

我以我血薦軒轅

徐文立◎著

黑色文庫——勞改基金會出版

黑色文庫第一集

我以我血薦軒轅



徐文立◎著

勞改基金會

獻給我親愛的人——彤和瑾

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

——卡爾馬克思

有所作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徐文立和妻女攝於七十年代



■徐文立和母親與兄弟姊妹



■徐文立的父母親



■女兒徐瑾八歲時



■徐文立與女兒



■1987年徐文立在獄中已七年，他的妻女是他情思所寄



■一家終得團聚，1995於黃山



■九十年代獲自由後的徐文立



■1997年徐文立、賀信彤伉儷。一年後他再度入獄



■1997年的徐文立



■三十歲的徐文立和一歲的女兒



■在獄中大部分的牙齒都脫落了

出版緣起

勞改作為中共專制統治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遠在其建黨未久，在其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根據地」已存在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參照了當時蘇聯的勞改制度，在斯大林派來的「古拉格」專家指導下，溶合了毛澤東的「改造與生產結合」的思想，發展出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制度。勞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滅犯人的獨立人格和意志，剝奪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並美其名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這項龐大的無償勞動力，為共產政權創造財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國的勞改犯就被調動去築路架橋，修河造壩，挖煤墾荒。這些無聲無息的奴工為共產政府獻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沒有人記得他們。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生命價值的輕賤和蔑視，直接造成了對中國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殘。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

束，原始瘋狂的暴力行為和愚民式的政治運動逐漸式微。而鄧小平為爆發戶和拜金主義者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了社會發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從粗暴進入俗媚，從暴戾走向糜爛。一個經過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幫、反精神污染這些顛倒黑白是非，絕滅人性，輕視知識和道德長達四五十年的社會，如果不經過反省，懺悔，痛定思痛和懲惡撫善的過程，怎麼可能就直接跨入現代化的社會呢？無可諱言，改革政策以來，中國在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變化，但是毛澤東架構的極權政治制度，包括勞改制度並沒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社會必須經過徹底的反思，對災難的根源進行檢討和思辯，重新認識知識和道德的重要性，中華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義精神才有復蘇的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荒謬無知的悲劇重新上演。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十年的毀滅性破壞，得有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這樣的淨化過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體制內，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漸開展。

作為社會最底層的勞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犧牲者。以往共產黨將人任意劃成不同的階級。以階級分貴賤，以階級區分天堂和地獄。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階級出身、思想意識、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甚至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原因，被共產黨政府送去勞改。勞改營裡，在「強迫勞動」、「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靈魂、脫胎換骨的嚴酷環境下，人被剝奪了意志、尊嚴、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尚在備受折磨後，幸能存活，心靈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

蹂躪和殘害也萬難癒合。人們在尋求歷史的真實面目時，那個時期裡，人爲因素所造成的歷史災難，特別值得我們警惕。歷史巨輪所輾過的苦難者的經歷，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倖存者的故事永遠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勞改營倖存者的生活經歷和資料就成爲我們拂拭塵埃的歷史鏡子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塵拂。

勞改基金會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來，一直鏗而不捨地尋訪及收集勞改倖存者的事跡和證據，迄今已達五百餘份。在當前全球商業化的過程中，世界更傾向於資金財富的集中，文化事業的推動備爲困難。雖然在重商業，輕文化的趨勢下，不少倖存者非常艱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們的親身經歷寫了下來，卻苦於無處出版。還有一些人不具備寫作的能力，也有些人喪失了記憶的能力。那些來自勞改的呼聲和吶喊，那些血淚記錄的文字實在應該有一個機會被容納及保存。這是我們對子孫後代的負責，也是對公正及自由的承諾。勞改基金會願意，向散佈在全球，特別是如今尚在中國大陸的勞改倖存者繼續徵集資料，整理、編輯並出版這些文集。我們稱之爲《黑色文庫》。

勞改營是中國畸形社會的縮影，它的倖存者就如但丁《神曲》裏那些經過地獄煉火煎熬過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烙在這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賤民身上的，是專制政權掌控下國家機器的鐵的印記。勞改不僅對這些受難者摧筋斷骨，殘其軀體，還對他們洗腦換心。他們有些進去時是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來時已是白髮人；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這個大煉獄，也跟知識和資訊長期絕緣。因此倖存的生還者中大智大勇者有

之，圓滑機靈生命力特強者有之，至於心智消磨殆盡，看破紅塵，苟延殘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庫》就是要保存這些人的聲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樸的記錄，我們都願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們也都不加文飾，原文照登。相信讀者自能判斷。遇到當事人自己不能親自執筆的情況，我們則盡量以接近原始敘述的語調和情感予以記錄，以求傳真。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經歷了「失語」的時代，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又想把中國人變成一個「失憶」的民族。讓我們來記錄歷史，為專制政權譜寫輓歌，為民族喪失的記憶招魂。

《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十月于華盛頓

序言

吳弘達

這是一篇很難寫的序文。

首先，作者如今還在坐牢。按刑期十四年算，才過了四年，還有十年。誰知這十年中，徐文立本人，中國以及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作者在一九八一年被中共當局判刑十五年。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共將他作為政治外交的一張牌，他獲得了提前釋放。可是，他不願意被放逐到國外，僅與妻女相守度日，也不甘心做一個俯首貼耳的順民。於是，一九九八年又回籠了。

本書中收集的文稿截止到一九九八年。我相信作者不會就此噤聲停筆。他會持續自己的「事業」，包括寫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這樣一個人的歷史地位及社會價值既不可簡單地從他已存在的文稿及社會活動中去判斷，亦不可以今天就輕易作出結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者開始坐牢時，寫了「我的申辯」這部分。因為他自信不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份子」，他堅信中共會給他「公正地解決問題」。由於徐文立從少年時代就崇敬及追求馬克思主義，可能也認為中共與他信仰一致，所以他的不幸遭遇是一種歷史性的誤會。他大概認為這個悲劇既不是必然的，亦是可以避免的。在這兒作者激昂地吶喊，讀了使人蒼蒼茫茫。作為旁觀者，我們知道這淒厲的喊聲，撞擊在專制極權的萬里長城上，是引發不出反響的。

作者在字裏行間，特別是在詩歌部分流露著對人生的愛惜，對妻女的眷戀，對真理鏗而不捨的追求。這些都會是他信步勞改庭院中的精神支柱。合起書卷，閉目沉思：孤燈下，一位憔悴的婦女十數年來，如何度過那孤寂的日日夜夜；在異鄉異域，消瘦單薄的女兒怎樣咽下了淚珠兒，為老父奔走呼喊。為什麼這個自稱具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社會竟如此無情？

在書中的第三部分讀到徐文立在九十年代期間，享有自由的那幾年，孜孜不倦地跟朋友和同志們一道，思量研討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並深入城鄉各地進行實地考察，試圖了解中國社會不同層面所積壓和新生的危機。幾經沉浮，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思已經轉化成對人權和民主法制的追求。這就成為他二度入獄，被判重刑的罪名。為什麼偌大的中國容不下一這麼一介書生？

西方有句話「革命吞嚥自己的孩子」。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遠離「革命」了，「吞嚥孩子」的行為可以休矣。否則它終將被自己的孩子吞嚥。

目 錄

009 / 出版緣起——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013 / 序——吳弘達

019 / 第一部分：我的申辯

223 / 第二部分：獄中詩鈔

247 / 第三部分：對中國民主人權問題的一些思考

247 / 自然 社會 人

249 / 彈淚男兒亦英雄

253 / 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先生的談話

269 /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與韓東方對談

288 / 就中國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294 / 積極回應達賴喇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呼籲

296 / 致九屆人大的嚴正聲明

298 / 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一九九八年

四月二十一日與安琪對談

附錄

329 / 中共政府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後的法律形勢——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秦永敏

334 / 申請建立《中國人權觀察》致中央的公開信 徐文立

339 / 徐文立年表

第一部分

我的申辯

如果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我就不必申辯。

如果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終究會公正地解決我的問題，我就不會申辯。

特等獎賞

我坐牢已經快四年了。

去年元旦，女兒來信告訴我，她正看「《尼爾斯企鵝旅行記》，是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女作家的作品，是日本彩色動畫片，好看極了，一共五十二集，我希望，演不了幾場爸爸就回來和我一起看，你得答應我抱著我看，我好久沒和你撒嬌了。」

今年大年卅，女兒又來信說：「我給你寫這封信是在三十的早上寫的。我在想：人家過三十都是一大家子在一塊團團圓圓的，可是咱家。唉！沒辦法。不過我堅信咱家今後會永遠團聚。」

這十歲孩子家的話，字字句句炙我的心。

這字字句句又溫暖著我這囚徒的心，這是一個囚徒所可能得到的特等獎賞——妻子和女兒深沈的愛，這是愛的獎章，我想這恐怕也是任何一個人難以得到的特等獎賞，期盼著早日去領受。

盼望總有憂慮伴存。她們既盼著我早早回去，又總是怕，怕我不能完好無缺的回去。

更怕：萬一，萬一回不去……

我從她們的封封信，言言語語，閃著淚花的雙眼裡看到了這種與盼望伴存的憂慮。雖然，這種憂慮大可不必：一，我絕不會輕生；二，我清清白白，用不著越獄，用不著逃跑；三，我身體很好，沒有任何足以致命的疾病。所以即便有喪盡天良的人想加害於我，也難於找到向世人交代的藉口。何況，當今中國，正義和公理占著絕對的上風。可是，作為親人的她們怎能沒有這樣的憂慮呢？

痛苦的鳴咽

有人說，男兒的眼淚比金子貴。又有人說，會哭的男人是好人。我會哭，我哭過，我是個好人嗎？我是個好男兒嗎？我的眼淚不如金子貴嗎？

八一年八月一天的深夜，在K字樓的二街十三號。

這一夜我失眠了，這在我一生中是極少有的。夜極深了，我昏昏然，突然了打一個寒戰，我驚醒了，發現自己在哭，在痛苦地嗚咽，聲音很小。

同監的那個人也醒了，他吃驚地問我：「怎麼？你怎麼哪？」

我一時語塞，好半天才哽咽出一句一字一頓的話：「我居然成了反革命！」

「唉！別想它了，睡吧！」他說。

莫非他真的是「釘子」，夜裡也這麼警覺？或許是這種嗚咽的哭聲有特異的穿透力，能把別人在酣睡中喚醒？

無光的童年

我故鄉在長江中游，是個有名的碼頭——安慶，更具體一點可能是懷寧縣石牌鄉。

安慶的像徵是臨江寺和臨江寺的寶塔。登上這個塔，可以看得見對岸，和很遠很開闊的江面。塔有七層，至多五十米，到了頂層向下看去卻能使人暈眩。膽量特別大的人，竟敢爬出頂層的小窗戶，站在陡峭的瓦沿上，去攀抓那盞照耀東去西往的航船的明燈。我不

敢，可佩服這種人的勇敢。我只是在十一歲左右，在這裡生活了近三年，尚未充分領略這歷史名城的風采，就匆匆離它而去了。

抗戰勝利在即的一九四三年陰曆六月初八，我誕生在抗戰的前線——江西安福。當時，中國人都在盼著抗戰的勝利。這天天氣奇熱，有幸來了一場暴雨，在涼爽中我落生了。爸爸以順利為吉，給我起名叫「利」。我輩逢溫字，叫溫利。父親死後，伯父以為「利」者，貪圖小利也，主張改名為「立」，許是老人家勵我自立圖強。參軍後，沒有人肯按我的輩份，把我名字寫成「溫立」，而俗寫成「文立」。眾意難拗，這樣我才有今天這第三個名字：徐文立。

在我前邊，父母已經造就了七個孩子，中間早逝三個。除了二哥長我四歲，其他哥姊都比我大十歲左右，大都在外地上學，偶然回來並不跟我這個小不點親近。

當我記事的時候，可能是五歲，家裏已搬到那個「環滁皆山也」的滁縣。對於江西，只依稀地記得，家裏曾到過南昌附近，景色奇麗的桃花島玩過。到滁縣，家住在縣裡的頭號大地主金家大院裏。當時的金先生辦一所鄉學，他自任校長和教員，近於免費的讓鄉親的孩子們上學，他對佃戶的租子也不催逼，所以在鄉裏頗有人望。解放後，政府特別定他為「開明紳士」，子女也都在政府機關供職。長子曾隨彭總赴朝鮮任英語翻譯，後又曾隨中國乒乓球隊，作為新中國第一個官方代表團成員正式訪問了美國，為打開中美關係作了貢獻。

爸爸整天忙於醫院的公務，不記得他有過星期天。記得只帶我們去附近的教堂和遠處的椰呀山玩過一次。也不知道媽媽整天忙什麼，從不關心小孩子的心裡需要，不跟我玩，也不買玩具給我。我對於當時這個家，最有感情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每天下午給吃一芽南式的月餅，總覺得很香，因為我每天這時也覺得餓了。再一件事，就是等爸爸回來，我給他拿拖鞋，然後可以參加他和媽媽，或和客人們的談話。我小，他們不背著我，有時我還能插上一、二句引大人們哈哈一笑的傻話，所以在家中享有這陪坐的唯一特權。

這大院裡，也沒有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和我一起玩。我的童年就是在這種並沒有愛，沒有玩具，沒有友伴的無光的世界中度過。相反相成，這反而促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對愛，對玩具，對友伴十分敏感，有著異乎尋常的追求。

譬如對玩具，當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時候，我和妻子的工資都只有三十幾元，加上各種補貼不過八十元出頭。孩子的哺育費至少花三十五元，就這樣我們還是要擠出一些錢，給孩子買些玩具，雖然還不到富裕人家的高等水平，但也不低於中等水平。當生活有所好轉，更是如此。記得八一年初，我們住的樓房火災，孩子大舅從新加坡寄來一百元，我當即想到的不是添置什麼家具，而是全用於給孩子買了一輛五洋牌的小折疊自行車。我和我妻子都決心，自己再苦再難，也要讓我們的孩子，享受到我們倆童年都沒有享受到的一切樂趣。

童年的「朋友」

如果勉強要算朋友，在小時有過二個。

二哥有兩次做過我的朋友。第一次，是他在跑跳時，不慎摔斷了小腿，只好臥在床上。媽媽怕他呆著煩，在單人床上套了一張長桌，讓我陪他下軍棋。我不會玩，他很讓著我，玩得很開心，他成了我好朋友。第二次，是爸爸死了，媽媽替班去了，每天我這九歲的小男孩做飯，做好飯之後，先到汽車車站上等媽媽。等她回來炒菜，然後再到附近早已上了燈的新華書店裡，把二哥從書的迷宮裡叫回這個世界。他總誇我對家務事很能幹，對他自己又把時間忘了，向我表示一點無聲的自歉自責，使我很得安慰。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小時的朋友。

我小時的另一個朋友，叫李福根。我四十多年來，接觸到許許多多的人，能記住名字的，至多不超過幾十個。我很愛不知不覺地抹去不必記憶的事情。但是，這李福根的名字，並非有意，我卻牢牢地記住了。他是我父親的勤務兵，實際上在我家做伙夫的工作。他很喜歡我，幾乎每天都要帶著我出去玩。他怕我走累了，走著走著就把我放在他那個寬闊，堅實的雙肩上。我們常走到縣城去趕集，走過那座旱橋，他總歡買那種又鬆軟，又熱乎的芝麻燒餅給我吃，那燒餅的香味我至今不忘。他不怎樣跟我說話，可能我太小，不會和他對話，也許這位貧苦農民出生的老兵不苟言談。

一般孩子不是在父親的寬闊、溫暖的肩膀上長大，也享受過這種溫暖的寵愛？可我卻從未享受過這份幸福，從這位善良的老實人寬闊、堅實的雙肩上，享受到了這種溫暖，所以雖然我們並不怎麼交談，但心卻相依著。他是我童年的朋友，一直到全國解放。也不知今日他還在人世否？又在何方？我想念他。

我這老朋友，當年的年齡可能有五十歲，爲了掙幾個微薄的軍餉，寄去孝奉孤寡的老母而當兵。我真爲他這麼大年歲還當兵，還那麼窮而不平。

人世間的不平，在我幼小的心靈上，還曾劃過一道更深的痕跡，就是金家大院不遠處的地棚。這棚成三角狀，乾樹枝上搭著破席，蓋著草，難民們就只隔著一層稻草，睡在地棚上。在有陽光的日子裡，難民們就脫下他們唯一的破棉衣，捉虱子，捉到放嘴裡咬得嘎嘎嚮。這地棚雖不是年年有，但在那十年有九年滂的黃淮流域，卻是常見。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金家大院。潞縣是個小縣城，除了有椰岬山，醉翁亭這些名勝之外，是窮縣，可金家房子卻是西式的二層洋樓，有寬敞的大陽台，有許多房間，我們二大家子住，還空了許多。後院是花園，一個排球場。這在整個舊中國的鄉村，恐怕也是數得著的一等私宅。特別是到收成季節，推著「江洲車」來交租子的隊伍，像條長龍，只見頭，不見尾。這就是人世間的不公平。它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靈上，這對我日後的性格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我在日後的生活，中，稍見不平事，就極容易激動，一激動又往往難以平復，非要幹點什麼不行。

第一啓蒙人

我的童年幾乎全部是在戰亂中度過，總是搬家，我們家的孩子都從小練就了整理東西和捆打行李的本事。我也記不清上過多少小學，轉過多少次學，我從小沒有可以稱得上啓蒙的老師。若能算我人生的啓蒙老師的，是我二位早已去世的親人。

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外婆。

我爺爺奶奶在父親年輕時就已去世，與我們最親的隔代長輩就是這位孀居的外婆，我們都尊稱她「奶奶」，現在我尊稱她是「聖奶」。因為她常說的那些極普通的話，都極靈驗、正確。她對我們說，任何人不應該看不起有各種難處的人。她愛說：不做姑子（尼姑）不知頭冷。是啊，事隔三十年，我這個囚徒總算嘗到了我母親四十做寡婦的艱辛，因而自責自己過去對母親的敬孝不周。

聖奶生長在農村，從小做農活，養成了她終生勤勞、善良、愛整潔的品德。年至八、九十也不肯讓別人替自己整理房間和身邊瑣事。她八十三歲還能不戴花鏡，爲她三個最喜歡的隔輩人作棉坎肩，我，小表弟，大表哥一人一件。她年近九十的時候，還給大表哥照看過二個才一、二歲的曾孫。

她老人家最值得人崇敬的品德是她的寬厚和仁慈。在我和她共同生活的三年裏，從未見過她生別人的氣，也從未見過她讓別人生氣。

她嫁的是城裏望族胡家，同名揚四方的「胡玉美醬園」的胡玉美是本家。姑嫂妯娌眾多。據說，逢外婆有了不舒服，出了嫁的姑奶奶們都專程回來幫她照顧孩子。這在那封建禮教色彩甚濃的社會裏是不多見的。這就是她爲人的魅力和吸引力。

她一輩子生了十二個孩子，孫男嫡女，親戚朋友，從未有一人說過她的不是。她又不是那類「和事佬」式的老好人，是非十分明白。常常調解糾紛，勸慰受欺者，批評欺人者。她總是平等地待每一個人，擺得公公平平，無不悅服，無人對她有所嫉恨，相反大家都敬她愛她。有次，她姪子得知她回到安慶，立即從幾十里外趕來，接她老人家回娘家看看。她姪子五十多歲，又跛腿，讓他兒子推著「江洲車」，載著姑奶奶，自己一瘸一跛，畢恭畢敬在旁伺候，又行了幾十里才回到家。其誠其敬，我至今不忘。我也是那次平生第一次回到皖南的鄉間：那厚實的稻草覆蓋的草屋，屋頂上站立的那半人高的五光十色的蘆花雞，漂亮極了。

她是年滿九十，得子宮癌去世的。去世前，她極不安地對她一手照看大的孫女說：「奶奶前世造的甚麼孽哦，老了得了這個病，讓你跟著受苦！」她不是爲自己的病痛難過，是難過要讓孫女每天爲她洗血褲，這是她從未有過的事啊！

她死的時候，住的那條街上家家戶戶都送了幔帳和花圈。出殯那天，全街傾室而出。出殯的隊伍頗壯觀，行人還以爲去世了一位甚麼知名人士，沒想到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太婆。不，她不普通又普通，她就是中國式母親的典型。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啓蒙老師，

正是她教我做人要寬厚、勤勞、善良。

我和她老人家生活在一起的三年，是我少年生活最愉快，最難忘的三年。我從她老人家口中，知道了中國推翻帝制的英雄們的業蹟。她特別講過徐錫林的死。她說：「徐錫林也算你們本家了，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未遂而被捕。砍頭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身上貼滿了紗布，蹬著重鐐，走過安慶的青石板路，死也不肯低頭。聽說，對他執行的是叫『披麻帶孝』的酷刑，一片片連肉地撕下紗布，叫『凌遲』，然後才砍頭，真慘哪！」我都聽呆了。這就是我奶奶在我的腦海裏樹起的第一位英雄。

後來，她對我說過秋瑾，所以我的女兒也取「瑾」為名，便是對秋瑾女士的崇敬和紀念，和對奶奶的深深懷念。

第二啓蒙人

我的爸爸堪稱我的第二啓蒙人。

爸爸青年時是熱血人，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不幸被軍閥政府逮捕入獄。家人將他保釋出獄後，遂即送鎮江上學。他畢業於鎮江醫學院，留任助教、講師。七七事變，醫學院向大後方撤退。他當時出於抗日的愛國熱誠，經同學介紹，棄教從軍，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在江西前線的野戰醫院任軍醫。因他醫道較高，工作負責，很快提升為醫

務長，抗戰結束前升任院長。在這次全民抗戰中，我們家獻出了三個孩子的生命。其實當時並沒有得甚麼大病，只因缺醫少藥，爸爸一心掛在工作上，即使任了院長，凡是大一點的手術都必由自己親自動手，最長的手術能達六、七個小時，無暇照顧自己的孩子，又不肯隨便動用軍醫品，三個都已三、四歲，五、六歲的孩子，就這樣相繼死去了。如果爸爸果真像後來「三反五反」運動中，被無端指控的貪贓枉法的人，他身為軍醫院院長，我這三個兄姐是斷然不會全都病死的。

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發動內戰。爸爸因此對國民黨大失所望，他多次拒絕參加國民黨，後來醫院國民黨特工利用一次開會，照全體像，突然宣佈所有照像的醫護人員集體參加了國民黨。這樣他才成為國民黨員，可能後來還硬性任命了他一些甚麼職務。內戰爆發後，在反對內戰的思想指導下，爸爸在滁縣國民黨後方醫院任院長時，私自放走了二名剛剛醫治好的受傷被俘的新四軍高級幹部。我那時雖小，在旁聽他和媽媽的談話中知道的（此事需進一步核實——作者註）。那時，他每天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坐馬桶，同時跟媽媽談話。幾乎每天都要罵院裏的特工搗蛋。有一次就談到那件事是如何遮掩過去的，那是朋友們多方幫忙，偽稱新四軍幹部是自己逃跑的。特工查不出我父親私自放人的實據，當時戰事日緊，還需要爸爸當院長，所以只給了一個失職降銜的處分。直到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大學南撤時，爲了籠絡人心，才給爸爸一個少將軍醫銜。此銜並未實授。文革中我二哥無辜受審查，外調人員從敵偽檔案中發現，我們才知道爸爸是少將銜軍醫。

爸爸私放新四軍幹部的事，過去我們家人從未提過，我估計爸爸解放後也沒有提過，以免有邀功之嫌。可是文革給人的教訓太深刻了，過去的歷史不論是好，是壞，都應實事求是地講出來，不然救人者和被救者都很容易被人蒙上不白之冤。

自從爸爸放人之後，就處處受到醫院特工的刁難、掣肘和監視，也促使他對國民黨更加不滿。一九四八年，爸爸醫院奉命撤退，本應迅速撤到福州渡海去台灣。後勤歷來先行，爸爸在一些部屬的支持下，清除了特工人員，遣散了醫治好的傷兵號，故意讓醫院滯留在福建南平一帶，等候解放軍的到來。當解放軍先頭部隊一到，我父親就立即率全院人員向解放軍三野投誠，並正式移交了全部野戰醫療器械和各種物資。他在解放軍部隊裏接受了一個月的熱情、真摯的款待，才回到家中。由於他當時對共產黨、解放軍缺乏深刻的瞭解，考慮到家屬多，不便隨軍，就謝辭了部隊首長的一再挽留，由他的老同學，當時任三野衛生部長的葉伯伯介紹到福建省鼠疫防治所工作，全家被安置在福州兩湖一水相連的著名的龔家大院居住。據說，這是一位前清御醫的私宅，耗鉅資仿頤和園的某些格局修建的，此院後改爲福建省的交際處。

解放後，爸爸對共產黨清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的工作尤爲敬佩和擁護，每每回家來，都要高興地給孩子們讀報紙上的新聞，不住地說這條好，那條好。然後與孩子們討論，我雖插不上嘴，也聽得津津有味。在他的影響下，大哥一九五〇年主動放棄了投考大學，帶頭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的志願兵，在部隊服役至今。爸爸當時也有顧慮，一是擔心孩子上

了戰場，出三長兩短；二是考慮到大哥功課不錯，又是學生會主席，應該考大學深造。當大哥說，正因為自己是學生會主席才應該帶頭參軍，保家衛國，他也就毅然同意了。現在回想起來，後來二個姐姐在學生時代就入了黨，哥哥姐姐都能積極學習和工作，大學畢業後都成了科研戰線的骨幹人才，我也從小養成關心國事的習慣，都是和爸爸的「飯桌政治」的薰陶、感染分不開的。可是沒想到，防治所在「三五反」運動中，僅因為爸爸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和舊軍醫，就毫無根據地把他定為「大老虎」來打，被關到所裏，不許回家。說甚麼「無官不貪」，「他當偽院長的一定有貪污」，不承認就不讓睡覺。面對著大電燈炮烤，叫作「熬鷹」。他實在熬不過，勉強承認有貪污，所裏就來人抄家。其實家中並無金銀財寶和貴重物品，他們就把我母親娘家陪嫁的金銀首飾、私房和一些稍為值錢的東西當贓物抄走了。所幸的是這股風很快被上級制止了，把爸爸放了回來，也沒作甚麼結論，抄走的東西也沒退還，就不了了之了。爸爸雖覺得冤枉，但對於這一次受審查並無怨言，相反認為，反對貪贓枉法這種精神總的還是對的。他又很愉快地接受了將他調至古田縣醫院任領導的安排，不久因福州防治所工作仍然離不開他，又調回所裏繼續任細菌室主任的職務。一九五三年初，抗美援朝臨近尾聲，可美國卻把細菌彈投到我福建地區，爸爸奉命帶隊，赴閩南細菌彈受害區。他為了儘快控制受害區，搶救傷病員和採集新鮮細菌樣品回來研究，率領十幾個醫護人員，不顧大雨滂沱，日夜兼程。八閩公路坡陡彎急，多臨懸崖；閩江春汛乍起，山洪翻滾。美蔣特務為阻止他前往，狠毒地將救護車顛覆，栽入滔滔閩江

之中，爸爸與同車醫護人員其中的六位，一起不幸身亡，時年四十三歲。那時我才九歲。當時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親自簽發了追認爸爸為革命烈士的證書（榕字00001號）。可是，文革中一些人出於打擊、迫害老幹部的目的，又把我父親打成了「軍統」特務，取消了革命烈士的稱號。後經我們多方申訴，至一九八一年才得以糾正，為爸爸恢復了名譽。

爸爸生前幾乎無暇照拂我，但他正直、愛國的短暫的一生，給我留下了最寶貴的遺教。

我母親對我的影響不大。她長得美麗端莊，很像我外婆，可惜我的姐妹們都沒能充分繼承她這一優勢。她很內向，性格堅強，樂善好施。她不像解放前那些閒著沒事幹的官太太，她不愛打牌，年輕時也不怎麼到處去玩，偶爾看看書。我少年時，她只是在一件事上，從反面給過我極深的啓蒙。那是在老家安慶，一天我和鄰居的小孩玩耍，吵鬧了起來，我受了點委屈，正巧趕上媽媽從外邊回來。她分不清是非曲直，就到人家那吵鬧一頓。其實小孩吵架多是無謂小事，何況我也有不對之處。可媽媽絲毫沒有批評我，一味的偏袒我。事後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過去媽媽關照我雖然少，但她在我的眼裏是完美的。我是第一次看到媽媽也會這樣厲害，甚至不太講道理。可怕的是，她讓小孩子看到了母性自私的一面，破壞了母親在我幼小心中的完整性，我猛然感到與她有了距離。現在想起來，她當時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唯恐孤兒寡母在外邊受人欺負，所以要厲害一點。可她忽

略了另一面：小孩子也會思想。母親在孩子心目中的形像是完美、崇高的，不要有意無意地損害它。這也使我懂得，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偏袒自己的孩子。

一樂即悲

老話說：「樂極生悲」。可我小時卻「一樂即悲」，有二件實例。

四八年初，家隨著爸爸醫院南撤到了南京。夏季的一天，大人帶我去看電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電影。電影對於我這個鄉巴佬，自然很新奇。我才五歲，內容是不懂的，依然興高彩烈。好景不長，不到半場工夫，我這在滁縣曠野裏長大的小孩子，開始受不了這影院的憋悶，恐怕當年也沒有冷氣和空調，我越來越不好受，不由地大叫：「我要吐！」攪得周圍的觀眾老大的不高興，家裏人只好趕快抱我到休息室去吐。真是：一樂即悲。

無獨有偶，家剛剛搬到福州，伯父的朋友便高興地帶我去南台玩。那時騎自行車與帶人，我就坐在前橫樑上，坐得很累了，才來到南台。天色已晚，南台的燈火齊明，無數的霓虹燈閃爍著。哦，真好看，好開心，我竟然在車上手舞足蹈起來，車頓時失去了平衡，只聽「啪」一聲，我、車、大人一齊摔倒在地，更不幸的是我的右腳丫被前護泥板劃破了一個三寸長的大口子，深可見骨。我也不知痛，也沒哭，只見血流遍地，到了醫院縫了二十幾針，一夜工夫血染透了墊腳的枕頭。至今我的右腳留著一個嘴巴大的疤痕。它時時提

醒我：樂極生悲。

一場惡夢

我睡覺不愛作夢，但必竟作過不少夢：「夢斷難尋」，幾乎沒有記住的，但小時的一場惡夢卻記住了。

那是剛到福州不久，住在龔家大院的時候。我家住在一個二層的中式樓屋裏，此樓青磚青瓦，油漆彩繪，古色古香。大飛簷寬敞廊，室內屋高六米以上，一明四暗，檀木雕花間壁。前樓有假山、小橋、流水，不遠是主人家老夫人拜佛的水中禪堂，遠眺可見秀麗的西湖。

七歲的那年我出疹子，白天昏睡時，突見牆壁上一個人頭。瞬間，人頭越幻越大，大得十分怕人。他手持一根大針向我扎來，我大叫一聲「啊！」這驚恐的聲音喚來了所有在家的夫人。媽媽趕緊哄我：「乖乖，不怕，媽在這兒。」這時我心才定下來。媽問我怎爲了，我告訴她看見一個怪物要扎我。媽媽趕忙告訴我：「那不是真的，是夢。」說也怪，自從這夢過後，體溫也降了，身體也慢慢復原了，但這個夢卻忘不了了。

見義勇爲反遭殃

在我身上留下第二處傷疤的，還是在福州。當時我剛上小學，下午沒課，午睡之後，就從大姐手裏接過一個大西紅柿，站在門口一邊吃，一邊望呆。這時只見一隻小狗很厲害地在追逐一群上學的小孩，嚇得孩子們狂奔，那小狗還緊追不捨。我忙從當時每家門口都有的防空襲的「防火沙箱」裏，抓起一把沙子，就朝那小狗砸去。沙子剛剛出手，就不知從哪兒竄出一條大狗，撲向我大腿，咬了一口就跑。當我嚇呆時，那狗早已無影無蹤，我便嚎啕大哭起來。大姐聞聲跑來，見我被狗咬，抱起我徑直往醫院跑。當醫生問我，咬我的狗是不是夾著尾巴的，並告訴我姐，瘋狗才夾著尾巴，人被咬後要得狂犬病的。可是我卻說不清。這狗對我來說，幾乎是來無影去無蹤。後來，鄰居們又說，要是讓瘋狗咬了，可不得了，肚子裏會長小狗，人要瘋，直想往牆上爬。嚇得我全家人不知如何是好。那時爸爸又死了，只好趕快請在福州協和醫院當會計主任的伯父想辦法。伯父找遍了全福州市大小醫院，總算找到了幾十針「狂犬疫苗抗清」。這倒楣的「見義勇為」，害得我屁股挨了半個多月的扎，一天二針，左右開弓，打得走路都走不了，以致日後一見打針就緊張得不得了。可是，我並沒有吸取教訓，以致一而再，再而三的因為見義勇為，打抱不平而吃虧。

福州，這美麗的榕城，自然不會只給我留下這二塊傷疤的記憶。

福州，美麗的榕城，我忘不了那鮮美的荔枝、龍眼、特大的西瓜；我忘不了龔家大院那亭台樓閣，西湖的碧波千頃，鼓山的神奇泉湧。我更忘不了，閩江入海口處的一對大腳

似的巨石，因為是它們，挽住了我爸爸那在洪水中飄蕩了七天七夜的可憐的遺體不致被魚蝦吞食。

爸爸一身中山裝完好無損，派克金筆、懷錶也都在。據有經驗的漁民說，這是奇蹟，一般都會被洪水衝剝得一乾二淨。大伯不讓我和媽媽去看，只帶大姐去收殮了遺體，並安葬在福州烈士公墓裏。我爸爸的遺體就這樣神奇般回到了家所在的福州。這雙腳巨石，我雖未曾親睹過它們，卻怎能忘記？我相信，終有一日我要親眼看看它們，親手撫摸它們。

難忘的羞恥

我的小學是在不斷搬家，不斷轉學中度過的。光在福州就搬了四、五次家，五四年又從福州搬回老家安慶。我上過的小學的名字只記得一個，安慶的墨子巷小學。小學的同學也只記得一個名字：翁開捷，是福州的。我回到老家與他通過信，可是同他的友誼是怎樣建立的卻全然忘記了。對於友誼如此健忘，實在對不起朋友。至於恩師嘛，實在談不上，只有一位老先生在安慶小學時，講的一個故事卻記在腦海裏了。他講，從前有一個讀書人，讀了一輩子書，也失意了一輩子。臨死之前自己立了一個石碑，上面刻道：生不逢時，奈何！奈何！

看來，人不但要好好讀書，還要生逢其時。

然而，我這個小時頗爲頑皮的孩子，小學的書就沒有讀好。那時，上初中的競爭不亞於現在上高中，我第一次考初中，卻名落孫山。初中都考不取，這實在太打擊人了，也太羞恥了。這羞恥我揹了二十多年，直到爲了鼓勵自己孩子好學上進，才鼓足了勇氣在獄中寫信告訴她，作爸爸的曾有過不用功讀書而落榜的羞恥。從揹上這羞恥到敢於對自己孩子講自己的羞恥，是一大解放，包袱這才放下。人，有點自信的人，內心驕傲的人，要公開承認自己的一點醜事，真是頗費周折啊！

初中沒考上，媽媽把我送進一個補習班。補習班有許多農家的子弟，是爲了考城裏中學特意到城裏補習搞小功課的。這些同學生活條件很艱苦，讀書都很用功。他們每月才能回家一次，然後帶來米自己做，就著鹹菜、辣椒下飯。他們的刻苦、用功給了我很大的促動。

羞恥和促動使我開始懂得發奮讀書了，所以我後來到了東北就很順利地考入了當時長春的第一流中學——長春師大附中，前身即東北師大附中。

離家遠行

我補習一年，大姐來信決定讓我去東北上學，由她負擔和管教。

媽媽是在爸爸去世後到所裏接的班，可她因爸爸突然去世打擊太大，身體一下子整個

地垮了。兩次大出血，動了二次大手術。那二次，我等在車站久久不見媽媽回來，真是心焦無主，欲哭無淚。每次都到了很晚很晚才盼來了媽媽同事，來帶我和二哥到醫院去看媽媽。媽媽這時已難以堅持工作了，就申請病退。領導上只同意按提前退職處理，媽媽拿了幾百元退職金和爸爸的撫卹金，帶著我和二哥，又接奶奶回到老家。坐吃山空，她只好把安慶近聖街一所三進一樓的祖居賣了，以維持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生活費和兩個上大學的姐姐的零花錢。五七年，媽媽已無力獨自撫養我了，就同意我去東北已工作的大姐那兒上學。

我離家那年是十三歲。離家頓然使我覺得自己已是個大人了。奶奶特意給我買了一個鋁飯盒、小電筒讓我帶著，就像是送一個出遠門的人。當時，我並不知舍戀地離別了奶奶、媽媽、故鄉，走向了人生。

第一件荒唐事

離家的時候，媽媽把我拜託給一位到天津看女兒的老先生。

江輪順利地靠了南京碼頭。成人之後，我才懂得江輪最舒服，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可少年的我，當時卻不曉得充分領略。下了船，來到了休息室，放在心頭很久的主意鼓動開我了：對，到了南京一定要去看看大嫂，那是我自己的親大嫂啊！我知道她在市糧食局

工作，那就坐車到城裏找人問唄！又怕老人不許可，我就自作主張，來個不辭而別。倒還順利，上車一問糧食局在哪兒，售票員就把我引到了新街口。我到了糧食局，人家說早下班了。可不是，一看天已黑了。好在大嫂一位熱心的同事，自告奮勇地把我領到了大嫂家，這可把剛過門的大嫂嚇了一跳。大嫂長得很漂亮，能唱一口好戲，個子矮點，但顯得小巧玲瓏，聰慧敏捷。她父親早年去世，老母故亡不久，獨自帶了一個傻呆的弟弟生活。那天我見到了他，他不停地用手撫摸和拍打他姐姐的銅床上的立柱。那立柱有一截被磨得特別光亮，可以看出他是怎樣依戀他姐姐的。他姐姐爲了哄他去後屋睡覺，又是給他奶糖吃，又是給他香蕉吃，他都不稀罕。大嫂說：「他全讓我給慣壞了，一點也不聽話！」後來我才知道大嫂對這個傻弟弟的溺愛和寬容，難怪每逢她到大哥部隊探親，把弟弟送到他哥嫂那裏，他就大鬧一場不肯去。他雖傻，心裏卻明白誰愛他、疼他。

大哥在我的心目中是陌生的。只記得他有一身當年看起來很威武的藍呢軍服，和他帶回的遼東青香蕉蘋果，最香最甜。可大嫂的高尚、美麗卻在我心中深深地生了根，我尊敬她。

當大嫂知道我是私自跑來找她的，真是哭笑不得，立刻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趕往水碼頭。路上，她問我：「沒吃飯吧？餓了吧？」我要強地說：「不餓。」她急了，說：「你這孩子，這麼小就這麼多規矩，我是你親嫂子！」她讓車先停停，去給我買吃的。我不肯，她又說：「哦，你是怕我不吃有豬肉的东西，我這回民嫁了你哥哥，雖不吃也不怕。」

她不容我拒絕，硬是買了許多吃的，再帶我趕路。趕到水碼頭，不見那位老人，又往火車站趕，才看見老人正翹首以待哩！老人見到我就說：「哎呀，你去哪裡啦！怎麼也不說一聲，把你給丟了怎麼得了，再說車這就要開了。」老人買的是船車聯運票，差點誤車。經大嫂一再解釋，老人才不數落了。後半程，老人一直生氣，嚴加防範，押著我直到分手。

寒冷的長春

這麼個冷地方，卻叫長春，也真是怪。

我大姐對於我也是冷的，自從我到了她的麾下，她除了開始每週為我洗衣服之外，便是管教，管教，再管教。後來她忙於寫情書，結婚，度蜜月，工作，自學，也就慢慢地把我給遺棄了。我這個家裏的小不點，沒有享有過溫存的母愛，但對愛卻異常敏感。大嫂的熱和大姐的冷恰成鮮明的對照，這在我稚嫩的心靈上留下的痕跡太深了。以後當我知道大姐因為和黨總支書記等幾個黨員，在組織會議上，向那位在文革初期頗聞名的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當時在東北人民大學，後調南京大學）的生活作風、工作作風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小集團，若干年之後才平了反這件事，雖然能諒解當時她對我的冷漠和理解她內心的煩惱，可是依然心結難解。當時，我畢竟是初次離家，遠行千里來投奔她的小弟弟啊！我雖然過去不用功，補習過一年，不是已經考上了第一流中學嗎？入學以後我的功課

也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啊！她對人的看法，也太一成不變了。這類人，口頭上是辯證法，事實上是形而上學。有恩不報非君子。我雖然總想在她的孩子身上報答她對我多年的養育之恩，可心底卻不感激她，也不愛她。因為我知道她心底裏看不起我，也不愛我，只是盡不得不盡的義務而已。

初中這三年幾個假期，那怕短暫的寒假，我也堅持要回家度假。自我上東北之後，二姐工作分配到北京水電部設計院，二哥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家就搬到了北京。我要回家，一是北京有吸引力，但實際上也沒有錢到處去玩。記得天壇還是在北京上學時才去過一趟，當時覺得從六鋪炕到天壇好遠啊。二是我想家，媽媽總比大姐對我親。那時的火車，逢寒暑假擠得要死，我又矮小，搶不著座，晚上就坐在通道上睡，有次險些給圍著我的人群擠得背過氣去，至今想起坐火車就發慌。盡管這樣，我也寧肯忍著，不能忍受自己親姐姐那種沒有愛的冷臉。

一強一弱二朋友

我在初中的兩個好朋友，是截然相反的二種典型：一個是典型的強者，另一個是典型的弱者。這弱朋友姓宋，名字記不得了。他一隻腿因小兒麻痺，失去支撐力，杵一根拐。小孩子的心有時既純潔又冷酷，不少同學叫他「宋癩子」，拿他開心。我從不，而且總是護

著他。他跟我最近，我倆又住在一個宿舍，真是形影不離。你別看他杵根拐，可靈便了。他一樣淘氣，能一瘸一拐地和我一起打籃球。冬天，下了晚自習，他還會和我一起，去扒拐彎慢行的「磨電車」哩！冬天，電車的窗子結了一層厚冰，售票員看不見外邊，我們就大膽地幹這扒車的把戲，扒一、二分鐘到了宿舍胡同口才下來。宋就這樣和我大嫂的傻弟弟一起，成了我心中的少年朋友。正因此，我生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虐待，特別是對殘疾人的耍笑和嘲弄。我甚至一看見殘疾人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惻隱之心泛起。七九年，我一次見一個孩子，跪在人行道內側，伸手向人討錢。當我注意到他是失去雙膝的人的時候，人已走過去好幾步，可不知爲什麼，一種無形的力又把我牽回到他的跟前，掏盡了我身上僅有的幾毛錢，給了他，才安心離去，不然我很可能會覺得犯了甚麼罪。當然實際上那幾毛錢對於他也只夠一天的飯錢罷了。

那位強者朋友，叫朱延豐。我從沒有見過像他那樣絕頂聰明的人，一雙大眼，開闊高揚的前額。他和我在班裏是學習上的競爭對手，可我們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並不怎麼用功，可門門五分。不論大小考，臨時性的突然抽測也考不倒他，照樣五分。他的學習完全是融會貫通式的。我最不行的外語，對於他卻毫不費力，他能熟練地背誦全部英語課文。他父親是當年的吉林軍區政委，他是延安時代的孩子。他從不自誇，也不傲視他人，是我所認識的幹部子弟中傑出的那一類典型。他知道我家不在長春，就經常邀我到他家作客，待我親如兄弟。我以後回到北京上學，一直還和他保持著友誼。後來雖不知他的音信，我

的心卻始終懷念著這位少年時代的好友，盼著哪一天能在有所作為的人物的行列中，聽到他的名字。

難忘的一課

我初中時，正是提倡勤工儉學的時候。那時的勤工儉學很受我們同學歡迎，我學過做木工，做五十門電話交換機，還常到學校自辦的農場勞動。我們農場有汽車、拖拉機，還有三頭十分漂亮的高頭大馬。一次勞動回來，迎著夕陽回學校，快到學校的時候，在十字路口上，我親眼目睹了一場悲劇。我們同年級的一位女同學被一輛軍車撞倒壓死了。我和幾個同學嚇呆了，驚呼著奔向了死者，死者的肺和腦漿，粉紅色的，火熱，撲撲地作響。我們認出她是吉林軍區司令員的女兒。因為我們是見證人，被留下來作了證詞，很晚才回宿舍。我們惋惜這女同學的不幸，也關心著那司機的命運。因為我們親眼所見，這事故不怪司機，他爲了躲那位突然出現的不幸者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事情的結局，給我上了終生難忘的一課。

女兒的噩耗剛剛傳到司令員家裏，二位老人大爲震驚，並且不相信，但得知確實如此之後，二位久經沙場的老人幾乎昏厥過去。母親痛不欲生，父親沈默無語。是啊！怎能不悲痛？活生生的女兒，多聰明、靈利、漂亮的一個女兒，臨死前的一聲慘叫還是叫「媽」

啊！這是從戰火的硝煙下保存下來的孩子，竟然這樣早上出門，晚上就回不來了！多難以接受。

司令員先走出了痛苦，詢問了全部經過，又關切地問了司機的情況。他對妻子說：「孩子已經死了，不可挽回，只怪我過早地讓她騎車上街。現在的問題是那位司機，聽說已經把他嚇壞了，正被關押著，某某軍準備把他交軍事法庭處理。可是我想，現場的證詞和勘察都證明不能怪這個司機，這是個農村來的孩子，我們不能讓這孩子去受審，這樣做也不利於軍區和野戰軍的關係，妳看呢？」

他期待著他的老戰友。妻子的答覆很令他滿意：「那就快讓他們把那孩子放了吧，別讓他膽小，我們不會責怪他的。」

這樸素的話語浸人肺腑。司令員和他妻子的崇高形象，使我永誌不忘。不論是在那文革中的日子裏，還是某些人以權謀私十分囂張的時候，甚至我深陷囹圄的日日夜夜，正是這二位老夫妻的形象，使我絕不會動搖對老一輩革命者的信賴，對正直、無私的共產黨人的信念。因為這不是任何人給我上的一課，而是我親自目睹耳聞的事實。

第一名

初中畢業後，我投考本校的高中部，考了個第一名，三門二百九十多分，創了我學業

史上的最高記錄。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是，這次升學考試，不考外國語，讓我這個最怕死記硬背的人躲過了難關。再者，這次語文考試，作文占六十分。我曾有一篇作文很得老師欣賞。它記敘的是我和幾個同學爲「大煉鋼鐵」盡一份力量，爬到長春市下水管道網裏，收集當年日本人占領時留下的廢舊鐵管的曲折過程。經老師反覆幫助修改，成爲範文在學校內流傳。考試的時候，我幾乎是原文一字不漏地用了這篇現成的文章，得了罕見的六十滿分。可能正是這個緣故才使我名列第一，居然考在了朱延豐的前面，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長春師大附中的確是所好學校，不愧是全國有名的重點中學，正是它爲我人生道路奠定了堅固的基石。

這個學校的教師全部是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年紀輕，事業心極強。老師們每天除了上課，還陪著我們上早自習和晚自習，自己的孩子都托給別人代管。寬敞的教學樓和健全的文體活動設施，陰雨體育室，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尤其校舍搬進了原師大歷史系之後，同學大多數住校，宿舍還專門配有生活老師管理。在這所學校裏，我真是得益不淺，不然我這樣一個雙親不在身邊的孩子，怎樣可能從一個考不上初中的學生成爲第一名呢？

這個時候，北京在向我招手，少年的心總是趨往最強的誘惑。我謝絕了老師們的一再挽留，決定轉學到北京上學。學校特意爲我開了評價極好的介紹信，希望我能轉入北京師大附中。可是當時北京已經開始實行學區就近入學的制度，我只得入了北京七中讀高中。

入團

剛到北京的第一年是平淡的。

第二年的班主任，語文老師申學敬，開始注意了我的能力和班上的威望，他有意在班上的一些活動中讓我嶄露頭角。於是高二的時候，我被大家推選為班主席。我們年級有團支部，人數很少，可當時擔任班主席的幾乎都是團員，因此我成了重點培養對象。我功課和工作都很好，我們班開始從一個後進班逐步成為全校很活躍的一個班。因為我爸爸有歷史問題（實際上算甚麼問題？可當時就算有歷史問題！），我又不肯昧著良心，不顧事實地去一味批判自己死去的父親。加上那位女團支部書記，她的功課在全年級數得著的差，就憑是工人家庭出身（實際上解放前是賣炸油條的小商販），特別想在我入團問題上顯示她階級立場堅定，因此拼命從中作梗。經過反反覆覆，討論了三、四次，直到引起其他團員的眾怒，學校團委又出面干預，我才算入了團。

休學

六三年，高中畢業在即，我生活中出現了巨大的轉折——我決定退學，自學馬克思主義。在離畢業僅有二個月的時候，突然作出這樣一個對於我一生意義巨大的決定，主要有

三個原因。

一，自初中開始愛讀課外書，最入迷的時候是初二。有一次竟在課間操時，躲在老師的講台裏面看小說，老師來上課了，我卻不知道。等我不得不出來的時候，把那位女老師嚇了好一跳。高中之後，我主要讀傳記小說。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馬克思傳、恩格斯傳、馬克思青年時代、列寧的青少年時代這五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我敬佩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遠大抱負，和爲此不惜犧牲一切的奮鬥精神，認定自己就應該像他們那樣度過自己的一生。我自他們的經歷中發現，他們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沒有經過高等教育，馬克思在大學也是學法律的。他們創立馬克思主義，或繼承，或發展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自習而取得的。因此我也就認定要想真正學懂馬克思主義，必須在社會實踐中自學。

二，我對當時基本上是「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十分反感，認爲它窒息了青年人生機勃勃的精神。老師灌，學生記，回家背，簡直不叫學習，學生無疑成了只會背書的機械人。當時據我瞭解，大學文科的教學方式也大體如此。儘管當時我的功課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可我對考大學一點也不感興趣，而且暗自下了決心，決不考大學，我要到火熱的社會實踐中去自學。

三，中蘇關係公開破裂，中蘇之間開展了公開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把我深深地捲進了政治的漩渦。

當時這場大論戰被人們稱作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三次大論戰，是百年難逢的好時機。我眼前亮著強烈地吸引我的光。當時只有一個念頭，要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錯過這個時機簡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於是，我正式向學校黨委提出了退學自習馬克思主義的申請。這種情況，在中學生中可能是絕無僅有的。校黨委和全體老師、同學大為驚愕。除少數幾個同學支外持，絕大多數人強烈反對。剛剛從南昌奔外婆喪事回來的媽媽、二姐對我大失所望，一致反對。其他三個兄長也異口同聲表示不可理解，讓二姐全力阻止我這樣做。

面對二姐這個對手實在讓我難辦。二姐身材頗長，亭亭玉立，幹練，敏捷，待人誠摯，熱情。在我的諸兄長中，如果說我對二哥是尊敬，對二姐則是喜歡。她對我不僅規勸，施展了她作為技術幹部兼黨務工作者的全部能力，還特地帶我到北京大學她老同學那裏，讓那聞名中外的高等學府來吸引我。可惜，我是屬於打定了主意，絕不輕易改變的那種類型的人。爲了使我和二姐之間的友愛不致被破壞，我就以書面的形式與她辯論一番，就是那篇以二姐爲假想對立面，題目叫《我要自學》的終身宣言，全面說明了在許多人把學習大本大本馬克思主義厚書看成是不可思議的時候，我爲什麼突然決心退學自習馬克思主義的理由。經過反覆地辯論、談話，終於達成了妥協：學校批准我暫時休學一年。

事隔二十多年，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中蘇論戰的功過是非，已經可以看得更冷靜、更清楚了。但這畢竟是今天才可能得到的。也許未來的歷史學家們還會進一步修正

今天的看法；也許會爭執不休，然後才可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也許永遠得不出完全一致的看法。

如今看來，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那場論戰中，可能在潑掉髒水的同時，把可愛的孩子也一起摔傷了，以致發展成為「繼續革命理論」的荒繆。但是正是他們，在蘇聯某些（今天應該承認有功績的）領導人霸王作風面前所顯示的不屈品格，和堅持當時自己認為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所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無疑是值得後人理解和肯定的。今天的人們，一定會在潑掉髒水的同時，更聰明地把可愛的孩子保護、培育起來。

這就是我，一個當年毛澤東的追隨者的反思。

那休學的一年，我按自己擬定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目，進行了自學。記得當時我在擬定的書目的封頁，寫了這樣幾句話：雖有佳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嘉也。這一年，自學了馬克思主義原著；閱讀了大量有關第三次大論戰的資料；到河北東縣鹿的鄉村去考察了一次；每週週末到學校廚房義務幫廚一個上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現在的我居然被人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在我們這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度裏，誰都知道，衷心擁護，勤奮學習，努力實踐，並不斷追求馬克思主義之真諦的人，決不會是反革命分子。

有人可能會說，你當年自學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明你的過去，現在你變了。（變成了

反革命分子！)

我不禁要問：一個人要從本質上起變化，那麼容易？尤其是一個人自覺自願確立的志向，特別當這種志向是在少年時代就發自內心確立的。這種人本質改變了，你見過很多嗎？變質？談何容易。還是請繼續看事實吧。

摯友

一個人能在青少年時代，交上幾個真摯的朋友，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北京七中期間，我有幸結交了四個好朋友：敖德煥、王殿元、王東復、何延忠。其中德煥就是對我自學的決定，首先給予了最深切的理解的人，我覺得他是我的朋友中唯一能夠完全理解我的一个人。他是高二時的插班生，來自玉門，隨父親轉到北京的。他父親是石油界的元老，我國石油開發最早的基地——玉門的總工程師，後調石油部任總工程師。他從來不對我說這些，我們之間幾乎相交了十多年了，都還不很清楚各自的家庭情況，關於父輩的情況都是後來逐漸在無意中知道的。盤問對方的家庭情況，沒有必要，又似乎不禮貌。友誼不需要前提，只要它在我們之間存在就足夠了。他到我們班上不久，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好像我們早就相識，早就就是好朋友，不需要甚麼患難。倘若，共過甚麼患難，那也只是加深友誼的問題。他不苟言談，我們雖談得並不多，但我甚至敢於在他面前批評他的母親有點

「官氣」。當我後來知道他是怎樣深愛自己的母親時，我恨不得嚴厲地檢討我這個批評的偏頗。我們之間好像有甚麼默契，如果不接受對方的友誼，簡直是罪過。這可能就是人們備加稱道的「神交」吧。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中，朋友間說話往往有所戒備，但我們彼此卻毫無顧忌地交流。他長期從事文藝工作，思想解放運動剛剛萌芽的時候，我曾冒很大的風險寫信對他說：我認為只有徹底批判那份主席曾批示過的江青主持的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文藝才可能獲得解放。他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回信表示完全贊同這個看法。過了二年，這個看法已經是文藝界許多人的普遍看法了。

如果說我和德煥、延忠、東復的友誼有一點客觀原因，那就是我們住家都在六鋪炕，相距很近。跟王殿元的友誼，那就完全是純樸的心心相印。他家當時住在新街口，卻常和我們在一起。他比德煥更不善言談，幾乎一天沒有幾句話。只要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做什麼事，都是爲了大家，默默無聞，任勞任怨。對別人，他真夠得上魯迅讚揚的那種「孺子牛」。他還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孝子。他老母文革中被遣回百里外的小湯山。當她媽病重時，他星夜騎自行車趕回小湯山，後又騎車返回北京，向單位借了三輪平板車，再急匆匆趕回小湯山，一個人蹬車把老母送到北京就醫。這一次往返近四百里，他寧肯這樣死苦自己，也不肯告訴我們去幫助他一下！你看他不愛說話，說起話來有點口吃，可朗誦起詩詞卻能把那一字一句的深意，準確清晰、形像地送進你的腦海裏。當時他最喜愛的是馬雅

可夫斯基的激情詩。他對我的友誼特別表現在嚴格上，常常是在對我發表不同意見和批評意見時，他才異常激動地對我說話，即使我有時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卻總是在內心引起震動和深思，因為那一字一句無不中肯。他是極自愛自重的人，可我這一次卻可能讓這位無辜的老實人在警察、居委會和鄰居的眼中蒙上了不白之冤。雖然這對於我來說是萬不得已，受騙上當，可我總覺得我牽連了他這絲毫不知情的人，欺負了他這個地地道道的老實人，對他犯了罪。我真覺得今後再沒有臉面去見他，儘管我知道他任何時候對我都是寬容的、誠摯的，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這樣對待過他。

延忠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沈默者。他從小愛聽古書、看古書，可他非但沒有愛看古書的少年常沾染的俠氣，反倒像是入了佛門的出世人，他對人世間的事似乎都很麻木，唯獨對我們幾個人古道熱腸。學生時代，他家境困難，到什麼地方去玩，我們從不肯讓他花錢。等到我和殿元有了家累，他倒無事一身輕，就充分地顯示他這「獨身富翁」的慷慨，和他那獨特的細膩的友情。「有福之人不用忙」，倒是我和我妻子比他更忙於爲他完婚。我妻子將自己一位賢慧的表妹介紹給他，並在我家爲他辦了喜事，度過了蜜月。他還官星高照，成了我們五個人中唯一當了科長的人，想起來真是有意思。記得七五年，「四人幫」相當猖獗的時候，我在一次「家宴」上，忍不住地抨擊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我深爲周總理的處境憂慮，並認定「彙報提綱」的方向是正確的，引得他這位保衛科長大爲驚訝。他當時雖認爲不可理解，回去倒也沒有彙報，不然我早就遭殃了，說明他雖然麻木於世事，

心卻明如懸鏡，是個相當內在的人。

說來也怪，我這麼個愛說好動的人，偏偏交的幾個朋友都近乎「啞巴」，也許是「異性」相吸吧。但也不儘然，那位王東復比我更好說愛動。我們倆是五個人中的活動因數。他是一個天賦極高的人，在中學時代就才華橫溢。別看他個子矮，他卻善打籃球，更踢得一腳好足球，是校隊的右邊鋒。而且他數理化門門精，外文、中文在班裏也是拔尖的。在演話劇（如「火燒趙家樓」等）、化裝晚會上，更是我的好幫手和好搭檔。他當時的繪畫，尤其漫畫，從構思到成圖，我看不亞於當年的漫畫家方成的水平。難能可貴的是，他這些本領都是無師自通的。他是我們五個中唯一的大學生，畢業後主動報名到大興安嶺落戶。他在那兒寫來的信，我們都當作優美的散文詩來傳閱，他有很深的文學造詣。可惜這早年就熠熠閃光的天才、林學院的高材生，竟淹沒在本應造就他的林海之中了，不知現在的命運如何？

談到同學和朋友，卻有這麼一個人值得一提。他不算我的朋友，他卻認我為他的朋友。他叫李長順，雙鼻孔有點缺陷，朝天長著，與大家不合群。當時他家境很不好，曾隨著一些小夥伴去行過一次竊，他當放哨的，被抓住了，在公安局待了幾天。這在六十年代的學校可了不得，學校幾乎沒有出過小偷，一下子他的事成了頭號新聞。念其初犯，很快被釋放了。他是我們班的，我當時任班主席。當我瞭解他已知羞愧，我特別在他尚未回班之前，召集了全班會議，希望大家不要歧視他，要比以往更關心他，更歡迎他。同學們都

很擁護這樣做。當他回到班裏，大家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非常真誠地對待他，我又特別幫助他補習功課，他在大家平靜的愛護下度過了難關，順利地畢了業。他後來被分配在一家保密廠工作。他參加工作，我正在休學，他特意到我家來看我，他說我是他的好朋友，很感激我，並表示再也不會犯過去那種錯誤了。我也很感動，其實我和同學們並沒有爲他作什麼，只是創造了一個平靜、友善、溫暖的環境，讓他自身的良知在其中復活。

遠足

我從小就佩服二哥，也羨慕他，敬佩他那「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的毅力和獨創進取精神，敬佩他公正無私、儉樸、廉潔、溫良的品格。羨慕他在中學時代就到廬山遠足，後來他的足跡又遍及天下。

六二年，他大學畢業了，我也成人了，他和一位同學準備到八達嶺遠足，他同意帶著我。我也揸上一個小背包和他們一起出發了。二哥的遠足有二個特色：一，少花錢，自備乾糧，野外炊飲；二，爬山是那兒陡在那兒上，下山是那兒險從那兒下。這二條既啓迪我，又吸引我。一次下山，山十分陡峻，我出了個主意，先將背包順山滾下，然後再一節一節地用繩子把食物和炊鍋吊下去，很得二哥賞識，我也很得意，至今不忘。記得就是那

一次，腳蹬小樹根，手抓長草，往下倒爬，突然我雙足蹬空，整個身體只靠野草挂繫，居然牢牢的。這才知道，草多了，密了，照樣可以救命，並非「稻草不救命」，不然我就會掉在懸崖之下了。

我隨著二哥他倆順著京張公路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時分來到八達嶺長城上，我們不顧一切地跑上了南烽火臺，第一次目睹那火紅耀眼的夕陽，沈入那古沙場。啊！真美，我讚美你，夕陽！「夕陽無限好」。

一連又走了兩天，才走到了官廳水庫的發電站。我初次認識了人的足力和毅力的無限，對自己的人生更是充滿了自信。這一次，使我和二哥靠得更近了。有了第一次，就想第二次，但又不想簡單地重複。

於是就促成了我們五摯友的第一次遠行，那是在六三年我們即將分手，各奔東西的時候。我任主管，擬定了路線，籌集了少得可憐的路費。那個時候整個國家也剛剛走出谷底。這一次，是我們上一次路線的反道。這樣，一，我有點引路的把握，二，我想把往日的快感帶給朋友，又不重複，又有新鮮感。

我們的第一站是豐沙線的「珠窩」，名字很美，就選定了。果然還可以。火車從左山口進，出右山口，倒是一個窩，珠不珠倒不要緊，對於久居都市的青少年，大自然一切都是美的，和諧的。淌山水，才知道再淺的水溜，也會把踏不穩的人沖倒。這就是「勢能」，有勢之能，是動力，又可能成為破壞力。

僻居山野的人最歡迎外來的客人。人是歡迎人的，尤其獨居而又熱愛人群的人。二個在孤島上爲單位放羊的牧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們像過節一樣高興，不斷地說：在這個窮山溝，要見到幾個人真不容易啊！其實，這兒距北京城裏不過幾十里。

夜幕將臨，我們趕到了一所小學校聯繫住宿，這是上次的經驗。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學校證明信，幾位年輕女教師面有難色。中國自古「男女授受不親」，好在她們的老師在，他熱情地歡迎我們到他所在的中學投宿。他說：「不遠，十里路。」不管多疲乏，也得走啊！揹起行李捲，扛起糧食繼續前進。腳下是盤山鐵路路基。大山已經星星點點，那是一座礦山，燈光從炕洞中閃出。天陰了，濃雲翻滾，一層又一層地壓在頭頂。「快到了吧？」「快了！」十里？至少也走了有二十里啦，山裏人的路距得比城裏人的小一倍。沒逃過去，這大雨，就是六三年那場罕見的大雨的前鋒，我們經受了一次徹底的洗禮。大雨瓢潑，塑膠布只夠護著被子、糧食，人就讓他成落湯雞吧。從此刻起，我們就開始了三天的雨中遠足。

特別令人難忘的，就是在這風風雨雨中，大家都異口同聲：此行不虛。青少年的心是熱啊！

第二天到了官廳。官廳的黨委書記先是責怨，後是憐惜。看著濕漉漉的我們，他特意安排我們在黨委辦公室的沙發上過夜，又怕我們睡不舒服，索性打開小會議室爲我們鋪床。知道我們第二天一早趕路，又囑咐伙房五點就爲我們生火。我事後想，這位黨委書記

在任何時候，也是個開明人士，且有菩薩的心腸。

第三天的行程很辛苦，風更大，雨更急。途中只能找到一個破崗樓裏躲避休息。背包放在中間，各占一角，爲了取樂，我們開了一個「香腸宴」，其實是吃半粗糧半細糧做的土「江米條」，當地產的，在此時此景別有滋味。不知與我們同時代的青少年們，可有過同樣的體驗？

一路上，總是德煥當開路先鋒，他默默地、沈著地走在最前邊，像一面迎風勇進的旗幟，每個人都堅韌不拔地追隨著。晚上又來到了一所小學，可能是沙窩小學。真是沙，沙已經堵塞了村中的道路，壓到農舍的後窗沿了。大豆的弱秧不過半尺，稀落地長了幾個豆莢，和東北那齊人高的大豆秧簡直沒法比。當地一年之中，有半年吃不上菜，外地調進的芹菜連莖帶葉一起醃著吃。小學黑著燈，停電，年輕的男女教師很樂觀，拉著手風琴，唱著歌，在窮歡樂。是一位校工接待我們的，他很可能是一位被分配的「右派」，城裏人，對北京的一切十分感興趣，問長問短，談個不停。他挑水幫我們做飯，怕我們睡不慣土炕，特意卸下教室的門板鋪在炕上，又生起盆火，讓我們除除涼氣，等那四位躺下，又和我一起把每個人的濕衣服烤乾，幾乎忙了一宿。天剛剛發白，又幫我們做早飯和路上帶著吃的飯。我望著這頭髮斑白的中年知識份子，心裏酸酸的，他沒有明說什麼，我也沒有明問什麼，讓明白放在肚子裏吧。是啊，「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優秀分子即使在蒙奇冤、陷絕境的情況下也不是不可信賴的。」（劉賓雁語）

凌晨，我們告別了這位「校工」，趕往八達嶺。沒有羅盤和詳細地圖，稍偏預定目標，徑走到了青龍橋車站。也好，該回家了。買了火車票，我這管帳的身上僅剩一分錢了。上車開飯，一鍋涼拌飯，連下飯的鹹菜也光了。天無絕人之路，不是還有殿元從家裏拿來的紅絲綠絲嗎？對了，那包在北京與河北交界的小鎮上買的白糖呢？這包白糖，本想送給大姐作個禮物，她要臨產，當年紅糖是精貴物。這下子只好貢獻出來了。白米飯拌上紅糖、紅絲綠絲，煞是好看，這對於五個又饑又冷的大小夥伴，無疑滿有吸引力。正當其時，著名的「京張三八包乘組」的服務員來了。我向她買開水，當時車上開水要花錢買。我買半壺，她問怎麼好幾個人，咋買半壺水？我不好意思地向她坦白，我們出來三、四天了，只剩下了一分錢。她看著我那狼狽相，不由地笑了，她甜甜地說：「就一分錢，也給你灌滿壺，還管你們夠」。我也甜甜地答道：「那就謝謝您了。」到沙河時火車攔淺了，水沖壞了中途路基。這可瞎了，晚飯怎麼辦？我動員所有人搜索自己的錢夾、日記本，王東復果然發現了五毛錢，下車買了幾個包子，分了份，墊墊肚子。半夜，車抵西直門車站，外邊仍然下著大雨，只好將行李墊在水泥地上擠成一團睡一覺。不久，一個寒噤將我驚醒。這幾天我負有的責任，讓我的覺睡得特別輕，每天不到五點鐘就能醒來。我一看不見殿元了，我慌了，一路平安，別到了北京出點事。正這功夫，只見殿元還是穿著一身濕衣服，拎著一個包走過來，趕忙叫醒大家。大家一看，是一包饅頭和菜，殿元的家並不富裕，糧食也緊，可爲了夥伴，他背著我們偷偷地跑回了家，把家底全抄來了。他對朋友真是格外心

細，還交給我幾毛錢，以備天亮回六鋪炕好有坐車的錢。我們看著這「憨牛」，消瘦的臉上架著的眼鏡也都淌著水，肚子乾癟著，大家心裏都不是滋味……，五顆青少年的心撞在一起了，閃著火花。

回想起這次遠足，心裏總是久久不能平靜。回憶中，也使我聯想到現在的國內旅遊。儘管不提倡，但已開始形成潮流。這是大勢所趨，眷念大自然是人類的共同心理。不過，旅遊也不必都擁向那名勝之地。青年，特別是青少年更應該提倡到就近的山川、大自然中去遠足。最好是靠自己的雙手，勤工儉學，去自費遠足。當然，社會要逐步創造勤工儉學的機會，並把勤工儉學的收入合理地重新支付到青少年的身上。

下鄉

六三年因為連日的暴雨，河北發生了罕見的大洪水。我都不放心農村所受到的衝擊，而且從我自學的角度看，也需要到農村考察一番。春節前夕，我向母親提出，想到鄉下去過春節，我們家很要好的鄰居朱大嫂也願意我到她老家看看。於是，我興致勃勃地乘車到了河北東鹿。一下火車，視線就被二座山吸引住了，一座是麵粉袋山，一座是大白菜山。據聞，這是國家爲了災區人民過好春節，特意調運來的。我一聽心裏暖乎乎的。到了村裏，也看不出受災的樣子。村民都興高采烈地忙於辦年貨，左鄰右舍，高聲嚷著，互借磨

麵的碾子、過麵的籬和大件的炊具，這可能就是中國鄉村一種特殊的「鄉誼」。

我奔的是朱大嫂夫家的親戚。村裏人聽說來了個北京的洋學生，都趕來看我，奇怪我這個城裏人，大過年的不待在家裏，怎麼到這個窮鄉村來了。這家子正在院裏請人宰羊，那時還允許有自留羊。那屠戶真是一把好手，不出十分鐘，宰殺、扒皮、開膛、分解，全部完成，看得我眼花繚亂，這比課本上的「庖丁解牛」生動、具體十倍。我問主人：「今年過年比往年怎樣？」他坦誠地說：「別看遭了災，哪一年也比不了今年，往年國家那能救濟這麼多東西啊！」剛說話這一會兒功夫，主人的閨女就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雜面湯，臥了二個雞蛋，上邊飄著一層當年的稀罕物——香油。看著這碗面，在心中深深地刻下了「憨厚」、「好客」四個字。待我吃完，主人問我：「這是雜面，可中？」我滿意地告訴他：「比在家吃的還香，這雜面真好吃。」

第二天正趕上主人的本家侄子娶親，好不熱鬧。新郎騎著馬，新娘坐在驢拉的大車上的一頂花飾轎子裏。新郎不足二十歲，隨爺爺長大，爺爺盼著早抱孫子，家裏也需要一個女人照應。男孩就當了一年車把式，掙了錢娶媳婦。媳婦是朱大嫂家村裏的，在太行山的腳下。一對小夫妻，真是天合地配，男的英俊，女的秀美，一雙大眼，長辮烏黑發亮，皮膚白皙，比城裏姑娘的還細膩。一方山水養一方人，很可能是山裏的礦泉水給她帶來的秀麗和靈氣。

宴席上，我成了上賓，我老實地告訴他們，我不會喝酒，他們也倒不硬勸我，我就舉

杯示意，吃點菜。席上葷腥很少，多是豆製品，算得上豆製品「素宴」。新娘三天無大小，小輩、同輩一個勁逗新娘，新娘只笑不語，也不惱。老爺子直在外廂囑咐別過火，新娘的嬌笑自有魅力，毫不費力就解了重圍，頗有情趣。鄉親們的和氣、友愛使得整個婚事辦得很體面、圓滿。那氣氛與家家戶戶的門楹上「滿招損，謙受益」六個字十分諧調。

當然，那時的中國農村的貧窮也處處可見。初一，大人給孩子買塊糖，孩子捨不得一口吃掉，捏在手裏一點一點地舔。過節，孩子們能置新衣的也很少。朱家的老母雙目失明，孤寡一人，土屋土炕滿是塵土、蜘蛛，很是淒涼。鄉村的火車站也很破敗，候車室無一凳椅，中間用土坯盤個爐子，土煤渣塞滿了冷膛，看來也早已不生火了。

我帶著這兩面觀，回到了北京。

春節一過，休學一年的期限就快到了。再這樣自學下去，恐怕生活費都要成為問題。我就開始結合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遠足、下鄉的體會，寫一份總結，這就是後來獻給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篇一萬多字的文章——《我們的時代和青年的任務》，提出了中國有志知識青年應該走向農村，改變那裏的愚昧和落後的面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等問題。這也是當時我自己的心願。我一向鄙視口是心非的小人。我和王殿元聯名寫信給中共北京市委，自願申請到農村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可是沒有答覆，也沒有任何回音，只好作罷。

閃電式的大連之行

六四年四月份，我回到學校復學，順利地取得了高中畢業文憑。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不考大學，等母親知道我這個決定時，報考大學的時間已經結束，她想挽回也挽回不了了。

我想我即將走向社會，該利用這最後一個暑假出去遊歷一下，母親同意我去大連找大哥。爲了節省路費，我坐慢車到塘沽，準備乘船去大連。那知道塘沽到碼頭的汽車十分不方便，等我趕到海邊，班船剛離去，我只好望船興歎。再等下班要等一周，於是乘車北上，從瀋陽折赴大連。

我滿懷著希望，找到了大哥的海校。他陪我到軍官食堂吃早飯，他的戰友們輪番地走過來看我，都顯然帶著一種看怪物的神情，弄得我好不自在。看來他們都知道我就是那個要自學馬克思主義的弟弟。真奇怪，別看在我們這個國度，幾乎人人都要宣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倘若，果真有人宣佈要自學它、研究它，又往往會被人看作怪人！

我們剛吃完飯，還沒走出食堂，就收到二姐一封電報：三弟速歸，學校開始分配。看了電報，我一笑，告訴大哥：「這不可能。學校的慣例，工作分配都在大學考試發榜之後進行，不然不知道誰沒考上，那怎麼分配，分配誰啊？分配工作至少要過一個月才可能進行。」大哥顯然已經對我這個愛擅自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人不信任了。也許怕我誤了分

配工作，今後前途受影響，也或許他早已習慣用服從代替理智。他絲毫不考慮我的分析和解釋，立即決定買第二天船票，讓我返回北京。主人下了逐客令，我也毫無辦法，總不能賴在那裏啊！

大哥白天讓我眼中留下了「秋林」公司的掠影，晚上讓我耳旁響過一陣老虎灘浪拍峻岩的轟鳴，二十四小時之內就讓我結束了這次盼望已久的大連之行。

這是一次「一樂即逝」的旅行。

參軍

回到家中，整整憋了二個月。一天，學校黨委韓書記把我找去，她突然問我：「讓你參軍，你不去？」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當兵，怎麼不去？不過，我的眼睛有點近視，恐怕人家不要。」「你看吧，我就知道你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剛讓你考慮考慮，你就打退堂鼓了。」這位女書記說。

天哪！想自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反倒成了思想有問題？哦，在那個年代，不經組織的書記們指派，而想有所作為，就是個人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而且，還不許別人說實話、反映實情，一說就是打退堂鼓，不革命，面對有這種思想方法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真是毫無辦法！我只好不語。沈默一刻，她又說了：「如果真是這樣，僅僅因為眼睛，那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我看你這個人很需要到部隊好好改造改造！」我答道：「改造也好，鍛煉也好，當兵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責任，我很願意到部隊去。」

別看這老太太，神通也夠廣大的，我這個左眼零點七，右眼零點四的人，居然也參上了軍。我揹上背包，在家門口與母親告別，好像每次上學一樣離開了家，沒有任何依依不捨，甚至沒有再回頭向母親招手。少年心盛，憧憬的總是前方，對母親也太缺乏溫情了，回想起來，實在有點內疚。

卡車經過新華門，大家都驟然激動起來，唱起歌，心裏都明白這是向北京告別，向主席告別，似乎他老人家能聽見似的。

迎著魚腥味，來到了青島滄口海軍航空兵第二航校。

嚴己又嚴人的教訓

軍校的生活是極其緊張的。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有時緊急集合，越野行軍就起得更早。一天六節課，下午、晚上四節自習，或政治學習。夏日中午有午睡，冬日中午作集體遊戲，必須參加。晚上九點半熄燈。我當時被指定為學員班長，記得是三大隊四區隊七班。當班長的時間更緊張，除了各種班務活動，碰頭會、彙報會，還要做每一個班員的思想工作。每天起床要按時，晚上睡覺常是十一、二點，星期日也搭了進去。在青島學習近

一年，我只進城二趟，一次看棧橋，一次照紀念照。看那張照片，人瘦得像個猴子，體重降到一百斤。

勤奮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評價。一次長途行軍訓練，邊走邊宣傳鼓動，總結會上得到了大隊長和學校的通告嘉獎，年終以優秀的訓練、學習成績被評為五好戰士。我們班榮獲了四好班集體稱號，我寫了一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引，做好班長工作的體會」，在中隊作了介紹。這份底稿可能還夾在我哪本書裏。

但，在畢業分配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給了我難忘的教訓。即將分赴部隊的臨行前，我突然發現自己的那副近視眼鏡找不到了。我的東西一向安放得很有秩序，很少丟失，這多是母親和外婆愛整潔的影響。我上小學時，有一次與同學們踢足球，玩昏了頭，將一件脫下的毛衣忘在球門架上，就回家了，等到發現再去找，已經不翼而飛了。回來本以為母親會責備，出乎意料，她並沒有說什麼，只淡淡地告誡我，今後要在意。媽媽的寬容反而使我內心很自責。當時爸爸已經去世，丟了毛衣，媽媽是無力再買了，只會把自己的讓給我用，自己這樣馬虎實在不應該。從這以後，我再沒有丟過什麼稍大的東西。

在赴部隊的途中，有一個和我一個部隊的戰友告訴我，是我的副班長故意把我的眼鏡扔在地板底下去了。哦，這小夥子還記恨啊！我恍然大悟，想著這件事，心裏倒不特別責備他。這副班長是個幹部子弟，在家裏很受寵。在學習雷鋒的活動中，有一件事讓我很反感。他爲了做好事，每天早上比大家早起半個多小時，這本來不合乎作息制度，可他每次

早起時，總是故意在屋裏叮咚亂響，吵得大家睡不好，讓別人好知道他去刷廁所，做好事了。開始幾次，我單獨找他談了談，既肯定了他，又提醒他。他不服，反而每天早晨弄得更響，我就不客氣地在班務會上，直率地批評他做好事的動機不純，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可受不了，好事也不堅持作了，還處處與我作對。事後我找他談了好幾次，直到畢業，這疙瘩也沒解開。他臨走拿我眼鏡撒氣，是不奇怪的。

這件事讓我看到了自己的主觀，看到了方法不當的後果。對自己要求嚴格，是對的；對別人則應該寬厚一點，批評別人不能單靠自己的主觀分析，這不正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嗎？

好心不得好報

我被分配到上海大場基地，海軍航空兵十八團機務中隊任地勤機械員。機械員的工作是瑣碎、細密、辛苦的，而且責任重大。三個月後，我已能單獨工作。

一次飛行，一位行校剛畢業的飛行員飛最簡單的起落課目，由於飛機著陸時速度過快，飛機失控，衝出跑道，一頭栽在一個很遠的水坑裏。這不是我維護的飛機，當時我剛好在這架飛機著陸的這一頭。見到此景，我抓起身邊的小梯子，就飛快地向出事地點跑去，其他許多戰友也都跟著跑了過去。我首先登上飛機，幫助飛行員打開座艙蓋，再幫他

解開保險帶，邊問他受傷沒有，請他立即出來。這時才注意到，機頭紮在水坑裏，幸虧沒有灌到高溫高熱的發動機，不然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可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救飛行員要緊。

由於工作努力、踏實，臨危不懼，又積極承擔中隊的宣傳工作，因而多次受到中隊、大隊嘉獎和表揚，年終被評為五好戰士，又被同志們推選為中隊的「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成為黨支部的重點培養對象。

好景不長。文革開始了。與我們同駐一個基地的「八〇一」廠是四大單位。這個廠與各地的四大單位一樣，鬥幹部、戴高帽、罰站、遊廠。這個工廠的幹部，大多數是這個基地部隊幹部的老戰友，基地幹部對這些做法十分不滿。我們中隊駐地近臨「八〇一」廠，雖說我們也看不慣那些做法，但並沒有和「八〇一」廠發生矛盾。可是基地的一些幹部卻不斷到部隊裏向幹部、戰友散佈對「八〇一」廠不滿的言論。部隊開始與「八〇一」廠有些矛盾，他們就進一步在中隊會上說：「這簡直是騎在我們脖子拉屎！」並準備在「八〇一」廠的人找基地反映問題時，在半路上埋伏抓人。情況變得越來越緊迫。我心裏也很急，總想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鬧出亂子來。於是，我給基地最高領導李副政委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認為在「八〇一」廠並未直接向我們部隊挑釁的情況下，有個別幹部鼓動部隊與「八〇一」廠發生衝突是不妥當的。我們部隊作為一個非四大單位介入四大，違反了中央軍委的有關「部隊要穩定」的指示。倘若發生衝突，首先會追究我們的責任。而且，我

們與「八〇一」廠將長期共存在一個基地上，發生了衝突，不利於今後長期團結，望首長立即予以制止。

萬萬沒想到，這赤心可灼的「諫書」雖阻止了一場衝突，卻給我在政治上闖下了第一個大禍。這封信交上去的三天，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找我個別談話。他絲毫不考慮，我寫這封信完全是一片赤誠，是爲了部隊的穩定著想，也是爲避免領導一時處理不慎鑄成大錯。他劈頭硬說我，也想像「八〇一」廠那樣對待部隊首長。天哪！天底下居然有這樣不明事理的人。我堅決予以否定，然後不想再說什爲了，認爲跟這種不講道理的人，沒什麼好多說的。這下子，可大大得罪了這位領導和他的上級。從這件事之後，我再努力工作，再積極要求進步，也都白搭了。回來又風傳我早已犧牲的父親有問題，受審查，有些人就更找到了壓制我的藉口。從此，評五好、獎勵一概沒我的份，只是中隊念我工作確實出色，經常表揚表揚，「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是大家公推的，不好撤銷。

六七年，部隊轉場海南島值班作戰，第一批也沒有我，我就不得已，用「絕食」來表示自己要求上前線保衛祖國的決心，才作爲第二批到了海南島作戰值班。

不論是在上海大場的訓練，還是在海南島的輪戰，以致東海岱山的值班，我維護的飛機飛行過近千次起落，沒有任何一點小的差錯。在服役的後二年，我經常代替休假的機械師，單獨負責機組工作。臨復員，中隊路指導員懇切地對我說：「小徐，你在部隊這幾年的表現，大家都看在眼裏，心裏都有數，所以給你的鑒定、評價是全中隊最高的。你的組

織問題沒解決，這原因，我不說你也清楚，同志們也清楚。你的表現，我們一定負責向地方介紹，希望你不要灰心，回到地方繼續努力。」指導員的話，都這麼說了，叫我能再說什麼呢？我只有感動。當然，我也有沈思：好心真不得好報？

在看守所，有人對我說：修橋鋪路雙瞎眼，殺人放火兒女多。人世間的事，就是這麼回事。真的嗎？真該如此嗎？我至今不信。

我仍然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最高的評語

我是個創傷易於彌合的人，幾句動情的話就能讓我心軟，將怨憤遺忘。以致在「愛犯上」這點上屢犯屢受挫，幾乎到了「死不改悔」的地步，這是後話。

其實，那次「進諫」受挫，給我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早在路指導員談話之前就已經彌合。

那個時候，雖然我的名字在上級機關挂了號，但基層支部對我是有數的，同志們對我也是有數的，所以中隊領導對我的各方面工作，依然放心重用，同志們仍讓我做「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的工作，這樣反而促使我更竭盡全力地為大家服務。因也更贏得大家的信任。在戰友們的懷抱中，我深感人心是公正的，是溫暖的。

六八年，一次團幹部到我們中隊聽取意見，我和戰友，也是北京兵王海明（六九年一度在部隊的階級鬥爭運動中被錯打成現行反革命，後徹底平反。）直率地發表了意見：「現在駐地的老鄉都反映我們不像是能打仗的兵，倒有點像會議兵。每天茶杯一端，板凳一拿，蔭涼地一坐，就是半天一天的。現在老不搞訓練，將來飛行員怎麼能架飛機空啊？」團長聽了連連點頭，正趕上這時中央軍委可能發佈了應該適當加強部隊訓練的指示，我們的意見很得領導重視。在領導的提議下，同志們又一致推選我作為戰士代表列席團黨委擴大會議，著重反映戰士們的願望和要求，使得我更不把那創傷放在心上。

六九年，大批戰士復員，我也已超期一年了，上級批准我復員。雖說對於復員，老兵們都高興，該回家了。可是見到中隊的一草一物，朝夕共處的戰友們又不由得戀戀不捨，我離家參軍時都沒有這種感覺。臨別前，戰友們送了許多紀念品，那位薦「老廣」戚軍械師特意送我一個特大號的茶杯，並深情地說：「小徐，將來回去當了工人，哪有那麼多時間打水，這一缸子，夠你喝一天的。」可不，這大缸子能盛半暖水瓶水！想得真周到！

我是在舟山群島的岱山島離開部隊的。這天黃昏時分，全團戰友一直把幾百名老兵送到碼頭。船慢慢地離岸了，招手、呼喚、熱淚，混成了一片。突然間，歡送的人群中暴出了同一個聲音：徐文立、徐文立、徐文立……

我楞了，這不是齊聲呼喚我的名字嗎？為什麼？一聲又一聲，接連不斷。我的雙眼模糊了。哦，這是對我往昔的呼喚？這是對我未來的激勵？不，這不是對我一個人的呼喚和

激勵，那麼多名字，怎麼呼得清？我不是當過他們的代表嗎？那就再代表一次，讓我們每一個老兵都記住自己的戰友們，讓我們每一個老兵都來領受戰友們的祝福。

船離岸越來越遠，呼喚聲仍然隱約可聞，島上的人群已看不清了，島上閃起星星點點的燈火。船邊的海水波濤洶湧，我的心甜甜地蕩漾，腦子裏沒有一絲浪花。啊！親愛的戰友們！你們，你們對我的呼喚，不就是最高的評語嗎？人世間，難道還有任何獎賞和評價，比戰友的理解和信任更可貴的嗎？

知遇

結束了五年的軍人生涯回到北京，開始進入了對於我是陌生的社會生活。學生兵最傻，一點不錯。絕大多數戰友不懂得走門子、巴結人，當絕大多數人被分配到偏遠的昌平、豐台的時候，唯有一個天天一早一晚到武裝部掃地的「機靈人」留在了城裏，分到低壓電器廠。這就是我回到社會上接受的第一課。

我被分在豐台鐵路公務工廠當鍛工，從掄大錘當學徒開始。幹了五年的技術兵種，掄大錘，體力確實有點頂不住，可我沒示弱，錘掄得滿溜，師傅們很喜歡我這一點。據說，我進了監獄，還有師傅遠從豐台跑到我家問長問短，表達了對我的關心。

現在有人說，我是因為對工作分配不滿，滋長了個人主義，走上了犯罪道路的。真不

知道「左」王的這些人，硬把正直清白的人，往這犯罪根源唯一模式裏死套的作法，何時才能徹底根絕？如果說我有「不滿」，那我的「不滿」是：既然國家這麼缺乏技術人才，我們這些技術兵不正是現成的人才？為何不用？由於這種浪費，受損失的是誰？是國家，是老百姓。難道有這種「不滿」不應該嗎？這難道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嗎？這就是個人主義？如果我真的是從這兒開始走上犯罪道路的，那又怎麼解釋我當時每天幹勁十足地打鐵學藝呢？又怎麼解釋老師傅們對我工作的滿意呢？又怎麼解釋我日後夜以繼日地協助黨支部書記趙斌對工廠的整頓呢？

這種「不滿」完全是一種有高度主人翁責任感式的「不滿」，恐怕是那些充滿著「左」傾僵化思想，只知道整人往上爬的人永遠理解不了的！他們只會抓住一點，不顧其餘，也不想去瞭解一個人的全部歷史，把一個清白正直的人投進監獄，他們毫不痛惜！

六九年底，國家開始抓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上級派了趙斌任工廠黨支部書記，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瞭解，選中了我任他的助手，著手對工務、電務、建築三個工廠進行整頓。他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有經驗的基層領導者。他工作潑辣，善於聯繫群眾。在他的領導下，三個工廠不到三個月，生活都開始走上了正軌。他對我十分信任，放手讓我工作。可以說，他是我遇上的第一個真正瞭解我的志向和能力的領導，對待這樣的知遇，我也是不遺餘力，袒誠相待。

上有千條線，下有一根針。各項工作都要在基層落實，尤其在那不平靜的年代，工作

異常繁雜，中心工作一個接著一個，文字材料要的又多又急。我那時的工作，每天總是十幾個小時，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有時忙得我只好連軸轉，二、三天得不到必要的休息。人瘦了，戀愛也耽誤了，所以我快三十歲才結婚。儘管工作緊張、辛苦，心裏也從來沒有怨言，中國古來就是「士爲知己者死」。我總是把老趙要的材料，準備進行的工作，幫他安排得十分妥貼，老趙對我的工作是十分滿意的。在他的推薦下，黨支部幾次開會討論我的入黨問題，可是因爲當時支部一共才五個黨員，其中有三個黨員，在整頓中國經濟不清白的問題上，受了批評和處分，他們就拿我出氣。藉口我父親的歷史問題，二個人反對，一個人故意不表態，所以幾次不得通過，老趙也毫無辦法。上級黨委在有「爭議」的情況下，也只得同意再考驗考驗，我的入黨問題就這樣再度擱淺。

我的「左」

在那「左」傾滿天飛的日子裏，我也曾是很「左」哩！也「左」得很「天真」、很「可愛」！有四件事令我永遠不能忘懷。

我當老趙的助手時，同時也負責工廠裏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我接手的時候，運動已近尾聲，可「揪」聲仍不絕於耳。電務工廠有位女工，小時在日本人辦的「扶輪小學」上過學，後在電務段當電話員，與其他女電話員結爲「十姐妹」。那些「十姐妹」紛紛被揪

爲「特務」，寫來揭發材料，領導上決定也定她爲「特務」，我也不細緻分析研究，積極參加「揪批」。這位四十多歲的無辜者經此次打擊，人顯然地衰老了。事隔不久，她已被放出「學習班」。我在上醫院時看見她，那原是青絲的頭髮已見斑白，內心很是不安，心想，這裏面也有我一份「功勞」啊！

雖然在「文革」中，我就錯辦了這麼一件案子，可這「左」勁由來已久了。記得在高二時，一天傍晚，我看見一個農村婦女躲在電線杆後面出售雞蛋，我當時非但沒有憐憫之心，反而回家寫了一篇短文，竭力描寫她鬼鬼祟祟的行爲，認爲她破壞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經不起困難的考驗。這篇短文雖然是自己隨手寫寫，也不想發表，但卻反映出我不諳民情，一點都不關切農民的疾苦。豈不知當年的農民就是靠「雞屁股銀行」換點鹽油啊！後來在鄉下看到農家的孩子捏著糖果舔的情景，我不由地責備自己那篇短文。

有了「左」，不但害己，更會害人。在部隊開展階級鬥爭教育的時候，我突然想起，我的高中班主任申學敬老師曾寫給我的二首詩，這詩很明顯地流露了申老師對當時社會氣氛的一些不滿情緒。實際上，這情緒當時絕不止他一個知識分子有，是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從五七年「引蛇出洞」，擴大反右之後都有的普遍情緒。這並非是對社會主義的不滿，而只是對「左」傾路線的「言而無信」的不滿。可是在「左」的指導下，我反而覺得這詩有問題，應該揭發，險些鑄成大錯。後來可能是另一種感情占了上風。申老師曾那樣器重我，把我視爲他的得意門生和知己，才會把這樣的抒懷詩，抄給我這個毛孩子，我怎能做出對

不起老師的事情？後來我雖沒有進行什麼揭發，沒有害老師，可是這一閃念就夠可怕的！真是人心可畏！我怎麼只有所謂的「忠心」，就沒有良心了？！這個「左」，竟然讓我傻呆到這種地步！

現在，可能有許多人都知道，是我主辦的《四五論壇》，首先為思想青年遇羅克平的反，為他出了專刊，還特地請了民間木刻家為他刻了一幅意境深邃的畫像作為扉頁。這在《四五論壇》可謂最高規格了。可是，大家一定都不知道，也正是我，曾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中，向《文匯報》投過一篇批評遇羅克的一篇小文。當時，我的小文已付排，突然因為有人指示，這不是一場學術爭論，是政治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我的小文就沒有見報。現在想起來真是萬幸，多虧他們嫌我還不夠「左」！

那篇小文，我已不大記得是什麼內容了，可能是有關帝王將相的評價問題。至於在這個問題上，我和遇羅克誰是誰非已經不是什麼主要的問題了，問題是我曾與羅克進行過不公開的論爭。然而他卻犧牲了，死得又那麼悲慘。一個難得的天才竟是那樣被人早早地扼殺了！當我們還泡在「左」的苦海之中的時候，他卻孤身向這海洋挑戰。所以，即使我們論爭過的這一個觀點上，我是對的，我也比不上他的一個小指頭。啊！我幾乎墮落為他的敵手的地步！真可怕！我正是懷著這種羞愧的自責心理，才下決心不管官方給不給他平反，《四五論壇》一定要大大地宣揚他，為他出特刊，出專刊，要為他鳴不平，要大大地頌揚他——一位早逝的勇士、智者。遲早人民會把他祭奠在中國的先賢祠中，我相信。

一九八一年清明節，當我預感到厄運可能就要降臨到我的頭上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遇羅克的不屈不撓，我特意精製了一個小小的題詞牌，敬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他的一幅畫像前，以示我決心永遠懷念學習他的志願。

我真正從這「神聖的左」的迷霧中脫胎出來，是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後了。

返樸

當我頭腦開始清醒的時候，我正在單位負責清查「五一六」的工作。

七一年底，鐵路撤銷站區，恢復原建制。老趙調永定門分局工程隊。工程隊也要調我去，可重新組建的豐台工務段不肯放，讓我負責工務段清查「五一六」辦公室的工作。我開始從各站區將豐台工務系統有關「五一六」的問題接過來，組成了辦公室。

我接豐台西站一個學習班時，有一個姓吳的人的情況真是讓我大吃一驚。這人本是一個極健壯的養路工，被關在一個前堵門，後堵窗戶的朝北的小屋裏，夏天也不准開窗子，也不放風，只是一早一晚出來倒二次小便桶，三層草墊都濕透了，這大漢已經直不起腰了，走路十分吃力。我見此景，便對學習班的負責人說，這間屋另有它用，把他換到朝南的屋去，窗戶不要堵死，你們放心，他不會跑。他果然沒有跑。我又到他家去看了看，老婆帶著幾個孩子極困難，糧食不夠吃，我給了她一些糧票。好在不久學習班就解散了。

當工作剛剛有了頭緒的時候，段上派一個叫李向東的黨員來作正手，我當副手。這位正手對我的工作十分放手，讓我繼續負責辦公室的全盤工作，包括到分局開會、彙報，具體工作他不肯插手，只是向段革委會，即軍管會的主任彙報工作由他負責。後來，我才慢慢體會出這位正手，年紀雖不大，卻心機老深、精於升官之道，他是吃透了「縣官不如現管」這條實用主義原則的。

隨著我對清查「五一六」的瞭解和研究，越發感到這簡直是一場製造大錯案、大假案的運動。在分局召開的「邱線分析會」上，我忍不住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說，我認為「五一六」這個組織在我們分局存在不存在值得懷疑。我們查出了這麼多「五一六」分子，他們都承認（實際上全是誘、逼出來的）參加了「五一六」組織，並填了表。全局交待出來的「五一六」表格起碼也有幾百種，卻沒有一個一樣的。既然那麼多的人參加填表，為什麼直到今天也沒有查出一份原始表格呢？又說，當時「五一六」不是以反革命面目出現的，那怎麼會把那麼多的表格統統地銷毀得一乾二淨呢？這值得我們深思。現在又有那麼多的人供出，寫過攻擊周總理的大字報、標語、傳單，而且毫無例外地又都在深夜作案，一到早晨又都被撕掉或覆蓋（實際上都是審訊人員提供的串供內容，讓所謂的「五一六」認供）。大家都知道周總理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如果真有那麼多攻擊他的標語、傳單，而且又是有意識地撕掉或覆蓋的，當時不會不保存原始證據或照片，可是現在卻沒有。我當時雖不在北京，但據我所知，在整個運動中，在北京僅出現過二張有關周總

理的大字報，一張貼在「二外」，一張在王府井。當即被撕下，並留有證據。所以我認為對清查「五一六」的問題應該更加重證據，而防止人們串供的事情發生。

本來這是一次再次掀起運動高潮的分析會，我發了這麼一通「標新立異」的看法，頓時炸了窩。與會的四、五十人，包括分局清查領導班子的軍管幹部，大多是五十開外的人，四十歲的寥寥無幾。我這個當時三十出頭的人，簡直算小青年、黃毛小子，竟然敢出此不同尋常的意見，實在夠「狂妄」。我的發言，引起了多數人的不滿，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是瞪著眼看著我把話講完的。我話一落音，立即遭來激烈的反對和批評。只有幾個人在聽我說的時候暗暗點頭。多數人還交頭接耳在詢問：這個人是哪個段的？過去怎麼沒太見過？幹什麼的？

發表這麼一番看法，我一方面是希望分局軍管能冷靜地重新考慮這場清查運動。另一方面，是覺得以上我所列舉的事實都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為什麼都緘口不語，或視而不見，還一個勁地掀高潮，這不是瞎耽誤功夫，自己唬弄自己嗎？寧可因為發言被貶斥，也不能再這樣對黨的工作不負責任了。我因而就無顧忌地放了一通。沒想到，這次倒沒招來什麼禍。相反，事隔不久，中央指示基層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整個停止。我一聽真是高興死了，我可受不了這份洋罪，味著良知整人。

根據上級政策精神，我擬定了結束我段清查「五一六」工作的方案：第一，解散全部學習班，誠意地向被搞錯的人賠禮道歉，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安排他們的工作；不論其家

屬子女受株連與否，一律到其所在單位做好解釋工作，消除影響。第二，只對二個人作結論，給予行政警告處分。一是宗福林，因有一般性的打、砸、搶行為。二是王玉書，由於他在運動中想邀功受獎，主動地暗自串通楊村工區一個姓薛的，提供參加「五一六」的偽證。事後，姓薛的以為自己當了反革命分子沒有出路，自殺身亡了。王玉書對薛的自殺雖不負直接責任，但他是有間接責任的。對於這樣不老實想取巧的人，應該使其接受一點應得的教訓。我特別堅持應給予他進行行政警告處分。

這個方案經辦公室研究通過，按規定一式二份，報段革委會、軍管會和分局清查辦公室審批。分局清查辦公室完全同意這個方案，而段軍管主任則不同意。於是李向東就把我推上了第一線。第一次讓我直接向張主任彙報。張問我：「照這樣處理，那不證明我們搞錯了嗎？」因為按照他的習慣，任何時候任何事都不能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錯了。他以為這樣就會損害黨的威信。可我卻傻呆地向這種人解釋：搞錯了就糾正，並公開承認，這樣決不會損害黨的威信，相反會贏得人民的信任。他根本不聽這一套，我只好說這是上級政策規定的，請他和分局辦公室再交換意見。

沒過幾天，李向東被調到段上任團委書記，由我留守，處理辦公室善後工作。二個月後，張主任把我找去，他說：「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你還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不過，你這個同志很驕傲啊，今後還需要好好在勞動中改造、改造自己，你明天開始就回班組參加工作。」就這樣，我回到了工廠。回班組早在我意料之中，就是「驕傲」這頂帽子給我戴

得心裏很不舒服。當時我剛三十出頭，可我這頂帽子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已經戴了長達十幾年之久了。上學的時候，在課堂上不知怎麼就想出了一些老師也難以解答的問題，又喜歡問，被個別老師給我戴過這頂帽子。到部隊，在工作上願意發表點獨立見解，被個別幹部也戴過這頂帽子。沒想到今天又頂著這個帽子離開機關。

不過，現在想起來這倒是件大好事，沒有這頂帽子，我恐怕還很難這麼快回到這堅實的大地上，也很難那麼快地讓自己一雙眼睜得更大，把問題看得更清楚……

憂（一）

回到班組，我逐漸發現工人們都愛說這麼二句話。

「咱們是磨坊的磨，聽驢的。」這是在工作中，本應該提一點合理化建議時，人們常說的。

「走，給人家幹活去！」這是在「抽袋煙」的名義下歇了半個小時，甚至二、三個小時之後，人們愛說的。

工作中，有沒有不計報酬，不計時間地拼命幹活的人呢？有，是少數。多數人不這樣，多數愛說上面二句話。有的不說，也是按上面二句話行事的。這說明當時多數工人，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主人翁的地位，但他們並沒有在經濟上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們並不把

自己當主人。可是，有些人偏偏想要用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能達到的標準來要求大多數人；或者誰也達不到，他們也自己欺騙自己；或者根本不知道這樣一些最普遍、最常見的社會現象。

七三年，老趙在分局建築段任工會主席，他幫助我調回城裏，在建築段大修隊隨一位六級老師傅學電工。本應二、三年掌握的技術，我半年內就掌握了，正式定為電工，一年後調城內電力工區。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發現許多電工在掐線時，從不認真估算，多掐了二、三，甚至十多米就隨手一扔；釘子掉在地上，從不彎腰去撿。據說腰是自己的，釘子是公家的。看來，他們也同樣不把自己當成主人。

在城內工區，我一度領著幾個人幹活，遠遠沒有達到拚命幹的地步，卻能輕易地做到省工省料。每到住戶幹活，還儘量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如，人口多的家庭主婦，希望燈頭線長一點，可供三用：「吃飯用、孩子做功課用、主婦做縫紉機活時用」。又如，愛整潔的人家，不希望電錶裝在室內或廚房，願意裝在走廊或不礙眼的地方。又如，有嬰兒的家庭，希望一間屋能裝二盞燈，晚上孩子起夜開小燈。我這樣做，工長兼黨支部書記杜萬峰並不滿意。另一位領著幹活的楊金山，技術上很全面，做工考究，幹活麻利，就是每項工作必超工超料，上班時間領著人逛公園、上商店、打撲克牌，卻很得杜工長器重。慢慢的，我就明白了，只有超工超料，亂填施工報表，杜工長才有可能在亂中謀私利、拉關

係。都一清二楚了，他那用的工料從哪兒出啊？

時間不長，我就成了杜工長的眼中釘。一次，楊金山因為和一個女徒弟的某種關係，動手打他的另一個男徒弟，我在會上批評了楊。事後，我便被攆出了城內工區，調到東便門電力工區。我調走之後，工友告訴我，城內管區的許多住戶問：「你們那個瘦瘦的徐師傅怎麼不見來啊？」「調走啦！」「哦？調走了？」

現在，又可能有東便門管區的住戶要問：「你們那個瘦瘦的徐師傅怎麼老不見哪？」「叫人把他當反革命，關到監獄去嘍！」「什麼？他是反革命？」

不知觀者作何感想。

調到東便門工區，才發現那位兼支部書記的賈工長，雖說比杜工長年輕多了，可在謀私利、不幹活方面卻比杜工長更隱蔽、更滑頭。面對著這樣一些細微的、大量的、司空見慣的現像，我能不憂嗎？

憂（二）

一次到密雲車站施工，活完得早，下午我去爬山，下山見一些社員在棒子地裏，歲數大的在抽煙，婦女在聊天，年輕的打撲克牌。我觀察了他們有一個多小時，我與他們混熟了，他們見我一個普通工人，倒也跟我說實話。

「你們幹嘛老待著不幹呢？」

「幹？一個工值才八分錢，幹一天活不夠買包煙。勁都使在這兒，自留地誰給幹？」

「那幹嘛在這兒耗著呢？」

「人家沒打鐘，咱敢回去？」

嚴格地說，這不叫「大呼隆」，而應叫「大胡弄」，在當時農村普遍又普遍。我又憂。

憂（二）

當年更值得人們憂慮的是政治狀況。

在部隊上對外界較疏隔，當老趙助手，陷在大大小小各種運動之中，聽到的只是這項運動必要，那項工作必要，脫離了活生生的現實，思想是混沌的。但偶然遇到一件事，讓我有所清醒。

那時有個「九大」代表叫安玉榮的，是北京粉末冶金廠工人，靠憶苦思甜當了黨代表。我先後聽過她三次憶苦思甜報告的錄音。第一次，她說她爸爸臨死前想吃一個糖葫蘆，而不可得。這倒可能是真的。第二次她說，她爸爸臨死前，想吃一口淨面窩窩頭，而不可得。第三次，她又說，她爸爸臨死前，想喝一碗粥，而不可得。這一次一個樣的憶

苦，真叫人不敢相信。可她偏偏當上了「九大」代表，莫非「九大」代表……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是與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手攬手，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上露面的。這一次，開始明顯地看到他有點老態龍鍾了。可報紙依然說他「神采奕奕」。我不由得想到，這位老人對外界的真實情況都瞭解嗎？這裏暫不談我當時觀察和瞭解的黨內的重大門爭，什麼「海霞」、「創業」、「慶豐輪」、「譚甫仁之死」……只先看一些此機關和個別幹部的作為。

我所在的建築段是個不過七、八百人的單位，段上的脫產幹部有五、六十人，加上每個工區不應脫產而實際上脫產的二至三人，實際上的非生產人員近百人。據說比文革前多一倍還多。可是機關還是常嚷嚷：「人不夠用」，寫個屁大點的材料，也要各工區派人送上去。曾常去段上的女工魏秀英說：「不上段上去，還好一點。到段上一看，那勁兒全泄沒了。人家聊天的聊天，打毛衣的打毛衣，看報的看報，逛商店的逛商店，成天叫咱們『大幹快上』，也虧得他們說得出口！」

今年（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那位原北京市機械局黨組書記鄧文林，我就曾有幸和他直接交過鋒。我是反對「爛鼓任人錘」的，現在提到他，只是以這位知名人士為例，易於說明問題。

這位兼書記的鄧局長，原是鐵路分局的高層幹部，所以仍住在靈境胡同鐵路宿舍裏，和城內水暖工區的工人周雲鶴是鄰居。七六年地震，家的西牆，即周家的東牆震裂，建築

段派人拆修。等砌牆時，鄧家一男一女二個青年人出面刁難，聲稱新砌的牆靠他家那一側沒有了壁櫃，那不行，不讓繼續往上砌。原老牆一米多厚，曾有一個堵死的門洞可當壁櫃。現砌牆，不足四十公分怎留壁櫃？不留壁櫃，鄧家就不幹。在鄧的慫恿、支持下，這二個孩子就白天砌，晚上扒。周家四、五口人住一間房不能老露著天睡覺啊。鄧家無所謂，他們也四、五口人，住著四、五間房子，怕什麼。最後，建築段惹不起這位老首長（可能是個「三八」幹部）和他在分局的老同事，妥協了，鄧家方霸甘休。但事情並沒有結束。

七七年初，周家經申請批准，在房前蓋一間小屋給孩子住。這小屋絲毫不防礙鄧家的事，鄧家的女兒卻出面干涉，說周家蓋小屋影響了他家從西邊來的光線，並稱小院朝東開門，側向著她家窗戶（足有四、五米遠），她受不了。一天下午，她揚言要糾集人制止蓋房和砸爛蓋房用的石棉瓦。老周慌了，趕忙打電話請支部去人調停。當時尚未下班，杜萬峰正準備到前門俱樂部看一個內部電影，另外他又怕得罪姓鄧的和他的老同事。他靈機一動對我說：「小徐，你不是不去看電影嗎？那你替我上老周那兒去看看。」我就從命前往。

剛到老周家，鄧文林就坐小車趕回來給他女兒撐腰來了。只聽鄧文林大聲說：「老周哪！你是怎麼搞的啊！你要在這兒蓋房子不大合適吧？嗯！」他反背手站在周家門前。

老周一聽他的聲音，渾身直篩糠。我對老周說：「別怕他，我去對付他。」

我也雙手一背剪，沖著他便說：「您就是鄧局長，我是段上（讓他不敢太小視我）派來調解你們糾紛的。（一下子把他拉下馬，讓他和老周處於平等地位，先打掉他以官壓人的威風。）老周是個工人，您是局長，別說這房子蓋在柱子中心線以西，絲毫不礙您家的採光，就是往東占一點，您作為局長的，也不能不讓著他作工人的啊！再說老周孩子大了，擠在一間，多有不便，您也是知道的啊，嗯，您說呢？」

他白了我一眼，無可奈何地說：「你，你倒挺會說話的！」再也不說什爲了，背著個手，叫女兒隨他回去。這就是鄧文林在左鄰右舍中的真面目，所以他在機械局那樣霸道也就毫不足怪了。他在黨風逐漸端正的今天受到應有的處罰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這種人在當年往往有一張王牌，對毛主席有樸素的階級感情。那就讓我們再看看這類人的樸素的階級感情吧。

七六年九月，鄧文林藉口他家西牆震裂，要大修房屋。實際上，西牆早已由建築段修好，他家還搗了不少亂。他家這次大修並非修也，而是調來機械局工程隊（爲什麼許多幹部捨不得這個「小而全」的落後的經濟結構的癥結便在這裏。）大改重裝，完全按現代化標準改裝他這一整排中式平房。在他作這種勾當的時候，他們局不知正有多少職工的危房破屋待修而無人修哩！他心中有鬼，怕夜長夢多，就讓工人加班趕修，到深夜再擺酒宴專門招待二個領工，以示關懷，好讓他們更努力監工、督工，更符合他的裝修要求。九月九日主席逝世，鄧文林怕今後會有變故，不許工人停工參加聽廣播和悼念活動，反而加班加

點，日夜兼程。這就是這位郵局長這類人的「樸素的階級感情」！

對這些，我是又鄙視，又氣憤，又憂慮。

憂源何姓「屈」

其實，對以上這些，我憂什麼？我又為何憂？我更為誰憂？

過去有人好心地對我說：「咱們是草民，咱們管不了那麼許多。」

今天仍有人坦率地告訴我：「你不就是一個二級工（入監前已爬上三級了）嗎？想管國家的事，活該！」（即住監獄活該。這是含著某種同情的狠。）

我也有時自嘲地對自己、對別人說：「我這是吃飽撐的！（今天的我，很能瞭解瞿秋白當年為何把臨終自述，名為『多餘的話』。）」

最近，十一月十一日，我又從電視劇《魏征》中得到一句話：這叫「自作多情」！

話雖這樣說，對於有些人，你讓他見憂不憂，見慮不慮，還是真難作到，甚至要宰他，要殺他，事到臨頭，他還犯傻犯呆地在那兒又憂又慮呢！

今年（八四年），九月四日，我寫了《關於充分利用「友好城市」這條渠道，為經濟建設服務，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振興步伐的建議》，十月十四日，又寫了《希望重視和加強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出版、發行工作的建議》，這恐怕更是自作多情了吧？總不至於入了字

紙簍吧？不是說，盛世之下野無遺言嗎？

當然，我有時也消沈，正是在那一段萬馬齊喑的日子裏，我也學著操起種花養鳥的行當，只是不太靈通。甚至，有時煩得連天天必看的報紙，也懶得看。

中國啊，中國！這古老而又新興的中國，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她的一部憂慮史，為什麼篇篇頁頁都有一個「屈」字呢？為什麼就數這「屈」字最醒目呢？難得不「屈」不稱其為憂慮史了嗎？哦，哦！最著名、最早的那一位不就叫「屈原大夫」嗎？他不就姓「屈」嗎？還稱「原」！這個源頭可開得不好，「憂源」為何要姓「屈」啊？

出路何在？

我在學習。我在苦思。

當時我的主要結論是二個方面。

經濟方面有二點

一、馬克思曾認為，勞動者對勞動喪失興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由於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被有產階級所剝削，所佔有，勞動者與勞動成果相分離。那末，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對勞動喪失興趣的原因又何在呢？我當時認為主要原因有二：1. 是少數幹部的以權謀利，多吃多占，損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2. 是勞動者在生產上

無權，在分配上平均主義。歸根到底，是個當家作主的地位問題。

二、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形態上的問題。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既高度發達，又日趨沒落必然滅亡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上的。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理論應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生產勞動效率。可是，不論是過去的蘇聯，特別是後來的中國，資本主義都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廣大農村基本處於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的狀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又不允許我們像初期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以千百萬貧苦農民的破產代價來實現的。那麼，在廣大農村就只能建立適合於當時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係，讓農民從生產中得到實惠，得到好處，在農村就地發展工業和副業，防止、避免大量農業人口流向城市，實行「小河有水大河奔騰」的聚財方式。

在政治方面也有二點

一、在政治上，我當時認為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只要不使用暴力和煽動使用暴力推翻無產階級政權，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所謂「民主」的根本含義是官民共主，就是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如果只發表相同的意見，是用不著談什麼「允許」、「不允許」的問題，也用不著講「民主」。只有發表不同意見，才有一個允許不允許的問題，才需要倡導「民主」。有不同意見、不允許公開發表，往往釀成「宮廷鬥爭」，以致「宮廷政變」，也往往製造「宮廷秘史」和「宮闈豔史」，很難做到對「社會公僕」的有

效監督和促進。

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說，只有對立面（包括敵對面，但敵對面只是其中一種特殊的形態。這裏指的是非敵對面的）相互鬥爭和統一，才是實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既然我們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為什麼偏偏在政治上不注意自覺地運用這一條規律來指導我們的社會生活呢？和平時間不同於戰時狀態，也不同於政權初創的鞏固時期，在言論自由方面應該有更寬的尺度。古人尚且懂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尚且「不毀鄉校」哩。毛澤東的晚年悲劇不是主要的就在於脫離了實踐，脫離了群眾，容不得不同意見嗎？後來，我國政治局勢的發展的實踐，更進一步加強我這方面的認識。

當時自認為弄清楚了以上這些問題，今後的方向也就比較明確了。我暗定主意：今後凡符合正確方向的，努力促其實現。反之，則與之進行必要的和平的爭鬥。我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我崇尚聖雄甘地的許多品德，我信服理而不信服力。這也許是弱點，甚至是個錯誤，但我認為這應該是我政治生活中不可動搖的原則。

總理逝世

一九七六年，是中國人最悲哀的一年，又是中國人最振作的一年，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極特殊的一頁。一月九日早上，我剛走出宿舍樓，便聽見哀樂四起，心裏「格登」一下，嘴裏不由得吐出了：「不好！」

我連忙轉身回去，找出黑紗，撕成三塊，我戴上一塊，另一塊給妻一塊，三歲的女兒一塊。我女兒那張懷念周爺爺的照片就是那時候照的。

匆匆來到段機關，我那時正在段上排話劇，準備參加職工業餘文藝匯演。奇怪的是，我發現就我一個人戴著黑紗。我又急不可耐地要其餘幾位參加排戲的，和我一塊準備紮花圈，到總務要紙、要漿糊。總務說，沒有。怪了，那年月哪個單位也少預備這些東西，怎麼偏偏給總理紮花圈反倒沒有了呢？後來，才慢慢打聽到北京市委有「三不准」的指示：一不戴黑紗，二不紮花圈，三不開追悼會。（後來迫於壓力，有所改變。）更怪了，這是誰死了啊！你們知道嗎？這是總理！不是別人！我火冒三丈。過去雖曾聽了不少有關總理處境很困難的消息，沒想到竟會搞到這種地步！

一氣之下，下午我就不辭而別了，來到王殿元所在的天壇公園花卉處，正好何延忠也在那裏。我不由分說地就把殿元的塑膠花拆了，做了一個小花圈，找了二條緞帶，寫上「敬愛的周總理，中國人民世代永遠懷念您！您的兒女敬挽」，將它頂在自行車前叉子上，與殿元、延忠一齊奔天安門廣場，招得行人直看我們。當時紀念碑前有一些人，但還沒有花圈。我們選了紀念碑南側周總理親筆手書的碑文下面，認為這邊是屬於總理的，獻

上了這第一個小花圈。我們三個人一路無語，到了這兒仍是無語，只有默默的致哀和啜泣。

從這一天起，我是每天必到紀念碑，讀市工會一個小組的那篇悼文，和不相識的人交換心聲，與幾位一同排戲的夥伴去照相留念。當我看見「一花引來萬花獻」，松牆上也綴滿了小白花，我滿意了，我高興了，我覺得對得起死者了！

那幾天，我天天去照相，照那壯觀的場面，照那自發的悼念，製成簡陋的相片冊托人獻給鄧穎超。我想她老人家當時一定除了悲哀，也一定很氣憤，我想讓她老人家寬寬心，讓她知道人民愛戴自己的好總理，同時也沒有忘記她這位孤寡的老人。

總理遺體火化那天，北風料峭，我和妻來到西單路口，道路兩旁站滿了人，等著總理的靈車，看著靈車開過去，直到深夜，等著靈車開回來，整整在寒風中佇立了六、七個小時。我們心裏明白，除了看見車的外型，是什麼也看不見的，我們也仍然要等在這兒，要讓總理的英靈，讓總理的未亡人知道他們的兒女來送他了！我們都是他們的兒女！

當時，心裏總像是在賭一口氣，至於為什麼賭一口氣，又明確，又不甚明確。後來才慢慢地明白了，這是對總理的愛，對主席的怨，對奸臣的恨。

一份極重要的「揭貼」

四月，清明節要到了，我當然更是天天必到天安門，似乎在盼望著什麼。

四號晚上，已是十一點了，我還拉著我妻子去了一趟。到了天安門，只見大會堂東門外已站了一排足有五百米長的「工人民兵」隊伍。我低聲對妻子說：「可能要出事，小心點！」

當我們在紀念碑西側下方看到整個「四五運動」中那張最大膽，也是最重要的「揭貼」的時候，我全身的血突地湧向了腦部，不禁叫好！這「揭貼」寫道：前不久，中國共產黨黨內發生了第七十二次路線鬥爭。毛澤東主席在最近一次中央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江青等人的錯誤，肯定了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後所取得的成績……雖然後來的事態發展是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是這份「揭貼」卻第一次明確地向國內外輿論，傳達了一個正確的資訊：毛主席肯定過鄧小平。毛主席批評過江青。這消息雖被層層封鎖，卻在瞬息之間傳遍了祖國大地。這消息，在那個年月是驚天動地的。這份「揭貼」的歷史功績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緩和了總理逝世後因種種怪事而引起的人們對毛主席的某種冤忿，為十月勝利中打倒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造了輿論，為鄧小平的再次出山立了頭功。

在這份「揭貼」之前，廣場上雖曾有過抨擊「四人幫」的內容的花圈、匾額、詩文，那全都是以隱喻的形式出現的，如：「江橋搖」（甚至不含王洪文）、「懷念楊開慧」等等。而這份「揭貼」，則把一場民意運動，直接地導入了打倒「四人幫」、擁戴鄧小平的政治運動。

這份「揭貼」的歷史功績和它的製作者在當時十分恐怖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眼光、膽識和勇氣是永載史冊的。

四月四日夜的流血事件

看完了這份「揭貼」，我連忙對妻子說：「我們該走，這是第一個公開點了江青名字的，他們一定會借此下手，走，快走！」我們快步走到與東西交民巷相通的橫街時，這兒已佈滿了警察和「工人民兵」，並站成了一道封鎖線：只許出，不許進。

這時遇到一個頗有意思的場景。一個少年幾乎與我們同時到達這裏。他問一個女警察：「我要出去撒泡尿，等會我還要回來，行不行？」女警察答道：「不行，出去就不能再回來！」（她心裏可能在想：真傻呆！）那少年固執地說：「那怎麼行，我的朋友還在裏邊看著花園，還等著我替他哩！」那女警察只好說：「走吧，走吧，快走吧，別囉嗦了！」（她心裏可能在想：走一個少一個挨抓的，還不快走，怎麼看不出梭縫，真傻！）是啊，這少年「真傻」！他是想不到共和國的烈士紀念碑下，善良的人們會為紀念周總理而流血啊！

我們剛走出警戒線，警察、「工人民兵」就開始轟我們，一直轟到正陽門下，才停住。這時聽見紀念碑前的嘈雜聲，並持續了很久。後來，據目擊者告訴我，當時紀念碑前

發生了建國三十年來第一次流血事件，許多人被打、被抓，花園全部被拉走，一部分拉往郊外，一部分拉進歷史博物館和東南角那座小紅樓的後院裏。最慘的是那份「揭貼」前的圍觀者。圍觀者中混有許多便衣。等到動手時，人們突然靜了下來，開始清醒，但還十分瞭解自己處於什麼樣危境之中。這時，突然一個便衣，讓那位剛才應大家要求小聲唸這份「揭貼」的人嚷道：「唸啊！唸啊！怎麼不唸了？」那人不語。便衣們過去用暴力強迫他唸，他仍不唸，便衣們開始按著這個人的頭往紀念碑上撞，一邊撞一邊惡狠狠地說：「唸啊！不是挺英雄的嘛！怎麼不唸了？」與此同時，其他便衣、警察開始打人、抓人，不服者、反抗者更是被毒打得厲害。

青年們的血，無辜的血第一次真正染紅了紀念碑。

第二天，我趕到天安門時還見警察和清潔隊用洗滌水在刷，用水龍頭在沖。可是，一早仍然有人衝破阻攔又在紀念碑的四側立上了四個大花園。白天，紀念碑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這一夜的行動，據內部人士說，是王洪文坐陣在文化宮親自指揮的。凌晨，他接見了全體幹警，並表揚他們幹得好。後來，不還專門為鎮壓「天安門事件」的「英雄們」開了授勳大會嗎？

這就是我當時耳聞目睹的「四四事件」的真相，「四四事件」是「四五事件」的直接導火線，完全是由一些人蓄意製造的流血事件。往年的清明節花園，從來是放一周左右才處置的，可是這次絕大部分是紀念總理的花圈，人們不都說自己熱愛周總理嗎？為什麼

偏偏這一次要在清明節當天就處置呢？而且還發生打人、抓人的流血事件呢？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四四流血事件」和進一步的彈壓，就不會有「四五」的群眾討還花圈的要求、打警察、翻宣傳車、火燒小樓。

「四四夜的流血事件」是日後許多有關「四五事件」的報道、追記所忽略的。這一點，希望今後的史學工作者能注意到。

八零年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對一位朋友說起這件事的始末，他才對我說，那張「揭貼」是他幹的，我開玩笑地對他說：「好嘛！真有你的，差點沒送了我 and 彤這一條命！」同是這一天，這位朋友又感慨地說：「黨要是明白有我們這些人的存在，對這個社會對黨的好處，就好了。」

是啊，要是鄧小平能知道，我這位朋友當年冒著生命危險，寫過這麼一份重要的「揭貼」，他今天的政治處境至少不會這樣困難吧。可惜，我們這些人都不會來那一套。不然，中國哪能有「寒食節」呢？

「四五」險遭抓

四月五日凌晨，我趕到天安門之後，就匆匆又趕到西單上班去了。

臨近中午，小魏從外邊回來，告訴我們，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我和其他人正在西

單手帕胡同鐵路宿舍一位老知識分子家的頂棚裏幹活，我們禁不住都高呼起來了：真解氣！好樣的，幹得好！主人家的所有人都都異常高興。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又挨完了杜萬峰組織的又長又臭的會。會上，他一再叮囑：任何人不得再去天安門廣場，那裏有反革命分子搗亂。他不這麼說倒好，一經他這麼說，我更堅定了馬上去天安門廣場的決心。會一散，我就拉著當時和我還不滿錯的楊金山，在街上買點吃的，去擠車，趕往天安門廣場。車出奇地擠，真沒把人憋死，而且天安門站還不停，司機架不住乘客的一致要求，破例地把車停在正對廣場的馬路中心。

廣場上人已寥寥無幾，一輛廣播車像幽靈似地不停地在放那位市長的講話：「廣場上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在煽動，希望大家趕快離開，不要在廣場逗留」。沒人聽它的。越晚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了，大多數在紀念碑前唱歌、唸詩、交談、獻花圈，花圈又圍滿了一層。九時許，紀念碑四周，自從總理逝世就一直故意不開（給在晚上看、抄花圈上詩文的人們造成困難）的聚光燈突然亮了。我連忙對老楊說：咱們該撤了。

我們走了下來，又去看了看被燒的汽車和小樓。這時又有不少剛才一起退下來的人，又重返紀念碑前。我們則到東南角的廁所小便，剛出廁所，只見松牆後跑出一隊穿高腰黑皮鞋、紮武裝帶的警察，廣場四周不斷跑出一隊隊軍人、「工人民兵」，軍隊在週邊，警察和「工人民兵」在內層。開始，那一隊警察沖我們跑來，馬上有人制止，讓去包圍紀念碑。警察們剛跑進鐵索欄杆，遇到一大片群眾擺放整齊的自行車，他們中的個別人將車全

部踢倒，然後用皮鞋在自行車上亂踹。大批的警察、民兵把「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人群包圍了，叫喚聲、喊打聲、慘叫聲，不絕於耳。

有幾個膽子較大的人，與我們一起被轟到東南角馬路牙子上站著，有的站在前門原銀行、郵局門口的高臺上。只見一個人忽然忙從西南角跑過來，見我們便問：「他們拿著棒子沒有？」我們答：「看不太清，好像沒有。」那人又說：「那邊的都拿著棒子。」看來也是一個不怕死的目擊者，特地跑來交換「情報」的。

這時，見一個人在紀念碑前的松牆處被打倒，估計是棒打的，他倒在地上，就動彈不了了。我們數著數，數到十幾下時，才見他蠕動了幾下，七、八個警察圍著他站著。片刻，一輛吉普車從文化宮方向開過來，可能是用步話機把它叫來的。幾個警察動手了，要架這個人上車，此人拚命掙扎不肯上，終於被硬推搡上了車，車開走了。

我們這幾個人見警察並不理我們，看來站在廣場欄杆以外的人他們不管，又壯著膽子向中心靠，剛到廣場邊緣，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警察大聲呵道：「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快走，快走！」他見我們倒退幾步又停下了，更大聲呵道：「快走！快走！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這說的叫什麼話？）這時，一位身穿軍裝的退伍軍人模樣的青年人接了茬：「好，好，咱們走，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轉身便要走。話音剛落，那位警察突然大喊一聲：「抓住他！」四個年輕警察撲向他，他剛起步跑，便被抓住。抓了回來，便是一場極野蠻的毒打，尤其那位五十多歲的老警察，朝這年輕人的臉、腹，一陣兇狠地

拳打腳踢，青年奄奄一息，朝天倒在地上。那位老警察仍不甘休，一邊用蹬著黑皮鞋的腳亂踩這年輕人的腹部、胸部，一邊叫到：「誰是反革命？我聽你說，你說呀！」這野蠻人行兇的一幕在我腦海中印下了永世不忘的印記，對我日後的人生觀起著重大的影響。

這時的我渾身氣得發抖，幾乎完全控制不住了，整個身體的血往外湧，我與一旁的另一個人同時從嘴裏噴出同樣的一句話：法西斯！我身體趨向前，心裏想說：「不許打人，你怎麼能這樣打人呀！」說時遲，那時快，早在一旁盯著我的楊金山，伸出了整天要鉗子把的大手，一把將我牢牢抓住，嘴裏說：「找死呀？」不由分說地拉起我就走。我還不舍地看著那青年，他已被四個警察四腳朝天、連拉帶拖地拉向紀念碑。後來，從「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民日報》的報道中知道，那位原遭毒打的年輕人叫阮南南，是位工人。他被拉到紀念碑上，又被罰跪在碑前。後來據人說，所有被抓去的人，先是集中在文化宮，全部在文化宮朝牆罰跪到天亮，經簡單的詢問，又大部分投進了我今天住的這個原屬市局七處的「龜」形樓。

當我和老楊走到正陽門時，在空場上站滿了各單位調來的「工人民兵」，只聽見一個人壓低著聲音對周圍幾個人說：「咱們都是工人，叫咱們打人咱不幹，咱工人不打工人。哥幾個，聽見了嗎？」

至此，整個神州大地只有暗流，只有沈寂，可怕的沈寂。我的眼前總有那位年輕人的身影在晃動，似乎我對他有愧。我的耳邊總是響著一句馬克思的話：只能聽見一種聲音的

民族是可悲的！是可悲的！

中華民族啊，偉大的民族，在此時此刻不可悲嗎？！

偉大的「四五運動」

「四五運動」是一場自發的民意運動，它已經在中國的現代史上佔有了極重要的地位。至於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說，「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話，那末，真正揭開中國社會演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序幕的，就是「四五運動」。如果說：「五四運動」還只是一場愛國的學生運動的話，那末，「四五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全民族、全體人民的愛國運動。「四五運動」從政治上結束了仍然帶有封建殘餘的個人專制，它從經濟上結束了自給或半自給的自然經濟。中國社會從此才有可能走向一個完全意義的現代化的社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四五運動」所表達的民意，就不會有「十月勝利」；沒有「四五運動」所表達的民意，就不會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誕生。就像沒有「五四運動」，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北伐戰爭的勝利一樣。

如果我們還承認我們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的話，那就讓我們拿出足夠的勇氣，來恢

復「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這樣一個起碼的唯物史觀吧！讓我們再不要懼怕聽到「群眾自發」這個完全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字眼吧！

有人說，當無產階級的政黨已經建立，再談論什麼群眾的自發性就是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是似是而非的，是完全錯誤的。即使在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任何一場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正是首先彙集了群眾中自發的正確的願望和要求之後，才可能興起、發展的，並取得符合人民意願的結果，否則對於人民群眾來說，只是外在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唯一使命，難道不是去正確地反映和表達人民意願嗎？除此以外，難道還應當有什麼別的使命嗎？

當中國人民已經接受了二十年強加給他們的大大小小的各種運動，把他們搞得疲憊不堪的時候，第一次自發地全面地表達了他們所要求的民富國強、政治民主的強烈願望，難道不是很自然、很正確、很應該的嗎？難道這願望不正是中國共產黨內一切正直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願望嗎？這一次讓民眾首先生動地自發地來表現，讓他們自己運動自己，而不是別人運動他們，那又有什麼不好，這不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為之奮鬥的結果嗎？政黨不是保姆，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者、表達者。當中國人民在「四五運動」中所表達出來的種種願望，由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十月勝利」、「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真正體現出來了，這不是很好嗎？這不正是清澈的有源之水嗎？那我們有些人又為什麼又不敢正視一下這個偉大的源頭呢？

「沒有偉大的長江，就沒有偉大的小溪。」早已被人顛倒過來了：「沒有偉大的小溪，就沒有偉大的長江；沒有偉大的源頭，就更沒有偉大的長江。」

人們，親愛的人們，讓我們一起正視這一段剛剛走過來的歷史吧。

追查中的倖存者

有人甚至拍著胸脯保證說：「四五事件」中沒有死一個人。這是謊言。

「四五事件」不僅僅指的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這一天，在天安門發生的事件，它既包括「四五」之前，也包括「四五」之後所發生與之相關的全部過程。「四五事件」發生後的追查運動更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

在那位專門備有一個「黑筆記本」，專門記錄周圍所有人行言行的特務型人物杜萬峰的眼睛裏，我這個「四五事件」中的活躍分子，是不可能不成為被追查的人物的。因為我有足夠的蛛絲馬跡供他告發。果然，我成了他的告發對象，只是由於一種偶然的機遇，讓我「漏網」了，成了倖存者。

「一月八」、「四月五」，我幾乎都到天安門廣場去，而且在杜萬峰三令五申不許去的「四五」前後，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泡」在那兒，這滑不過他杜萬峰的那雙警惕的「階級鬥爭眼」。這是其一。杜萬峰傳達上級指示，要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我卻公開在

會上說：「三項指示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以毛主席的指示爲綱，這有什麼錯誤？」這是其二。

杜萬峰一天突然罵娘：「他媽的，萬里這小子原來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啊，我們全上了他的當。」魏秀英低聲對我說：「前些日子，他老杜恨不得管萬里叫爹！」我忍不住噗哧一笑。事後，他讓大家每個人寫篇表態文章，批判「鄧小平、萬里這班XXX！」我卻繞開鄧小平、萬里的名字，寫了一篇頌揚抓國民經濟、抓整頓的詩文，貼在工區的表態欄裏。這篇詩文是杜萬峰要求追查我的主要物證和根據，可能至今仍保存在我們段保衛股的有關檔案裏吧。這是其二。

七六年八、九月，在青龍橋施工，杜萬峰發來鄧小平、胡喬木等人起草的「彙報提綱」，要求認真批判，掀起高潮。我卻越讀越有勁，公開對楊金山、小趙、老曹（黨員）說：「提綱」沒有錯啊！中國要真能按這個提綱辦，中國就有希望了！這是其四。其他的，我也記不得了。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根本用不著這麼多，有一條就能要了一個人的命。偶然的機遇出現了。南口工區的電工張師傅的死，救了我的命。張師傅是全段最年輕的六級工，技術精湛，還不同於一般電工，懂理論；童叟無欺，服務周到，在南口工區管內的各個站、段是有口皆碑的好人。

他在「四五」前後，與別人私下議論過江青的爲人，在追查中被人揭發，風傳要追查

他。他潔身自好，忍受不了「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的重壓和侮辱，捨下了妻子和五個未成年的孩子上吊自殺了。他死了，他是「四五事件」中的被害者，難道「四五事件」中沒有死人？至少我知道「四五事件」的追查運動就有我的一位師傅成了殉難者。「四五事件」死人之謎不會是燭光斧影！

張師傅和我一同排演過話劇，他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也是幽默、風趣的樂觀的人。他時年不足四十歲，沒有「四五事件」後的追查風，他是不會死的。張師傅以無聲的抗議，抗議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抗議了「四五事件」的鎮壓者，抗議了「四五事件」的追查者，在知情的人們的心靈上劃下了深深的痕跡。張師傅的死，使得我們段上的幹部大為恐慌，力主追查的人膽怯了，消極追查的人更消極了，心中反對追查的人更是設置繼續追查的障礙。我倖存了。

隨著主席的逝世，十月的勝利，追查的中止，我更是倖免了。

年年一月八 年年四月五

年年的一月八，年年的四月五，對於參加過「四五運動」的人來說，是最有感情日子，堅信總有一天會大慶一下的。可是，對於有些人，這二個日子，好像有點不吉利，所以他們在這個日子，總是神經過敏，過敏得手癢癢。歷史當然不會按著某些人的主觀意志

來塑造。但它又畢竟是有規律的，那麼這個規律就是人民的意志不可抗拒。人類世界只會走向光明。即使在黑暗籠罩整個世界的時候，也總會有一線光明，這光明就是希望之光。

「四五運動」作為希望之光，閃耀在神州大地上，僅僅過了五個月就迎來了金色的十月。九月九日主席去世，全國人民是沈痛的。這位天之驕子，中國革命的第一功臣，黨、軍隊、國家的締造者，是不朽的。有良心的國人不會忘記他的恩澤，以他為中國人的驕傲。但是，向往前進的人又不願看到他的凝滯。他的去世，讓人們在悲哀之餘舒了口氣，這不是對老人的不敬，而是深沈的愛戴。

十月勝利實現了人民的意願，人們開懷地笑了，這是更強烈的希望之光。

我立即給華國鋒、葉劍英寫信，希望他們第一件政績就是順乎民心地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同時也就是給定為「中國納吉」的鄧小平平反。我唯恐此信此信落入「四五事件」鎮壓者的餘黨之手，我一封寄往小醫房胡同的谷牧家請轉交黨中央，一封寄《解放軍報》編輯部，請他們轉交葉元帥。當然，又是沒有下落，好在我有底稿。

這時，「達摩克利斯」劍仍然懸在人們頭上，我又是被追查的倖存者，使我不得不謹慎行事。每逢「一月八」、「四月五」，我只能去天安門廣場看看聽聽，與不相識但又不是可疑者聊聊談談，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為鄧小平的復出，起點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的徒弟

這個時刻，我也忘不了那位張師傅的遺屬。「四人幫」沒倒臺之前，我去南口看了他們一次。他妻說：「現在是誰也不管我們哪，您還敢來看我們，真是謝謝！」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只是赤手空拳慰遺孤啊！真慚愧！

「四人幫」倒臺之後，我立即讓他們寫材料，要求為張師傅正名，並要求解決生活困難的問題。七六年底，段上總算勉強同意按「非正常死亡」處理，錢一次結清，安排大兒子到建築段當徒工，每月十幾元錢。這孩子聰明好動，特別能吃，一頓飯吃八兩還不覺飽，這十幾元錢，真不夠他吃飯的。

這樣，我就收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徒弟。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帶徒弟的技能，我雖獲得全段電工技術表演賽第二名，但是我對電工是不鑽研的，只會做一般裝修電工的活，不懂理論，更幹不了高級工的活。待我用半年時間把自己渾身的電工解數，都傳給我徒弟張良之後，我對他說：「你跟師傅是再學不到什麼技術了，今後全靠你自己向別的師傅學和刻苦鑽研了，我還能教你的，就是怎樣學習你爸爸在政治上做個正直的人，在技術上作個肯於鑽研的人。據說當年你爸爸在城裏上班的時候，不管白天多累、多忙，晚上還要跑到文化宮去學習，去上技術理論進修班，你也努力吧，再爭取當個全段最年輕的六級工。」

直到八零年，張師傅的問題才有了較為滿意的解決，張師傅的妻子為此專程從南口到城裏來看我，使我深受感動，自己也覺得可以告慰死者的冤靈了。張良啊，不知你現在可成器哦？

欲當教師不成

七七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他主動要管科教，教育戰線開始吸收人才。

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現代化的國家必須以教育為基礎。再說，我對自己的電工工作，雖然在工作時間內是盡職盡責的，但畢竟和我的志趣相去甚遠。「四人幫」倒臺了，國家有了新的生機，我何不趁此大好時機在自己所喜愛的社會科學方面施展自己的能力呢。

教育這個大門對我是有吸引力的。我意願，也覺得有能力去當一名教員，那怕是小學教員也可以。同時，我就有可能，利用更多的時間去鑽研一下已經開始荒疏的社會科學。於是，我開始向分局的教育部門，向有關部門寫申請。在許多人還「死活不當孩子王」的時代，我自願要當一名教員，不是被某些人當成了神經不正常，就是認為不安心本職工作吧？或者當時機關對平民的來信還沒有理睬的習慣。反正，沒有人給予答覆。

一次，在靈境胡同維修，偶然認識了鐵一中的一位新提拔起來的年輕女副校長，她初步瞭解了我的志向、學歷、特長和口才之後，表示十分歡迎我上鐵一中試教數、史、地，並說現在他們學校正缺能講課的老師。她積極為我奔波，若干時間後，她無不惋惜地告訴我：「實在對不起，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分局教育科說我們學校已經超編，怎麼還能進人呢？可是，你知道，這二年進的都是些什麼人啊，都是有門、有線的，都借著學校的指標，從外站、外省縣調回北京的。什麼七大姑八大姨，大多數人任不了教，叫我們怎麼安

排他們的工作。這是能教書的進不來，教不了書的進來不少。」

「那也得謝謝你！」我說。

「你在分局認識什麼領導嗎？不行，也走走門子。」

這位熱心人倒是提醒了我，我在機關幫忙的時候，認識一個處級的下放幹部，現在任分局副局長。走門子，實在不意願。可是，韓信不還受過胯下之辱嗎？求職業，不算丟臉的事；毛遂自薦，也不算違反什麼原則。可這門子怎麼走法，總不能空著手走啊！對了，不是有個朋友送了一幅不錯的山水畫挂曆嗎？挂曆當時還算稀罕，割愛求職，帶著它吧。一個人去難免尷尬，動員妻子帶著孩子一起去。

進了趙副局長家的二層小樓，老趙正看電視。他聽我講述，接過挂曆，最後說：「我跟他們打個招呼吧。」

下文沒有，不便追問。總之，教師沒當成。

投考研究生受辱

轉了一圈又轉回來了，不想考大學，沒有文憑，還是難以進入研究社會科學的殿堂。忍痛改初衷，報考研究生。

我深知報考研究生的困難：一、只有高等院校的高材生，才有報考研究生的資格，我

以同等學歷的身份去競爭，未免有點自不量力；二、研究生錄取的，是這些高材生中的尖子；三、文革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競爭勢必異常激烈；四、我缺乏系統的基礎和專業知識；五、學業荒疏多年；六、新聞報業史專業雖不考外文，但這專業對於我是陌生的；七、這專業報名二千多人，只取一至二名，實在太難了；八、複習時間很短，只允許脫產一個月。

難啊！妻子全力以赴地支持，好像是她參加投考一樣激動，自願包下全部家務。好，有堅強後盾，那就上陣！業餘加脫產，閱遍了北京、首都、科學院三大圖書館的有關資料，心底才較為坦然。

趕考時，有人在考場外議論：聽說早已內定了，咱們是陪練的。我將信將疑，現在不是講真本事了嗎？那一套吃不開了吧？考歷史、考政治、考基礎課。自我感覺良好，甚至回到家中能複背全部試題和自己的答案。信心倍增。

專業課試卷是要求寫一篇論文，題目是「試論宣傳工作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融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結合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新聞工作的實際作用，簡潔明瞭地論述了這個問題。整個論文寫畢，差十五分鐘到點，複查、交卷。

回來的路上，我們單位一個與我同考研究生的人告訴我，他是怎樣做的，說著說著，他說：「不好，我走題了。」並告訴我，是怎樣走的題。我聽了也感覺他是走題了。他又

問我怎樣答的，我向他複述一遍，他認為論述得不錯。至少當時我感到他的態度，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

發通知單，我總分比那位同考的高一些，奇怪的是他走了題的論文得六十幾分，然而我的論文才得四十幾分。後來一打聽，我的總分只比參加復試的少二十幾分。我自然想到，莫非主考因為我不在內定名單之列，論文評分又不容易有統一的硬性標準，而故意將我論文的分數壓低，以阻止我參加最後的競爭？想到這裏，不覺怒氣衝天。再一想，天外有天，樓外有樓，這二千個競爭對手中一定有實際學業比我更高的人。可是我不能忍受用這樣壓分的辦法，對付我們這種沒有門路的人啊！這不是成心侮辱人嗎？一氣之下，我寫了致教育部、北京大學黨委的公開信，公佈了根據我複記下來的論文，請領導和各位師長評一評這樣的論文是不是應該得四十分，如若我的複記文章有與原文明顯不同，有華飾之處，甘願受罰。我指望北京大學這樣一所素有民主策源地之名的學校，能主持公道。當然，我也考慮到，即使我爭回二十幾分，我的總成績也比不上名列前茅者。所以在公開信的結尾部分，著重談到，現在國家急需人才，近十年沒有進行過這樣的大考了，能不能充分利用這一次考試的效應，把接近研究生錄取分數線的其他考生，按考試和復核的實際能力，由國家各部門量才錄用。特別是那些能接近錄取考生水平的同等學歷者，國家是否可以考慮按其實際水平承認學歷，擇優選用。

北京大學繞過我個人，通過我所在單位向我施加壓力，希望我不要再開。

教育部不理睬，我徑直找去，考生辦公室推來推去，最後一位負責人很不耐煩地對我說：「錄取不錄取，權力在學校。」天啊！他還以為我在爭個人的錄取哩！我忙解釋希望教育部能考慮我那個建議。這下子，他倒乾脆：「這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完了，全完了，面對這樣的官，再費口舌都是多餘的了。

牆前的「私生子」

三撞二撞把我撞到了「牆」前。

不加雅號，稱它為「牆」，我看不會有大錯，它本是牆。開始，人們稱它為「民主牆」，後來《參考消息》借用外國記者的話，也稱它為「民主牆」，並向全國做了介紹，還告訴人們臺北有一個對應的「愛國牆」，是因為釣魚島事件和中美建交而興起的。至於北京西單這堵牆，後來有人稱它為「西單牆」，沒收了它的政治內含。姑且稱它為「牆」吧，這錯不了，其他問題留待歷史學者或日後的「好事者」去考證吧。確切地說，我不是被撞到這兒來的，我還不至於那麼下賤！也不能說與撞沒有一點關係，我工作單位正在那附近，也有一定關係。但我主要是被吸引到「牆」前的。當時有二件事吸引了我，讓我拋開個人的煩惱。

七八年，「牆」上雖然最早貼的一份帶有政治色彩的文章，是有關《中國青年》雜誌

復刊的始末，因為復刊號登有為「天安門事件」鳴不平的內容，一度被某位大人物勒令停止復刊。這又撥動了北京人的心，所有關注「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的心。一句話，人們在這個敏感的問題上「氣不忿兒」。我自己自然也不例外。這位大人物有悖民意的作法，更使人感受到，在如何對待「四人幫」的問題上，黨內的鬥爭並沒有結束。

然後，是北京汽修七廠的「零五三八」工作證的持有者，致宗福先的公開信，更是掀起軒然大波。當時人們並不知道黨中央正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該文肯定「宗戲」的前提下，尖銳地指出了「宗戲」所沒有敢觸及的「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背景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並表達了年輕一代人對黨和老一輩革命家的信任和愛戴之情。

綜觀全局，我當時認為，在「四人幫」倒臺之後，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是保守，還是變革這樣二條道路的問題。我以後的所有政治活動，都跟當時這個基本分析相關連著。凡是保守的，我就反對；凡是變革的，我就支持。

當時，我感到光憑在「牆」前發發議論，倉促地寫幾張大字報，已經不能適應人民要變革的願望和要求。人民需要一種深思熟慮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報考中國報業史研究生的一段緊張的學習，對我是有啓迪的。中國報業史使我懂得：報是人辦的，手抄報也是報紙的一種。中國報業史又使我懂得：中國是先有官報，後有民報的。但是，民報曾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起過相當積極的作用。有一度，民報在中國相當盛行，它在民眾中的影響是官報望塵莫及的。官報、民報並存的局面一直從清末延續到解放初。

一九五七年，民主黨派的報紙的停刊，才算中國民報在大陸的暫時中止。但中國的臺灣、英人暫治的香港、葡萄牙人暫治的澳門，仍是官報、民報並存。中國報業史又使我知道，具有現代意義的報紙，起源於外國傳教士在華辦的民間宗教報，即民報。特別是七八年底，政治局勢的趨向似乎又給我一種希望：今後的中國有可能允許民報再嶄露頭角。

以前談論過的言論自由的必要性，與現在看到的可能性，給了我一種衝動：辦報，辦一張民報。從民間的角度，對中國社會的更大進步作貢獻的機會到來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名外國記者在「牆」前宣佈：鄧小平肯定了「牆」，二十六日將就此召見他們。我聽後異常興奮。二十五日這夜，誕生了我的「私生子」——《四五報》。它的誕生暫時還缺少必要的法律手續。這是一份四、五張八開紙的手抄報。後來一位美國記者托人向我轉送了這張《四五報》的新聞照片，否則我自己都沒有了一份完整的底稿。

針對當時有人仍然號召：「抓綱治國」。《四五報》首篇評論是「當務之急」：中國人民現在的迫切需要是變革。變則富，變則強。《四五報》的宗旨是：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映民眾的意願，促進祖國的四化建設。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班後，我約來一位考研究生同是落榜的小戴，到「牆」前貼《四五報》。在那二位外國記者向圍觀聽眾傳達鄧小平接見他們談話內容時，《四五報》貼在了「牆」上。記得鄧小平當時說：西單民主牆是群眾的一種創造，是個好事情，可以看成群眾反映願望和要求的一種形式。即便有了錯誤，也不可怕嘛。現在只能記得這很不詳盡的大

意了，但大意如此，是不會錯的。我的「私生子」，就是這樣與世見面了。

私生子，歷來受人嘲弄和鄙視。我的這個「私生子」，首先遭到了魏京生在「第五個現代化」結尾處的嘲弄和鄙視。自從有了幾部維護私生子正當權益的文學名著誕生以來，私生子的社會地位已經開始大大改觀，人們開始從鄙視轉為同情和愛護。不知我的「私生子」的最終命運將如何？尚在未定之數。或許會有諾亞方舟來載它？

《四五論壇》

數日後，候宗哲代表趙南與我談合刊的問題，我同意合辦。首先的爭執是合辦的刊名。趙南曾以「人民論壇」為筆名，在「牆」上發表過為彭德懷鳴不平的文章，他主張合辦的刊名為「人民論壇」。我拉來小戴說服他，理由是：

一、「四五運動」的意義十分偉大，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標誌，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四五運動」的可貴精神。趙不以為然。

二、「人民論壇」這名字也不錯，但它體現不出必要的時代性。這個名稱曾被許多國家的辦報者和各個歷史時期使用過，難以體現它是誕生在中國新的歷史時期這個特色。

最後達成妥協，合辦的刊物定名為《四五論壇》。辦刊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辦刊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與《四五報》基本相同。擬定了簡單的編輯部工作原則

和必要的紀律。當天，向北京市委宣傳部門、出版部門和稅務部門，寄去要求註冊登記和依法納稅的申請，申請的法律依據是：

一、憲法賦予公民言論、出版的自由；

二、憲法保護和鼓勵公民從事文化出版工作；

對於我們的申請，無人理睬，無人答覆。我們只能認為不答覆，不制止，就是默許。《四五論壇》不是私生子，已經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續。為防備今後查無實據，我們特意將這些申請，刊登在《四五論壇》上，今後再要論責任，則是有關部門失職，不執行法律手續，責任完全不在《四五論壇》。

不久，風傳北京市委認為，民刊是非法的。《四五論壇》編輯部再次致函北京市宣傳部門、出版部門和稅務部門，要求註冊登記和依法納稅。仍然是無人理睬，無人答覆。這與《四五論壇》編輯部對讀者、投稿人是「有信必回，有問必答」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對照。我們認為有關部門這種作風，缺乏起碼的黨和政府機構應有的禮貌道德，不符合現代文明的慣例，起碼是失職行為。我們只能再次認為不答覆、不制止就是默許。

但是，「民刊非法說」時而平息，時而鼓噪。《四五論壇》從一開始就在這種提心吊膽的氣氛中顛簸前進。

懇談會

我逐步在來稿和「牆」前文章中，發現了一批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當今政治、經濟問題的優秀人才。我開始不遺餘力地「收羅」他們，幾乎無一「漏網」。我建議編輯部召開一次「懇談會」，邀請的主要人物有：

馬老師，他寫過著名的評「天安門事件」的文章，與《人民日報》商榷；又寫過內容十分重要的向黨中央的建議書。

周老師，他七九年初寫過「中國民主的方向」一文，指明了中國民主的主要方向是在農村，即首先要解決公有制之後的農民自主權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為農村承包責任制的興起鳴了鑼、開了道；他寫過與胡喬木商榷的重要文章。

呂樸，即致宗福先公開信的「零五三八」；後來，他又針對一些青年人的模糊認識，寫過「美國是民主樂園嗎？」。

會上，我講道：「我們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辦《四五論壇》的。這個選擇，沒有經費，沒有工資，自掏腰包，占業餘時間，做不了官，受不了獎，甚至可能會招致誤解，嚴重了，還可能要去過鐵窗生活。可是，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只有對立面的互相矛盾又相互統一，才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那就讓我們自覺地充任這個對立面，這個甚至使人難受、使人受委屈的對立面（必須明確它決不是敵對面），從民間的角度來促進我們這個社會繼續前進。希望大家與我合作。」

結果，呂樸同意參加《四五論壇》，並任召集人之一，以接替「隱退」的趙南。其他

與會者同意做《四五論壇》的自由撰稿人。同時，我們還特聘了一位青島工人孫維邦為撰稿人。對於千里之外的人，有什麼把握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孫維邦是從《參考消息》上知道北京西單有個「民主牆」，可以向黨中央進言獻策。他興奮地、晝夜不停地寫了一份五十四張紙的「致華國鋒、鄧小平的建議書」，連底稿都沒留，等到當月工資發下來，趕忙買了火車票，利用一個星期日和一個補休，從青島直奔北京西單，貼上建議書。建議書認為，中國社會面臨一個絕好的時機，只要華、鄧成為改革的旗手，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然成功。他建議設立「幹部考試院」，國家機關定員定責，務使幹部年輕化；改革經濟體制，真正按勞取酬，提高生產效率；實行新時期的用人標準；改革教育；提倡敬老愛幼、講究禮貌的社會風尚等等。總之洋洋大觀，無所不談。這是發生在七九年初的事情，他的願望現在已經逐步成為了現實。只是實踐證明華國鋒不可能成為這場改革的旗手。當然，當時的孫維邦無從深刻地瞭解這一點。

孫維邦在熱心觀者的協助下，貼完這五十四頁的建議書，找到一個小餐館吃了一頓飯，堅詞謝絕熱心者挽留，既沒上街，也沒探親，立即返回青島。用他的話說：「咱們自己講效率，講紀律，就不能說了不照辦，明天我還要按時上班，不能無故曠工。」

他的建議書，是從心中直接倒出來的一腔熱血，文詞充溢著山東漢子的豪放、熱烈、樸實，很合群眾的口味，一時在「牆」前形成了一股「孫旋風」，裏三層，外三層的人，擠看這五十四張建議書。人們連連稱讚：寫得好，都是實話。有人專門深夜來抄錄，因為白

天根本靠不上前。更有熱心者專門保護這五十四張建議書，不許覆蓋，不許撕毀，整整使它完好無損地存在了十天，這在「牆」前的「貼史」上是無前例的。

我不禁要問：「天底下有誰見過這樣赤誠的『反革命分子』」？這簡直是個標準的赤色分子。依我看，這位赤誠者雖時熱時冷，不穩定也不夠成熟，受到挫折和打擊時會更突出地暴露出這些弱點，那也比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官僚強千百倍！

截然不同的態度和作法

民刊越辦越多，「牆」上論政的文章也越來越多。人們對此持不同的態度。一些人認為，對當今的青年一代，我們瞭解不夠。對這類新出現的事物，要調查，要研究，不要簡單地否定，而應該積極地調查研究，因勢而導之。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的事，有過也是資產階級右派提倡的那一套，甬囉嗦，一句話：取締。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後來的七處的那位處長或副處長說得更乾脆：「你們這一套我們很熟悉，我們就是用這一套搞垮國民黨的。」這位儼然以共產黨的化身自居的人，就以那憑空一想，把一批熱血青年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地推倒了敵對面。為了證明各自的正確，二種不同觀點的人都在緊張的工作。我們姑且用「取締派」和「引導派」來區別他們。

「取締派」利用他們做特種工作的有利地位，不斷提供或真或假的情況，以影響中央的決策。據他們說，「牆」前一團糟，充斥著烏七八糟的東西。可是，就我親眼目睹，並沒有看到過什麼烏七八糟的東西。政治觀點是紛雜的，但基本傾向是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觀點錯誤的文章只占極少數，這是難以避免的。

現在看來，「牆」的主要缺點和不足，在於它過於注重政治性問題，這樣發展下去，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的重點向經濟建設上轉移這個中心的中心。為此，《四五論壇》還專門寫了一篇有關的自我批評的文章。但是對這一點，是可導而不應堵的。

所以，當「牆」取消時，有外國記者問我的看法。我認為，當人們還沒有掌握更高一級的手段，來表達民願的時候，取消西單民主牆是不妥當的。正如中國共產黨內也會出過「四人幫」一樣，民主牆也出現過一些不正確的東西，但這不是主流。不過，既然政府決定取消它，我和《四五論壇》會遵守這個規定，不會去違反它。《四五論壇》在當時，自然成了「取締派」經常向上反映的對像。從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這些「取締派」謊報軍情的做法已經卑劣到何等地步。

七九年，我曾聽一位朋友告訴我，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次講話中，點了《四五論壇》的名，並且說，《四五論壇》大多是幹部子弟組成的，經常偷閱自己家長的內部文件，然後向外散佈，或者賣給外國人。他希望老幹部要管好自己內部文件。又說，這些人經常攻擊我們一些幹部搞特殊化，我們有的幹部就是不爭氣。爭口氣，做出點好樣子，

才能堵住他們的嘴。

鄧小平的講話所依據的材料，不可能是他自己親自調查來的，無疑是那些「取締派」提供的，提供這樣一些不負責任的材料，欺騙領導，讓領導騎上瞎馬，是對黨對國家忠誠的表現嗎？

事實上，《四五論壇》除了呂樸的父親呂驥是高級幹部，絕大多數不是幹部子弟，甚至一般幹部子弟都沒有。《四五論壇》從來沒有向外公佈過什麼內部文件，更談不上向外國人出售了。再者，《四五論壇》基本上不涉及「特殊化」這個當時很敏感的問題。即便「北京之春」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組成，也沒有見過或聽過他們有上述那些作法，倒是見他們對汪東興大興土木建私宅有過一次公開的抨擊。所以，八四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一篇評論說得好：「對於《簡報》之類材料，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得花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

「引導派」也在積極深入地做工作。團中央研究室到第一線調查，基本肯定了這些青年多數是關心國家命運的好青年。調查報告還寫道：徐文立家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除了一張雙人床，只見一對箱子。（實際上還有一張十七塊錢的方桌，兩把八塊錢的椅子和一對同事們幫忙打的「沙發」，價值約二十元。）又寫道：徐文立家三口人擠在一間小屋裏，將一個大房間騰出來供《四五論壇》編輯部使用。

《中國青年》雜誌社與民刊開始了友好的對話。《北京日報》內參記者受鄧穎超、彭真

委託，也在做深入的調查研究。這位記者先找到《四五論壇》對外接待的東四十四條七十六號劉青處。記者問：「可以到編輯部看看聽聽嗎？」劉青答：「歡迎，我們對外什麼也不保密，我們歡迎別人瞭解我們，公安局的人我們也歡迎。」這位記者對《四五論壇》的基本評價是客觀的。他認為《四五論壇》信仰馬克思主義，較為成熟。他印象較深刻的是《四五論壇》，特別注意按法律的規定，決定自己的行動。

這位記者繼續奔波於各個民刊編輯部。三月份，突然傳來「人權同盟」的任曉町，在「牆」前被捕的消息。這位記者叫苦不迭：這不是抬高了任曉町的身份了嗎？看來，第一回合，武的走在文的前面了。

錯誤的第一步

任曉町，我見過二、三次，粗略知道他父親在文革中受過迫害，他本人也被人以叛逃罪關起來過。他曾表示想參加《四五論壇》。後來，他自己組織了「人權同盟」。「在那種拿人不當人的日子」（鄧毛毛語，見在《江西的日子裏》）之後，有些青年人從維護作人的最基本權利出發，去要求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權利，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些年輕人提出一些荒唐的政治主張，也是不足跡怪的。任曉町曾在宣告「人權同盟」成立的前一天，違反他們的規定，拿他們的宣言先給我看，我認為這是一種信任，於是連夜看了這宣言，

看了後真是哭笑不得。

我印象最深的有二點：

一、毛澤東在文革有千錯百錯，他仍不失為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無產階級的領袖的確更不應該搞保存遺體，供人瞻仰，糜耗鉅資這一套，這並非毛澤東自己的意思。可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建成了「紀念堂」。若硬是要把毛澤東的遺體從「紀念堂」中搬出去，許許多多中國人在感情上是難以接受的，甚至可能因此釀成政治事端。可是，任曉町的政治主張，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取消「紀念堂」，把毛澤東的遺體移出去。

二、中國已經是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國家，人口急速膨脹，已經大大地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從馬寅初先生為開端的節制生育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任曉町卻從空洞的「保障人的生的權利」出發，反對現階段在中國實行節制生育政策。他也不想一想，中國再無節制地生育下去，搞到大家都餓肚子的狀況，才真正是侵犯了「人的生存權利」哩！

第二天凌晨，我提早從家裏出發，趕到任的臨時住處，他正睡覺，我隔著門縫對他說：「我的意見都寫在上面了，我勸你一定不要發表，這個宣言錯誤實在太多。」我將那份宣言遞還他，又匆匆趕去上班了。晚上見到他。他說，對不起，說不服某些人，宣言已經發表了。也不知道是我沒能說服他，還是他沒能說服別人，反正發表了。

後來，據那位內參記者調查，「人權同盟」只有幾個人，而且四分五裂。特別是這個

號稱「人權同盟」的成員們，幾乎無人知曉起碼的「人權」理論。可是後來又有人把他們當成資產階級「人權」理論在中國的代表人物來批評。

按照列寧關於階級劃分的理論，毛澤東的階級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是把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作為根本依據來劃定階級屬性的。即便本人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必須有依附的具體物件，才能下這樣的定論。可是長期以來，一些「理論家、批評家們」，完全不顧及馬克思主義這樣一條基本理論，想給什麼人扣上一頂「資產階級代表」的帽子，就給誰扣上一頂。任曉町身為一個工人，當時家裏一貧如洗，除遠在西北棉廠上班的妻子和一個小孩之外，可以說一無所有，連妻子來探親睡的床都是臨時向單位借的。這種人，他又如何依附「國內資產階級」，或「國際資產階級」，並成為他們的代表或代理人呢？實在叫人摸不著頭腦。

在中國，給人戴一頂政治帽子，曾經是何等容易，時至今日，此風為什麼還不能絕跡呢？難怪，那位內參記者從維護黨的聲譽和利益出發，叫苦不迭哩。何況，任曉町是在「牆」前張貼致人大常委會一封公開信時，被警察逮捕的。這豈不是等於說，向人大常委會進言，也是違法的嗎？這豈不是等於說，在西單牆向受政府認可，並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司法人員也可以在「牆」前違法抓人嗎？

即便像後來在審訊魏京生時所透露的，任曉町曾接受過外國記者贈送的西方有關「人權」的書籍，那也構不成犯罪！在日益開放的中國，今後將有成千上萬的人每日每時與外

國人接觸，接受他們贈送和向他們借閱經海關允許帶進的書籍，難道都當違法處理嗎？要是那樣，我們的司法部門忙得過來嗎？而且實際上禁得了嗎？倘若真禁住了，那開放政策也就將被這些人破壞得差不多了！

我看問題是，有些人的神經不要那麼脆弱，先長長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才幹，不要讓一些無知無能的人，去掌管這需要健全頭腦才可能掌管得了的領域。再不要讓這些人把意識形態領域，搞成無產階級怕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怕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不正常的局面了吧。

值得認真考慮的是，被某些人視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未必就真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已經到了有關部門、有關人員公開承認這第一步就走錯了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於「我們只有錯抓，不會有錯放」習慣的人們尤其重要。因為這種人爲了維護自己的錯誤，是不惜犧牲別人的青春和生命，一錯再錯，甚至編造假情況，製造錯誤理論，去欺騙黨、欺騙人民！

錯誤的第二步

有些人以爲手裏拿著「維護安定團結」的尚方寶劍，就可以爲所欲爲。我們倒是要看一看這些人是真的維護安定團結，還是製造事端，破壞了生動活潑的安定團結呢？請看以

後的事實。

錯誤在升級。臺階上得越高，下臺階也就越困難。暫時不想下臺階的，就更需要製造維持自己錯誤的理論和事實。三月底一天，宣武分局七、八個警察，突然毫無理由地闖入我的家，並且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或法律依據，檢查了正在印刷的《四五論壇》，查詢了我家在座的所有來客，並登記了他們的姓名、職業、住址。當要檢查我小屋時，正好小屋鑰匙，讓兩個剛才在小屋換工作服的姑娘拿著買東西去了。一位警察急不可耐，認為裏邊一定有鬼，是我故意不讓檢查。這時，恰好拿鑰匙的回來了，我說：「急什麼，你看這不回來了。」這位警察惡狠狠地說：「哼，到時候，有著急的！」進屋一看，正如前面已述，一床二箱，窮家陋舍，別無他物，更無秘密。按我國法律，不出示任何證件和法律依據，穿著警服闖入民宅，為「非法入侵民宅」，甯論什麼罪了，起碼是違法行為。

《四五論壇》對此發表聲明，支持政府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但反對少數人使用暴力壓制不同意見，扼殺民意（判決書故意篡改成「民主」），這是完全正當的，毫不過分的。可是，在判決書中，這個聲明卻成了誣衊《通告》，煽動群眾抗拒政府法令的實施。真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任曉叮的被捕，促使本來就激進的魏京生更激進了。他本來就認為解放以來的錯誤，特別是文革的錯誤，全部原因就在於毛澤東的獨裁，在中國絕不能再允許任何人搞獨裁了。他認為目前的形勢，民刊受壓，有人被抓，正說明鄧小平又重蹈毛澤東之前轍，他很

自然的就把矛頭指向了鄧小平。四月五日魏京生拋出了那篇稱鄧小平為獨裁者的文章。《探索》一共三、四個人，主要就魏一人執筆。他把其他人全部打發出京躲避，故意讓有關部門抓他孤身一個，想以此後果更證明鄧小平是不容反對意見的「獨裁者」。

四月八日《四五社論》發表與《探索》商榷的文章，批評了《探索》對鄧小平的攻擊，高度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各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探索》的錯誤作法已經開始引起大多數關心「牆」、愛護「牆」的人們的不安。魏的蠻幹使《探索》一下子失去了大多數的關心者和支持者。可是，有關部門並不研究分析這些情況。四月十日正式逮捕了魏京生，完全實現了魏京生所預先想要達到的目標：嚴重地損害了鄧小平形象的完整性。這就是有關部門第二步錯誤的主要後果。

假若，有關部門能夠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真實的情況，由中央負責人親自做好魏京生的工作，既肯定他憂國憂民的一面，又幫助他克服對馬克思主義的偏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促其認識自己的偏頗，那效果絕不是團結和幫助魏京生一個人，而是會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團結和幫助有類似思想的青年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全體人民空前團結的政治局面，也就不會出現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青年人與壓制和僵化的思想工作相對峙的局面，更不會出現讓「凡是派」看笑話，甚至出現破壞鄧小平形像的事情。至於魏京生可能不可能接受這種工作，只要能全面、準確地瞭解魏的情況，就會相信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有人可能說這是不可能的。那好，讓我們看一看美國獨立戰爭中的一例吧。

當時，南方奴隸主的叛軍兵臨首都華盛頓，林肯總統首先考慮的不是迎戰，也不是鎮壓反對派，而是接見了反對派首領，並誠懇地聽取他的意見，聽取廣大人民的呼聲，發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從政治上首先狠狠地打擊了奴隸主的叛亂，為整個平叛戰爭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以比較的眼光來看，我國當時的政治局勢並沒有出現有些人渲染的那種混亂，根本不存在美國獨立戰爭時那種危急的狀況，也不存在伊朗、波蘭那種日趨混亂的局面。相反地，社會上展現著一種全民一致、積極向上的生動的政治勢態。有一些不同的政治見解是事實，有些意見可能十分荒謬，甚至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成分，但仍然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向黨提出來的，請黨考慮，這正是對黨的信任和熱望。魏京生的本質在於他並不是利欲熏心的小人，而是一個既激進又愛國的年輕人。

如果說有某些不安定，那也是一些幹部的官僚主義和「凡是」觀點，慣性的高壓政策所造成的。世界上很難找到像中國老百姓和青年人這樣愛國，這樣忍耐，這樣聽話的了。再向他們身上踹上一腳，實在說不過去。有人可能說，你這不過是美好的幻想，你說的這些作法不合中國的國情。不，有政治家風度的事情都是深得人心的。五七年那場嚴酷的反右運動中，不是也有一位中央負責人，單獨陪一位大學的著名「右派」學生到外地走走，盡最大努力作她的工作嗎？當然，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之中，即便雙方都努力，也不大可能

奏效。因為破壞力與聚合力太不成比例，黨內許多人首先就不喜歡這種細緻的思想工作方式。儘管結局不盡人意，那也不是作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樁美談在人們中流傳嗎？

鄧小平七八年十二月說得好：「對於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自』方針。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制止。毛澤東同志歷來說，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這不僅是對新中國政治鬥爭史的很好總結，也是一種深切的經驗概括。

與《探索》商榷

我們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對待和平的政敵，既是為國家的聲譽著想，也是為執政的政治家的聲譽著想，絲毫沒有我們自己的私利。正因此，我們才可能在魏京生犯了錯誤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嚴肅地批評他。四月五日，我路過「西單牆」，《探索》正在出售，我買了一本。當時一看，這是一篇點名攻擊鄧小平的文章。我立即想到這事關重大，《四五論壇》對此不能沈默不語。回來後，我立即通知召開編輯部緊急會議。會上，我唸了《探索》的文章，然後說：「這篇文章是錯誤的。在當前的中國，是凡有關鄧小平的問題，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中國改革的命運，中國前進的命運，繫在他身上。《探索》這樣攻擊鄧

小平，既不公平，也很粗暴。這種作法不論從方式到內容，我認為都是不能不批評的。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我不能沈默，沈默就是變相的贊成。我們不能搞只要是民刊『對是對，錯也是對』這種江湖義氣，這不是正確的是非觀。何況，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後，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不能閉著眼睛看著有人說瞎話，要有起碼的政治良心和正義感。」

編輯部一部分人認為《探索》這種作法是錯誤的；一部分人認為《探索》這種作法起碼太過分；個別認為無論如何不應該由我們站出來批評《探索》；極少數人從心裏贊成《探索》的意見。經過激烈的辯論，然後付諸表決。贊成公開批評《探索》這篇文章的略比反對的和棄權的多一票，並由持反對意見的劉青執筆，第三天交稿，再由全體會審議。

劉青是守紀律的，開始按多數人的意見起草，但畢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第一稿實在不行。我和他個別談了談，側重從三個方面說明了鄧小平恢復工作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以事實來批評《探索》的錯誤。他欣然接受了，寫了一篇不錯的第二稿。我又親自幫助他修改（此稿肯定還在我檔案之中）。七號晚，全體會議一致同意，同時為文章定了一個較為平和的名字，叫「與《探索》編輯部商榷」。以《四五論壇》編輯部名義發表。當晚抄在大紙上，八日貼到「牆」上。

文章論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取得的三大成績，記得是：

一、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把整個國家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人民生活有

了很大的改善；

二、以極大的勇氣糾正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為「天安門事件」和絕大多數右派平反，為地富摘帽，初步實現了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政治局面。

三、在對外關係上，實現了中美建交和中日友好條約的締結，譴責了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這些內容和鄧小平八零年初所作的報告中的三年成就的評估是吻合的。這並非是我們有什麼高明之處，而是先有黨所取得的成就，才有我們的正確的認識和表述。我們並不企望論功行賞，只不過僅僅以事實說明《四五論壇》不反黨，徐文立不反黨，並非專為所謂的「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

這個事實，還說明用文明的說理方法來正確地維護領導者的威望，要比用武力或強迫壓制的辦法來強行維護領導者的威望，更易於被人們所接受，而且是從根本上維護了領導者的威望，從而維護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宗旨的再討論

隨著《四五論壇》承受壓力的增大和人員的增加，需要進一步明確《四五論壇》的宗旨，並健全它的內部章程和紀律。新任召集人之一呂樸提議進行一次內部整頓，統一大

家的認識和意志。我認為很有必要，經三個召集人同意，我們作了內部整頓。

整頓的焦點集中在對宗旨的討論上。對原來宗旨提出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沒有異議，「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也都沒有異議，但認為需要突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個提法。分歧主要集中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態度上。有的人問：正確，我們擁護；不正確，我們也擁護嗎？有的人說，人民共和國的權利既然屬於人民，沒有必要專門提擁護中國共產黨這一條。極個別人雖沒說，但由於局勢的變化，承受的壓力，對黨的懷疑和不滿在增長，他們不善於把具體的業務部門、工作人員和整個黨的領導相區別。

爭論很坦率也很激烈。面對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我不能不明確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我說：「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擁護這個問題不能含糊，也不能動搖。儘管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不純的成分，她也並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但她有幾千萬黨員和幹部，有久經考驗的領導人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在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現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可能替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五論壇》的宗旨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條既不能變，也不可能少。加上『正確的』這個前定詞，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有人想利用《四五論壇》直接達到或迂回達到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目的，那我是堅決反對的。若是那樣，我可以退出《四五論壇》。」（可參見我以徐庶筆名發表的「中國當今社會變革之初探」，載於《四五論壇》。）

經過一周的討論，一致通過了《四五論壇》新的宗旨，大意是：《四五論壇》以馬克

思主義爲指導思想，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爲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而奮鬥。

民主討論會

到了七九年八月，《四五論壇》內部，主張公開積極營救任、魏的人的態度更強烈了。可是，我當時考慮到對任、魏情況畢竟不十分瞭解，《四五論壇》應以辦刊物爲主，不宜進行過多的社會活動。特別是我歷來希望，不同政治主張的各方，儘量避免採用激烈的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分歧。當然，我同時也注意到，我國法律不採取「無罪推定」，但也不採取「有罪推定」。在沒有公佈確鑿犯罪事實前，就以反革命罪逮捕了任、魏是不妥當的。而且根據我國法律，此類案件應在三個月內進行公開審理。所以，我同意就法律程式方面存在的問題直接聽取民意，以民意的結果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於是，編輯部開會決定在「牆」前，舉行民主討論會。

這次討論會第一項是民意測驗，事先不公佈內容，當場向參加的群眾散發了五百張民意測驗卡片，就付、魏、任三案在法律程式上的問題，徵求民意。由於天黑之後不便於群眾監督，臨時決定唱票由五百減爲一百，由群爲中推出一名監票人，記得是二位東北出差來的人唱票。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群眾對有關部門不能嚴格遵守法律程式的做法強烈不

滿。

討論會的第二項是由《四五論壇》三個召集人，發表即席講話。我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法律應該獨立、公正地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我是講過「法律不能成爲一紙空文」、「法律不能成爲某些人手中的特權」。最後，我講到，我們維護法律尊嚴的目的只有一個，不是爲了任何一個人，而是爲了我們的祖國更加繁榮，更加富強，讓我們的青年人也和在全場的各國青年一樣，到世界各地去旅遊，開闊的視野、增長才幹。但是，我們靠自己，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美好的未來。這些講話出乎意料地被人們的歡呼聲一再打斷，最後竟贏得了長時間的歡呼和掌聲。看來這些內容符合人們的心願和願望。

未曾想到這番話，特別是「法律不能成爲一紙空文」、「法律不能成爲某些人手中的特權」這二句話，竟然被那位可敬的檢察員作爲我的罪行，向法院提出控告。在法庭上，我說：「時至今日，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難道還有人真的認爲法律應該成爲一紙空文嗎？難道還有人真的認爲法律應該成爲某些人手中的特權嗎？檢察員難道也堅持這樣認爲嗎？」（如果這二句話也可以成爲判定我「反革命」的依據，那末《人民日報》的葉伴、評論員，一些記者和不少的文學家、雜文家早夠戴十頂以上的反革命帽子的了！相反，不也正說明這個人不是「反革命」嗎？不也正說明那位檢察員的思想「左」到何等可怕的地步了嗎？）

判決書割捨了這條指控。那次討論會的講話和法庭發言、起訴書指控都有原始錄音、

材料可以查對。

更錯的第二步

九月份，北京市中級法院在排除了各家民刊參加旁聽的情況下，採取有組織發票的方式對魏京生進行了半公開的審理。結果以「出賣情報罪和反革命煽動罪」，判處魏十五年徒刑。有些人愛侈談什麼文學作品的「社會效果」，現在讓我們先看看這場政治案件的社會效果吧。

人民震驚、失望，原以為「四人幫」倒臺之後，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了。很多人冒著很大的風險，直接在「牆」上發表了不同意見、評論和責問。當《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沿過去的作法，連續發表了幾篇「臭魏」的文章和報道之後，這種不滿更加強烈。讓我們以半年後的北京大學的選舉為例吧。八零年，北京大學所有參加選舉的候選人，無一例外地受到選民的有關「魏案」的詢問，並要求他們表明態度。據我瞭解，這些候選人中有70%的人，認為這是「四人幫」倒臺以來最大的一件錯案，應該予以糾正。20%的候選人認為此案判決不當，起碼過重。10%的候選人表示對情況不甚瞭解，不便發表意見。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候選人認為此案的判決是正確的。最後，有北京大學代表前往北京市中級法院就「魏案」向該院提出質詢。法院不得不在《半月談》上以談話的方式作出解釋，仍堅

持錯誤的判決。這一切，在國內政治案件判決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樁，很能說明問題，也很令人深思。

國際上，魏案判決的第二天，就做爲頭條新聞出現在許多國家的主要報紙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表示對此關注。特別令人震驚的是，正在法國訪問的華國鋒，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訪法記者招待會，因爲國際輿論對魏案判決的反響強烈。這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承受這種外交上的損失，決不是那一個個人，而是我們的國家。更爲嚴重的是，魏案的重判，將在很大的程度上，很長的時間內損害鄧小平形象的完整性，因爲任何瞭解魏案始末的人都知道，魏是在公開攻擊鄧小平的第五天被捕的。儘管最後給他扣上一個出賣情報的罪名，由於這個罪名的證據漏洞百出，又沒有適用的法律，人們是不可能相信這個判決的。

時至今日，不是還有許許多多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只有在有關領導再三動員、一再保證之下，才敢寫本來根本不應該擔驚受怕的調研文章嗎？（參見《人民日報》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頭版頭條。）

這就是魏案判決的社會效果，這就是一些人在民刊問題上一錯再錯所造成的惡果。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負，不是很清楚了嗎？

對具體案件的判決發表評論難道有罪嗎？

中級法院對魏案的錯誤判決，引起人們的不滿，造成極惡劣的政治影響，損害了黨、國家的根本利益。可是，有些人並不想捫心自問，老老實實地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嫁禍於人，我就成爲他們嫁禍的主要對象。魏案審判後，我主要從法庭錄音中瞭解到：

一、判魏重刑的主要罪名是出賣情報。魏並非機要人員，談的內容，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算不上什麼機密。審判過程中，並沒有證據證明魏所談爲機密的軍事情報。若他所談確系情報，那首先要懲處的是提供情報的機要人員，但法庭對此毫無涉及。

二、判處魏有出賣情報罪的法律依據，是「反革命懲治條例」。該條例明白規定「向敵方或間接敵方提供軍事情報爲出賣情報罪」。可是，魏的談話對像是和我國友好的西方國家的記者，並非敵方或間接敵方。

三、當時已經風傳，有人假冒外國記者故意與魏談論有關對越反擊戰問題，設下陷阱，錄下音，然後交有關部門的。在我受審期間，預審員爲詐我交代與外國記者所謂的違法交往，曾毫不掩飾地說：「別以爲外國記者都那麼可靠，魏京生向外國人出賣情報的錄音，就是外國人送給我們的。」言外之意，外國記者對我也有告發。我說，我與外國記者都是正常的來往：一，我從不主動邀請，但來者不拒；二，除按國內同等價格出售《四五論壇》之外，不與外國人發生一分一厘的經濟交往；三，不談論可能涉及國家政治、經濟

和軍事機密的事情。而且，我與外國人的來往，都自備可以公開的錄音，以備查考，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地方。如果你們真掌握有什麼可以證明我在這方面有違法行為的證據，我歡迎你們拿出來，該論個什麼罪就論什麼罪，那是我咎由自取，毫無怨言。預審員無言以對。訛詐不成，反露了天機。

四、魏京生的言論確實有反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某些煽動性言詞。但是，要考慮到魏出身於一個幹部家庭，在紅旗下長大，沒有對黨對社會主義敵對的家庭、階級根源。據說，他曾在下鄉期間，親眼見過某個地區人吃人的悲慘事件，這是引起他思想巨變的重要原因。熟悉老一輩革命者的經歷的人們都知道，許多老前輩就是因為看到了舊中國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不少人以致背叛自己剝削階級的家庭，而投身革命營壘。作為一個青年人，在動亂年代，見到了暫時的個別的悲慘事件，而模糊了自己的認識，認為蘇聯的問題出在斯大林獨裁上，中國的問題出在毛澤東獨裁上，斯、毛的思想基礎既是馬克思主義，不用再去研究那浩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知道錯就錯在這個主義上。中國需要第五個（政治）現代化。他決心擯棄並反對馬克思主義，有關部門應該對待一個突然失明的人走錯了路一樣，通過艱苦細緻，平等相待的態度做他的思想工作，予以引導。而不應該用法律手段對待這類人、這類問題。

基於以上考慮，我不在乎與魏素昧平生，只匆匆見過一面，也不計較魏京生曾對我個人的揶揄、譏諷，正像前他五個月前攻擊鄧小平一樣，我覺得為維護公理，避免有關部門

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爲了從根本意義上維護國家的利益，我同樣不能沈默。契珂夫在評論左拉爲德雷福斯案件辯護時說得好，「人間畢竟還有正義，如果發生冤獄總會有人出來說話的。」本來我寫的「不公正的判決」是準備以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因爲有人不同意在爲魏案說公道話的同時，還批評他的錯誤。我看一時難以統一認識，就以個人名義在「牆」上發表了。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人也相繼發表了評論。

從此，我便成了某些人的頭號眼中釘。對我的評論一直耿耿於懷的中級法院，在我的判決書上寫道：徐文立還搞所謂「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張貼散發傳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決和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確處理，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辦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爲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蔑提供藉口。

真是豈有此理！

一、請中級法院某些人不要本末倒置。是先有我对魏案的評論，還是先有你們對魏案的不公正判決呢？外國人對魏案的報道、評論的新聞來源首先是你們，怎麼這麼謙虛地推到我頭上來了呢？

二、我的評論先是發表在「牆」上，「牆」前每天有外國記者採訪，何用我專門向他

們「散發、郵寄、傳遞」？中級法院某些人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嗎？作為《四五論壇》讀者的某些外國記者、外國人，《四五論壇》自然要投寄給他們。含有「不公正的判決」這篇文章的雜誌，難道也擁有什麼罪行嗎？

三、說到使館，大家都知道，各國駐華使館是外交機構，《四五論壇》作為民辦刊物怎麼會無知到徑自和使館發生關係？我們訂戶中只有一名法國駐華使館的一般工作人員白天祥，因為他是訂戶，向他的住宅（外交使館的公寓，並非使館！）投寄刊物，怎麼成了向使館「送什麼」呢？中級法院某些人為了混淆視聽，已經到了捏造事實的地步，豈不可悲？

四、中級法院某些人，請不要再玩弄外國人嚇唬中國老百姓的把戲了。這套把戲在前清、軍閥、國民黨和「四人幫」時期流行過，用它來對付當今現代人早已失敗。外國人在中國人眼裏是外國人，中國人在外國人眼裏同樣是外國人。外國人是人，中國人也是人。中國人沒有特別尊崇外國人的必要，也沒有藐視外國人的理由，我們只求平等、友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請那些諄諄教誨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的先生們，首先自己不要心理上「崇洋媚外」，不要再用隔離的政策，嚇唬的把戲，對待中國人與外國人，包括外國記者、友好使節的正常往來吧！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才是國家間友好交往的基礎。

外國人對魏案有所報道、評論，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國際慣例。各個主權國家都會對國際上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進行報道、評論。這是常識，這是國際慣例。這慣例是

相互的，也是平等的，根本談不上什麼干涉內政，不必動不動就給人家扣個什麼反華反共的帽子。巴基斯坦的齊亞·哈克要對布托先生處絞刑，中國政府不也曾出面希望他重新考慮嗎？這難道也是干涉內政？也是反對巴基斯坦？或者反對伊斯蘭教規？

外國人報道什麼評論什麼，對的就聽，不對可以不聽，甚至反駁。何必對外國人評論不敢反駁，而遷怒於中國人自己呢？這種作法，算是有民族自愛，還算是崇洋恐外呢？我看，不必要讓別人來給中級法院的某些人下結論。

我的又一件荒唐事

如果說我的第一件荒唐事是讓那位老先生著著急、生生氣，再有的荒唐事可能是傷害過別人的感情。這一件荒唐事，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劉青，害了《四五論壇》，也害了《人民日報》一些無辜者。魏案審判之後，劉青毅然主持了法庭錄音的整理、公佈和發行。發行時，有關部門在「牆」前抓了人。劉青徵得我的讚許，以「君子不避危」的氣度前往北京公安局交涉，在接待室被捕。在缺乏法制傳統的國家，盡出這種違反司法常理的事情。怎麼可以在上訪接待過程中拘捕人呢？

劉青的被拘，自然引起《四五論壇》的不滿。有些人主張用激烈的形式表示抗議，要求釋放。也有極個別人故意以「徐立文膽小怕事，只顧保自己」激眾人，也激我。但是，

此時此刻我的頭腦還算清醒，我也瞭解劉青也不會同意四五論壇變幹。我對大家說：「本來《四五論壇》只想以辦刊物的形式，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起點促進作用，並不想搞什麼社會性的政治活動，可是有關部門有些人總是製造事端，挑動我們，和他們一起爬臺階。上了臺階，總要下臺階，爬得越高越難下。這一次，我們不要上當，不要搞冒險、盲動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通過內部途徑，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經討論決定，有關劉青被拘留只發一條簡短消息。

第二天，我正奔波於《北京日報》社、團中央之際，聽說有人想在發簡短消息的同時，在「牆」上貼二條抗議的標語，我急令一人趕去制止住。爲了《四五論壇》內部團結，在我前往《人民日報》社謀求內部解決劉青問題途徑時，特地帶了兩個對我有不同意見的人。現在想起這荒唐的作法，真是後悔莫及。自己太天真，《四五論壇》也太天真了，把政治看得太單純了。過去宣稱「我們沒有秘密可保，什麼人都知道」，簡直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也是拿可能涉及的人的政治生命開玩笑！

我先帶另一個人到《人民日報》社反映情況，希望中央能關注這件事，讓有關部門釋放劉青。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要求我們寫成文字材料再去。文字材料寫成又去時帶了那兩個人。一位長者接待了我們，他平易近人，辦事講效率。看了材料後他說：「你們寫的材料，我們作爲黨報，可以考慮向中央反映。但是，這材料引用了一位中央領導人的一段話，據我瞭解這是在五九年那個背景下寫的，拿到今天來用，我想作者本人也可能認爲不

一定妥當，因為你們年紀輕，當時還小，對有些背景不很瞭解，我這意見僅供你們參考。」我們在考慮了這位長者的意見之後，將原材料這段引語刪去了。這就是事情的真相和全部過程。

可是，與我來的某一位卻出於向某部門邀功的目的，把這位長者維護黨的利益，維護中央領導人的威信，善意地幫助我們年輕人克服在文革中形成的不顧慮原作的時間地點、歷史背景，亂摘亂用某些領導人的某些話語的不良作法，歪曲成了《人民日報》與《四五論壇》在劉青問題上互相勾結，串通一氣，欺騙中央，向中央施加壓力等等，以致那位長者受到中央領導的嚴詞責問。真想不到自己人也會搞自己人，還搞得這麼狠毒！

這回又是武的走到了文的前面！本想緩和矛盾，抱著內部矛盾內部解決的良好願望，倒被人變成了一石打雙鳥的邀功機會。荒唐啊！荒唐！那位長者的名字，從八二年開始慢慢地見不到了。

但是，從我每天研讀的報紙上，特別是八三年底反「左」、改革以來的報紙上，我似乎又天天看到他的名字和他為黨嘔心瀝血、忘我無私地工作的身影。

談話第一次被竊錄

七九年底，各地民刊所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民刊求團結、保生存的願望也就愈強烈。

各地民刊準備利用八零年春節在武漢聚會。我考慮當時局勢不宜再舉行這種聚會，聚會不但不會有什麼成果，反而會激化矛盾。我謝絕了邀請。上海小傅誠意可嘉，專程邀河北三人（有小傅同學一人）來北京請我，並約我到他們暫住處——禮士路鐵路公寓去談談。

老實、純潔的小傅卻把我引進了陷阱，河北其中一人是帶著使命來的，將竊錄的材料作為準備整治我的王牌材料。當時我毫無戒備，侃侃而談：現在有的人並不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心上，仍然搞「假、大、空」那一套。他們雖說信仰共產主義，但他們把共產主義搞得玄而又玄，可望而不可及。近來又大借外債，又要搞什麼「十來個大慶」，只想吃資源飯，而不把重點放在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上。在這種形勢下，要民刊停刊，而民刊有些人想頂著不停，要召開聯合會議，依我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反而會激化矛盾，招來更大的壓制。不知你們看過一部名叫「緊急下沈」的美國電影沒有？民刊既然暫時辦不了，不如停一停，等以後形勢有所好轉再說。總之，我不贊成對著幹的辦法。所以我不能前去武漢，再說我還要堅持上班，不便請假，請大家原諒。

當時，還有人有意或無意地挑逗我再談點什麼。可我這個人從來是心裏怎麼想，口裏就怎麼說。心中沒那麼想，口中也不會那麼說。要我對黨提意見，談建議，我可以竭盡思慮，盡興而談。要我反對黨，與黨對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有些人可能要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你還說這樣的話，你不是反黨是什麼？

請這些先生不要激動。我倒先問問你，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一個很長的時間裏，你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支持呢？還是反對呢？或是懷疑動搖呢？如果你始終支持，咱們且不論。如果你曾反對，或是懷疑、動搖，只是到現在才支持，那你是不是也是反黨啊？再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內就沒有鬥爭了嗎？如果沒有鬥爭，那「凡是派」是怎麼回事？那些堅持「左」傾的是怎麼回事？如果沒有鬥爭，那份與廣大文藝工作者對著幹的雜誌《時代的報告》，怎麼到一九八二年才改組、才拔正航向了呢？如果沒有鬥爭，八年底為什麼要從根本上否定某些人不斷要反右的要求，而明確提出反「左」、改革、開放的主張呢？難道在一系列的鬥爭中，「四五論壇」和我從根本上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反對和抵制、批評各種「左」傾殘餘思想，也是反黨嗎？到底誰懷疑黨的正確路線，誰擁護黨的正確路線，這個是非倒是值得人們好好分辨分辨。

現在我舉一個生活的例子來看看。

在一次東便門電力工區的閒談中，我說：「政策對不對，好不好，對於老百姓來說，就是它能不能讓老百姓富起來，生活得好起來。」一位姓張的黨員立刻反駁我：我們這個共產黨（這類人就好把黨據為己有，視他人為異己）搞的是社會主義，政策對不對，好不好，首先要看對建設共產主義是不是有利。在他看來，一說老百姓生活富裕就不是共產黨，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了！

我反問：「那麼共產主義是為的啥？共產主義不就是為了人人都過富裕的生活嗎？當

然還包括高尚的精神生活。」那人頭雖搖著，口卻講不出什麼來了。

這位與另一位黨員的家在保定農村，占工區黨員數三分之二，他們的親屬大部分在村裏是幹部。他們不明白現代化政治中所謂「反對派」，並非一定是敵對派。他們更不理解我並非「反對派」，直把我當作「反對派」來對待。他們在我面前口吐真言，毫不掩飾地反對承包責任制。甚至對堅持改革的中央領導十分反感，對「凡是派」表示同情。對於這樣的中共黨員，反要我這個非黨人士向他們宣傳承包責任制的好處，說明水漲船高，村幹部只要幹活不想多吃多占，一樣富裕，甚至更有條件先富裕起來。當然，他們說的有些問題，也的確是在農村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如承包土地分得過碎過散等等。我就經常找些報紙登載的事例給他們看，慢慢地他們不像初期那樣激烈反對了。記得起初讓他們看，那位姓張的揶揄我：「你這個人就是靠報紙過日子！」這一批評，有一半說對了。是的，我這個人從中學開始就愛看《人民日報》，二十多年幾乎一天不拉，拉了一天事後還要補上，我是把它看成自己的良師益友、百科全書。當然，它也讓我上過當、受過騙，但總的來說，我得益於它的多，受害於它的少。我至今如此，入獄後仍如此。應該告訴《人民日報》社，坐在監獄裏可有不少忠實的讀者，這些人讀得仔細、認真的程度，遠遠超過許多自由人。《人民日報》今後再徵求讀者意見和反映，不應該忘了這個角落的忠實的讀者們。

《四五論壇》在內外夾攻下停刊

《四五論壇》內部始終存在著鬥爭，這是極正常的。大多數不同意見都是通過公開談論，或個別交換，或個人提出，很體面、妥善地解決了。但是，那位候宗哲卻不是這樣。他總是想以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操縱、控制《四五論壇》，但又不肯出面做艱苦、細緻、瑣碎的具體工作。他的這一套不容易被人們所識破，卻也不容易被人們接受擁護。所以他在《四五論壇》內，基本上沒有市場，只能在背後搞點小動作。自從劉青被拘留，營救又沒有成果的情況下，他開始利用一些人的不滿，鼓動他們發難。首先，他們選中財務作為突破口，想奪取領導權。他們以為財務雖按會計原則，設管帳和出納二人，並受紀律檢查小組監督，但它的主管是我，若有可能從中找到茬，最容易把一個人搞臭。候慫恿別人在《四五論壇》危在旦夕之機，鬧著要清經濟。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我完全同意這樣做，而且建議成立查帳小組。經查帳，《四五論壇》的財務清楚，是所有民刊中唯一沒有虧損的，除去各種開支，包括支付劉青一度的生活補助、組織郊遊費用等等，仍有幾百元節餘。候的陰謀破爲了。《四五論壇》停刊後，每個成員，包括初期就退出的趙南，在獄中的劉青，每人分到一份幾十本社社會科學書籍紀念品。個別幾個人，因買照相機而未買，欠公款，就以書抵欠了。

候等人發難並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這些人後來想復刊，也要纏著我不放，轉彎抹角地要取得我的認可，逼得我沒辦法只好說：《四五論壇》這面旗子，不是屬於我徐文立個人所有，現在停刊了，今後誰想打這個旗子誰就去打好了，不必要徵求我的同意，也不

用來拉我，我是不會和已經識別出來的有野心的人合作的。」外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北京之春》中的好朋友給我傳來話，說中央現在不希望民刊存在。於是，我決心停刊，並公佈《四五論壇》就劉青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二封信。在全體會議上取得了多數人的同意，五個編委又在同意停刊的文件上簽了名，《四五論壇》出了告別刊，就終止了。

在這前後，我曾會見了國際上四大通訊社和一些國家的記者表示：作為《四五論壇》和我本人，從來不採取和黨、政府相對抗的方針。現在，據說國家不希望有民刊存在，我們是準備停刊的。我們希望不要因為採納一些人的錯誤主張，而把民刊的一些青年人變成一種潛在的暗流，這樣的結果往往並不好。

我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都要求他們在發表前或發表後將副本送我一份，據我所見並未有歪曲我上述講話意思的報道。在預審中，我被告之，有合眾國際社女記者，曾報道我揚言要轉入地下，以此威脅中央。這純粹是毫無根據的捏造。

對《四五論壇》的簡單回顧

《四五論壇》自一九七八年底創刊，經歷了三個年頭，實際上僅僅一年多時間，共出十七期。每期一般有十幾篇文章，約三到五萬字。每期最多時一千份，最少幾百份。這不包括停刊後，我以個人名義發表的「答記者問」，那是爲了「以正視聽」而發表的。固定訂

戶近二百家，在「牆」前出售幾百份，總是十分搶手，讀者是按預告時間排隊等候，往往難以滿足需要。國內讀者分佈在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台、港地區，國外讀者有分佈在歐、亞、美、澳幾大洲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四五論壇》發表的主要文章，我印象深刻的有：

一、我們登載的文章重點是有關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也有一些關於理論問題探討的文章。譬如，七九年初就發表了「從周總理晚年的遭遇看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等文章。在改革問題上我們一貫的提法是「體制改革」，而不是「制度改革」，這說明我們主張的改革，是對體制的改革，而不是根本制度的改革。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條是不變的。

正如胡耀邦在八四年十月九日所說：「這個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改革，根本制度還是堅持社會主義。」當然，事情要回到四年前的環境中去看，在當時就明確「體制改革」的提法，不是不需要一定勇氣的。誠如盧祖昌在「神本賦」中所說：讀者同志想必記得，城市經濟改革那時（還不是指七九年，而是更晚些。）尚處於醞釀階段，懷疑論者還頗有市場。在一段時間內，「改革」二字像彗星從報紙版面一閃而過，人們對此噤若寒蟬。

二、當農村承包責任制尚未興起的時候，周老師在「民主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出中國民主的方向在農村，主要是給予農民的自主權。同一位作者，在與胡喬木商榷一文中，側重是談不可低估「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以及從根本上剷除「四人幫」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的重大問題。實踐證明，這是一篇有見地的好文章。

三、當短途、長途販運還被列為打擊對象的時候，湯戈旦的文章專論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的文章，無疑是大膽的。

四、當許多人仍然認為只有全民所有制，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候，王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的「論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前途和發展」等文章，無疑也是大膽的。

五、當社會上仍然有人在報紙上，鼓吹「大河沒水小河乾」的「大鍋飯」理論時，《四五論壇》鮮明地提出了「大河沒水小河乾」不但合乎自然規律，也不合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只有富民才能富國，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流行有一百多年的「富國窮民」的理論。三年之後，「小河沒水大河乾」的說法才被人們所普遍接受。

六、當社會上有些青年人，對西方自由和民主有一些模糊認識的時候，我們發表了「美國是民主樂園嗎？」等文章，重申了一個老口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必要的。

七、當社會上一些守舊的人對青年的服飾的變化，大肆討伐的時候，《四五論壇》發表諷刺小品，予以回敬。這個問題經過幾個回合，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作了結論：「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是和生活方式的變革聯在一起的。」「有人甚至把一些現代的生活方式，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來批判，這就妨礙人們，尤其是青年的消費積極性，限制生產的發展。」

八、當時提出的工資應改為三部分組成：逐年增長的基本工資、崗位工資和獎勵工資。現在這方案已逐步在一些改革先行的單位成為現實。

九、當時提出的經濟上應保護、鼓勵合法競爭的原則，八四年七月九日《人民日報》肯定地說：「唯有競爭出活力。這一條，要得到確認。」

十、當時發表的十幾萬字的長篇文章「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七十年代初寫的作品。作者原本是獻給毛澤東的赤誠的禮物。不曾想，不但沒能獻上，還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關了起來，在獄中身體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疤。「四人幫」倒臺後他被釋放。這篇文章，雖然尚未跳出毛澤東的某些理論的窠臼，但它的意義在於，作者實質上是建議毛澤東放棄「文化大革命」，來進行「體制改革」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作了一些設想。從這個意義上看，這篇文章在現今也有一定積極的意義。「對於探索真理的認識運動來說，『異端』那怕只有滄海一粟般的真理認識，也比墨守陳規的思想有價值，因為後者無益於社會的進步。」（摘自《人民日報》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關於『異端』的斷想」）

——僅憑記憶，就回顧這些吧。

實踐既然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有那麼一點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也不會把主辦這樣的《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作為一個兒子，面對祖國和人民，我是無愧的。今天的我，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心滿意足了。今天的我，更多的不是欣

慰，而是悲哀，一份雜誌和人一樣，它的生命鐘有了提前量，它的結局往往是可悲的。

最後一次會見外國記者

八零年初，我最後一次會見的外國記者，是英國國家電視臺（BBC）的記者，與他同來的是一個攝影、錄音小組。根據法國和美國記者的事先聯繫，原定採訪有關《四五論壇》的一般情況。但是BBC電視臺的記者要了一個滑頭，完全超出原定內容，提出了許多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採取先通過翻譯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即記者問，翻譯翻譯，再記者問，我答覆。）該記者仍嫌不夠刺激，乾脆用無考慮時間的一問一答方式進行（即記者先對翻譯說，翻譯翻譯後，我就答覆）。雖然，事後我對原聯繫的法、美記者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紛紛表示道歉。可是，當時我是十分從容地應付了他們的挑戰。我的答覆，引起他們一次又一次的驚訝和讚歎。他們臨行時，特別是攝影組的小夥子們一再向我表示祝福。事後，我估計他們這樣做，主要想得到更真實的第一手資料，倒沒有什麼其他惡意。

譬如他們問我：「您對魏京生等人的被捕、判刑有何看法？」

我告訴他們：「應該說，魏京生等人的被捕、判刑，有關當局在作法上雖有許多缺陷和錯誤，但還是注意按法律規定進行的。這說明我國法制在進步，這一點值得肯定。應該看到，從人治到法制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至於對魏案的判決，我有公開評論，我認為判決

是不公正的，在此不準備再重複這些「內容了。」

他們又問：「辦民刊的，據說多數人都被捕了，您爲什麼沒有被捕？您認爲您會被捕嗎？」

我答道：「據我知道，辦民刊的人不是多數人都被捕了，而是大多數人沒有被捕，被捕的是少數。至於我爲什麼至今沒有被捕，這不是我所能決定的，如果記者先生有興趣，可以向我國的有關當局去瞭解這一點。不過，一個人的五個手指頭伸出來，都不一樣齊嘛，總不會都一個樣。我會不會被捕呢？我看有這種可能性。政治上引起誤解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我被捕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是誤解嘛，我想也就一定會得到公正的解決。」

談話第一次被竊錄

《四五論壇》停刊後閒散多了，但思想並不平靜。各種消息不斷紛至沓來：什麼有人仍想效法毛澤東集黨、政、軍一身哪；什麼「你辦事，我放心」的真偽哪；什麼「十來個大慶」哪；什麼「南水北調」缺乏論證哪；什麼寶鋼決策中有失誤哪；什麼一米七軋機沒有設計電源哪；什麼做壽問題哪；什麼中日友好船的問題哪等等，攪得我憂慮不堪。特別是「凡是派」與改革派的爭鬥，以及重大決策上的失誤又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這一點，再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任何憂國憂民的人，思慮的重點都不在問題的表像，而在於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和解決辦法的探究上。真怪啊！莫非「晝夜不眠的苦戰，席地而臥的夜晚，簡易沙發上瞌睡，人刻手推的印刷，提心吊膽的辦刊」，還沒把人折騰夠？莫非「上下求索」，真要「九死而不悔」？儘管後來事實說明個別消息不盡準確，甚至是誤傳，可多數還是準確的事實，這些天道不暢，小道風行的消息，足以讓人憂慮無窮。

正當此時，廣州王希哲、青島孫維邦，先後來信希望來京看看談談，我表示歡迎。要接待二個人的住宿，我是有困難的，只好委託陳德堯代為辦理。我和陳是在「牆」前相識的。一次出售《四五論壇》十分擁擠，以致將公共汽車場的門口堵塞，我立即要求停止出售，並引導讀者讓開汽車場出口，向東排成一行。當時，我大聲地向搶購的讀者宣傳：「我們既是擁護民主，又擁護法制的，那我們就應該模範遵守交通規則，不能影響汽車的通行，請諸位多多幫忙，向東排成一行，按循序出售，謝謝大家了！」這番話，事後很得陳的讚揚。這正是我的弱點：容易接受所謂的合情合理的讚揚或恭維，甚至有共同的合情合理的見解者作朋友為樂，且信人不疑。

誰知，陳在甘家口旅館為王、孫安排的住宿處，又是一個陷阱。我們這類人也防不測，但又很不善於保護自己。陳告訴我，這是他為外地採購員預定的旅館，他們尚未到，我們可以先頂他們的名字住幾天。這就是後來在法庭上所謂「化名」住旅館的由來，我當然也據實辯駁。

這一次，我借機向他們二個人，談了我有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試行無產階級兩黨制和多黨制的設想。大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我認為都是社會對執政黨缺少有效的群眾監督，因而重大的決策上的錯誤不可能及時被發現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致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重大損失。「四人幫」倒臺之後，這類問題仍未解決。既然資產階級可以用兩黨制或多黨制來調整內部的階級關係，以利於資產階級統治，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能更自覺地應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原理，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認為，打開這個大門的鑰匙，就是突破一黨制，在社會主義國家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西歐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已經公開宣稱，當他們掌權之後，一定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我覺得，這把金色的鑰匙已經在我們的眼前晃動，但歷史的老人並沒有把鑰匙交到我們手中。所以，我對此並無把握，希望聽聽他們的意見。

二、如果要搞無產階級兩黨制、多黨制，是不是可以考慮先搞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

三、如果要搞「同盟」一定要公開，決不搞秘密的，要公開向中國共產黨打招呼，向政府註冊登記。但是，考慮到我國一向對組織問題十分敏感，那麼在籌備的過程中要保密，要突然出現。

四、如果要搞「同盟」，特別重要的是，要向中國共產黨充分說明，這樣做對中國共產黨只有好處，而不會有害處，「同盟」的目的是促進，決不會反對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

五、在談話中，我還向他們介紹了我所瞭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情況。據我瞭解，胡耀邦在領導科學院工作時，「五子登科」（住家房子、入託孩子、上班車子、煤氣爐子、解決兩地分居的妻子等問題）很得人心，是個體察民情的好幹部，有可能出任黨的總書記，但華正全力阻止。新上任的趙紫陽在四川工作是得民心的，有幹勁和魄力，注重實際。談話中雖然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但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關於「同盟」的設想，王、孫聽罷一致表示當時不宜考慮這個問題。這次談論，就在當天晚上作罷了。後二個晚上是一些朋友見面，互相介紹情況。

考慮到需要加強思想上的溝通，王、孫同意輪流辦一個《學習通訊》。通訊實際出了五期，第一期是一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提綱和書目，另三期由我、王、孫各辦一期，第五期由南京徐水良辦的，我並未見到，就被捕了。

這是回憶的大致內容，可以與真實的錄音材料相對照，不難看出這次談論絲毫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和行爲，只是一次有關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探索性討論，而且未形成任何實際的結果。

所以，當事後不久，我知道這次談話已被有關部門錄了音，我絲毫沒有什麼驚慌和不安，甚至當時都沒有認真想一想怎麼讓人家竊錄的，以致以後再次上當。當時，甚至天真地認為，有錄音也好，正好說明我們的討論的問題，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沒有錄

音反倒說不清，反倒容易被人歪曲爲組織反革命組織等等。卻沒有深思，錄音也是可以刪改、歪曲的，也是可以作爲捏造罪名的「可靠依據」的。

事過境遷，我就漸漸地淡忘了，以致預審中，我說什麼也想不起來這次討論是在哪月哪日，預審員一定認爲我是裝的。然而，這段歷史對於我，則已成爲過去，又沒有形成實際上的成果，記著它有什麼用。何況，我明知道有現場錄音、錄像和各種記錄，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個細節上裝糊塗。可能後來他們已相信我是忘了，才提醒我那是八零年六月十日的的事情。

預審中我又知道，他們居然「細心」到，我和家屬陪孫維邦等人到香山去玩時的歡聲笑語，也由姓陳的錄下來，去邀功哩！

庚申上書

八零年下半年，我除了向香港的《觀察家》投了以南客、客卿署名的二篇文章以外，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中共中央上了一份庚申改革的建議書。年底據聞，在中央的「凡是派」破爲了，改革派占了上風，我心裏十分高興，感到國家有了希望，隨即寫了這份建議書，其結果又是泥牛入海。

記得庚申上書的主要要點有這樣一些：

一、馬克思主義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最科學、最完整的體系，繼續作為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世界是無窮盡的繁複，並不斷地向前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曾一再聲明，他們並沒有窮盡真理。我們也不應該要求一百多年前為生的馬克思主義，把今天的世界對理論的要求，以致千萬年後的世界對真理的探索，都已全部預知或預告。事實上，當今世界上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裏，為全人類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全新的理論和知識。如對現代社會有指導意義的《資訊理論》的作者，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虛心而又坦白地宣稱，他接受過馬克思對他的啟發，對他形成新的理論有巨大影響。在這一點上，難道我們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應該比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更不保守、更不僵化嗎？而更會在繼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完善它、發展它，同時也不拒絕吸收人類一切新鮮的經驗和理論，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鑒於中國社會曾大大地吃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片面性惡果，我建議黨中央公開宣佈，在確立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搞獨尊，而提倡「博採眾家」，廣泛地學習和吸收全人類一切先進的思想和成果。然而有些人由於輕視整個文化積累的功能，儘管也學習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按說他應該講唯物論，而在實際上充滿著唯心論；按說他應該實行辯證法，而在實際上卻處處表現為形而上學；按說他應該主張歷史唯物史觀，而在實際上卻搞個人迷信，搞唯英雄史觀。

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趙紫陽對華人學者專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講話，我是非常贊成的。他說：「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要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凡是符合這些要求的政策，我們就採取，否則就擯棄，不受任何模式、任何規定和原則的束縛。」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重大意義所在。

二、明確教育作為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基礎。

三、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明確無論大小企業一律逐步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體制，使企業既有活力，又有壓力。

四、為鞏固農村改革的成果，儘早頒佈新的土地法規。農業問題歸根到底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徹底解決，在一定條件下，難免承包戶不搞掠奪式經營。

五、壓縮現役兵員，提高部隊素質，逐步讓受過嚴格軍事文化技術訓練的職業軍人充任軍隊的骨幹。

六、逐步實行收取公民個人所得稅的制度，以調整人民內部的經濟關係。人們終將明白，勞動致富，一定允許一些人先富起來，允許有差距，但不可能允許差距越大越好。在保護合理的差別和差距的同時，也要注意保護先天性弱者，這是客觀存在。片面地強調先天性，搞唯天才論，是唯心的。但又不能不承認人的先天性，不准講先天性，不准講天才，也不是唯物論。

另外，只有採取收取公民個人所得稅，才有可能使每個人客觀地認識自己的社會價值，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實現當家作主的迫切願望。

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國勞動力必然過剩，又鑒於我國幼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和校外缺乏教養的情況相當嚴重，長此以往，不能不影響我們整個民族的人口品質。我認爲應該在自願的原則下，允許女職工實行半日工作制。反對男女平等是錯誤的，不承認男女天然差異也不全面。應該承認，有人類的全部歷史，早已向人們顯示了，婦女在教養後代方面，有著先天的優越性。一些家庭負擔很重的女工，對那種空喊「婦女解放」，而不從實際上關心她們、幫助她們的那一套，十分厭惡。據我瞭解，她們中很多人都很想學習一些家政、育童的知識，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的精力更多一點。這對維護一個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也有深遠意義。

談話第二次被竊報

八零年底，我考慮到中國不論大陸還是臺灣，以民刊爲主的民主運動處境都十分困難，恐怕都與議政過多有點關係，這不是它的過失，但在目前中國政治情勢下，總是難以爲執政者接受。我想如果兩岸的民主運動都能把自己的重點放在促進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上，恐怕是一舉數得的好事。於是，我請劉二安徵求了孫維邦的同意，就開始著手醞釀這

件事。本不想要孫來京面談。可年初（八一年）他有空閒，一面想來京完成新創的刊物——「人」，並想推銷點海藻為辦刊物籌些經費，他來到北京。一天，我陪他去看電影，散場後我想既然他來了，就再面談一下。那天正巧陳德堯也隨同看電影，他邀我們上他家談話，我嫌遠，就選了宣武公園坐坐。

我談的主要內容是：

一、和平統一祖國，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大陸和臺灣的民主運動，可以通過香港為「仲介」，再將海外愛國人士聯合在一起，為這一大業作點貢獻。是否可以組織一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來辦這件事。促進民主進程，促進和平統一，這就是它的宗旨，它是一個民間的群眾團體。

二、考慮到國共兩黨積怨甚深，誰也怕對方企圖吃掉自己，特別是國民黨方面。那末，國共的談判，祖國的和平統一，都需要一個媒介，一座橋樑，這就是「促進會」的作用所在。同時，中國的民主運動也可以從中得到發展。

三、有關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的一些具體建議和設想。

四、考慮到大陸、臺灣民主運動的處境都不好，又要聯合搞「促進會」，所以它的初期處境將會是十分困難的。於是，我設想，可否將總部設在香港，對於國共雙方都鞭長莫及，又便於聯繫海外僑胞和籌集經費，尋求支援。

五、對於臺灣方面的民主運動不十分瞭解，知道陳鼓應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所以作為

主要聯繫對象。麟祥（？）比較穩健，影響比較大，也可聯繫；美麗島雜誌那些人情況，可能紛雜一些，可能有台獨的成分，聯繫上要慎重。（這些人報紙上，都一再公認為臺灣的民主人士，可判決書卻稱他們為反華反共分子。真是實用到極點！）

六、要搞的「促進會」決不是秘密組織，一旦醞釀成熟，立即向國共雙方申報註冊，要求承認和支持。

可惜這一番對祖國的苦心和好意，又被陳德堯秘報上去，肆意歪曲，為我種下了更大的禍根。

火災

這也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在八一年春節的前十幾天，晚上的七點多鐘。當時，我和妻、女兒、老母親正在陪妻的女朋友和孩子吃晚飯。火起於我家正上方的三層樓上。三層樓這大單元裏，住了三戶警察，屬鐵路公安分處。肇事者是一位老警察，姓張，五十開外，在公安刑警隊幹了二十多年了。另二位都三十多歲，一位是女的，打字員；另一位是幹警，妻子任廠醫。

老張圖點小便宜，讓大兒子從房山「石化」，用大轎車捎來廠出的煤氣罐，一大罐才五毛錢，當然不包括那大轎車每次專程或順道所耗的汽油費。這次的罐與市內煤氣灶的管口

不合扣，老張不死心，仍想使用，亂擰上口扣，便試火，火卻從介面處著了起來。剎間，煤氣罐成了噴火的火焰噴射器，老張不懂擰死瓶口即可滅火，卻急忙回屋拿破被來捂，不想忙中出錯，將瓶捂倒，汽化液流出，火面騰飛。這時，他驚恐了，踉著雙鞋就往外跑，一邊催促老伴抱著孫子，二個男孩，一個女孩，向樓外跑去，一邊嘴裏失聲地喊著：「快！快！快救火！」

我聞聲竄了出去，上樓時，那位肇事者正狂奔下樓，然後光著雙腳，帶著全家，一直站在樓下呆著看。和我同上來的人，開始用臉盆接水潑，猶如揚湯止沸。我奔向大門口抱來一根水管，也無濟於事。這時，我們和老張一樣不動腦筋，其實只要衝進去把瓶擰死或扔出窗外，即可化險為夷，不動腦筋真是誤事！

火勢愈來愈猛烈，煤氣煙火已嗆得人快窒息了，人們紛紛下樓，我只見一黑影衝了進去，瞬間抱著一物下去，並大聲喊道：「誰家的電視，你們怎為什麼都不要了呢？」老張一看，不正是自己家的嗎，連忙去接過這全家的唯一「遺物」。此時此刻，真不知這位終年一身警服或警便服的老警察，面對著這位曾被她視為「小流氓」的青年作何感想，其實這青年就多穿了一條喇叭褲子！那位女警察也想起了自家的電視，她聽小夥子說，煤氣輕，浮漂在上層，他是貓著腰進去的。她有點發狂了，丈夫說：「那是身外之物！」她不聽，衝了進去，居然一個人抱起了平時二個人才抱得動的二十四吋電視下來了，這也是唯一「遺物」。頂樓那位去報火警的中年幹警更慘，夫妻倆一個兒子一齊跑往門口，連手錶都沒

帶出來。事後，夫妻倆只穿件毛衣也不知冷，都木了、傻了。幸虧妻子在工廠頗有人緣，千把人爲這位廠醫捐獻了一千多元，救了他們的急。

我無可奈何地下來的時候，消防隊的救火車趕到了。火勢主要還在三樓的廚房，火焰剛開始從單元門往外竄，如果消防隊此刻能及時撲滅火源，仍不至釀成大禍。可是消防隊也只懂向火源噴水，一會兒二車水就用完了，他們居然找不到消防水栓，我連忙奔波幫助去找。救火車越來越多，聽說有四個中隊，一輛接一輛，已經排了一千多米長，從院裏排到水電部，聽說最多時排到白廣路電影院，火勢卻絲毫沒有減弱。又起風了，風助火威，整個單元的七間房全燒著。這時我發現消防隊只顧噴水，而沒有切斷火路。這木結構的房頂是連成一氣的，夾雜著煤氣的火被水一噴，更向頂棚蔓延。我也急成了一團火，大聲喊叫：「快去切斷火路，上房！上房！切斷火路！」我身旁的小指揮根本不聽我的建議，並指著大指揮說：「我們得聽他的。」我又奔向那大指揮，對他解釋，他仍不領悟。難怪有人說我有野心哩，這時的我恨不得從這大指揮手中奪過他那指揮話筒，這個笨蛋！瞎指揮！只知道噴水、噴水再噴水！

大火不停地向東撲去，片刻又燒了一個單元的六間房。這時消防隊才上了屋頂，揭瓦、砍木梁，噴水斷火路。又三家被火吞噬了。西樓三層的住房和樓頂上的消防隊員正看熱鬧。正是天有不測風雲，火正向東進軍的時候，風突然轉向，由東向西刮去，西樓的人們慌亂之際，火苗順著頂棚立即向西竄。火路又未預先切斷，西樓頂上的消防隊員正在

「一切行動聽指揮」。嘿！風更大了，不到一刻鐘，西樓二個單元的十三間房子也成了一片火海，住戶的財物搶下甚少，比我們南樓的受災戶強不了多少。最後，火總算被切斷在西樓與北樓交接處了。救火的水龍頭已從「八一影廠」宿舍、六六中操場向火海噴去。

這時，我又儼然以一個「指揮員」的姿態去找來幾個小夥子，讓他們看守樓口，以防有人乘虛而入。火勢在減弱，我這才發現妻站在我身旁，告訴我，她女友帶孩子走了，母親和女兒安置在別人家。妻一見我就痛哭起來，哭得像個孩子。她很內向，性格堅強，極少哭。那次與闊別三十餘年的哥哥見面，我一面向她大哥哥訴說她悲哀的童年，一面禁不住淚淋滿襟，她卻一滴淚也沒有，好像不是說她的童年。也許剛見面那一刻已經把淚哭乾了；也許過度悲哀，麻木的心是冷的，冷得將淚凝固。這時的她，卻擒著淚眼向我說：「立，咱家就這樣完啦？」她是耽心那辛辛苦苦積攢了十年的家沒了。哦，她曾傾注給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的母親的最大的愛，隨著母親的去世，已經完全轉移到這個家上來了。這就是寄託，人沒了寄託才是悲哀啊！我笑了，安慰她：「不會的，絕對不會的，火再大也燒不透樓板，頂多被水泡了。」她釋然了。

火熄滅了，三、四樓面一片漆黑。人們看著我，我明白了。妻問我：「能行嘛？」是啊，到處是水，地上是水加泥濘。我答她：「沒問題。」我心裏想：「不然還算什麼電工！先摘掉了線路上的荷載，找來幾個乾椅子，登上院中的抗震棚，用鉗子叮著掐斷的電源線，接火、按閘、復明。」

回到家來一看，水深過膝，向外淘水吧。水繼續從樓板上流下來，上面殘存的牆垣與樓板成了小水庫，儲滿了不計成本的水。各家顧各家，只知道向外淘水，千篇一律。是啊！不能怪這些善良的人們，中國人多少年來腦細胞已經壓縮扁了。愛思想就可能發議論，就可能冒尖，冒尖就可能被槍打「出頭鳥」。隨大流最安全，早澇保收，別說小小老百姓了，那些大幹部、名學者、文化人不也都彼此彼此嘛！許是大禹的遺傳因數，在幾千年後仍然起作用吧，我這個「異教徒」沒戴什麼帽子，反正也差不多了。我就大著膽子地想了一想：上邊小水庫不消除，水最終也能淘乾淨，時間可就長了，傢俱更要挨淋。我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左鄰右舍中還有的那麼一點小小的信譽，動員每家出一個勞力到樓頂上，在瓦礫中開渠，鑿穿殘牆，先排小水庫的水。妻和我並肩在樓頂，陸續又上來幾個人。東方吐白，上水泄盡，下水也自然枯竭。

這段往事常常促使我想到許多，甚至想寫點什麼。那位貪圖小利，臨陣脫逃的老刑警不值得人們深思，那是一目了然的。值得人們深思的倒是這位刑警和那位穿喇叭褲的青年的對照。當然，更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平常人的無知和消防隊的無知是多麼的可怕！房子被燒二十六間，九戶的財產蕩然無存。三樓程家每年布票買的布，捨不得給孩子年年做新衣，存了整整二櫃，也毀於這一旦，這是三十年的積財啊！還有三戶也所剩無幾，整個損失折合多少人民幣，事後並無人統計，經驗教訓的總結仍然是走走形式。浪費啊，浪費，火災是浪費，形式主義更是不應該的長期浪費！

己、仇敵。平等相待吧，朋友們！在防止暴力、動亂的同時，讓人們開動腦筋，暢所欲言吧。

說這些幹什麼？又得罪多少人啊？命運對「異教徒」總是嚴峻的。

預審後期，一次「閒談」之中，預審員似乎是想幫我總結經驗教訓吧，因而需要追索思想根源，因為他們一貫的作法都是這樣的。於是，這位預審員第一次相當露骨地說我有野心。我「哼哼」一笑。不由地把這場火災中的我作為當成「評功擺好」的依據，並「囂張」地問：「按照你一貫的基本思路，有野心，必然自私，自私必然膽小，那我這個有野心的膽小鬼，怎麼會不顧自己的家小在救火呢？」

他毫不費力地就擋了回來，冷冷地說：「那是怕火燒了你的家！」

我「哼」在鼻中，「小人！」在口中。

我只得告訴他：「失火在三樓，隔著厚厚的樓板，根本燒不到我的家。若真是怕燒到我家，我更應該首先搶搬自己的家財，安頓自己的老母和小女兒啊！」

他無言。

一盒錄音帶

八一年三月份，安陽的劉二安托人帶來一盤他講話的錄音帶，讓我也把要講的話錄上

帶回。我記得有二點：一、我認為現在取消民刊，是對民刊的誤解，這樣作對民刊是不公平的。二、對劉二安拿我與波蘭的瓦文薩相提並論，我認為不妥當。我無法和瓦文薩相比，希望他今後不要這樣作。我不喜歡別人這樣恭維自己，我會覺得不自在。在劉二安受審查期間，他交出了這錄音帶，我並不責怪他，他有他的處境和自由。

拘禁

俗話說禍不單行。人們生活起來，倒也不提著心、吊著膽地盼著那禍成雙。可也怪，也可能是鬼遣神差，我卻在火災之後，不知不覺地在做著預防禍成雙的準備。失火後，妻的大哥寄來錢，我湊上賣舊錶的錢，給孩子買了一輛五羊牌小自行車。許是怕她日後的條件比不上人家？緊接著，借錢買了電視機。許是想今後什麼也不幹了，該娛樂娛樂了。許是怕小女到別人家看電視，再受委屈？要知道，現在想看一場好電視（這兒星期六、日反而不讓看，看也常看不上好片子）這樣難，當時在家該多看幾眼啊！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緊鑼密鼓地在準備著，好像要到那裏去一樣。

四月一來，清明節就要到，又是抓人的季節來了。果然，要抓人的風，一天緊似一天。民刊的「激進派」又要進京向人大常委會進言，要求撤回內部禁令，給民刊以合法地位。他們想讓我為代表。我心想這些人真不瞭解某些人的脾氣，一旦定下來變不了，偌大

中國二、三個人請願，毫無用處，只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更爲抓人提供藉口。

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我一早先到天安門，向紀念碑的遇羅克像獻了題詞牌。然後，奔妻的學校去油漆那個請人打的寫字檯，總愛「胡思亂想」的人，混了三十年了，竟沒有一張寫字的檯子，還妄談憂國憂民，豈不可悲，可憐！

傍晚，又攜妻女拜謁烈士紀念碑。

七日晚下班到家，女兒對我說：「爸，我們要春遊啦！」

「哦，這可是第一次，要交錢吧？」真沒辦法，這窮人的通病，怕提錢，凡事又最先到要花錢。

「爸，要交七毛錢，看，我這都準備好啦！」

她小手攥著一個小包，滿是「鋼貝兒」。

我一愣，眼圈立刻濕潤了，這懂事的孩子，看透了這窮爸爸的口袋又是空的。我苦笑了笑：「哪能用你的錢，拿去。」掏出僅有的一元，硬充慷慨。晚上等孩子睡下，我告訴妻。妻很爲自己生了這樣懂事的閨女自豪，自豪感尚未從臉上消失，就遇上了我的故伎重演。

「你還有錢嗎？」她自然明白，又是讓她「繳械」。也習慣了，最困難的時候，每月初從我這兒接過五元錢，月底能交出四塊八，甚至五塊整。一根冰棒都捨不得吃，和《鄉音》的女主人公一樣，「徹底投降」。

「有，這一毛，給你，我還有飯票。」毫不費力就「繳械」。

第二天，又「偷」了晶兒小匣的四個五分「鋼貝兒」。八號這頓午飯總得應付啊，還好，剩了一毛五分壓兜。這一天，我可真有點窮急了，真是「圖窮匕首見」。我對班長說：「快讓工長發錢吧，今天都幾號了，過了六、七天了！」我指的是獎金和誤餐費、交通補貼的十幾元錢，過去總是月初發。

九號一早發了下來，下班直奔東單，像個腰纏萬貫的富翁似地採購：奶油卷、巧克力、香腸、話梅、橘汁、水果，家有茶葉蛋，對得起女兒了！

「咱們的小女兒，多美啊！咱小時候春遊，你婆給烙張糖餅就得了！」

我得意了。吃飯，看報，給女兒裝書包，兌橘汁，裝餅，十一點多睡下。

妻讓我自立門戶。差十幾分鐘十二點。「咚咚咚！咚咚咚！」我心裏明白了，開門。

「開燈！」幸好各立門戶，立刻開了燈。「穿衣服！」

「爸，怎麼啦？」女兒在夢中問我，我忙答：「沒什麼，乖，你睡，沒事。」可憐的小機伶又昏睡過去。決不能讓她耽心受怕。十幾位穿著警服和便服的擁在門口，無語。我亦無語。穿衣，一想不能穿皮鞋，到那兒還要跑跑步，身體不能垮。伸手拿鞋盒，恰是「懶漢膠鞋」，二塊錢一雙，購於菜市口委託商店。妻穿著她母親的一件舊灰襯衣（不是絲睡裙，也不是緞睡袍），今天要拿到委託商店，人家都不收。我這個作丈夫的！她雙眼直勾勾地看著我，把我緊緊留在腦中，無語。她知道我愛用手帕，從床沿上搗過一方晾乾的手

帕，疊好交我。我交她那塊大哥送的金殼錶。扣好風紀扣。

「請出示證件。」我說。

「這是拘留證。」我並不需看。上銬。「哐卡、卡」鎂光燈閃了二下。

無聲，離家。門外還有二十多位警察。永定門工區的單身漢也都聞聲而起，觀望。我心想：「在這兒抓我對他們太有利了，要在白廣路，就是我不吱聲，那些鄰居也會圍得他們水泄不通，雖然說話的人倒不一定有。」我是早已想好，此時此刻是不必說什麼的。在內情極度閉塞的國度，除了像譚嗣同有必要以血喚醒民眾之外，搞什麼「付代價、無效果」的抗議、絕食等等，都是愚不可及，不如從容鎮靜地應付這一切，更讓人去思。何況，時代畢竟不同了。電影裏那一套畢竟是電影。

一路無語，一青年便衣問我：「銬子緊不緊？」我搖搖頭。到了半步橋四十四號下車，又是一陣閃光燈。早有人接，搜身，登記物品、簽字、入獄。這時，我對那位後來的「主持」預審員說了一句話：「明天，我孩子學校組織春遊，我希望你們不要影響她前去。」

「這個我們不管。去，我們不會干涉；不去，我們不會鼓勵。」答得不冷不熱，我不再語。無事懸心，心很安。

入二衙十四號電動門，單人，給了一褥一被，據說一般人是不給褥子。「被子不夠，明兒再說。」也再沒人來說。有點冷剛停暖氣，和衣躺下，似乎想了什麼，又似乎沒想什

麼，到天明。第二天搬九號，三人同住，難友供一棉大衣，足矣。

預審員們

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個月的預審，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上不算長的。過了二百多堂，這可能算多得有點出奇。頭一個月幾乎每天三堂：早、午、晚。每次二小時左右，不誤開飯，偶誤睡覺，每日有午睡，覺是充足的。

我共接觸過七個預審員，「真人」們均不露姓。「主管」是一位白臉，勾鼻勾眼，薄嘴唇，斯文、持重、陰沈，五十開外的人。他是屬於「我說你有罪，你就不會沒有罪。順我者寬大，逆我者嚴懲」那類人。估計是一位處長或副處長。「主持」是接我的那位：戴眼鏡，頎長，精瘦，他是實現「主管」意圖的能手。一次聽人叫他「老張」，我如此稱呼他，他嚇一跳，不知爲什麼姓都怕我知道，估計是科長級的。第一天晚上露了一面的胖子，可能也是科長或副科長，在審訊室頗隨便，說話粗俗，日後再沒露面。還有一個黑瘦子，是個「老油條」，作過幾次記錄，說話更是信口開河：「我們這兒關鍵是看態度。態度好，能從砍頭變無期、有期，甚至釋放。態度不好，就重判，甚至砍頭！」他一個普普通通的預審員就敢作判決的主。這裏層層有否決權，層層有生殺權。一個小青年，記過幾次錄。二位三十五、六歲的「常務」預審員，可能畢業於公安學校。但是，他們：

一、不懂什麼叫「流派」、什麼叫「社會學」。二位「常務」倒還不恥下問，那位「主持」覺得有失身分，連忙搶答：「社會學嘛，就是社會科學！」一語定音，我和二位「常務」一起瞠目結舌。

二、不熟悉《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內容。當審到討論「同盟」一事時，我說：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反對過無產階級兩黨制和多黨制，事實上還承認這一點。而且《共產黨宣言》就是為當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

「常務」吃驚，問：「不可能，在哪兒說過？」想考住我。

「在《共產黨宣言》上。」

他忙說：「那更不可能。《共產黨宣言》是我們共產黨的宣言，怎麼會宣傳兩黨制？」他以共產黨的代表自居。

「那可以查。」我慢慢地說。

他費了好長時間，總算找到一本《共產黨宣言》，事先還一定翻了翻，所以一回來就以勝利者的口吻質問我：「這，哪裏有啊？」

「別忙。」我翻到《宣言》中「共產黨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那一部分。告訴他就在這兒：「馬克思明確地在這裏說，共產黨並不排斥其他工人階級的政黨，這就是說，馬克思本人沒有因共產黨的存在，來排斥和反對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存在；並在事實上承認在共產黨之外，可以有其他工人階級的政黨存在。」

「常務」立刻搬來了看家本領：「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不考慮時間、地點。」好一個考慮「時間、地點」，怎麼運用得這樣靈活！怎麼不再誇口《共產黨宣言》是屬於他的了，反而搬來「國情論」，他恐怕還不知道當年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就唱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論！

三、不懂什麼叫社會主義。在一次「閒談」中，我問「常務」：「你們認為我是反社會主義，那請問什麼叫社會主義，你能概括一下嗎？不然怎麼知道我反對社會主義呢？」

「我們這兒不搞學術討論，我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他有點氣急敗壞。

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頌葵在《無事的悲劇》中說得很生動：有心人「壓根兒還沒有弄清什麼叫資本主義，卻去反資本主義，比唐吉訶德用風車作戰還要讓人感到離奇。」真可笑！可是，偏偏把我們這些人的生殺大權交在這些人手中！這可就笑不起來了，特別是搞學術研究的老夫子的命運可能就更可悲。悲哀啊！我相信，這決不是僅僅幾個人的悲哀，說是全民族的悲哀並不誇大！

天津的老先生湯戈旦，二十年代入黨，因被捕失掉組織關係。解放後，不但未能恢復黨員身份，反而幾遭整肅，他並不灰心，心仍向著黨，自費專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鍥而不捨。他確認建設社會主義首要任務就是發展商品經濟，缺了這一課，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更別說建設共產主義了。他的這些思想和文章，長期得不到確認和發表，還備受排斥，只能與孫治方、薛暮橋、于光遠進行書信探討。這樣的人，要是落在不知「流派」、

「社會學」爲何物者手裏，更是有理說不清了！這就有點像，你讓一位酒家老闆去批判《安娜·卡捷林娜》，你很難不讓他告訴你：「這是一本淫書！」

今天湯老的命運又該如何呢？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平行不悖的。又明確，要大力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可是，孫治方去世了，健在的薛先生、于先生可肯爲湯老說句公道話啊？不然，可就難了，他文革後自己已經努力，老戰友多方相助，也沒能夠恢復組織關係，落荒在民間，又因文章無處發表逼得和我辦的民刊結了點「親緣」，恐是難逃出此劫的！嗚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學的倡導者。

僵持到「妥協」

四月十日，剛八點便傳我，劈頭就要我交待違法、犯法的行爲。我也乾脆：「我從來不作違法、犯法的事。你們拘留我，是違反法律的。」僵持，一上午，又一下午。

晚間，我剛想躺下，又來傳。又僵持。一個多小時後，我開始閉目不語。只露過一面的那位有點震怒，我連看都不看他，仍閉目不語。再三催促，我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是當工人的，九號上一天班，晚上剛躺下就被你們請到這兒來了，到現在已經一天一夜沒合眼了，我頂不住。」當時的確很困乏，說完又不語，他們無奈，送我回去。

這樣過了一、二天，他們轉換了手法。從此，再不提犯罪違法，連「非法」也不提，一再「誠懇」地表示按九號文件精神辦，把問題講清楚就行了。我這個人就怕軟的，這是個大弱點。那也好，我心裏有我的原則：

一、我辦民刊和其他活動，從來不是違法的秘密活動，而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活動，沒有什麼不可談。以後他們也不得不或先或後透露了他們掌握情況的程度，對這些，我更沒有什麼不可談，甚至談清楚。

二、涉及別人的，我沒有義務談，即使非談不可，也以不會給別人造成任何不應有的損害為限度，微小的可能性也不讓它存在。

三、凡是與我政見有點不合的人，絕對不談。

談，算進行下去了。車轂轆的話，轉著圈談，一遍再一遍，絲毫達不到他們想達到的目的——提供不存在的事實。「逼、誘、詐」均不能奏效。倒還沒敢動武的。我也不會給他們提供藉口。

他們可能逐漸發現了我的弱點，從「逼」上下手了。先問我，我妻子對我的活動的態度，暗示我，他們不惜把我妻子牽連進我的問題中來。開始，我對此訛詐，不予理睬。他們又進一步露骨地提醒我：「如果我們把你的愛人也抓起來，你有什麼看法。」我怒不可遏：「那就連最起碼的人道也不講了！」

我知道，他們也知道，我妻子對政治毫無興趣，多年運動使她對政治極反感，出於不

傷我自尊心，又憐惜我的「懷才不遇」，（實際上叫什麼「才」，不過她還是認為我是有才的，許是作妻子的偏愛吧！）又深深地愛我，只得縱容我。可是，我從事任何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她均不參加。我也不徵求她的意見，既是避免在中國最不受歡迎的「夫人干政」，（其實夫人不干涉政治，但參與政治並無妨。美國憲定總統必須由有配偶者擔任，是科學的。單身漢很難瞭解家庭的問題，而家庭又是迄今為止的社會的基本細胞。）又是尊重她不喜歡政治的自由。事實上，我任何重要一點的政治活動，沒有一件是在家裏進行的。在家裏辦刊，也是和我們居室分開的。不要說因為我，而抓我的妻子，稍有株連她，都是毫無道理的。可是他們的威脅，我又不得不認真考慮和對待，他們是什麼事都可能做得出來的。考慮的結果是，我個人無論作出任何犧牲，也不能讓我無辜的妻子被牽連進來，原因是：

一、我妻子從小失去父親，母親被迫回到娘家，備受歧視。我妻從小備受包括親外婆在內的歧視，外婆帶所有的孩子上公園，獨不帶她。我每聽到此事，想到此事，就禁不住要落淚。她母親無奈改嫁，養父是老工人，待她不錯，一旦有了親骨肉，總不如親生父。我妻又格外敏感、倔強，從小心靈就這樣受過大的創傷。初中畢業，成績很好，卻不能考高中升大學，她痛哭一場。上中專，每天從西城走到南城上學。她從小體弱，上操竟會暈倒。可賺錢了，平日一個錢都捨不得花，全數交給母親。與我結婚又是苦日子，生活剛剛好一點，又成天為我辦民刊擔驚受怕。她大哥從新加坡來找她，生活寬裕

了，她驟然年輕漂亮，神采飛揚了。我卻又被捕了。這個命運備受波折的妻，我怎麼能讓她無辜受牽連啊！我寧可死，也不能讓她遭恥辱！

二、我的二哥文革中受審查，二嫂被牽連，才落個自殺或他殺的結局。我記憶猶新，我不能不想到這種可能。

三、更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孩子，才九歲，是女孩。極單純、天真，又敏感。她媽媽要遭不測，她可怎麼辦？親朋好友，不會不管，但畢竟不是自己的父母，即使更細緻、周到，孩子的心靈難免有隔閡。特別是若有不測，孩子出點事，我關在裏邊，那才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我死也不能讓孩子再受更大的委屈。

因此，我寧肯粉身碎骨也不能讓他們狼毒陰謀得逞。「妥協」是可以的，當然必須在一定限度之內。而且，必要的時候一點兒也不妥協！他們要我軟下來的第一個目的是：搞一點他們掌握的竊聽錄音上所沒有的東西。

一、他們「提醒」我，我在甘家口討論會上說過：要和黨「分庭抗禮」、「平分秋色」。我肯定地答覆：沒有，我沒用過這樣的辭彙。記錄在案，可供查考。幾次之後，我答覆：「記不清楚了，可能有過這個意思。」又幾次之後，我答：「可能用過這幾個詞，記不準確。即使用過，也沒有任何推翻、打倒的意思。」他們不敢再問了，怕這「成果」飛了。

二、他們又「提醒」我，甚至說我用過「取而代之」的字眼。我斷然否認，根本不可

能。直到最後的不得已的階段，我承認從思想上認識就是這個意思。這種答覆是很清楚的，這只是一種分析，而不是事實，今後總有搞清楚的那一天。後來，他們在公開場合（不包括他們向上彙報）也不敢再提這一點，法庭上更不敢提這一點。法庭只問我說過「分庭抗禮」嗎？我答覆：「不記得用過這個詞，沒有說過。而且這個詞按中國文字的本意，只是指朋友間相見、分庭而立，相互致禮的意思，與『打倒、推翻』的意思根本不沾邊。」

三、他們很明白，有關「同盟」的討論，我們自己否決了；「促進會」是爲了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很難加上「反革命」這頂帽子。他們就想先給討論「同盟」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拿「促進會」作身子，以便定案。於是，千方百計要讓我把討論「同盟」與醞釀「促進會」聯繫起來。我始終未讓他們滿意，因爲這根本不是事實，所以法庭上也未敢提出來，他們向上彙報怎樣說的，就不得而知了。

然後，就在我保存的材料上兜圈子，整整又兜了二個月，他們也覺得無望了。

轉捕

八月十日升級了，轉逮捕。同時，他們重申二點：

一、仍按九號文件辦，只要談清楚就完了。

二、只要交出材料，可以考慮我提出的任何條件。

同時，又拋出一些他們掌握的情況。

我知道遇羅克在最後時刻，曾錯過一個機會。這是他頑強、不苟且的表現。我當時的處境雖沒有那麼嚴重，但我有種種考慮，一定要爭取出去。文革中許多老幹部，也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公開宣稱自己是「牛鬼蛇神」嗎？對於不嚴肅的作法，也不必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之。這是一場滑稽戲，既不是面對階級的敵人，也不是面對民族的敵人，本無氣節而言。只是在嚴肅的場合，才有嚴肅對待之必要。他們要弄我，我也會耍弄他們。真相總會搞明白的，但我不願意在黃土中去等這一天的到來，我要親眼看到這一天。只是方法問題，時間早晚的問題。

當時，我身體狀況日漸虛弱，腰疼得連端盆水都困難了。這個看守所，不顧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有關中國既不實行「無罪推定」，也不實行「有罪推定」的規定。而實際上，實行的是「有罪推定」，這兒的待遇本來只允許稍低於自由人，可是實際上比關押已判決犯的監獄、勞改、勞教場所的條件待遇差得多。每周二十頓，十八頓基本上是清水煮菜，窩窩頭，窩頭中間還是硬生面。每周只有二頓細糧，一、二頓菜能見油葷。當時關押已久的政治犯都吃小灶，他們故意不給我小灶待遇，只讓醫生按病號飯（其實按預審需要），給我開小灶。我在K字樓一年零五個月，吃了近五個月小灶。基本上沒有放風，一個月難得放一、二次。一、二個月放一次電影，政治犯唯我不讓去。不能接見，不能通信，沒有書

和紙張，對我用筆控制格外嚴。室內有監聽設備，門上有從外向裏的監視孔，掛黑簾。當然，裏面的人，也能想辦法向外看，事物總是兩面的。雖對我不會用暴力，但監所內的打罵聲、電擊聲，時常可聞。有的人已在這兒被耗了好幾年了。預審時限，在這兒根本不起作用。有的人已明顯呈垮相，我很怕被耗在這兒，被拖垮，爲了妻子和孩子也決不能垮在這裏。這兒層層有否決權，想向上反映，根本不可能。

我唯一可以妥協的，就是我保存的那些材料。其他的儘管他們不滿意，我都實事求是地談完了。我也知道這是他們最後階段的主要目標。他們越說什麼：只要交出來，什麼條件都會考慮；交出來，不正說明你沒有問題嗎，等等。轉了二個多月了，他們越是甜言蜜語，就越使我曉得其中有詐。但我也有詐，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試一試。到時候，說話不算數，我也自有辦法。想給人家戴上圈套，難免不是自己的圈套。

但是，他們不能理解一個正常人的心理，他們說了千句萬句，沒有一句能打動我。他們當然更不願意想到，他們詐我，我也會詐他們的。其實，我當時不交材料主要只有二點障礙，材料之中根本沒有他們想像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相反只有更充分地證明我是無罪的材料，正因此我才怕落到他們手中，而被篡改、或銷毀。另外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道義上的障礙。

一、我交出這些材料，將無顏見王殿元。

我與王殿元是摯友，情勝手足。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在他那兒放點東西，他從不過

問，也不參與。我爲自己，將他這自重自愛的人置於警方和家屬委員會之前，那不但對不起他，讓他在不明真相的鄰居中抬不起頭來，也對不起小傳和孩子。但又考慮到，事實將證明與他無關，衝擊波不會持續過長，只要我的問題清了，我再去償還他的損失，和求得他寬恕也不晚，儘管他不會要我這樣做。

二、我八零年下半年，以南客、客卿的筆名在香港《觀察家》上發表的幾篇文章。一部分是爲齊白石的墓被毀，至今不予修繕。齊家的家傳國畫被抄，至今不退還而鳴的不平。迫切希望中央關注這件事，責成有關部門愛護國寶，落實政策。希望有關部門，恢復解放初期共產黨人的好傳統，盡速解決問題。特別希望美術界個別負責人，不要因爲曾將齊白石禁閉雨兒胡同，受到周總理批評，到了今天還視國寶爲糞土，踐踏中華文明。事實確鑿，語詞懇切。儘管如此，文章也已發表，但此文是我主筆，一旦公開，怕對齊家不利。又一想，即便不利，也大不了那兒去，也恐怕不一定就不利，這顧慮才有所消除。

另一部分，即是爲郭羅基鳴不平的文章。當然文章的著眼點，不在於郭與蔣的個人糾紛，而是唯恐因郭的受壓，影響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進程，影響中國的改革進程。赤誠可鑒，肝膽照人。儘管如此，他們不會不歪曲，不會不更加害於郭。不過想到此事此文也已公諸於世，是我主筆之事，可能會從組織紀律這角度，再給郭找點麻煩，再不利郭的後果也不過如此了。真是本想幫忙，可能要幫倒忙了！

爲了防止我的處境進一步惡化，爭取可能爭取的前景，和其他一些考慮，我決定交出

保有的材料，但我與他們定了幾條「君子協定」：

一、我在王殿元處保存的材料，與王殿元完全無關。絕不能因為我交出材料，對他所傷害。拿取此材料，不可驚動王殿元所在單位和鄰居。材料的保存地點和內容，我會全部如實指明，除取材料，不得抄查王殿元的家庭，干擾他的生活。主人有口吃，任何人不得嚇唬他，由我寫一書信，讓他同意你們將材料取走。原來我要親自去，他們不肯。幾經堅持，他們仍不肯。

二、材料中涉及的人和事，不得再追究和株連，有任何需要承擔責任的事，由我個人負責承擔。

三、一旦我需要使用這些材料，將提供方便。

四、材料核定後，立即釋放我。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條件並不苛刻。我所以不交出材料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們預料。待我的要求，他們一一答應承諾之後，我才提供了保存材料的地址和戶主的姓名。對他們的承諾，我沒有要什麼文字保證材料，因為我明白，如果他們不想遵守這些承諾，我要一百份文字保證也是白紙一張。我當時的處境，他們可以任意搜檢我的東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時候，我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就被他們發現，並巧妙地當我面銷毀了。看來，他們很怕這封信傳出去，所以才假手我毀掉它，恐怕這封信他們始終對中央是保密的，至於為什麼他們這樣怕中央，怕外界瞭解真情，明眼人一看是不難看穿的。越怕

被人看穿，他們就更竭力地想掩蓋，可謂煞費苦心，但總有一天要破的。

九九拜三哆嗦

材料一旦交出，他們可是眉開眼笑地彈冠相慶了一番，甚至當著我的面露了一下他們買了多少酒。但是，他們也就再沒有什麼戲好唱的了，我才平靜了那麼一小段時間。種種跡象表明，他們只準備小部分地遵守協定，大部分協定，從他們許約的那一天起，就準備撕毀它，果然不出所料，又來新花招了。

一、他們要求我有個原則上認罪的代表。

開始我慎重聲明，我是無罪的，也不可能犯罪。他們就說，你總不會沒有錯吧，錯與罪並沒有嚴格的界線，從提高認識的角度，要認識到自己是犯罪的。現在九九拜都拜了，這一哆嗦就不哆嗦了？

看來似乎他們只要我原則上認個罪就算了，已經到此地步，認一個也無妨。廉價的肯定，也可以廉價地否定。必要時再說，話雖這麼說，對於一個真正知道自己並無罪的人來說，要這麼違心地作賤自己，心是要流血的，所以才有那「痛苦的嗚咽」。我料想了要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料想了他們也不會不為此付出代價！而且他們應付的代價，我會儘早兌給他們的。

二、他們又要求我寫個認識過程的所謂「親筆供詞」。

長期以來，他們習慣於要人們按他們那主觀的形而上學的思路寫什麼認識材料，不管如何編造，只要有了它，就「合乎規律」，也就萬無一失了。我寫不來，他們就耐心地「幫助、提示」，總算「九九拜，又哆嗦了第二哆嗦」。其實，這不過是一張廢紙，因為它不過是一個通篇帽子與事實不符的官式文章，但他們需要用這廢紙騙中央，騙輿論，騙自己。

三、他們要我寫一份有關白天祥的材料。

他們又荒誕無恥地要我，來這一個「九九拜，第二次哆嗦」。我問怎麼沒完了？他們表示是最後一次了。那二位「常務」叫上鋒逼得也夠受罪的，只跟我說好的。但這是一支一箭雙雕的毒箭，它等於告訴我，他們準備向白天祥下手；另外想再故伎重演，讓我和外國人挂上，以便再次在必要時愚弄中國百姓。

事實上，白天祥作為法國駐華使館的一名隨員，並非正式外交使節。他是一位老中國留學生，對中國很有感情，很熱愛中國。至少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任何一點的反共反華的情緒、思想和言論。相反，他對中國很友好。他作為「四五論壇」的讀者，與我有過幾次接觸，因為雙方都忙，接觸也是來去匆匆。偶爾一次交談中，他會很誠懇地說，據他看中國很有希望，這幾年的經濟改革，比蘇聯的改革步子邁得大得多。他作為香港《觀察家》主編許行的朋友，曾替他給我帶過一些雜文，我也托他轉送許行一些「四五論壇」。最後一次，我請他帶一封信致許行。托人辦事，我從不願意瞞著人家，所以對他簡要解釋了一下

信的內容，是有關與許行商議「促進會」的。他表示，信可以轉交，但他認為許行先生不一定會同意。我表示，如果帶信覺得勉強就不必帶，如果可以帶，我很感謝。

他與我的交往就是這樣，即使因一個外交官的身份要求他，他也沒有做超越身份的行為。想就此對白天祥作出什麼不友好的舉動，是極不負責任的，既對不起白天祥本人，也對不起法國政府和法國人民，他們沒有把信任錯授給一個不相稱的人。白天祥對中法人民的友好事業，作出了努力。正像我們曾經誤傷過義大利的安東裏奧尼一樣，總有一天會向白天祥先生道歉的。不過，這樣作的結果對一個國家的聲譽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損失。可是，有些人並不在乎這一點，只要自己一時得利，他們什麼事也敢幹。

我與白天祥交往的事實真相就是以上這些，他們即使相信事實是這樣，卻因為不符合他們的要求而不肯罷休。繼續追問，以致胡攪蠻纏，不然難以達到某些上司主觀定下來的目的。這下子，我發怒了，我甚至吶吵起來。他們見狀，知道再搞不出來什麼了，又怕已得的成果飛了。就讓我寫，寫來寫去總也不合他們口味。他們有點急不可待，我也看出我再努力也難以阻止他們這瘋狂的一步。他們乾脆自己動筆了，我堅持事實不許有一點添油加醋，他們刪去有利白天祥的事實，又給他戴了幾頂空帽子，那我就管不了了。不過，這也正給提供了一個在將來可以牢牢地套在他們頭上的圈套。而且，有眼力的領導人一眼就能看穿這材料不實，甚至有鬼。可惜，我至今還沒有看到在此案上有這樣一位有眼力的領導人。

此後不久，我就在法庭上當眾將這個他們本想套我的圈套，回敬給了預審員先生們。可謂言之不預。我早對他們說過：「我是會一報還一報的。」當時，他們吃驚地把眼睛瞪得溜圓，囂張地說：「我們還從來沒聽說過，有誰敢對我們一報還一報的。」真是霸道！

至此，這些預審大員們再也不露面了，偶然的機會遇到我，也趕快地溜走了。心中有鬼的人們，我不是曾問過你們其中的一位嗎：當你帶著你的孩子上公園的時候，你想起了你會把一個你明知無罪的人送進監獄，而使他能帶自己的孩子去玩耍，你的心靈會安寧嗎？

在此我慎重聲明：

一、在我案今後的復查中，我只認可一切與我案有關的未經篡改、刪節的原始證據，包括原始錄音，才具有定案的法律效力。一切未經我本人再次確認的詢問記錄、審訊記錄、「親筆供詞」和其他在預審期間裏形成的文字材料，一概不具有定案的法律效力。

二、我再次重申在法庭上的聲明：由預審員動筆捏造的有關白天祥的所謂材料和預審員趁我不備而隱蔽搞的錄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由此造成的任何後果，我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希望有關部門不要據此作出任何有損中華人民共和國聲譽，和有損中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錯誤決定。如果因為錯誤決定，而造成的一切後果，其責任完全由七處的有關預審人員承擔，我概不負責。

這一聲明，我早已準備好的，在法庭上他們偏偏回避這個問題，我只好找准一個時

機，突然宣佈出來，審判長想制止已經晚了，聽眾大為驚愕。可能在座的那二位「常務」預審員一定如坐針氈，如喪考妣，從業十幾年大概從來沒有裁過這樣大的跟頭吧？我在法庭上又抗議，他們違反人道主義，不給我家屬送來的假牙使用，吃飯造成困難，以致在法庭上說話不攏風，可能不清楚，請各位聽眾諒解。這下子，他們更是恨不可及，一直把我的假牙，扣留到我轉一監時，才不得不交出來。至今我才明白，他們所說的「九九拜一哆嗦」，是那麼一種話，以此回敬：天底下哪有只讓別人哆嗦，自己不哆嗦的道理哩？

開庭前的波折

在我預感到，非在法庭上與這幫預審員的代表者交鋒的時候，我早打定主意，不必說他們會蓄意判我十五年，就是判我一年，我也要充分利用法庭的機會，公開抗爭。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檢提」。這一次，我便聲明：我是無罪的。檢查員張起生大吃一驚，他沒有這種思想準備。他四十五歲左右，看得出來這個人，這十多年一路順風，得意主觀，盛氣凌人，比預審員們還「左」三分。他根本不想聽我的申訴和解釋，似乎他只負有起訴我的權利，而沒有檢查預審工作的義務，以致二個月後的八二年一月底，他還在起訴書上稱我「供認不諱」呢！

我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到起訴書後，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原答應可以查閱的我保存

的材料也不肯提供了。「刑法」也不肯借，只有同監的一本「詞典」，寫辯護詞的紙也沒有，這叫什麼允許「自我辯護」！二衝劉管教以「關心」的姿態借了「刑法」，給了紙，又以幫助我為名，提出幫我看看辯護詞的稿。就在法院第一次找我的前幾分鐘，劉將我寫的辯護詞拿走了。不讓他們明拿，他們也有辦法。事後，我立即想到辯護詞可能被複印。

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法院第一次找我。後來的審判長丁鳳春，是在一位戴著眼鏡，故意裝著老練的人的保護下來的。丁的年齡與我相仿，可能為了旗鼓相當吧，讓年紀大的當主審豈不顯得太沒人了嗎？不過，一開庭，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選擇是大大地失算了。丁某顯然是來自農村的復員兵，實際文化水準超不過初中，可能有合適那個時期的某種特長而爬上來的。「濫芋」一旦顯形了，真是給那位監護人添彩。這天，他梳著一個「高二林」相親時的頭，中山服，一本正經，頸項一直梗著，小嘴老是一撇一撇著。我知道向這種人重申我是無罪的，是白費功夫，可是又不得不向他重申，他根本不予理睬。談到請律師，我要求請馬榮傑，或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位曾表示願意給魏京生當二審律師的人（姓名現在忘了）。次日，丁某告，馬在國外講學，另一位查無此人，我不得不委託法律顧問處派一位律師，我要求家屬參加旁聽，未答覆。

二月十五日，我的律師來了。劉述芬律師，她五十開外，一張飽經風霜的臉，敏銳。她細心地聽取了我的敘述，儘管不十分充分。談二次後，我發現她即便不能作到盡力而為，也不至於為虎作倀，可以信賴。事實說明，她是一位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在可能的情

況下，盡了她的職責。她的公正而簡潔的辯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超出我起初的估計。

此後，不知何故，沈寂了二個多月，可能是內部意見不統一，也可能是政治氣候的影響。

四月二十九日，法院第二次找我，五月十八日，檢察員又第二次來找。

在這個期間，他們策劃了一個重要的陰謀，就是再次違約，把我為郭羅基鳴不平一事，補充列為起訴內容。這有二個意圖：一是為配合當時某種政治需要；二是用這件事更加激怒某些領導人，以增強他們執意要重判我的支持力量。完成這一步以後，他們認為萬無一失了。五月三十一日，給了第二次起訴書。同時，要撤回第一個起訴書，可我利用起訴書的空白寫了不少辯護內容，我只好要來墨水，將它塗成一片黑紙交了給他們。

法律程式就這樣地被玩耍在他們的股掌之中。

開庭：讓審判長迴避

八二年六月八日上午開庭。我穿一條筆挺的藍色筒褲、白短衫，皮涼鞋，留著學生頭。開庭前，再次派二名書記員向我說明有關規定，我表示不知道。

他們接受魏案開庭的教訓，上次雖是在內部進行，可是來人過多，坐滿了大法庭，估

計有幾百人。這次法庭設在大法庭的資訊廳，特意作了臨時佈置，莊重威嚴。二部攝影機、鎂光燈、聚光燈。東側排著三台大的錄音設備。電扇十多台。聽眾可能有五十餘人，多是來自本院各科室，有幾名記者模樣的，一律憑票入內。我認出二位「常務」預審員帶一個小青年來了。

一開始，審判長先問我：「法庭組成人員中，你有需要提出回避的嗎？」（心裏可能想，不會答有。）

「有！」我肯定地答道。丁某一愣。趁他一愣連忙問他：「請問審判長，在開庭之前，你找我談過幾次話吧？」

「談過那麼幾次。」他答。（心裏可能想，他問這個幹什麼？）

我不容他多想，緊問：「審判長，你是不是每次都講到，要我認識自己的罪行，以求寬大處理？」成了我審他了。

「是的。」他答，臉稍有鬆弛。（心裏可能想，原來這麼回事，豈不等於在領導與眾人面前爲我評功擺好？）

我想不能再解釋我的法律依據了，必須趁他鬆弛將「彈」放出去，我一字一頓地說：「因此，我要求審判長回避！」

我雙眼在逼他，他臉頓成白紙，木然的眼向我的右後方第一排坐著的「牽線人」投去，此後這位「木偶審判長」的目光就總是怯怯地朝著那個方向。

他顯然得到暗示，慌忙宣佈：「休庭！」

挺直腰杆的人們，一下子全踢下腰去。鎂光燈、聚光燈隨即熄滅。

「撲哧！」一個鼓得足足的皮球，突然泄了氣。

「簡直是開法庭的玩笑，讓審判長回避，這從來沒聽說過！他回避了，誰審你，無理取鬧！重判，一定要重重地判他！」一定會有人這樣暴跳如雷。

明白人也會想：怎麼讓這塊料當審判長，這不是明擺著的嗎？人大常委會早已宣佈中國不搞「有罪推定」，你還沒有經過審判，就告訴人家有罪，即你還開庭幹什麼？沒開庭，你審判長一個人就給人家定了罪了，那這開庭不明擺著是作作樣子嗎？那判決，不就談不上什麼公正了嗎？

有人可能說：「這是明擺著的，大家心裏都明白，你說這些有什麼用。」不，有用。雖說大家心裏都明白，說出來與不說出來，大不一樣。說出來，就說明不合法的事，你執法者更不能幹，你幹了難免人家不揭露你。法律從來是一把雙刃劍，不是只管老百姓的。知書懂法的一代新人，不再任人擺佈！這種執法者公然違法的事，今天行得通，總有一天行不通。今天誰也不聲張，但它必將記錄在我國司法實踐史上，供人們研究、思考，以推動我國法制走向健全和合理的軌道。著眼於未來，這是我的基本行事準則。

有人說：「你這不是招恨嘛？」我不招他，他就不恨了嗎？他要吃你，刺激不刺激都是一個樣。他總想給別人下馬威，今天就讓他先嘗嘗！嘗得他，再看見你的雙眼，心就發

顫。再說，判多少年，上鋒早已給他定下來了，你不招他，也輕不了。你招了他，他也無權無膽給你加碼。這就叫依法抗爭！

開庭：打回他的下馬威

休庭十分鐘左右，又開庭。自然是駁回。我想從法理上，簡單地解釋我要求審判長回避的理由。丁某不容我說，我也就罷了，讓聽眾自己去回味吧。只要有幾個人邊聽邊想，我就心滿意足了。企圖思想一律是絕對辦不到的。

法庭調查一開始，丁鳳春就搬出了他的下馬威，他們很清楚，要定反革命罪，依我國法律，前提是要有反革命思想和目的。然而，他們查遍我的大量的原始證據，包括趁我不備竊錄的材料，也找不出這方面的證據。這個事實本應該讓他們清醒，不要迫害無辜，可是某種原因使他們不這樣作。相反，檢察員找了一段南京徐水良的話，經過纂編、移花接木地按在我頭上。可是這把戲太不牢靠，一旦有人拿證據戳穿了這一點，並證明徐水良的文章我連看都沒看過，豈不釜底抽薪，整個定案的基礎都癱塌了嗎？於是，丁鳳春又生一計，找來一個以前整個預審中從未露過面的「秘密武器」來了。

丁：「你主辦的刊物中，有反動的內容嗎？」

徐：「沒有，根本不可能有。」

丁：「這是你主辦的嗎？」他通過庭上物證出示員向我出示《學習通訊》第二期。

徐：「是我主辦的，這一期刊登的是王希哲的文章，是由王希哲出的。」

丁：「你看過嗎？」

徐：「我看過。如果在內容上有任何問題，我不會否認我有責任。」

丁：「這篇文章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血淋淋的專政，有這麼回事吧？」

徐：「沒有，不可能有，我從來沒有這個印象。請審判長把原文讀一讀。」

丁：「……」

徐：「好，請審判長再把這一段的前後二個自然段讀一讀。」

丁：「……」

徐：「問題已經很清楚，王希哲的文章是說有的同志錯誤地認為，地主、資產階級會經用『血淋淋』的辦法對付無產階級，那末，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也可以用『血淋淋』的辦法對付他們。這種認識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是不人道的，應該批評和制止。文章還說，何況多年來實踐證明，有許多所謂的『敵人』是虛幻的敵人。這正是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對『左』傾的有力批評。這難道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血淋淋的專政嗎？如果審判長用這樣的辦法定案的話，那我相信你的口中也一定出現過『無產階級專政』和『法西斯』這兩個字眼，我不加分析地，硬說你說的『法西斯』就是指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你豈不也成了反革命了嗎？『四人幫』已經倒臺快六年了，你怎麼還沿用他們那一

套，掐頭去尾，羅織罪名呢？！」

丁某一時不知所措，在「牽線人」示意下，立刻轉換了題目。

開庭：追究原始證據

二位陪審員，如果說一個是精明過人，另一個則迷糊不醒，都三十歲上下。後者叫張從良，是由他拿的我致許行先生信的底稿。這是給「促進會」定案的最重要的原始證據材料。

輪到我發言時，我指出剛剛唸的這封信不是全文，我原信中最重要的一段不見了，那一段正說明醞釀「促進會」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國共和平談判和祖國統一，並為達此目的，設想了許多建設性方案和意見。審判長立刻否認，肯定地說剛才唸的是全文。我當即要求查證，他有點慌，故意滿桌找了一下，示意這信的原件暫時找不到了。那位「左張」檢察員不知底蘊，居然不顧「檢、法分立」的原則，連忙跑到法官席上向審判長表示他那兒有一份（可能是複印件），可供查證。丁某連忙將他推回，並說：「暫時找不到那信，在庭上也不便查對，庭下再說。」我不同意，但畢竟權在他手中，執拗不過，我一再要他認可庭下一定提供原件給我查對，他允諾。

這是審判長公然違反有關的法律規定，即定案的證據必須當庭質證，認定後，方可作

爲定案依據的規定。

六月十二日，是記錄員時學琛來看看守所送判決書的，由另一名記錄員陪同，丁鳳春不知爲何沒露面。當我詢問，那封信的原件時，他表示早已爲我準備好。我拿過來一看，這是原信底稿的影印件，看第一遍，我就發現此件與庭上唸的一模一樣，被人有意識地摘去了其中極重要的四頁，他利用文章中段落標碼的混同，讓粗心的讀者不易發現。我立即讓書記員時學琛看，他又給另一位記錄員看，時大吃一驚，認可是少了四頁。但他表示，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又讓我看法庭記錄，並讓我簽字。我一看這記錄遺漏太多，至少漏了一半以上，又不準確，有許多重要的對答是故意刪掉的，我指出這一點之後，表示不能在這樣的法庭記錄上簽名。我問不是有錄音嗎？他解釋說不准許用錄音轉爲筆錄。他要求我另紙寫明不簽名的原因，他回去好有所交代，我滿足了他的要求。他筆錄了我口述的理由，我在這份材料上簽了名。

通過窮追這封信的原件，果然使審判長等人露出了，爲加罪於我，他們不惜隱匿證據的馬腳。我國法律規定，故意隱匿證據，不論何方都是違法行爲。這嚴重的執法者知法故意犯法的事實，是我本無罪的又一個有力的證明，又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的鐵證。任何人妄想抵賴，決不會有好下場！

開庭：簡單的結論和否定

自我辯護和陳述時，我對所謂的組織反革命集團罪的問題作了如下概括。

根據法庭調查和我的自我辯護，大家已經知道，我在一九八零年六月提議進行的「甘家口討論」是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處於轉折、眾說紛紜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幾個人就社會主義發展前途而進行的探討。並且，當時就自行否決了我的某種設想。至於一九八零年底，我提議醞釀的「促進會」一事，被檢察員提出來起訴，我感到十分吃驚，如果這種指控發生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以前，還情有可原。大家知道一九八一年十月，葉委員長已經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九條方針，明確提出歡迎每一個中國人，歡迎各政黨、各民主團體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對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獻。我作爲一個中國公民，提議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怎麼竟成了組織反革命集團？檢察員的這一指控豈不是把葉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置於失信於天下的地位嗎？這是公然和九條方針唱反調。我真是佩服檢察員的「勇敢」和「膽識」！

根據我國刑法，只有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反革命行爲，才能定爲反革命罪。然而，我既無反革命目的，又無反革命行爲，憑什麼指控我犯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罪？

如果我們單以我國文字的內涵來衡量這種指控也是荒謬的。祖國的文字既豐富，又極嚴格。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漢語辭典》說得很清楚。什麼叫「組織」，就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請注意這是指「建立起來的集體」。什麼叫「集團」，就是「爲了一定的目的組織起來的共同行動的團體」。請注意這是指「組織起來共同行動」。

可是，「討論」和「醞釀」的內涵則不同。「討論」就是指「就某一問題交換意見或進行辯論」。「醞釀」就是指「釀酒的發酵過程，比喻做準備工作」。只有搞清楚基本概念，才能正確判斷，這是常識。單從行為上說，我當時行為只是「討論」和「醞釀」，和「組織」什麼「集團」根本沾不上邊，何況更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了。這叫「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這不是文字遊戲，這是學習和尊重祖國文字的準確含義。不論從那個角度上說，我都不可能犯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那位機警的陪審員薛家禮瞪著一雙大眼睛緊緊地看著我說，轉了一圈，又轉一圈，不知在想什麼？或是什麼也沒想。

至於，反革命煽動罪的指控更是不值一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部門、或一個司法機構把它的某些規定和具體判決，和它的立法機關和經過立法機關頒佈的法律、法令等同起來。更何況，我只是對某些部門的違法行為和不公平的判決提出批評意見，這和刑法規定的反革命煽動罪是指「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實施」的含義，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一個行政機關和司法機構的具體行為和司法判決，不允許別人評論和批評，豈不是太霸道了嗎？難道一個有低度民主的國家都允許的事情，我們作為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國家，難道反而不允許嗎？

起訴書竟然說我在香港發表的那幾篇文章，是反華反共的反動文章。更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我若反華，何為中華民族的瑰寶——白石老人爭一席之地？我若反共，何為周

恩來、沙千里等中國共產黨人高聲叫好？我若反華，何爲中國的改革大業出謀獻策？我若反共，何爲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途深思遠慮？親愛的先生們，實事求是是一點吧，睜開眼睛，憑良心說話吧！

開庭：滿頭大汗的檢察員

當我從種種跡象中，覺察我第一次準備的自我辯護詞已有可能被人複印之後，我就只好將它廢棄，改變部分內容，特別打亂了原結構和順序，重新在粗糙的手紙上起草了新的辯護詞，然後日夜放在口袋裏，包括不讓同監的那位注意到。事後，我是完全告訴他的。這樣一來，大大地影響了自我辯護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的辯護的力量，法庭上只好憑當時的激情和自信，總算使整個法庭的自我辯護和辯論基本成功。

有弊也往往有利，由於這樣一變，也給檢察員帶來了他意想不到的困難。雖然，他們也知道我對辯護詞可能被複印一事有所覺察，但又估計我已來不及更改。法庭上的檢察員席上，放著一摞準備辯論時用的底稿，約三十多份。可是，等我作完第一次自我辯護發言之後，開始法庭辯論，檢察員按他的臨時記錄，準備逐條反駁我的時候，可就亂了陣。因爲他不可能順利地按現在的順序，找到原來的預備稿，原預備稿是按駁我原辯護詞的順序擺放的。越找不到，就弄得越亂，越亂越找不到。心裏一急，就更亂。心急火燎，頭上就

冒開汗了，一直冒得他汗水淋漓！這就是「蔣幹盜書」的下場！

等我發言時，我不無諷刺地向聽眾指出：檢察員似乎全知道我的辯護內容，逐條作了準備，臨到現場又找不到，亂成一團，這是為什麼？檢察員頓時尷尬，既不否認，又不接這個茬。

開庭：平心靜氣的律師

劉律師是在檢察員第一次發言，我的自我辯護之後講話的。開始，她略顯得有些激動，片刻就極鎮靜地闡述了她的三點辯護意見。她說，她接受了被告人的委託，出庭任被告的辯護律師，現發表三點辯護意見，供法庭考慮。

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主辦的《學習通訊》「誣衊我國社會主義是『特權官僚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叫囂中國『必然導致第二次革命』，鼓吹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等反動內容的文章。」據我們查閱案卷，《學習通訊》第五期上刊登的一些話，是南京徐水良寫的，現在並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在這篇文章發表的事前、事後看過這篇文章。被告人也一再說明他從沒有看過這一篇文章。現在要被告人為這篇文章負法律責任，我們認為不妥當，請法庭考慮。

在律師發言之前，我也指出起訴書引用的這段話，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寫過，連

想都沒想過。而且，這段引文不包括導語和標點共五十五個字，三句話，其中只有二十九個字來自據說的原文，其他的二十六個字都是檢察員後來加上的，特別是那些有關關鍵意義的指向名詞，如「我國社會主義」、「中國」等等。另外，從行文上，也處處看見掐頭去尾的痕跡。

二、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寫了有關劉青被判勞改的資訊，郵往外地。我們調查，被告人是從劉青母親那裏聽到這個消息的，被告人在沒有進一步核實的情況下，把「勞教三年」說成「勞改三年」，並傳播給了別人，這和有意捏造是有區別的，這個事實請法庭考慮。

關於這個消息，我在自我辯護時說到，這消息我是從劉青母親那裏聽到的，劉母是有關部門口頭通知她的，通知人沒有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將勞教通知書交給親屬一份，才形成誤傳。誤傳，若論責任，首先在司法部門的通知人身上，而不在我們。預審和法庭都責問我為什麼沒有核實，就傳播給別人，並給司法部門的聲譽造成損失等等。我答覆他們，我一個普通公民到哪里去查證這類消息呢？就是去了，人家接待嗎？人家肯證實嗎？我只要舉一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求。當劉青被拘留時，有關部門違反法律規定，一直不通知家屬，他母親由於不知道兒子的下落，到公安局接待室查詢。接待人員不但一口否認他們抓過劉青，並且以不知道為由將劉母粗暴地推出接待室。直到一位中年人看不下去，當場證實，他曾親眼看見一個叫劉青的到過接待室，並被抓去。這時候，接待人員才不得不答應查查。這樣的接待機構，有可能回答我提出的查詢嗎？（我就

差點沒說出我們有些部門已經變成了「門難進，臉難看」的衙門！」

三、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煽動十幾個省、市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成立「營救劉青全國委員會」等等。據我們查閱案卷發現，被告人並沒有參加「營救劉青全國委員會」，甚至公開拒絕參加。這個事實，也請法庭考慮。

劉律師的後二點辯護意見，均被北京中級法院在判決時聽取和採納。至於第一點，判決書仍按原起訴，把它作為我有反革命目的和理論的證據，轉載入判決書。

開庭：恢復了尊嚴

整個開庭中，始終處於十分被動地位的審判長，只是到了當天下午五點左右，最後宣判時來了點精神。可是好景不長。他宣讀早已擬好的判決詞，我卻絲毫沒聽進去，也不想聽。我雙眼一直盯著丁鳳春，越看他，他越毛，直到後來聲音更是走調，因為他本來就是裝的京腔，以致最後到了氣急敗壞的地步，當他聲嘶力竭地喊出：「把反革命分子徐文立帶下去」時，我提前轉身，讓他們鏑上，微微抬起頭，略有笑意，目不斜視，平緩地向外走去。把一片沈寂留給那位可能即刻就要從審判長寶座跌下去的丁鳳春，心裏想著：我，恢復了尊嚴！

第二天，一位自稱是看守所的負責人，便來瞭解我想法，談了談，他記了記就走了。

例行公事的二審

二審完全是例行公事。這我早已料到，只是想再爭取一次公開抗爭的機會，但他們設法不給我。北京高級法院第一次與我談話是六月三十日。第一次就不愉快。我當時完全無意另請律師，只想順便打聽一下馬榮傑是不是真的不在國內。我就問後來的高法審判長：「馬榮傑律師，您認識？」他表示認識。我又問：「他從國外回來沒有？」他答沒回來。我說：「聽說他回來了（我已聽說）。」他立即追問誰說的。而且堅持要問，並追問不舍。我一想，馬律師是否可能半年時間都在國外沒回來且不說，他的態度反讓我窺出他也是個串通一氣的人物。我便不客氣地答覆他：「我沒有義務告訴你，你也沒有權利追問我。」

七月二十八日一早，就用小車將我載到法院，下午才開庭。法官席前放著一摞足有二尺高的案卷，似乎想告訴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駁回你的上訴。席後一溜排著四位，審判長、陪審員這三位一律不再是嘴上沒毛的了，均五十開外，神情都很木，馬上使我想到布店櫃檯前的夥計，其中只有一人，像是還動點腦筋的夥計。書記員是位顧影自憐的小姐。八月四日，我看記錄時，指出多處明顯的選詞不當，造成內容錯誤時，她甚至有點想發火，大聲說：「我是按錄音整理的。」我平靜地告訴她，可能是我有點南方人口音的緣故，按這個詞音反倒對了，但按這個詞義就不通了，可能還是選詞有誤。她以頗不為然的神氣看看我。

一開庭，我便問審判長：「依照我國法律，公開審判是允許旁聽的，為何旁聽席上沒有一人？」此審除還有檢察員、記錄、律師，只有一人職守答錄機，一個法警。審判長胸有成竹地答道：「開庭前，我們已經貼出布告，但沒有人來旁聽，我們也要按時開庭的啊？」好一付油腔滑調！我當時又不可能去看看是否已貼公告，又沒有證據戳穿他，只好作罷。一笑了之，點到為止吧，讓它記錄在案。

審判長先讓檢察員發言。檢察員是一位棱角磨禿了的中年知識分子，與我談了一次。他勸我認罪，我回絕了，他表示那就不可能在二審發表不同與一審的意見了。他照本宣科，口氣平緩得有點無力。檢察員發完言，按法庭的法定程式該由我發言，審判長卻先讓律師發言。律師重申了她上次辯護意見的第一點，這次更加明確地補充指出：徐水良的原文並非就中國情況，而是就蘇聯情況發的議論。這就更有力度地駁倒了一審檢察員的無理指控。

在法庭調查時，我又提供了一個有力證據，即我對資料的保存是十分周到細緻的，從我交出的全部材料中可以看到，唯獨沒有《學習通訊》第五期。如果我事前、事後看到此文，在我所保存的材料中是不會沒有的。經律師和我一再論證，高法裁定中，刪除了原判決書中這最重要，也是最要害的一條指控。

八四年七月二日，第一次通知駁回我數年的申訴的時候，來人再次確認了這一刪除。但又詭辯說，那也不能證明我不是反革命。那好，我請他們從我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竊

聽錄音中，舉出一件足以證明我有反革命目的的證據材料來。不然，刪除原判決的那段話的後果，自然是，既然再也舉不出證據證明徐文立有反革命目的，為什麼還非要維持原來的錯誤判決呢？

律師發言之後，我開始了詳盡的自我辯護，審判長幾次想打斷，我未讓他的企圖得逞，堅持講完，我一定要在法庭上留下一個他們也不敢隨便銷毀的完整的辯護詞，供後人去復查或研究。

在有關「促進會」問題上，鑒於判決書比起訴書更惡毒，更胡編亂造，甚至誣衊我要以「促進會」組織什麼「臨時政府」。這一次，這方面闡述得更詳細，並特別指出他們這樣作的惡果。這個問題越來越明朗，越來越可以看出他們這樣判決對和平統一的危害。

近幾年，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中共中央領導人一再希望，蔣經國和他的同僚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誠意，請他們放心「誰也吃不掉誰」。這些真誠的宣言，無論是對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對一般臺灣民眾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如果仍然允許一些人，把我這樣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是在個別政治問題上發表過不同意見的人，判以重刑，關押在獄，那麼，蔣經國和他的同僚們是不可能不產生疑懼的。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計，中法和高法還是儘早收回自己的錯誤判決吧！

而且，現在黨中央每推行一項正確的政策的時候，總要三番五次地向國內外人士一再保證，這個政策不會變，我們是守信用的，以致還有人疑惑不信，我國這樣一個歷來以忠

信爲立國之本的古老國家，爲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爲祖國的和平、開放、四化大計，中法和高法還是儘早收回錯誤判決吧！

在二審時，我發言後，檢察員出人意外地，不準備發表任何反駁意見。一場例行公事的審判就這樣結束了。在整個審判期間，我們原來住在二衛的人，全臨時搬到三樓七衛，二審後又搬一衛。已決犯和一些老政治犯一般可定期看電視或電影，我雖已決，仍然不能。這時，我就積極要求他們執行判決，經要求給家寫了信，實際並未發，執行卻付諸了。

入監

我是八二年九月十日單人用小車送一監的，與看守所一牆之隔。一監，不愧當年被毛澤東、朱德稱爲模範監獄，除了沒必要地扣了我和妻的十八封來往信件之外，各方面是嚴格按黨的政策對待我的。

我住的這個樓是「龜」形樓。開始住一樓一衛，八四年三月搬到二樓六衛四號，一直是住向北的房。我始終獨居，倒也每天能和雜務（由刑事犯主任，負責服務和監視）說幾句「天氣哈哈」之類的話，因此不至於喪失說話能力。這屋六平方米，有二扇窗，採光面積一平米五左右，冬天有暖氣，衝道內生一爐火可煮、熱點東西，根據氣候一般提前或

推遲幾天供暖。單鋪，床頭我陳有妻女的小照。一小衣櫃，可放碗、杯、瓶、食物和洗換衣。一日兩瓶開水和飯均由雜務送來，走廊有保暖桶，終日有熱水可用。大小便上廁所，夏季在樓上時終日開著門。床下有二個紙箱盛衣物。牆角我用二紙箱和花布搭一書架，放書和妻女彩照的鏡框。八四年三月發了一套新學生桌、椅，窗外本有一病柳，秋天伐了。

伙食，我吃雜務灶，在現有標準下辦得相當出色，每周改善三次，如肉包子、川丸子、燉肉等，燉肉少有三兩，多有半斤。近來冬季休息日餃子多是富強粉，我自包單煮自吃。節假日的改善有一般飯館的水平。細糧占百分之四十，我早上喝玉米粥很習慣，每天一頓細糧略有剩，窩窩頭我吃得不多。家中送食品，時許，時不許。這裏不時可買到一些水果、糖、花生等食品。送書和雜誌，也時許、時不許，均受政治氣候影響。

八三年開始幹一點輕微勞動，往塑膠涼鞋上戴花飾扣，除休息日，也不是天天有活。每次少則百餘雙，多則幾百雙；少則幾十分鐘，多則一個多小時能完成。八四年下半年開始付獎金，我已得二十七元九角三分。

每天一份《人民日報》，曾看了一段《北京日報》。八四年開始借給一些小說看，有些古典和近、現代中外名著。每周能看幾次或一次電視，有時長時間不看，每周一次較有把握。電影一般每月一、二次，不規律，冬天極少看。片子多是新的，中、外、港片均有。放風也不規律，有時每天，有時半個月沒有一次，一般二、三天一次。每周一般到小澡堂洗一次澡，擦身、洗衣服隨時可以。整個環境安靜，偶然聽見嘈雜聲。清潔衛生，走廊擦

得雪亮。我的室內始終保持整潔的習慣。

問題的實質

依照我國的刑法規定，有推翻和打倒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爲目的和行爲的，才可定爲反革命罪。司法實踐上，實際上是以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和行爲，定爲反革命罪。

那末，讓我們首先搞清楚什麼是黨的領導，什麼是社會主義吧。在現階段，黨的領導，說的直截了當一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擁護它就是擁護中爲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它就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呢？現在並無定論。我看以下四個方面可以概括：

一、人民民主專政；二、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又不是切生產資料都爲整個社會佔有；三、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四、實行按勞分配，當然要科學評價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價值，不可偏倚。

如果按照以上這些人們可能大都可以接受的標準，來衡量我的思想、輿論和行爲，我就不但不可能是一個犯有反革命罪的人；相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爲維護和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作出貢獻的人。儘管我仍存在許多弱點、缺點、錯誤，但我是一個愛國、進

步的人。

既然這就是我的實質，這才是我的本來面目。那為什麼又有一些人和一些部門要千方百計地定我為反革命分子呢？

問題已經很清楚，那是因為我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卻在不適當的時機、不適當的場合，以適當的文章和言論開罪了一些有權力的個人和部門，儘管這並非我的本意，也並非我清楚知道開罪了誰，開罪了哪個部門。

這就是我的問題的實質和要害。

對歷史的回顧

一六零零年，布魯諾被教廷焚死時，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一、國家無命令人民作如何思想的權力；

二、社會不得以武力懲罰那些不贊成公認教條的人。」

臨刑前，他向全世界喊道：「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來的世界會瞭解我，知道我的價值。」

現在，人類社會理解和接受了布魯諾的思想。

羅馬教廷近四百年後，為伽里略平了反，製造了人類平反史上的新記錄。宗教改革的

結果已被人們接受。嚴格地說，布魯諾、伽里略並不反對宗教。宗教也是人類對宇宙的一種解釋。在政教分立的情況下，它也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或穩定起過某種積極的作用。它經久不衰，綿延至今，不能不承認它所包含的某些哲理對人類是有益的。但宗教畢竟不是科學。這也是布魯諾、伽裏略的思想與宗教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它是科學。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一切科學的命運一樣，都不會是一帆風順、毫無曲折的。它到了它的繼承人那裏，也一定會有不同流派。

斯大林不能說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不能說他沒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正是他開創了運用權力壓制、迫害持不同意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思想犯的極惡劣的先例。受害者的數量，至今恐怕都很難確切地統計出來。人們現在已經知道，在十五到十六世紀，「異端」分子慘遭殺害，是數十萬之多。

對於不同政見者，毛澤東有時非常開明，有時又非常粗暴，甚至曾不惜以幾十萬知識分子的不說話（戴上帽子），來造成全體國民的不敢講話（怕戴帽子）。

這些影響是久遠的。

南斯拉夫作為一個國家，首先當了「異教徒」而受到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八十一個共產黨、工人黨的集體譴責。今天，共產主義運動「唯一中心論」已被擯棄，「多中心論」成為現實。

歐洲共產主義理論的「二大發明」：「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兩黨制

和多黨制」，已經不再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它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取得的進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國建國之後，也經歷了曲折的道路。許多自然科學家受到埋沒和壓抑，社會活動家和社會科學家的命運更是多舛。震驚中外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潘漢年反革命特務集團案，已平反昭雪。幾十萬五七年的「右派」摘帽、平反、昭雪。彭德懷元帥恢復了名譽。馬寅初老先生的人口學說、孫治方的經濟理論得到了確認。民間慘死的張志新、遇羅克及上海那位不知名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的勇士，也得到了公正的評價。

比起這些大人物、知名人士，我這個才疏學淺、孤陋寡聞的小「反革命分子」，我相信，我的命運可能會比他們好一點，時間不用那麼久？或許成為這個行列的最末一代？

對未來的展望

特別自去年底進一步明確反左而不是反右，進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欣喜地注意到了《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九日八版發表的祖佳攝的「暖冬」。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開放之勢不可阻擋！甚至一些敏感的禁區都在受著強烈的衝擊。譬如競爭的原則。在中國競爭的法則，首先在體育的領域裏得到公認。這

道理很簡單：一個人的運動，算不上競賽。一個人的「競賽」，成績不易提高。有對手的競爭，大家都提高得快。當然，規則、裁判不可缺。近年來，競爭的原則在經濟領域裏開始得到了確認，已經成爲我國經濟加速發展的催化劑。當然，法則、監察不可缺。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未來中國的社會，會不會出現一個各種政治力量和平共處、競爭發展的局面，我仍然沒有把握作這樣的預言。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用不著多長時間，在政治領域裏，談論競爭這個原則，談論國事決策反饋，可能不至於再當成反革命分子來打擊。對於未來，誰都有許多未知數，甚至那二位「常務」預審員也承認：也許將來你是對的，但是今天認爲你不對，就要整。

我看還是我國著名的現代戲劇家沙葉新，在《無標題對話》中說得有遠見：「以現在的認識水平尚不能認識的事物，都不要輕易否定。」

至於我個人的命運嘛，我想至多在監獄中坐到一九八九年，也可能較早解決問題，而得到釋放。記得在報紙上看到過，胡耀邦曾對一些辦案子的人說，辦案要以能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爲標準。又說，任何時候發現錯案，不論它是什麼時候定的，也不管是誰批示的，一旦發現，就堅決糾正。胡績偉今年十月一日一首詞中又說：「絕燃箕內耗，意誠胸袒。」這些都在不斷地增強著我對自己問題能得到公正解決的信心。我希望著，我期待著。

結束語

要寫回憶錄，尚嫌早。但現在寫一份自傳體的申辯，也許是必要的。在這個環境中，手頭又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閱，只憑記憶。雖是自己經歷的事情，細節上的出入想必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內容則完全是真實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

於北京市監獄龜形樓六衛四號

附件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2) 中刑字第138號

公訴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張起生。

被告人：徐文立。別名徐溫立。筆名徐庶、南客、客卿。男，三十八歲，安徽省安慶市人。原系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建築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門火車站鐵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劉述芬。

被告人徐文立反革命一案，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公訴來院，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張起生出庭支持公訴，依法公開審理了本案。現查明：

一、被告人徐文立爲了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策劃成立反革命集團，爲首糾集廣州、青島、安陽等地的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均另行處理）等，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連續三個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館秘密聚會。被告人徐文立在會上，誣譏我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黨專政」，圖謀以「突發的形式」「發起全國性的行動」，成立反革命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打破一黨專制」。王希哲等人認爲「條件還不十分具備」，應先「做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因此，被告人徐文立等決定出版《學習通訊》，由被告人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徐水良、付申奇、劉二安等在北京、廣州、青島、南京、上海、安陽等地分頭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在北京充當總「調度」，並負責審稿以及封面、插圖的審定。同時，策劃了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和方法，用以製造輿論，誘惑攏絡同黨。一九八零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共出版了六期《學習通訊》，每期數百份，散發至全國十八個省市，公然誣譏我國社會主義是「特權官僚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叫囂「必然導致第二次革命」等等，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爲了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被告人徐文立又打著「民主建國、和平統一」的招牌，於一九八零年冬至一九八一年春，先後分別勾結劉二安、孫維邦等人，秘密策劃成立反革命

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被告人徐文立為該反革命組織撰寫了《綱領》，還決定派人去香港等地與「反華反共分子」進行勾結，並親自給香港「反華反共分子」寫信，策劃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策略和行動計劃，陰謀將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港，下設「大陸、臺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其他地區設分支機構」，將香港做為勾結「反華反共分子」的「橋樑」，「選擇適當時機，在香港或海外，絕對秘密地召開代表會議」，宣告「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成立，妄圖把該反革命組織搞成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政治實體」，以所謂「實力」使共產黨被逼讓步，「組織臨時政府」，「舉行大選」，「組成新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二、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以後，被告人徐文立於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在「西單牆」散發傳單，誣衊《通告》是「使用暴力鎮壓」，「扼殺民主」，煽動群眾抗拒政府法令的實施。被告人徐文立還搞所謂「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張貼散發傳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決和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確處理。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辦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為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衊提供藉口。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被告人徐文立又向持有共同反動觀點的人，搜羅材料、組織反動文章，在香港「反華反共分子」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中造謠誹謗，誣衊我國是「扼殺『個性』」的封建社會主義」。公然叫囂要改造中國的社會制

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上述罪行，有證人證言，同案犯供述、技術鑒定及起獲的書證在案佐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徐文立爲首勾結他人，陰謀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造謠誣衊，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妄圖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組織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情節嚴重，應從重懲處。爲鞏固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懲處危害國家安全 and 社會治安的反革命分子，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六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徐文立犯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二、查獲之證物，予以沒收（清單附後）。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 丁鳳春

人民陪審員

薛家禮

人民陪審員

張從良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書記員 時學琛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終審裁定書

(82) 高刑終字第126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徐文立，別名徐溫立。筆名徐庶、南客、客卿。男，三十九歲，安徽省安慶市人。原系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建築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門火車站鐵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劉述芬。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以(82) 中刑字第138號刑事判決書認定徐文立犯組織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徐文立不服原判，以原判認定的事實不符，自己的行為未構成犯罪等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俞新根出庭執行職務，公開審理了本案。先查明：

一、上訴人徐文立爲了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策劃成立反革

命集團，為首糾集廣州、青島、安陽等地的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均另行處理）等，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連續三個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館秘密聚會。徐文立在上會誣譏我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黨專政」，圖謀以「突發的形式」「發起全國性的行動」，成立反革命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打破一黨專制」。王希哲等人認為「條件還不十分具備」，應先「做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因此，決定出版《學習通訊》，由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徐水良、付申奇、劉二安等在北京、廣州、青島、南京、上海、安陽等地分頭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充當總「調度」，並負責審稿以及封面、插圖的審定。同時，策劃了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和方法，用以製造輿論，誘惑攏絡、網羅同黨。一九八零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共出版了六期《學習通訊》，每期數百份，散發至全國十八個省市，散佈反動言論，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徐文立等人為了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打著「民主建國，和平統一」的招牌，於一九八零年冬至一九八一年春，先後分別勾結劉二安、孫維邦等人，秘密策劃成立「反革命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徐文立為該反革命組織撰寫了《綱領》，還決定派人去香港等地與反華反共分子進行勾結，並親自給香港反華反共分子寫信，策劃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策略和行動計劃，陰謀將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港，把香港作為勾結反華反共分子的「橋樑」，下設「大陸、臺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其他地區設分支機構」「選擇適當時機，在香港或海外，絕對秘密地召開代表會議」，宣告「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

成立，妄圖把該「反革命組織搞成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政治實體」，以所謂實力「使共產黨被迫讓步」，「組織臨時政府」，「舉行大選」，「組成新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以後，徐文立於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在「西單牆」散發傳單，誣衊《通告》是「使用暴力鎮壓」，「扼殺民主」，煽動群眾抗拒政府法令的實施，還搞所謂「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張貼、散發傳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決和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確處理，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辦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為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衊提供藉口。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被告人徐文立又向持有共同反動觀點的人，搜羅材料，組織反動文章，在香港反華反共分子主辦的刊物上發表，誣衊我國是「扼殺『個性』的封建社會主義」。公然叫囂要改造中國的社會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本院認為，上訴人徐文立為首勾結他人，陰謀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造謠誣衊，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妄圖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應從重懲處。原判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充分，定罪量刑適當，審判程式合法，應予維持。徐文立矢口否認其反革命目的和犯罪事實，提不出任何證據，顯系狡辯，應予駁回。

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不准上訴。

審判長 董成鈺

審判員 劉真

代理審判員 張文學

一九八二年 月 日

書記員 劉曉玲

沒收物品清單

油印機

一台

鋼板

四塊

圖章

三枚

複寫紙

一盒

蠟紙

二卷

手稿

一捆

刊物

雜誌〈港刊〉

一捆

《中報》

八本

《爭鳴》

五本

《北斗》

二九本

《廣角》

四本

《觀察家》

五本

《觀察家》合訂本

二十本

《明報》

三本

《鏡報》

七本

《七十年代》

四本

《天安門事件紀念周集》

十八本

《中國人》

一本

《南北報》

十四本

《展望》

十二本

《動向》

十二本

《海濤雜誌》

十六本

二本

王希哲發言

《新社會》

《左翼評論》

《大陸地下刊物彙編》

《香港與中國之間》

《鬥爭十八年》

《黃河》

《東西方》

《春秋》

《時代周刊》

《理工》

《學習通訊》

《怎麼辦》

《播種》

《當代》

筆記本

錄音磁帶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三本

二本

六本

四本

一本

一本

一份

一本

五本

十九本

二十一盤

第二部分

獄中詩鈔

獻給

我的妻子、情人、朋友——彤
我的女兒、朋友——瑾

獄中思情

每思妻兒孤相對，難忍心窩痛如絞。
雙雙凝眸向吾笑，歸日不從夢中瞧。

八二年一月二日深夜于K字樓二衛十二號

喜夢吾兒

吾兒荷傘漫走行，呼兒兒喜淚淋淋，
父女偎依臂交頸，頓覺心兒甜如蜜。
小瑾急呼找媽媽，驚動我心突然醒，
雙眼緊掃禿牆壁，可憐竟是夢中情。

昨夜第一次夢見吾兒荷傘漫步街頭，忽又呼其母，此狀不亦悲乎！

八二年六月十日晨作

哺髮織衣

昔有美女送寒衣，悲倒長城千古奇；

吾妻哺髮萬針織，感動玉帝山河移。

冬送暖 夏送涼

冬送暖，夏送涼，四季不缺情意長；
情意長，熱衷腸，子立雪地不覺寒；
不覺寒，偶爾煩，春夏秋冬天天盼；
天天盼，銀河旁，吾家同立喜鵲上；
喜鵲上，同聲唱，永遠團聚魚米鄉；
魚米鄉，在何方，天下大同萬世昌。

讀黃鵠詞

一日三讀黃鵠詞，遠勝嘉肴充肌腹，

八二年十月二日吾與彤結婚十一周年
于一監龜形樓一衞九號，後改七號。

吾妻送來花被一床，因之記此詩。

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航宇不須神女媧，蒼天有隙亦可跼。

徐注：肌非饑也

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勵兒行

喜見吾九歲愛女隨友人同遊密雲水庫孤身駕舟返岸圖因成四句以壯其志。

弱女棹孤舟，神牛待駕酬，*

驚聞壯士語，**瑾姑不悲秋。***

徐注：*照片中有一巨牛呈待駕姿，頗是添趣。***吾女曰：我才不怕哩！我自己划回去。***秋瑾臨刑詩：秋風秋雨愁煞人！

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題母女相倚圖

嬌因倚母懷，囚父得歡快，
賢妻從容立，愁雲不復來。

題八二年所攝妻女相倚圖

八三年一月十四日

夜雨

夜雨打簾頭，
久旱地浸透。
開窗迎不進，
珠碎濺窗口。

八三年三月十五日夜于垂簾居

獻給彤

四月十九日彤來信題贈裴多菲名詩一首，感慨系之因成此數句。
有人羨慕我，

不是因爲我的才華，

不是因爲我的容貌，

更不是因爲我有金錢，

權勢和地位，

只是因爲，因爲，

我有了——妳。

八三年五月十九日

捧著希望

多麼美好的圖案，

她，捧著希望。

她，是天使；

她是神女；

不！

她，她是我的瑾兒。

去年夏天，朝思暮想吾妻女不得謀面。忽見報載兒童藝術劇院演出話劇「十二個月」招貼畫，圖有一小女凝目合手，捧著一朵仙花，如見吾兒，遂珍存此招貼畫。今日暇思之際，成此小詩。

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彤和晶兒給我以愛

在這個世界上，

我最缺少的東西，

在你們倆那兒得到，

我心滿意足，死而無憾。

可是我現在不想死，

活著多麼有意思，

因為世上有你們的存在。

我面對著太陽

現在這一刻，

我和太陽，保持著最近的距離。

我仰望著它，它俯視著我。

起初，幾縷枝葉，遮擋著。

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移動了位置，尋找最佳的方位。

我面對著太陽，

我和它保持了最近的距離。

不再隔著厚牆，不再通過鐵柵。

我正面對著太陽，

貪婪地吮吸著，它的光芒。

它緩緩地沈著地升起，

早已越過高牆，

正在五線譜上，

蠕動，上升，

緩緩，沈著，

終於突破五線譜，繼續上升……

我正面對著太陽，

可是，我已該「返航」。

八三年六月二日晨十分鐘內寫于垂簾居

如果……

如果妳多了一道紋路，

那是因為妳思念我而留下。

如果妳多了一根白髮，

那是因為妳為我操心而添加。

這紋路，是愛之路；

這白髮，會發銀之光。

摀住這落下的夕陽

傍晚，才走出樓，

夕陽，落在大牆上。

伸出手，能多曬一會兒太陽。

這手，是想，

緊緊地、緊緊地，

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摳住這落下的夕陽。

八三年七月五日

念奴嬌——四十感賦

驕陽似火，普度著萬世眾生。

三十億年，凝聚就，智慧人腦無窮。

華夏印地，希臘尼羅，高奏古雄曲。

紛紛揚揚，鑄成千古好戲。

笑憶聖母當年，喚來傾盆雨，創生立世。

初試學步，彈指間，光陰四十瞬逝。

奇境神馳，「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東西文明，一朝終究合流。

八三年七月十七日

歸時思方休

竊白居易詞《長相思》成此四句。

點點吳山愁，流水長悠悠，
月明人倚樓，歸時思方休。

八三年八月十一日夜

夢

簾影渺北窗，晨霧落南冠。
不堪汝亮節，夜夢吾歸鄉。

八三年九月三日晨

一個忘卻的靈感

靈感，一個奇妙的靈感，
竟催我在它的奇妙中昏睡。
睡前我曾暗暗地叮嚀自己，

不要忘了它，一定抓住它，
夢中也這樣想，醒來還這樣想。

可是，這該死的昏睡，

這該死的腦袋，

卻把這靈感，這奇妙的靈感，

忘得一乾二淨，無影無蹤……

八三年十月十日晨

絕句

四十落南冠，抱卷度寒窗。

不泯愛國志，終可謝春光。

八三年十月十五日晚

這裏

終日燈光伴我，

不然就是，

垂簾漏過的春光。

這裏，沒有黑夜，沒有黑夜……

無題

燈照頂壁成焦影，終是白晝能安眠，
心中坦蕩無鬼事，清明恬靜夜深沈。

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據說……

據說，

每個人體內都有一座

控制自然生命的「生物鐘」。

能不能撥慢若干年，

至少五年也好，

饒我和彤 同齡。

八三年十二月四日

據說，

現代醫學可以將

暫不能醫治的軀體 冷凍，

以待救星來臨再起死回生。

不知道

能不能將現在的我冷凍若干年，

至少五年也好，

賜我和彤 同壽。

重新開始我的真正生活

生活對於我來說，

還是一座迷宮。

我要重新開始，

真正的生活。

這一天就在

八三年十二月八日晨

我回到彤和孩兒身邊那一天，
開始。

八四年一月六日

我和妳的命運

我和妳的命運，
竟這樣驚人的一致。
最需父愛的幼年，
父親離去。
夫妻最相恩愛的中年，
只能兩地心相印。
轉機啊，何時才能來臨？

八四年一月十一日

最冷的時刻

在冬天，我發現，

一天之內最冷的時刻，

一是太陽即將升起之前，

二是太陽落山時分。

莫非，太陽升起之前，

需要吮吸足夠的熱量？

莫非，太陽落山之時，

帶走了塵世間過多的能量？

八四年一月十五日

錢臉鬼六戒

正月得家信見一枚「鬼臉錢」紀念郵票，兄囑寄回，隨興題此六戒於郵票背面。

鬼臉錢，錢臉鬼，

臉鬼錢，錢鬼臉，

鬼錢臉，臉錢鬼。

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哭悼傲伯

玉門總工熬伯伯，戈壁立帳走駱駝，
喚油架井舞荒漠，春風渡關不蹉跎。
二十年前一席語，銘骨溫心蕩耳膜，
痛聞您竟仙逝去，忍拋知己我的哥。

八四年三月九日

只能見到白光

我這凡胎肉眼，
只能看到太陽發出的白光。
有人告訴我，不是的，
太陽光是不同波長的光的組合。
不，我不信，

我只能見到太陽發出白光……

有人告訴，

你可以用一個多稜鏡，便可見到，

赤、橙、黃、綠、青、藍、紫。

不，我還是不信，

「那是多稜鏡的妖術，不是太陽的本色！」

我只能見到，

太陽——發出白光，

……

紅樓夢題

寶釵獨風流，墨玉沈香久，

孤船落魄魄，萬帆競上游。

甲子年清明日題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集》之扉頁上

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生態平衡

日日觀窗外病柳

擗幹斷枝，

慮囚人攀求，

旱天已久，

蟲鬧不休，

倘無「四害」之酋，

斷無片葉存留。

除「四害」

笑憶三十年前，江山不裝點，

誓與麻雀作戰。

天兵天將，滿布城鄉。

搖小旗，響大鑼，

八四年六月八日

夜行軍，掏老窩，

好不熱鬧。

……

小雀漫天飛舞，苟存繁衍，

今又捉蟲護柳。

倘若當年斬盡殺絕，

千秋功過誰人追求？

八四年六月八日

獄中周末

每逢周末盼熒影，十有九空長歎喟。

不爲人嫁衣衫，何至彩電不得看。

八一年彩電購到家中，僅十餘日吾便入囹圄。所幸彤與晶兒有彩電伴度寂寞，吾將稍得安慰。

八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彤雲女神

九月十五日給彤生日賀信中，吾曾揣度當年岳丈爲其取「彤」字之意。許是以「同」之諧音以示疼愛。另外，她生日那天，也可能和我生日那天一樣，曾有過彤雲密布的光，並深爲這一相同而歡喜。可事後一想，秋天的北京能有這樣的氣候嗎？老天有眼，憫吾愛心。十八日白天通知我寫見面信。十八日晚，好一場雷聲大作，痛快至極的甘雨淋漓，下得我透心的順暢。莫非我彤雲女神顯示我好兆？遂得幾句，特記。

秋日裏，也會雷聲大作，

甘雨淋漓，灌透大地。

啊，彤！

你果是彤雲女神，

降世人間。

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愛人

世上

唯有你——

令我幸福地戰慄，
也令我痛苦地戰慄。

我願是……

我願是激流，
只要我的愛人，
是一條小魚，
在我的浪花裏，
快樂地遊來遊去；
我願是荒林，
只要我的愛人，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七，八日摘自彤信中

是一隻小鳥，
在我那稠密的樹林裏，
做窩、鳴叫；
我願是廢墟，
只要我的愛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著我荒涼的額，
親密的攀援上升。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彤抄贈我的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再抄

第三部分

對中國民主人權問題的一些思考

自然 社會 人

地球沒有毀滅之前，人總是永恒的主題。討論這一主題，古往今來，綿延不絕。

如今人們又重新燃起了討論這一永恒主題的熱情，這是因為：當今世界的人被扭曲了，資本醜化了廣義的「西方人」，權力異化了廣義的「東方人」。當今「東方」更有甚者，許多空洞的既非生命又非物質的原則概念至高無上，有生命的人卻淪為可悲的螺絲釘，成了原則與概念的附屬物。年輕的新生代渴望還人的本來面目，希望做一個人，作一個真正的人。

因而年輕的「反叛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更接近自然生活環境的中國的西藏和

世界的非洲，這種思潮在敏感的音樂、繪畫、舞蹈領域裏表現得尤為突出。在他們看來，淳樸的「原始」比庸俗的「文明」更珍貴。

世上的人只有好、壞之分，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國王是人，乞丐也是人；領袖是人，百姓也是人。在無垠的宇宙中他們都是人。

人有兩類屬性，一是天生的自然屬性，二是後天的社會屬性。

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的豐富，教育的深化有可能部分地改變人的社會屬性，文明、和睦、友愛和大同有可能逐步實現。

青年之中的深邃者不過更自覺地肩負起歷史的重擔，主動地去改變異化人的環境。環境為人，而不是人為環境；同樣的道理，制度為人，而不是人為制度。人是上帝，人是主宰。當然人又不可能不受各種條件的局限。

然而，只有每個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有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教育的日益深化。

物質的人，能力有差異，品格有好壞。差異的競爭要保護，相互的利益要協調，社會的秩序要管理。應該允許「亂說」，而不能允許危及多數人利益的「亂動」。意見上，可以千差萬別，不能相互強加；實行時，只能通過必要的程式，少數服從多數，同時保護少數；全體人通過代表會議監督社會的管理者。這就是民主的真義。

民主社會，首先要管好的是社會的管理者。公民則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最廣泛的自由。

自然界給了有理智、會勞動的人類以生命，人類應當感謝宇宙之母，和平友愛地生活在無垠的宇宙的懷抱之中。

中國廣袤遼闊的土地養育了勤勞、智慧的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讓我們中國人和平統一地生活在一起。

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屬於一部分人的，是屬於全體人類的。全體人類，共同享有吧！

*此文為徐文立為期刊《人》所作的序言，寫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九七年九月修定。

彈淚男兒亦英雄

希哲要我為他準備在二月出版的集子寫序，我是在辦完一些非辦不可之事的二月九日（年二十）回到家，才看到他和編輯雷競旋博士來信的。朋友之請不可違，只好在春節會親待友的忙亂中寫這篇序。

寫序多半是件苦差，因為序的基本使命有二：一薦文，二薦人。薦文難，薦人更難。時間倉促，希哲的文章只能匆匆讀過，序言自然難以深切。人——希哲，雖十多年前有過一

次難忘的會面，可此前、後均無深交，所以雙方都很難說是知己，譬如《民主大學季刊》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發表的王先生與該刊記者的談話中涉及我的部分就是明證。即使我再不懂「一個人的精神自由是最重要的」，以我的個性和從容入監十二年且不懼怕再入監的經歷，總不至於下到要向什麼政府作出什麼保證，才能討得自由和半自由。關心政事的人都會知道，我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假釋，是中國政府能取得美國政府一九九三年最惠國待遇的必備條件之一，所以在我被假釋的第二天，美國政府就從它自身利益出發，當即宣佈歡迎中國政治犯徐文立被假釋，隨後克林頓總統亦宣佈一九九三年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有此「身份」，唯有他們向我獻殷勤才合乎情理，何須我向什麼政府作出什麼保證來討得什麼呢？更何況我這人從來只有向養育我的父老鄉親作出保證，而從未向任何個人、特別是任何政府作出保證的習慣。當然這樣說並非說政府不會有非分之想，那是他們的事，總不能讓人家不去想。可是歷史已經把我們推倒了公眾人物的位置上，那就需想得更縝密，說得更慎重。

我出獄的當天（即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被官方傳媒糾纏了約二小時，近中午十一點到家，剛進大院門口即被早已等候的海內外各國記者團團圍了約八小時，幾乎進不了家門，好不容易擠進家中也只安靜地呆了不到半小時。在此時間內，我廣泛地發表了各種政治見解和較詳盡地回答了輪番提問的記者所感興趣的問題。之後的半年多裏，也適時地有談話和照片披露。據我所知，世界各國、香港、臺灣的電視臺和各主要報刊都較詳

盡地報道了這些談話，並發表了大量的攝影照片。可能在大陸，甚至廣州這樣開放的地區也無法看到或聽到以上這些內容。

對於我這樣一個與世隔絕、完全單獨監禁十二年的人來說，要更真切地瞭解我們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現實情況，唯有先到各地走走、看看、聽聽才有可能。於是我們去年先後二次，長達三個多月，西至成都、南到廈門，遊歷了黃河、長江沿線的十二個省市，同時爲我一九五二年因公犧牲的父親和因憂慮我的處境而於一九八七年去世的母親實現他們的——葉落歸根、合葬故里的夙願而奔波。正因此，希哲那二篇飽含深情的悼文也撥動了令我潸然淚下的心弦，而且每聽我夫人賀信彤（即康彤）說起希哲夫人蘇江在那艱難的歲月，不僅一人擔起贍養老幼的重責，每次探監還要挑著擔子趕車又乘船的感人情景，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今天我看到了蘇女士所寫致蔡詠梅女士的信，讓我看到了人美文亦美的蘇江女士。我總在想，軍人的家屬還能有一半軍功章，而政治犯的家屬又能得到什麼呢？在中國，他們不被歧視就謝天謝地了！所以，我又常想，總有一天，我們中國人應該爲一切曾受苦受難最深重的中國的政治犯的妻子和親屬樹一座豐碑。

古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我更相信有真情，會落淚的男兒是好人，甚至像希哲這樣爲不幸故去的姑婆和紅妹而落淚的漢子更英雄，我贊成彈淚男兒亦英雄。

我和希哲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八零年夏天，在此之前，希哲爲《四五論壇》撰稿，並與我有私人通信的聯繫。一九八零年，民刊被迫停刊，青島孫豐和廣州希哲都想來北京看

看我這個「廬山真面目」。六月十日，我們首次晤面，我想借此機會與有見地的朋友討論一些問題，於是我唐突地提出了一個極敏感的問題，即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多黨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問題來討論。儘管當時希哲和孫豐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可是由於我本性中的弱點使我輕信了一個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公安部門坐探的「朋友」陳德堯，並由他將我們安排早已設好竊聽裝置的北京「甘家口旅館」討論這樣的問題，於是，希哲和孫豐，以及臨時被拉來當紀錄的劉二安一同被無辜地牽進了一樁所謂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大案中來，希哲並被判十四年徒刑，僅比我少一年，何其冤哉！

正由於我們曾有過這樣難忘的會面和共同蒙難的經歷，希哲又是受我牽累，我十分願意向各位讀書人推薦這本記述了中國最後一代政治犯的血與淚的文字的集子，並且將它永遠地收錄在中華民族文字歷史中以饗後人。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三日

農曆初四凌晨三時

*此文是徐文立為王希哲的作品《春寒，假釋一年》，香港一九九四，所寫的序言。

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先生的談話

艾伯樂：你是不是能跟我談談剛剛釋放的魏京生先生？

徐文立：魏京生先生是我一九七八年民主牆時期共同戰鬥的戰友，當前他需要冷靜地考慮一些問題和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再繼續談論他，是不適當的。

今天，我主要想談談中國的民主運動問題，特別是大陸的民主運動問題。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包括各國的媒體、甚至包括駐京的各國記者，似乎都蒙上了一層面紗，有點搞不太清楚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在做什麼爲他們想做些什麼。所以，你今天跟我進行談話，我非常高興，我想借此機會比較全面地、系統地談談我個人的看法，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我這些個人看法是在聽取了許多朋友、特別是許多老前輩的真知灼見後形成的。但這以下的意見、看法都是我個人的，不代表任何其他入，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

我認爲，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將會是漫長的，不可能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很快地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較理想的民主社會，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只有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才不會急躁，急於求成，才可能有一個長遠的工作的打算和安排。

艾伯樂：是不是有個說法「進二步退一步」？

徐文立：（笑）是有一點這樣。而我認爲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架

構起來一個，借用電腦的語言，「平臺」。把它架構成功了，那麼誰是領導人，誰在這個平臺上表演，並不重要。因為這是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制約的平臺，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者一種政治勢力，不可能在社會中再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不可能再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不可能再出現這種情況。這種情況一旦形成之後，誰再做領導人也就不重要了。那個時候，就真正是「主權在民」，主權在老百姓了。「選擇在民」，由人民來選擇什麼樣的政黨執政，什麼樣的領導人作為國家的代表，要達到這一步，我覺得中國將要走比較漫長的道路。

我們這一代，是中國民主進程當中承前啓後的一代人，我們所承的前，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先生，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除臺灣之外，大陸也時有一些民主上的要求，但有的不是非常自覺的。後來經過一九五七年的進言上書、尤其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民主牆時期，都是中國民主進程的重要階段。我們這些成長於民主牆的這一代民主戰士，有可能和各個階段的民主人士及全國人民一道，完成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這樣一個過程。但是，歷史給不給我們這個機會，是不是真正可能達到那一步，很難講。也許，我們只是鋪路的石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在重要的是做踏踏實實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去推進。要推進，就要考慮中國的現實情況，民眾的一般訴求。今天的中國，已是進行了十幾年經濟改革的中國，領導它的中共不管是自覺還是被迫進行的，它都在「休養生息」方面產生了有利於民眾的結果。除了老少邊窮地區之外，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

平有所提高。當然兩極分化也日益明顯，有億萬富翁，也有赤貧百姓，有下崗工人的不滿，也有農民對苛捐雜稅的抗議，更有中國不光彩的人權記錄爲世人所詬。由於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許多需要借助政治改革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就長期地干擾著改革的進程。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由於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自由度的加寬，人們的訴求和視點正在分散，大多數人的安居樂業，使得民眾中「求穩怕亂」的思想成爲主流。

另外，由於經濟改革所產生的新的機制帶來了經濟問題有可能在經濟層面內解決。有許多經濟層面的問題，和政治層面的問題是不完全一樣的，有些問題是需要用經濟層面的經濟手段去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民主社會，他們依然存在著經濟層面的問題，並非不存在失業這些問題，比如說著名的「可口可樂」公司最近就要大量地裁員。但是經濟層面的問題和政治局面的問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是有影響的。比如說象下崗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也包含著政治問題。它是過去計劃經濟那種非常臃腫的機構，那種社會主義「大鍋飯」造成的結果。今天僅僅用經濟手段去解決，是完全能解決的，還要從政治層面上去解決，所以必須要有政治上的改革。另外，下崗的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它也會轉化成爲一個政治問題。所以，我說經濟層面上的問題主要應該在經濟層面去解決。政治層面的問題主要應從政治層面去解決，但是不意味著把它們看成是孤立的、相互不聯繫的部分。經濟問題很多是由於政治問題帶來的，所以，那些問題必須從政治層面去解決，將來要找到出路，也要從政治層面去找到突破口。所以在這一點

上，我們應該非常清醒，分清楚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我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都不是非常精通，並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和研究。對這兩方面問題，我都需要加以學習，才有可能深入地去瞭解它們，經濟問題對我來說更是如此。由於我畢竟從事了十幾年將近二十年的政治運動，所以對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可能考慮得稍微多一點，但是也不見得考慮得多正確。

明年是西單民主牆的二十周年紀念，我在這紀念年到來之前發表這樣一個看法，也是對西單民主牆的一份紀念。

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我想中共也不能否認，只不過是他們所想進行的改革，或者每次進行了一些改革以後又止步不前的這種情況，我們是要批評的，我們會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中國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大的動蕩，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我們暫不講，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在政治上不斷採用搞階級鬥爭、搞運動這樣的方式製造動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災難性的動蕩，使得中國人民對於政治有些冷漠，他們特別希望：凡是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可千萬注意，不要因為你們的失誤造成社會的不必要的動蕩。請注意，我說的是不必要的動蕩，不管是來自那個方面，是執政者方面，還是持不同政見者方面，說老實話，老百姓都不願意。應該指出的是，當今中國是否產生動蕩，其主要原因和主要責任者是執政黨，是中共，不是其他的人，因為它獨攬著大權。但是，不管什麼樣的動蕩，中國老百姓

都不會歡迎，他們不是不希望改變，但是希望這個改變是比較平穩的，是漸進的。作爲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或者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來說，都應該順應民眾的要求，不應該違背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從事民主事業的人，你既然有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着把人民的意願看得高於一切，那麼就要遵從人民的意志來從事你的活動。所以，在當今中國經濟上有所復蘇、有所發展，民眾恐懼動蕩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順應民眾的希望穩定、希望在穩定的同時求發展的要求，用漸進的改革方法來推進，才不會違背民眾的基本願望。那麼，我們想推進到什麼程度，才比較理想呢？我個人的看法，可以用二十四個字、四個短句來表示，中國民主運動應該追求的目標是：

結束一黨專制

建立第三共和

保障人權自由

重塑憲政民主

我一九九五年就一些問題發表個人看法時，已經包含了這四方面的內容，現在把它精練一下，就是這二十四個字。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四點的大概含義。第一點，結束一黨專制，明確地不同意由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來專制中國，希望出現一個多元的、多黨的政治局面，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就是前面說的我們要架構的那個多元的社會結構的含義，這一點是非常鮮明的。但

是，它又不意味著有任何要打倒、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意思。也可以說，只要共產黨作得好，不腐敗，能夠代表民國的利益，那麼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把它打倒和推翻。如果倒了，那應該從他們自身去找原因，不要去怪別人。所以，我說的結束一黨專制，是用的「結束」這兩個字，不管誰來結束，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在某種壓力下自己提出來結束，或者是各種政治力量強大到共產黨不得不結束。不管是什麼形式去結束，它是結束，不是打倒，也不是推翻。如果共產黨作得好，能得到民國的擁護和選擇，那麼它依然可以在未來的社會成為執政黨，或者成為反對黨，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前蘇聯的變化也是這樣，比如久加諾夫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在俄國當今的政治派別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關鍵是看你中國共產黨作得怎樣，這是我一貫的想法，我沒有任何想推翻和打倒中國共產黨的意思。對於中國共產黨近十幾年來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我是予以肯定和支援的。當然，其中有很多深層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好，我也希望他們解決好。

第二點，「第三共和」的提法久已有之。中國經過了長期的民主運動，在當今，不只我是一個人，還有其他許多朋友都提出這樣的主張和想法。那麼什麼叫「第三共和」呢？許多人恐怕不完全清楚，我要作一些解釋。因為它區別於孫中山開創的那「第一共和」。很可惜「第一共和」葬送在各路軍閥和蔣介石手裏了。那麼，人們要問，我國是否出現過「第二共和」呢？應該說，有過一個短暫的第二共和時期，這個時期的標誌是毛澤東的那一篇《論聯合政府》。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可以看出，當時的歷史條件

下，毛澤東是提出了建立一個不同於「第一共和」的「第二共和」。這樣一個綱領性的東西，是抗日戰爭之後發生的，很可惜，它被毛澤東自己破壞和違背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存有帝王思想的毛澤東不可能不違背和破壞這第二共和，儘管是他本人提出來的。所以，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過一些民主主張的人，未必不會走到自己的反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內心深處追求的是什麼。從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政協第一次會議這段時間，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還基本上是按照《論聯合政府》這個綱領做的，只是很快他們就放棄了。所以說，中國曾經出現過短暫的第二共和時期，後來又葬送在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些依然要堅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的手裏了。所以，我們想再追求一次「民主共和」的話，這次共和就可以把它叫做第三次共和了。把這問題搞清楚很重要，否則一般人不明白為什麼叫「第三共和」。它是有連續性的，第一次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了的，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以《論聯合政府》那個綱領性的東西為契機，到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後的第一次政協會議為止的那段時間，雖然他們並沒有把它稱為第二共和。今後建立的第三共和，從總的方向是一個接一個的，是連續的。但是，這中間的間斷非常長，在這三次共和中間有兩次是專制的，出現過國民黨的專制，也出現過共產黨的專制。

艾伯樂：第三次共和的特色是民主憲政的？

徐文立：「第三共和」特別強調保障人權自由，這次共和倡揚的民主甚至有些不同于

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來的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義是民族主義。當今應該說在中國的整個版圖之內，不是說不存在著民族問題，但基本上已不是最主要的矛盾衝突。孫中山先生當時面對的是滿清政權，所以當時他提出民族主義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今天，依然沒有變化、沒有發展地看這個問題是不夠的。現在的民主共和應該特別注重保障人權自由，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民主可以叫作「人權民主」。不知道我這樣一個概念準確不準確。這個社會特別注重保障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權利指的是各個方面，而不僅僅是中共所說的是保障生存權。這個權利是廣泛的，是與生俱來的，是天赋人權，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無權剝奪的。當然，任何一個社會是要有管理的，需要法治。民主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法治。只要是法律規定不允許從事的事情，民國就要加以遵守，特別是以不防礙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它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不是無序、放縱的。

第四點，為什麼提「重塑憲政民主」呢？其實民主的本身就是講究法治，這是民主的應有之義。為什麼要突出憲政呢？因為一個民主社會重要的特徵和內容是憲政，它由一系列的母法、子法和法規來保障所有人。任何人、任何政黨都必須按照人民和議會制訂的憲法和法律來進行它的活動。為什麼提重塑呢？因為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並非沒有憲法，他們也曾經制訂過好幾部憲法，憲法當中也規定了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示威、出版等自由，有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只不過沒有兌現罷了。目前不謀求改變現有的憲法，只要求

他們兌現言論、選舉、出版結社等自由，但是對於未來社會這個憲法就顯得非常的陳舊了，因為它當中還有什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的內容。所以未來的憲政和現在已經有的憲法是兩回事，那是民主社會的憲政，那是新的憲法指導下的法律體系，所以我用了「重塑」二字。但是目前階段，我們可以首先提出要求中共兌現他們所制訂的憲法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選舉和被選舉等等自由。

艾伯樂：現在至少要執行憲法當中關於自由的規定，是嗎？

徐文立：對。以上就是我們要實現的四個主要目標。我們的行動原則是什麼呢？要實現這些目標，應有一些行為規範，我個人和許多朋友有共識，那就是：「公開、理性、和平及非暴力。」第一是公開，要實現這些目標，應採取一種公開的方式去進行，而不是秘密的。第二是理性，這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含義是，我們要從街頭政治轉移到目前的憲法允許的合法領域當中來。不排除有時候的必要的街頭政治，但不是以它為主要的活動手段。

艾伯樂：那麼天安門運動錯了嗎？

徐文立：沒有錯。天安門「六四」運動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它完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錯誤。但是民主社會的形成，將不會以廣場式的街頭政治為主，要逐步地轉移到議會政治。現在就要轉移到選舉人民代表的活動當中去，爭取民主人士當選。當然，在某種條件下，不見得就不會出現街頭政治的情況，不要說在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家，西方的民主社會也會出現街頭的遊行、示威，甚至法國的

卡車司機還在高速公路上設路障，進行罷工示威。這二者之間不是衝突的，要看當時的情形，當時的需要。

我們為什麼特別強調非暴力，因為從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幾次大暴力產生的政權，完全是一種舊的專制的重復。我們認為暴力，依然不可能給中國帶來一個安定的、繁榮的、均富的民主社會。鑒於這樣的歷史，我們主張和平與非暴力，不希望又是過去的惡性重復。比如蔣介石把所有的軍閥打敗了，然後上了台，他本來也是跟著孫中山搞民主革命的，但是他卻成了一個獨裁者。這種軍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領袖人物，上臺以後，不可能不搞獨裁，不可能不搞專制。毛澤東也一樣，這種打江山的人總覺得自己有理有理由獨坐江山，當皇帝，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包括他們的功臣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就應該去享受，去享有不應有的特權。這種思想是要不得的。我們這些人並非沒有看到現在的政權有武裝力量，非常強大，但是我們還是主張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就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再重復前輩人所犯過的錯誤，不希望再出現一個專制黑暗的社會，如果建立起民主的機制，那麼誰想獨裁，誰想專制都作不到。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們才追求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我們並非那麼傻，不懂得槍桿子是很有力量的，毛澤東曾經說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懂得，但是我們絕對不採用這種手段，因為不想重復蔣介石、毛澤東的錯誤，不想用犧牲又換來一個獨裁黑暗的社會，希望中國將來是民主的、和平的、光明的社會。

第三方面要談的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目前側重要作，也可能作到的

三件事情。

一、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人權。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有很不光彩的人權記錄，侵犯人權的情況相當嚴重，人權應該作爲一個突出的問題來解決。現在在國際社會的幫助和壓力之下，中共也開始意識到問題很嚴重，有時候很丟面子，影響自身的國際形象。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採取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蓋就蓋的方法來面對這個問題。這種態度應該改變，是到改變的時候了。

爲了說明人權問題的嚴重程度，我舉幾個重要的個案來談一談。第一，如果中國有最大的人權個案的話，那就是趙紫陽先生這個個案。很可惜，它爲各國政府、輿論界、甚至大陸、海外的民運人士所忽略。可能因爲趙紫陽先生曾經是中共黨員、又是中共的領導人，所以他的人權被侵犯就覺得不那麼值得同情，這是不應該的。我們知道，趙紫陽先生最近發表了致中共十五大的一封信之後，人身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最新消息傳他又將受到專案審查和進一步的迫害。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是站在人民這方面的，至今堅持這個正確立場。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爲一個中共的領袖人物，能夠作到這一點，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有了這一點，不管他過去犯過什麼樣的錯誤，或者有什麼樣的缺點，都顯現了他值得我們欽佩的品格和勇氣。他這樣一個人，能夠獲得言論行動上的自由，對於中共進一步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將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鑒於這樣兩點，我認爲趙紫陽先生的人權個案，是中國的最大的侵犯人權的個案。今後應加強對他的關注，希

望西方願意在人權方面和中國政府對話的國家能夠關注這個問題。

第二，還有象王丹、孫維邦（孫豐）、劉曉波、胡石根、高瑜、周國強、劉念春、陳瀾濤等和一切包括西藏、新疆地區在內的因政治、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監禁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孫維邦是民主牆的老戰士，兩次入獄，「六四」後被無理判十二年，目前仍繫獄中。

宗教界的良心犯，常不爲人所注意，其實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僅僅因爲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正常的宗教活動，就被視爲反革命罪行。現在反革命罪被取消了，那些人被判反革命罪是不是應該取消啊？給那些正常從事宗教活動的人安上了其他許多罪名，都是錯誤的。總之，一切因政治、宗教信仰被監禁的政治犯、良心犯都應該得到釋放。

艾伯樂：馬上得到釋放嗎？

徐文立：至於怎麼樣去操作這件事，這是中共的責任。當然，能一起釋放最好。如果他們覺得有困難，逐步地釋放這些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應該有承諾再也不要製造政治犯和良心犯了。否則，就會在世界面前更丟臉，讓侵犯人權的這個噩夢纏繞著中共。

第三，進一步地敦促中共儘早地簽署、批准《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力公約》，並不附帶任何條件。

簽署、批准之後就應該用這個公約來規範自己的人權行爲。我不希望中共簽這個約的時候還有附加條件，強調中國的所謂特殊國情。在人權這個意義上，是沒有什麼特殊的，

你能講中國人和外國人不一樣嗎？是人類就應該在人權問題上遵守同樣的標準。這不是具體的經濟問題和一些只跟中國國情有關的政治問題，只要承認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一樣是人，那麼國際社會制定的人權國際公約就應該無條件去遵守它。希望中共如果真的簽署了、批准了這個條約，會逐步地去遵守它。不遵守的時候，國際社會就會拿這個條約來批評你，包括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用這個條約去檢查政府的行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第二，關於重新評價「六四」的問題。請注意，我的提法是重新評價，而不是「平反」。過去常用平反這兩個字，那是共產黨的一個發明，平反是居高臨下的，從上面恩賜給下面的。「六四」的重新評價不需要任何人的恩賜，只要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改變自己過去的錯誤結論和評價，是他們改正錯誤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至少要向「六四」的死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們謝罪！當然，僅僅謝罪是不夠的，還要賠償死難者和死難者家屬的一切損失，特別是其中老者的贍養問題，讓他們老有所養。另外關於遺孤的問題，確保死難者留下的那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第三，關於中國大陸將要面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換屆選舉問題。這是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應該高度關注的問題，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換屆選舉（包括下屆政府的人選），基本上就是「黑箱」作業。代表是從省或者是直轄市直接被推舉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的，這個推舉的過程，被推舉的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有沒有資格作為人民代表？他有些什麼業績？他有什麼政治主張？他將代表人民在這個代表大會裏起什麼

作用？作些什麼事情？對於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來說，一概都不知道。推選的過程，中國大陸的廣大人民群眾沒有任何參與，換屆的過程，基本上是剝奪了人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這種作法是違背現有憲法的。所以我們應當關注這個換屆過程，因為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了。

下面我談談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採用一種什麼方式進行活動。據我所知，這些人基本上是採取一種「廣交友、小結社」的方式。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大家都不追求建立什麼組織，就是所謂的不結社，而只在交友的過程中互相交流切磋，這可能也會成為今後民主社會中的一種行為方式。那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各人根據自己的思考提出問題，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發揮各自特長，同時也吸收一些朋友的意見和智慧。我自己就常常這樣做。

談了以上這些，可以說就基本上把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面紗揭開了，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怎樣進行自己的工作，這樣也避免產生誤解和誤會。當然我所說的這種方式，決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表示只允許這種方式，方式是可以多種多樣的。我所說的，是我觀察到的基本的行之有效的 ways。

艾伯樂先生，有關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情況，我就談到這裏，我可以回答你所想問的問題。

艾伯樂：徐先生，假如你是江澤民主席的顧問，你將建議他作什麼？

徐文立：謝謝你提出問題。但是我絕對不可能成為江澤民先生的顧問，我曾經是中共的階下囚，而且我現在是立足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在這樣一個地位上從事著大陸的民主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就是請我，我也不會去給他當顧問，何況他也不會請我。我倒可以借此機會以一個民主運動的老戰士的身份，向他和中共中央提出五點建議：

現在中共和江澤民正面臨著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儘管在經濟改革上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正在復蘇、發展。國內的政治局面相對穩定，國際社會除了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共批評比較嚴厲之外，出現了較為寬鬆的外部環境，與周邊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大的衝突，雖然與日本有釣魚島問題，與東南亞一些國家有南沙群島問題，與有些國家的邊境線還沒有劃定，過去朝鮮戰爭有遺留問題，那比過去的問題要小得多。總之，國內外較為寬鬆的環境，為中共提供了一個可以較為徹底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絕好時機。其實，抓得住抓不住也就是一念之間的事。

首先，我建議還給趙紫陽先生——你們黨內的一個老共產黨員、曾是你們黨的領袖，還給他人身和言論自由。如果，你們更寬宏大量一點的話，倒是可以聘他為最高顧問，比如象新加坡請李光耀作資政一樣，充分發揮他的餘熱和智慧，繼續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作出貢獻。這樣作，非但不會動搖江澤民現有的地位，反而會提高他的社會形象，讓人們覺得你們很大度。

第二點，繼續釋放政治犯、良心犯。

第三點，重新評價「六四」。現在國際國內的形勢相對比較穩定，中共若能審時度勢，主動地重新評價「六四」，肯定「六四」的偉大意義，向「六四」死難者家屬謝罪，賠償一切損失。由此而引起的社會震蕩，將會是最小的。

當年「六四」時，北京市的市民和學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對中國的民主事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他們的表現，完全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第四點，在經濟領域方面，中共經過十五大，已決心走向市場經濟，並進一步走向改革這條路。這一點是對的。當然我們也知道，不是市場經濟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這種和世界經濟接軌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希望他們在這個時候絕對不要用敷衍的辦法，解決政治改革的問題，要誠心誠意，徹底地進行。如果能夠這樣做，那是中國人民之大幸，也是為民主運動奮鬥的人的大幸。當然，應該按照民主社會的方式進行，而不是走一步停兩步，應該是逐步地漸進地實行。

第五點，在目前的情況下，在改革中非常容易作到的是放寬言論自由，而且確保不因發表了不同意見而受到迫害。

如果他們能採納這些意見，我相信，他們就能作出彪炳千古的功業。我覺得，他們應該作出這樣的功業。

* 徐文立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路透社》記者艾伯樂先生進行上述談話。同

年十二月初和美國有線電視公司（CNN）駐京記者麥白柯女士、《路透社》電視部駐京記者賈琳女士、《美國之音》駐香港記者前衛先生、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記者米歇爾先生四位人士在北京分別進行了談話，談話的要點綜合整理成十個問題，其內容和本文雷同。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與韓東方對談

韓東方：前不久，你和其他朋友發出了一個《告全國工人同胞書》，請你談一下當前中國工人問題的嚴重性。

徐文立：前些時候，武漢的秦永敏先生起草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他是鑒於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向全國工人朋友們發佈了這封公開信。信是他起草的，我作了一下修改，也徵求了其他朋友的意見。因為大陸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們，現在基本上是採取以各自的名義發表各自的意見的方式在進行，所以這封公開信不是聯名發表的，在公開信後列了幾個人名，只是作為有關事宜的聯繫人而已。

發表這樣一封公開信，是因為朋友們認為，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不可能不關注民權和民生這兩大問題。當工人朋友們遇到嚴重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關注。這封公開信中也提到，在大陸堅持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大多數都曾經有過當產業工人的經歷，我本人也是

這樣。我從事民主人權工作大約有二十年時間了，是從一九七八年底在民主牆的一份叫《四五論壇》的雜誌開始的，這個刊物創刊於那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個時候，我是北京鐵路分局的一個電工，我當工人的歷史將近十二年。

韓東方：那個時候我剛剛初中畢業。

徐文立：一九八一年，我被判了十五年，四年剝權。一九九三年由於中美最惠國待遇的交涉，加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壓力，特別是當時中國想舉辦二零零零年奧運會等一系列原因，中國政府假釋了我。實際上我坐牢十二年零四十七天，跟我當鐵路工人的時間差不多。在這之前我當過五年海軍航空兵，更之前那就是當學生了，我大體的經歷是這樣的。

韓東方：你現在還在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嗎？

徐文立：現在已經結束了。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結束的。在我被假釋、剝權期間，有關部門一直是很「關照」我的，現在也沒有放鬆這種「關照」。

韓東方：你說的「關照」是什麼？

徐文立：「關照」就是說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前，我家門口駐守了很多公安方面的便衣，監視我的出入，我的一切活動，包括我到北京市以外的地方。從去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之後，這種情況就不明顯了，但是還是能夠感覺到，我想國內的工人朋友們能夠理解我這個意思。

我們之所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表《告全國工人同胞書》，關注工人、特別是下崗

的工人朋友們的情況，是鑒於這個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中國官方的報紙和有關部門也不再掩飾這一點了。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份《中國經濟時報》，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的。頭版上引用的是國家統計局十二月二十日透露的消息，截止到去年十一月份，國有企業的虧損額是七百零五億，據推算到九七年底全國下崗職工一千二百萬，除部分已經重新就業，仍有四百五十萬處於失業狀態。眾所周知，這種統計數位還有很大的水分。下崗之後，工人的處境是很困難的。這種情況，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不能不關注。雖然，中國是十二億人口的國家，但產業工人就有一億左右，在一億左右的人中有一千二百萬人下崗，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據我知道我們鐵路今年下崗的人數也相當大。

韓東方：對，超過一百萬。剛才你談到國營企業虧損的情況，和由此造成的下崗工人的數位。你當過國營企業的鐵路工人，在西單民主牆的時候開始關注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政治上開始介入。雖然那時候鄧小平已復出，各方面都起了變化，但老實說我覺得那會兒比現在還要黑暗。從那時開始，你們就站出來公開地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為中國的前途擔憂。那麼到現在，造成今天國有企業破產、倒閉，特別是最近失業越來越嚴重，同時缺乏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徐文立：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甚至上個世紀中葉，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勞資矛盾。馬克思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揭示，使得一些進步知識份子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入了一個誤區。他們認為問題出在資本的積累，對工人的壓迫，在這

樣一種階級鬥爭的背景下工人會逐漸走向絕對貧困，這種思潮對革命的知識份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當中國處在各種社會矛盾交錯的情況下，一批熱血的革命知識份子認為在馬克思主義那兒找到了出路。

韓東方：你所說的熱血知識份子就是早期的共產黨員？

徐文立：對。是指早期共產黨當中的一些優秀分子，也包括一些國民黨人。他們受當時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影響，覺得用革命的手段，把地主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建立的政權推翻，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的「工人樂園」式的國家，就能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其實，人類自身永遠有解決不完的問題，不會有一個終極社會。因為人性是不可改造的，甚至環境也是不可改造的，人類能夠學會和環境協調相處就很不錯了。

韓東方：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

徐文立：是的，在那種思想指導之下，他們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武裝鬥爭的道路。在武裝鬥爭的過程中，曾經非常熱血的革命知識份子異化了。有的人雖然還保留了些廉潔的作風，但是在權力的腐化下，他們的權力慾增長，特別是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膨脹。建國之後，他們並沒有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而是不斷地去強化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這個專政主要是對準他們過去所依靠的工人和農民的。我曾經做過工人，非常明白他們表面上把工人捧上天，說什麼工人是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是處在絕

對沒有權利的地位上。

韓東方：也就是說，在暴力革命之下產生了一個靠暴力維持的政權。

徐文立：對。暴力帶來民主，也帶來人權。

韓東方：靠暴力維持的政權，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無論用什麼手段，也要保住政權。你認為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到當前的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缺乏社會保障，這個之間的聯繫是什麼？

徐文立：這首先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一些工人朋友，特別是一些老工人，包括共產黨內還保持了關心民國生活的那些人，誤認為建立這樣一個政權最能夠維護工人的利益。實際上，恰恰相反，權力高度集中，把所有的經濟部門集中在國家手裏，再由少數人任命各級官員，這種「絕對的權力」把他們都腐蝕了。他們不會真心地去關心民間和工人的疾苦。我當工人時就知道，你想對任何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見，那都是不可能的。層層的官僚機構，根本不可能把一個正確的意見傳達上去，更不要說採納了。

韓東方：暴力奪取政權的特點，就是凡事由少數人來決定。這些不懂經濟和經營的少數人，派到企業來是因為他們受到上級領導的信任。

徐文立：或者用普通工人常說的話：「誰是馬屁精，誰就爬得快。」

韓東方：這些人作了領導當然只向任命他的人負責，給提升他們的老領導、老上級提供方便、好處，他們在企業經營中不會為企業的前途著想。徐先生，八十年代初鄧小平

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其他人跟進。現在已經十八年過去了，你覺得他這個設想成功了嗎？

徐文立：中共黨內以鄧小平為代表，希望能在經濟改革上找到出路，即便願望是良好的，實際上並沒有成功。所以現在有一些工人產生對過去的懷舊。實際上是一種繆誤，誤認為他們過去好象很有權力，過去好象還把他們當回事，以至於對現在的經濟改革的總體走向發生懷疑。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鄧小平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並沒給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帶來實質性的好處。經濟上是有一些變化，比過去穿得暖和一些，吃得飽了一點，但是這在「人權」意義上是遠遠不夠的。中共現在第三代領導人的智囊團中有一位知名的劉吉先生，他也承認：人民吃飽了，穿暖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就要發表意見。人民參與意識的增強是好事，是國家興旺的標誌，也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如果共產黨真的是為人民服務，是一個站在時代前列的先進政黨，就應該有新的措施和形式來滿足人民的這一要求。

一九七八年之後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沒有達到他們當時對人民所作的許諾，關鍵是政治沒有進行改革，有時候進了一步，後來又退了兩步。整個中共上層，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進行市場改革，會帶來一個什麼樣的結果。現在在國家權力之外，已經產生了公民要進行自主的經濟活動和交往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除了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之外，政府的權力難以干預，也不應該隨意干預，這是民主社會的必然走向。以市場經濟為趨向，必然朝

這個方向走。但是，當局並沒有意識到，中國已經起了這樣一個重大的變化。如果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兩層結構的社會，現在已經變成了三層結構的社會。兩層結構的社會就是通過工廠、公社、機關這些機構，國家直接對個人。現在雖然經濟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是卻產生了一個民間社會，比如說有民營的企業、民間的社團、還有各種的仲介組織、民辦的媒體、民辦的學校、城鎮的社區等等。另外還出現了一批獨立的知識份子，據說單是北京的獨立撰稿人就有五百人之眾，我也是其中一員。中國已經從兩層結構逐漸地變成了國家——民間社會——個人的三層結構。中共沒有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作總結並給予承認，他們還想把過去政治上的老套和管理方法搬到現在經濟改革以後的社會來，這就使得他們所作的——給全民帶來富裕——的許諾不能得以實現。

韓東方：這就是說，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跟著共同富裕的這個目標並沒有達到。從這個層面來看，改革開放十八年是失敗了。

徐文立：鄧小平在改革時，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叫作：「摸著石頭過河」。用這樣一種樸素的實用主義作指導，他難以把一些已經出現的社會變化提高到理論的層次上。他也不用理論來指導他們的黨，所以中共黨內許多人在思想上是很糊塗的，不知道情況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的統治、執政方式都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變化。

韓東方：如果說鄧小平的改革完全失敗也不公平，其實他的前一句是成功了，是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問題是第二個大多數人並沒有跟著富裕起來，只是填飽了肚子，而毛澤

東那個年代是填飽肚子都不讓。

徐文立：特權階層的成員們，是富起來了。有些人鑽了雙軌制的一些空子，也富起來了。當然，也有一些人是靠誠實勞動富起來的。但是，絕大多數人還是相對貧困。

韓東方：從這個層面來說，人們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了基本的印象。再往企業方面看，國有企業為什麼越改革越破產，越改革越倒閉？十八年的改革怎麼在國有企業上看不到好的效果？

徐文立：這有兩個方面，一是政治的原因，一是經濟的原因。政治方面是因為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現在人民已經提出這種要求了，他們還意識不到。權力高度集中的國有體制，不可能對領導者進行有效的監督。比如，一個工廠搞得一塌糊塗，廠長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不受任何追究。甚至他到別的地方還依然作官，沒有因為造成企業倒閉或破產，而個人有任何損失。他們還利用中國現在可以搞私人經濟，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排到更有利攫取社會財富的領域裏去了。

韓東方：前些天有位聽眾告訴我，他們那個廠長高價進劣質原材料，低價賣優質產品，從高價進、低價賣裏他都得回扣，倒楣的就是企業，慢慢地被他們吃光了，最後倒楣的是老百姓。

徐文立：真正的國有體制在中國實際上不存在，存在的是少數的官僚所有制。這種所有制不從政治層面上進行徹底改革，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虧損和頹敗的局面。

從經濟層面來說，國家管不了的或不需要管的企業，就不該由國家管，否則在經濟上就犯了絕大的錯誤。由國家壟斷或總管的企業，應該是非常有限的。極少數關係國家安全或嚴重關乎國計民生的企業，才可以由國家去管理，但亦應由國家資產管理局在人民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下，按市場經濟的原則來進行運作。總體上，應該加快經濟領域的私有化進程。

韓東方：不論從政治、經濟的層面，從國家、企業的層面，都應該進行監督。單進行改革而沒有監督，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監督，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

徐文立：而且改革措施越多，給他們能夠鑽的空子也越多。

韓東方：前些時候，你們發了一個《告全國工人同胞書》，呼籲工人們要理解政府經濟改革的大方向，同時工人應該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江澤民已經授權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但是人大常委會還沒有批准。你們呼籲工人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行使保護自己的權利。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於工人的抗爭，工人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包括遊行示威都不允許。在現在國家經濟條件較差的大環境下，許多問題攪在一起，你覺得這樣呼籲能解決問題嗎？

徐文立：占主導地位的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政府，他們要從理論上、從思想觀念上根本地發生變革，才有可能理解這個關係。

韓東方：現在控制整個局面的主動權，是在中共政府一邊。

徐文立：是的，因為他們是執政黨，是在中國大陸上唯一的一個擁有四千萬黨員，控制著整個社會生活的黨。那些有名無實的民主黨派不過是它的「較為獨立的支部」，因此它不容易從過去的錯誤觀念裏走出來。他們自認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所以，可以包攬天下。他們意識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韓東方：你對中共政府從這裏面走出來覺得樂觀嗎？

徐文立：應該說是不樂觀的，因為他們不想徹底放棄那套所謂的共產主義的試驗和馬克思主義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不樂觀的。對於那個似乎正確、似乎理想的東西，至今他們還認為是理想的、是好的。只不過是有了一點誤差，調整一下，將來還是準備實現那套東西。錯就錯在他們認為好的那個東西，從根本意義上是錯的。不應該把某個階層和階級認定為最好、最正確，他們就最能夠代表一切人的利益，而把其餘的都視為被統治者。這做不到，也不應該。

韓東方：工人階級不應該認為自己是領導階級？

徐文立：對！工人階級也應該從這個誤區走出來。

韓東方：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各階級應該是平等共存的，誰也不能強制地決定另外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命运。

徐文立：我們要走向的不是一個階級領導或壓迫另一些階級的社會，而是一個公民社會。每個公民只是職業的不同，都應該處在一種平等的地位。勞資之間的矛盾，應該尋著

法制的軌道和理性的軌道去解決。我們提出了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般民國的心理狀態是不願意再出現動蕩，工人們在往前走不回頭的情況下，應該盡可能地、比較克制地不走向街頭。不要單純用街頭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是採用中國政府已經參加了的這個國際盟約所賦予的工人有組織自己獨立工會的權利，沿著理性和法制的軌道，充分利用自治工會這樣的途徑，去解決勞資問題。

韓東方：要想中國政府放鬆控制，容許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看樣子至少在短期內，不那麼樂觀。換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希望工人目前能夠暫時擱置自己的權利，放棄街頭抗爭的方式，以大局為重，從個人和國家的長遠利益來考慮，採用中共認可的組織工會，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在屋子裏把問題解決了。這是我們的希望，但還看中共怎麼作。

徐文立：中共政府中，有一些人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過去起家就是依靠工人農民運動。把工人農民納在他們的領導操縱之下，然後推翻了國民黨政府。現在他們以為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人，也會沿著這條路走。錯了，應該告訴他們想錯了。我們不想學那老套，共產黨想領導一切，實際上並沒有能領導一切，也沒有真正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人，不想領導一切，不想去包打天下。他們只要告訴人們：你們有自己的權利，工人有權成立獨立工會，為自己爭取權益。因為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已經承諾了。我們深知，中共某些人怕這個組織更甚於工人上街。又錯了，工會組織不是想和

你奪權的，它只是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且在成立工會的整個過程中，還要求你拿出相應的法規。沒有法規之前他們還不能違法地去成立。至於前期的籌備工作，只要不違憲，是不必征得任何人允許的。如果工人們按照合法的途徑去進行，沿著由人大制定出來的相關法律的軌道前進，怎麼會產生動亂的結果呢？

韓東方：眼下的種種跡象，還看不出來中共除了在國際上作政治表演以外，會真的實施這個國際盟約，賦予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放眼西方，無論在美國、英國、北歐或實施福利政策的國家，工人從來沒有寄望自己的抗爭行為得到政府的保護，不論政府給不給，我們工人都應該走這條路，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從這個角度說，你們在大陸呼籲工人組織獨立工會，這種潛在的工會意識在工人裏面是不是有普遍性呢？他們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嗎？工人在面對困境時，會不會這樣理性地思考呢？

徐文立：應該說長期以來工人在謀求自己利益的時候，總是有這樣的願望。但是中國社會的高壓政策，特別是對組織問題非常敏感的情況下，工人常常談虎色變，不敢觸及這個問題。

韓東方：一九八九年我們在天安門組織了一個「工自聯」，很少人來參加。因為我們形成一個組織，靠近我們就好像有天蹋下來的危險。現在北京有上百萬的工人失業，有的也上街遊行。

徐文立：這種願望和要求是存在的。但是由於長期的高壓，一般人不太敢碰這個問

題。然而這種內在的要求，是很強烈的。當然也有些工人仍然沈醉于往日的幻覺誤區，還認為自己是領導階級。未來，只要市場經濟向前發展，經濟組織從政府的管理中游離出來，政府也會逐漸意識到發生了勞資糾紛，由政府出面去解決，實際上是個沈重的包袱，倒不如企業遇到勞資問題，由工人的代表和資方坐在桌面上，心平氣和地去談判解決。當然，很多問題心平氣和並不能解決，對資方必須要有壓力。如果政府完全站在資方一邊，工人矛頭就要轉向政府了。所以，國際同盟中保障了工人有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的權利。

韓東方：中國政府其實在扮演一個不討好的角色，仍然要對每個社會角落插一手，管一管。你說，從政府脫離出來的一些企業，勞資矛盾差不多已經完全是工人和雇主之間的事情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了雇主和工人的矛盾，政府不從這裏跳出來，扮演仲裁人的第三者的角色，反而把自己當成工人的對立面，鎮壓一方，偏袒一方，給自己無端地樹立敵人。這種仍然滯留在二十年前的思維方式真笨！對他們自己沒任何好處。

徐文立：變化是有一些。比如成立了仲裁法庭，現在也有律師參與為勞方提出要求。但是分量都還不足，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中共第三代領導的主要成員，大多是學理工的，他們自己也應該承認對政治和經濟並不是非常懂，好在他們智囊團裏一些人吸收了西方的先進思想，還比較進步。我剛才提到的劉吉先生就是一例，他在一次講話中談到，權力必須制約，沒有制約的權力就必然要腐敗。

他們這個領導集團不能起比較大的變化，我不很樂觀。但是，我希望他們從觀念、思想和理論上去適應中國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新變化。結構都已經變了，行爲方式也應該跟著變。

韓東方：有些工人還是抱著幻想和懷舊的感情，這很不現實。你覺得獨立工會的工作，應該是從上往下由一些走在前面的人領先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然後再到各地去宣傳、教育、組織工人嗎？

徐文立：用土話說，那是拿著大鼎走路。那就錯了。

韓東方：或是讓這些走在前面的工人先進者，從自己的身邊開始作工作。當基層工人的意識覺醒後，先建立基層工會組織。在這樣的基礎上，大家有了共識，而後才建立全國性的工會。你覺得兩種模式是從上至下，還是自下而上的好？

徐文立：我想肯定是自下而上，而不該是自上而下的。我剛才說的，除了雜技演員，普通人拿著大鼎走路是很難受的，不太可能，也不現實。作爲較快較早地接受了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和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有責任把政府已經簽署了的國際盟約告訴工人朋友，告訴他們是些什麼內容，這樣最能夠防止中共用這東西去欺世盜名，也會促使他們從思想觀念上、從行爲方式上起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指的是政府方面。對於一般民國和工人，要使他們知道自己具有這種權利，別再不敢談不敢說。首先從自身的願望出發，比如下崗的人，像「工人自救小組」，也不是什麼政治性的組織，甚至都不是工會意義上的組

織，用互相自救的方式，解決迫切問題。今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行爲去解決他們重新就業的問題。一些基層的事情，是自發地產生的，自發地提出要求，靠自身的力量去解決。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向工人們提供一些法律上的知識和規定，也可提出一個創建工會的草案，僅供參考。我最近剛知道北京三五零一工廠的事情，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整個事情，都是工人從自身要求出發提出的。我想，這就非常好，不需要別人去替代、指揮他們，用共產黨愛用的方法去操縱他們，那完全是錯誤的。應該是工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依據法律上擁有的權利，自覺地去爭取權益，逐步地成長、成熟。有了基層的獨立工會，才有可能有地區的；有了地區的，才有可能有跨地區的，然後才有可能有全國的。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該是從下往上的。

韓東方：在這個過程裏，工人中需要一些先知先覺者，知道組織工會的重要性。過去個別工人用非理性的手段爭得了個人利益，現在不適用了。可以用集體的力量，通過工會談判解決。

請你談一下，今後獨立工會運動和官方的全國總工會的關係怎麼處好？

徐文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不是那個全國總工會，也不是全國總工會下屬的一系列工會，他們過去沒有、也從來不可能代表工人的利益。他們代表的是共產黨的利益，是共產黨用來操縱、管理他們認為可以成爲他們基本力量的工人的御用組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和獨立工會完全是兩碼事。它是中共爲了自身需要而設置的派出機構。它和我們所

提倡的，和中共簽署的國際盟約所允許的那種獨立工會，完全不是一層意義上的東西。

韓東方：全國總工會在目前新的經濟形勢下和新的社會問題的包圍中，有沒有機會通過較好的幹部進行內部改革，使它慢慢有變化，那怕有限地，爲工人說點話作點事呢？

徐文立：從總體上說，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爲一個個人行爲，由工人推選，站在工人的立場，代表他們的利益去同官方工會打交道，這是另一回事。獨立工會，不隸屬於任何政黨，它是工人自己組織起來，保護自己利益的。如果官方的工會經過某種改造，改變了，那就和它原來的意義完全不一樣了，這種前景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過去的工會幹部能夠投身到工人當中去，根據中共已經簽署的國際盟約，真正地從工人自身利益出發也可以做些事，但最起碼的條件是他自己得是工人中的一份子。我們現在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許多朋友已經不是工人了，他非要說自己代表工人，去成立獨立工會，那也是虛假的，也帶有操縱意味。這起碼，是我個人不同意的。

韓東方：獨立工會和所有的政黨，包括中國今後有可能出現的不知道多少個民主黨派，如何處理關係？

徐文立：我想在政治權利上是平等的，不存在隸屬關係，不存在誰領導誰，誰指揮誰的問題。當然，有可能在某些政治活動當中，獨立工會和政治組織互相之間有一些聯合，有一些支援和幫助。在民主社會當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選舉問題，某一個政黨提出它的候選人，有一些政治派別或政治團體，包括個人團體、工人組織，有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更傾

向于某個候選人。

韓東方：並不排除獨立工會的人看到中共的一個候選人，覺得他的說法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徐文立：對，更傾向於他們，如果他們支援和幫助工人的話，甚至可以有某種合作。

韓東方：和他們有某些合作，但政治上一定是獨立的關係。

徐文立：在政治權利上是獨立的、平等的關係。

韓東方：就是說，即使我以獨立工會的名義支援你某一個政黨或派別，也是以獨立的身份，不是以下屬的身份支援你。

徐文立：在民主社會中，如果共產黨依然存在，它仍然想組織一些自己的幹部去作工會的工作。只要它有這種能力也不應該去排斥它，如果它收縮到沒有這種能力了，那是它自己的事情。

韓東方：在未來的社會，獨立工會不論和什麼政黨都應保持距離，確保自身的獨立。爲了避免再被控制，工會從一開始就應該把握什麼？

徐文立：它的獨立性！工人有自發的要求，在知道了法律上的權利以後，組織一個獨立的工會。一開始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去支配和操縱。獨立工會和相關方面發生關係的時候，也要尊重政府、尊重企業領導人、尊重私營企業家，以及各方面的法定權利、責任、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福祉。只有尊重了對方，才是尊重了自己，並不只是一味地提出自己的

要求和條件。

韓東方：你覺得獨立工會運動不可以超出範圍，無止境地超出一個社會的承受能力去作無限制的要求？

徐文立：是的，要在法制的範圍內。

韓東方：在法律的約束下，透過理性的交流、交涉、談判，讓矛盾的對立雙方協商、談論，然後達到共識。好，今天咱們作了長時間的談話，我是不是應該說一下，要感謝國家安全局沒有把我們的談話掐斷。

徐文立：中國經過二十年的變革，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人的思想也在起變化。獲得自由後，我還沒有受到更嚴重的威脅，我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進步。但願這不僅僅是權宜的安排，否則外界會覺得中共和中國政府是看著外國人的臉色，或是想跟外國人拉關係，才對持不同政見者、從事民主人權活動的人士稍微寬鬆了一點。但願是他們經過獨立思考，感覺到中國社會已經起了變化，再用老套套去解決問題已經不行了，我希望是這樣的一種進步和發展。

韓東方：看著外國人的臉色，來制定對付從事中國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政策……

徐文立：那就根本沒資格去批評別人什麼賣國主義、崇洋媚外。如果是那樣的話，首先要批評自己。確實我們中國人的事情，應該主要由我們中國人自己來做好。

韓東方：其實，警察能聽聽咱們的討論也是有好處的。

徐文立：據我所知，最基層的警察只要不貪污受賄、敲詐勒索，他們的生活處境也不比在崗上和下崗的工人好多少。他們的工資並不高，住房問題在中國的各個群體中算較為困難的，別的單位還有分房子一說，最基層的警察就沒有分房子一說，所以不得已向直轄區的單位要房子。現在住房私有化了，要自己買房子，他們是一般公務員，工資低，沒有條件買。只要比較廉潔，不去收受賄賂的話，幾乎根本甯想買房子這事。

韓東方：聽到我們談話的警察，或是正在搞錄音的警察，應該想一想，應該有權利組織警察工會。

徐文立：各個國家不一樣，有些國家允許一般公務員組織工會，有些國家是不允許的。

韓東方：在我們國家，警察也可以考慮一下自己有沒有權利組織一個警察工會，到公務員工會裏為本階層利益和政府的主管進行談判。

徐文立：據我知道，西方社會和香港特區的警察的待遇都是蠻高的。

韓東方：即使不可以，想一想，成立獨立工會，這個爭取的權利是有的吧。

徐文立：當然不成立工會，用其他的方式也能夠維護自己的行業權利。

韓東方：對不起，耽誤了你這麼長時間。

徐文立：我可能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韓東方：講得很清楚，謝謝！

就中國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

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屆代表大會籌備機構並轉

全國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外宣佈，將於三月初召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使大會更具民意基礎，我特就中國政府應該無保留地全面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向大會發表以下意見。

一九八六年，中國外長在談到聯合國通過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二十周年時指出：「兩個公約對實現《聯合國憲章》關於尊重人權的宗旨和原則有著積極的意義，我國政府一貫支援這一宗旨和原則。」十一年後，即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國政府代表終於正式簽署了聯合國的重要國際人權約法之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表示中國政府不僅在「普遍人權」的觀念上開始嘗試與國際接軌，而且準備在「普遍人權」的制度建設方面向前邁進。為全國人大準備完成中國政府加入這一國際人權公約的最後批准手續，和中國政府準備加入《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建議：

第一，全國人大應全面地無保留地批准中國政府加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並承諾實施公約所載明的公民應享有的全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第二，全國人大一旦批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就應以法令的形式責成全國所有主要媒體，全文刊登或播出該國際公約，並予以廣泛的宣傳報道，以表明中國政府加入並實施該國際公約的誠意。

為確保該國際公約在中國大陸境內得以全面正確的實施，中國政府應責成各級政府結構和公務員帶頭學習該國際公約，並成為貫徹該國際公約的表率。

第三，全國人大和各級有立法權力的特區或地方人大，應依據公約的有關規定著手修改一切與公約相違背的現行法規。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強調了公民結社自由，特別提出了人人有組織和選擇工會的權利，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希望中國的各級立法機構對此予以充分的注意。

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濟改革一旦以市場經濟為取向，實質上就是承認了在國家權力之外有公民自主進行活動和交往的空間，相關的經濟組織除遵守相應的法律法規，政府機關不應隨意加以干預，而且也是難以加以干預的。隨著經濟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大陸傳統的勞工與政府之間的垂直關係，已逐步演變成純勞資之間的平等關係，因此很自然地要引入新的調節機制，以調整勞資關係和解決勞資糾紛，保護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以及調整勞資雙方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然而，當前的問題是，資方有了法律地位和權利，而在改革中被置於風險環境中的勞方缺乏應有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因為他們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合法社團。市場經濟發達和成熟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工會這一傳統的公民結社形式對於保障勞資雙方權益，規範政府行為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它可以維護社會穩定，使勞資矛盾有可能在和平、理性的法制軌道上獲得解決。這不但減輕了政府的行政壓力，也有助於樹立政府作為公正調解人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力量的地位。這正是《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強調工人組織自己工會的意義之所在。

第四，中國現行的結社體制與《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要求實現的結社自由具有相當大的差距，應立即著手加以調整、規範。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幾部憲法都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並在一九五零年頒佈，一九八九年重新修訂公佈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結社體制，雖然全國性的社團號稱有一千七百多個、地方社團有二十多萬個，但是工、青、婦三大官辦「群眾團體」獨佔鰲頭，所有社團基本上都是官辦的，其性質和功能只具有行政性，而作為社團真正的必有特性——互益性和自治性，則幾乎沒有。

不僅如此，中國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不僅是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最嚴厲的限制結社自由的法規，實際上它是廢止結社自由的法規，這是因為中國建立了一系列與結社自由相背的制度：

一、在中國仍然實行許可制度。「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組織社會團體，均應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申請登記，社會團體經批准登記後，方可進行活動。」在這一制度之下，中國公民的結社自由完全成了政府許可下的「自由」，失去了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結社自由的意義。

二、在中國實行社團的壟斷制度。「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在同一行政區域內不得重復成立相同或者相似的社會團體。」不僅如此，一九五零年的《工會法》規定，全國的工會組織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最高領導機關，凡工會成立時，均須報告中華全國總工會或其下屬的產業工會、地方工會。

三、在許可制之外，中國還進一步建立了社團「掛靠制」。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凡是申請成立社團，先應當經過有關業務部門審查同意，然後才能向有關登記部門申請登記，不僅如此，該有關業務部門還有權對社團實行日常管理。

四、在中國還實行獨特的「年檢制」。「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登記管理機關對社團實行年度檢查制度，社團應於每年第一季度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上一年度的年檢報告和有關材料。」這種制度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五、爲了與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真正接軌，我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訂憲法並加速制定新的《工會法》、《結社法》。

在當今世界上，結社自由往往通過憲法予以直接保障，這是因爲嚴格限制對結社自由

的限制，是當前世界保障結社自由的發展方向，結社自由不得由法律隨意剝奪。也有的國家通過法律對結社自由予以保障。但是，象中國目前這樣通過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限制公民的結社自由，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無論是一九五零年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還是八九年以大躍進速度修訂的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都表明中國大陸是由國務院壟斷公民結社自由的立法。中國立法機構的大權旁落，是中國國家立法權行使中極不正常的現象。此外，從中國現行憲法關於結社自由的規定看，現行憲法對結社自由的保障也是不充分的。為此，我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適當的時候對憲法予以適當修正。

為確實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我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制定《結社法》的同時，廢止下列違反結社自由的制度：

一、取消許可制。應當明確規定：公民有權自由結社，無須徵得任何許可，採取「成立後備案制」。如果當前還難以作到這一點，可在一定期限內逐步地向此目標演進。

二、廢除「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的掛靠制、年檢制、社團壟斷制。

三、加強對結社自由的保障，要徹底改變當前實行的以行政當局為核心的社團管理體制，讓社團管理實行真正自治，尤其要引入結社自由的司法保障制度。一九八五年聯合國認可的《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將法官的職責確定為：「負有對公民的生命、自由、權利、義務、財產作出最後判決的義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應確認法官的獨立的最後裁判者的法律地位。

第六、爲了貫徹實施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我建議在中國首先嘗試建立獨立工會。

在當代民主和法治社會中，結社自由的權利應當是平等的，但是鑒於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獨立工會的建立予以特別關注，例如，該公約第八條規定：

「一、人人有權爲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並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僅受有關組織規章之限制；

二、工會有權成立全國聯合會或同盟，後者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

三、工會有權自由行使職權，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爲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第七、全國人大應儘早授權中國政府全面地無條件地簽署《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予以批准。

謹祝大會成功！

徐文立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

主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抄送：國內外媒體和有關單位
敦促中共當局在民族問題上放棄鴛鴦政策

積極回應達賴喇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呼籲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接管政權以後，以高壓和懷柔兩手解決民族矛盾，在似乎平靜的民族問題之下，始終潛伏著爆炸性的危機。文革時期的「沙甸事件」就是明證。然而，中共領導人卻常常不無得意地對內對外宣稱，中國不象前蘇聯那樣存在著嚴重的民族矛盾。這種鴛鴦政策，極大地防礙了中共接受當代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原則。

近幾年，中國大陸境內民族矛盾的多次激化，特別是西藏問題的凸顯，有理由令人擔心，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要實現的政治轉型中，民族矛盾的岩漿會隨著政治結構的不可避免的鬆動而迸發出來，給中國社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古訓曰：未雨先綢繆。

我希望中共當局在西藏問題上，再也不要無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民族和宗教領袖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再也不要一次又一次地放棄回應達賴喇嘛呼籲舉行和平談判的良好願

望。

今晨從外電廣播中，我再次聽到達賴喇嘛鄭重宣告，不謀求西藏獨立，並願意在中央政府擁有西藏防務、外交兩大權力的條件下，實行高度自治。既然，在香港能實行「一國兩制」，中共有什麼理由拒絕「一國之內西藏民族高度自治」的合理要求呢？

爲此，我建議中共當局：

一、首先，公開確認達賴喇嘛作爲西藏民族和宗教領袖的崇高地位，停止對達賴喇嘛的一切人身攻擊，追補祝賀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並將此獎項的獲得作爲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榮譽予以肯定。事實上，正是因爲達賴喇嘛堅持「和平理性」的政治路線，才避免了西藏境內出現如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出現的恐怖暴力事件。

二、中共既然一再對外表示，只要達賴不謀求西藏獨立，其他一切問題都好談。那麼，現在就應該兌現自己的諾言，積極回應達賴喇嘛有關和平談判的呼籲。

三、中共當局應承諾在西藏地區實行「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原則；承諾尊重西藏的民族傳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承諾西藏爲無核地區（包括核廢料存埋），並協助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凡國家需在西藏境內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必須首先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並照顧西藏自治當局應有的權益。

同時我們也希望，達賴先生充分發揮自身的巨大影響力，規勸少數謀求西藏獨立的人士放棄這一要求，與中國境內各個民族一起建設一個民主、富裕、自由的中國而共同奮

門。

同時，我們還希望，達賴先生能說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層人物和一切流亡在外的西藏同胞，尊重西藏這幾十年來的變化，捐棄前嫌，不算舊帳。並與中央政府協商，允許不願意在高度自治後的西藏生活的各族民國自由地遷徙到他們願意去的地方居住，並妥善安置。

同時，我們更希望，達賴喇嘛信守一再宣佈的，不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政權的承諾，在實行「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條件下，率先實行憲政民主，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西藏。

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農曆立春

致九屆人大的嚴正聲明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

我不希望看到貴代表大會開幕之日，是我的朋友受難之時。我不希望中共當局重蹈自己二十年前已經鄭重宣佈放棄的錯誤信條：「革命人民」開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遺憾的是，當我的朋友們對貴會寄予厚望，真誠地從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國防以及立法、司法、行政監督等等諸方面，代表各界人士，公開發表他們的寶貴建議的時候，二月二十五日傳來了福建著名的中醫大夫、對日索賠鬥士林信舒先生被當地警方非法軟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海著名異議人士楊勤恒先生被抄家並拘禁，二十八日才接到當地警方通知楊被刑警拘留，指控他擾亂社會秩序；與此同時，上海另一著名異議人士張汝雋也被傳喚；二月二十八日一早又得知，安徽著名持不同政見者馬糧鋼先生的家，凌晨五點被抄，馬先生被警方帶走，事後警方告知他被刑事拘留，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同時，安徽另一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沈良慶先生從二十六日起，至今下落不明。

如果一個國家安全，能被公民的公開的不同政見所危害，那麼，這個國家的安全豈不是太脆弱了嗎？如果一個社會秩序，能被公民的公開的異見所擾亂，那麼這個社會秩序還能稱為正常的社會秩序嗎？一個國家的議會，召開換屆會議，如果需要靠監視、軟禁、拘押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來保障大會的順利進行，豈不是貽笑天下嗎？所以，我真誠地希望貴會能在開會之前，通過第八屆人大常委會責成地方有關當局徹底糾正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打壓異議人士的錯誤作法。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北京公民徐文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

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

——專訪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徐文立先生

安琪

鄧小平之後，當國際輿論的焦點終於從江澤民身上轉移到中國社會的大背景上時，國內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徐文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立刻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被稱作新一輪「北京之春」的國內民主人權氛圍，經過多年的努力，在中國政治的轉型中，正在拓開八九「六四」以來的民運新空間。徐文立先生——這位久經考驗的七八年「民主牆」的老戰士，正是中國大陸新一輪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

徐文立一九四三年七月生於江西安福，原籍安徽安慶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家庭。他六四年畢業於北京七中，曾在海軍航空地勤部隊服役五年，復員後在北京鐵路分局任電工。

徐文立自幼受家庭的影響，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理念，一九七六年即參與「四五運動」，七八年以同等學歷報考北京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同年底在西單「民主牆」創辦《四五

報》和《四五論壇》。期間，因第一個提出討論多黨制問題和為文革中被毛澤東迫害致死的遇羅克和遭鄧小平迫害的「民主牆」戰友魏京生、任曉町、劉青、郭羅基等人鳴不平，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被當局秘密逮捕，並以「組織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十五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四年，成為當時「民主牆」判刑最重的異議人士。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當局迫於國際輿論和爭取二零零零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壓力，在與美國有關最惠國待遇的交涉中將徐文立假釋出獄，是時，中國大批持不同政見者陸續被迫流亡海外，國內民運處於高壓低潮狀態。

面對此景，徐文立先生多次婉絕了朋友們幫助他出國訪問的邀請，決心繼續堅持在大陸本土從事民主人權事業，在「剝權期」的四年中，他克服重重困難，利用各種機會，多次離京外出，廣泛地接觸和瞭解社情民意，足跡遍及中國十多個省市。

一九九五年，徐文立先生在深入研究海內外民運的基礎上，對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發展提出了建議性的意見，並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出版了四十萬字的《徐文立獄中家書》，被有關專家視為他多年自由民主思想的結晶。

正是由於長時間的積累和準備，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徐文立先生結束了「剝權期」，獲得了完全的自由後，便和他的朋友們一起，開始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民主活動。在鄧、江政權的更替和政治轉型過程中，成為一支令人矚目的社會民主力量。由於他主張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思想，更由於國際環境的改變和共產黨自身結構的改變，從而在

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次有可能形成一個朝野良性互動的社會氛圍，這對緩解中國的社會危機，促進共產黨的進一步蛻變，推動中國的政治變革和經濟上的全面開放，無疑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對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建立民主多黨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在美國對居住在北京的徐文立先生進行了長途電話採訪，恰值王丹剛獲保外就醫來到美國，徐文立先生不顧電話被警察監聽的危險，首先對王丹獲釋表示祝賀，指出應該將此看作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微小進步。但是他對中國政府依然把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作為人質跟美國和西方國際進行政治和經濟上的交易行為，表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他說：「我不希望中國政府再進行這樣一種不光彩的作為，把自己國家的公民作為一種政治的籌碼的做法，是違反國際人權有關準則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希望停止這樣的錯誤做法。」

這次採訪進行了近兩個小時，正當我暗自慶幸採訪將要結束時，徐文立先生的電話突然中斷了。我連續撥了幾次，都撥不通。一小時後當我終於聽到電話那頭徐文立先生樂觀沈著的聲音時，懸著的心才放下來。然而，這一意外「插曲」，對我的觸動卻是深長的。值此，我向徐文立先生和國內的朋友們道一聲珍重，但願自由的日子不會太遠。

中國民運正在尋求新的突破

安琪：你自從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獲得完全自由以來，做了很多有建設性的工作，請問你個人的角色定位是什麼？

徐文立：從事民主事業的朋友們多年來都在做出各自的努力，我個人的努力只是這其中的一部分。我在大陸從事民主活動的過程當中，主要起一個協調作用。由於我身居北京這樣一個有利的地理環境，能夠跟世界各國的媒體和國內各地的朋友進行接觸，跟海外朋友的聯絡也比較方便，利用這些條件我因此多做了一點協調的工作。今後我想更多地跟國內外的朋友一起搭這個臺子，大家共同來唱好民主人權事業這一場好戲。

安琪：你一向主張漸進改革，請你闡述一下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

徐文立：這是我公開從事民主運動以來的一貫思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號，我發表在《四五報》（即《四五論壇》的前身）創刊號上的發刊詞內容，就體現了這種漸進民主的思想。我認為中國當時的當務之急是改革，而改革會造成一種多元的形勢，不過中國不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再出現動蕩局面，所以要推進這項政治改革，就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過程中，早期共產黨員很多人都是熱血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曾抱著美好的願望，也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是到後來卻走上了一條專制獨裁的道路，這同他們選擇了激進、暴力和革命這樣一條道路是分不開的。我不懂得武裝的重要性，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一槍可以打死一個人，一炮可以轟炸一批

人，武裝的力量有時看起來好象比理論和語言更厲害一點。但是，我不迷信它。因為那樣做的結果，共產黨走上了跟國民黨沒有兩樣的獨裁道路，這個歷史悲劇不應該在中國重演。所以我們寧可把時間拉得長一點，付出的代價多一點，用以柔克剛的辦法解決問題，中國倒有可能走上一個真正民主的多元社會，這樣的社會給大家帶來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幸福。

安琪：最近你向中國當局提出在國內建立「中國人權觀察」的申請，具體設想是什麼？

徐文立：今年三月二十號，也就是在中共的人大和政協會議之後，我以個人名義向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發出了一個申請，要求建立民間社團組織「中國人權觀察」。同時，武漢的秦永敏先生向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提交了一個創辦民辦刊物《公民論壇》的申請，杭州以王東海、毛國良先生為首的一些朋友向提出了一個創辦《人權報》的申請，也就是說，這一社、一報、一刊，是大陸從事民主運動的朋友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四套新領導班子建立之後，向他們提出的新要求，希望在民主人權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我始終認為，只是釋放一些比較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或者改善了他們的一些條件，並不能說明中共在人權民主方面有實質性的進展。在人權民主事業上有實質性進展的重要標誌，就是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的突破和結社自由的突破。我們提出一社、一報、一刊，正是尋求這樣一種突破的嘗試。

安琪：當局對此有什麼反映？

徐文立：很遺憾，這三個要求，都沒有得到他們積極的回應。於是我們有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在武漢秦永敏先生以個人發言的形式主持《人權觀察》。《人權觀察》從三月二十號創刊，辦到第六號的時候，武漢當局提出疑義，禮貌地約請秦永敏先生會晤。秦先生跟我商議，我們能不能在他們提出疑義的情況下進行一些調整？我認為在大陸從事民主人權事業，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相當的彈性和靈活性，所以在不改變我們的方向的前提下，我同意秦永敏先生的決定，暫時取消《人權觀察》這個刊名。但這四個字眼上已開了天窗，所以仍然保留它的序號。到今天為止，該刊已經發了三十號，效率之高，內容之廣泛，都是空前的。在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全體朋友的幫助和支援下，秦永敏先生做了非常有效的工作，取得了成績。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顯示我們在這方面可能得到某種突破。我希望海內外的朋友們對此給予高度的關注。

中國政府不必在人權問題上矮化自己

安琪：你怎樣評價國際社會在促進中國人權方面的戰略性轉移？比如說取消經濟制裁，以對話方式來促進中國人權？

徐文立：人權問題不僅中國存在，歐美和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但是其嚴重性絕對不

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中國的人權問題是極為惡劣的，特別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震驚了整個世界。以這個事件為契機，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包括各國人權組織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人權政策給予嚴厲的批評和指責，伴之於一些經濟制裁措施，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當的。這些批評和譴責，震驚了中共的各個階層，使他們意識到人權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在經濟改革和改變自己的國際形象以取得更多國際投資的同時的一個巨大的障礙，這似乎是纏繞在他們身上的一個惡夢。一九八九年之後，負有主要鎮壓責任的鄧小平，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據我所知，鄧小平曾經責成有關部門去研究人權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做出了一些改善的姿態，希望能夠贏得國際社會的諒解。於是隨著江澤民的訪美、簽署《社會經濟文化國際公約》之後，又承諾簽署第二個公民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整個來說，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特別是鄧小平逝世以後，他們想在國際上改善人權形象的努力。這些努力雖然說不帶有實質性，但是畢竟有一定的進步。在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人權政策已經有所改善的情況之下，歐美一些國家調整了他們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從事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們，沒有權利和必要去強求各國政府一定要按照我們的意思去做。

我個人更喜歡用「批評」，而不喜歡「譴責」這樣的字眼。因為要考慮到，各國政府提到中國人權問題的時候，不僅譴責中共和北京政府，而且冠以「中國」這個詞，這對國內許多有民族主義情緒的老百姓來說，會對「譴責」這樣的字眼產生反感。你可以說這是

狹隘的民族主義，但也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正常的民族感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選擇批評和繼續對中國人權問題給予關注，以及用政府的對話方式來促進中國政府改善人權的政策，還是明智的，事實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不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放棄自己道義上的責任。

另外，我認為中國政府也沒有必要在人權問題上矮化自己。中國政府同樣享有國際公約賦予它的權利。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也可以在國際社會以與其他政府平等的地位去監督某些包括歐洲和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的人權不盡人意的地方。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批評正是促使整個國際社會人權問題得到改善的一個有效機制。人權是沒有國界的，它是一個普遍的原則，對任何個人的人權侵犯，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價值的一種侵犯。所以，我們有必要強調中國政府也可以去批評別人，如果中國政府按照國際公約去做的話，它也就再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對中國人權的批評是干涉中國的內政了。

共產黨的基本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

安琪：這種情況說明，整個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共產黨也在變化。從你的觀察來講，共產黨在哪幾個方面發生了變化？

徐文立：歐美國家對中國政府人權問題批評策略的調整，反映了當今世界的大潮流。

整個世界已經從過去強調革命、強調對抗、鬥爭的態勢走向了強調對話、合作、經濟一體化，在各方面採取更加容忍的態度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也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一些變化。第一，共產黨領導層的基本結構起了變化。它已經不再是那些所謂槍桿子打天下的人執掌政權了，它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整體上的更新換代。新一批領導人，大部分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知識結構也與以往的領導人有很大不同，他們多多少少都接受過一些歐美教育。據我所知，中共當政者的那些智囊團在思想上還是比較開放的，比如說最近出的以反左為主要內容的《交鋒》一書，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本書的主要幕後策劃者劉吉，就是江澤民智囊團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個左傾得勢的歷史，現在出這樣一本書，以反左為主要物件，特別批評了鄧力群等人所炮製的四個左派「萬言書」，反映了中共上層結構發生變化之後，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更加開放和開明的前景。

第二，隨著經濟改革的進一步開放，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過去那種垂直的結構方式，變成了雙層結構方式，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在逐步出現和形成。中國社會基本結構的變化，使得過去一黨專制的力度有所弱化，整個社會結構走向了多元。另外，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共產黨也逐步意識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發展經濟的結果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民主社會的形成，這個發展方向是誰也抑制不住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逐步地從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的趨勢已經是不可避免的。

了。

第三，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也是比較明顯的。例如七九年時我提出取消馬克思主義一家獨尊，還是大逆不道的，現在已經逐步地成為現實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使得馬克思主義又回到了它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科學的地位上。在國內知識界，誰要是還單單地奉行馬克思主義，而不接受其他的思想體系，好象已經成為一種笑話了。

安琪：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傳統的階級鬥爭的概念還有沒有現實意義？

徐文立：說來奇怪，關於階級、階級鬥爭的概念，共產黨人自己已經不這樣提了。特別是一些淺薄的官員，好象提到這兩個詞都感到很羞愧。我倒反而認為人類社會肯定是有階級和階層的，不同階級和階層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絕對會不一樣。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質，亙古不變。我們反對的是把階級鬥爭的理論絕對化，反對一切以階級鬥爭為轉移，用階級去劃分人的善惡、美醜的思想方法。

民運應該跳出共產黨的傳統革命理論

安琪：從最近的情況看，包括王丹繼魏京生之後也獲保外就醫，國內流傳的「方覺書」，出版反左專集《交鋒》，以及北大民主討論氣氛的復蘇等等，有人說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出現的社會多元化，這是否可以看作國內民運的空間也有所擴大？

徐文立：應該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改善，政治氣氛有所寬鬆，這是海內外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們共同努力的結果。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使得八九年「六四」後萬馬齊喑的局面，經過九年的奮鬥而有所復蘇。可以說，中國新一輪的「北京之春」的出現是可能的。特別是去年下半年以後，堅持在大陸從事人權民主事業的朋友們，已經成功地開創了「空中民主牆」。這是二十年前西單「民主牆」的延續，它以國際媒體、國際電腦網路、電話、電傳和一些現代化科技的手段，形成了跨越中國大陸，連接歐美海外朋友的「空中民主牆」。這個前景是否能夠鞏固下來，還很難做最後的預測。所以對目前的形勢，我個人保持一種審慎的樂觀。

安琪：你認為中國民運的目標和任務是什麼？比如說，民運還有沒有敵人，如果有，這個對立面是誰？

徐文立：中國民運首先要改變自己從共產黨學到的許多理論和思想，這是一個最根本的任務。我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就是革命的理論和思想，這種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整整耽誤了一代人。我並不是簡單地去否定革命的必要性，在某種條件之下，革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總體上它對人的危害和副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應該從共產黨當年灌輸給我們的窠臼中擺脫出來，建立一套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套思維應該是奠基在一種雙贏雙勝的理論基礎之上的，現在國內有很多朋友在做這樣的建樹。

我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跟路透社記者艾伯樂先生的談話中，提出中國當前民主運動的

總目標應該是這樣幾點：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重塑憲政民主，保障人權自由。中共有關方面找我談話的時候，我一再強調，我用的是結束，不是打倒，也不是推翻，而且並沒有提出由誰來結束。實際上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正在做這種結束的工作。中共不是誰能夠打倒，也不是誰能夠推翻的。另外，我也勸導中共不要因東歐和前蘇聯的巨變而產生一種恐懼感。那裏的變化說明共產黨如果放棄一黨專制，對自身黨的前途並不可怕。我們看東歐和前蘇聯於一個輪回之後，現在基本上還是前共產黨變化了之後的社會民主黨或者民主社會黨人在執掌政權。我甚至勸說他們應該放心地看到，中國民主人權的力量還非常弱小，還很不成氣候，還不具備以反對派和反對政黨的形態出現。它只是這個東西的雛形，離一個像樣的反對派組織還差得很遠。我希望海內外的朋友都能客觀地看待自己，也勸中共當局如果走向民主社會，依然可以依靠他們所擁有的人才和管理、領導國家的經驗，繼續成爲一個執政黨。

安琪：總目標確定之後，民運的行動綱領是什麼？

徐文立：目前在大陸從事民主運動的朋友們，堅持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路線。用這樣一種方式來達到上述的，對共產黨也並不是一個恐懼的目標，這對於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前景。他們達到一定的退休年齡時，恐怕不希望象現在的華國鋒或者趙紫陽先生那樣，處於一種軟禁和半軟禁的狀態。他們可能會羨慕象雷根、布什那樣，退下來之後能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我們要以新思維和新方法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

業。考慮到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法制的不盡健全。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在改變政策方面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在目前情況下基本上堅持的是緩結社，廣交友的對策。在具體的工作推動過程中，既堅守自己的原則，又有相當的靈活性，歸納為四句話，就是「進一步退半步，得寸不進尺，張馳有度，進退自如」。希望跟中共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朝野雙方都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得中國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當然我們更強調，滯後了的政治改革，不應該再滯後。

「我們不可能成為共產黨的一部分」

安琪：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共產黨可以通過自身的改變來進行民主建設？或者說，中國的民主機制也可以通過共產黨來建立？

徐文立：我想在民主的進程中，共產黨可以作出貢獻。剛才你提到的方覺先生的「方覺書」，雖然並不是高層和中層的一些人直接參加了，但是起碼反映了黨內部分人的想法。「方覺書」和方先生本人並沒有受到特別的壓制，這也說明「方覺書」所代表的一些思想，已經在中共內部有相對的市場，很多問題已經不可能簡單地用黨內過去那種殘酷鬥爭和批評的方法來解決了。

安琪：在這個意義上講，民運跟共產黨是不是有了一種對話與合作的基礎？

徐文立：是的。

安琪：如果共產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在某一點上跟民運的目標一致，那麼民運

敢不敢公開支援和幫助共產黨來進行改革？

徐文立：民運人士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多黨制、多元化的社會，我們不可能成為共產黨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加入進去，即使共產黨演變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不會成爲他們的成員之一。正象我一九七八年在《四五報》的發刊詞中所說的，中國社會需要有一個對立面，才可能推動社會制度趨向合理，應該將競爭的機制引進到政治生活當中來。我一貫堅持這種思想，我個人和我的朋友們不會去謀求進入共產黨體制內。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積極變化，給予某種程度的肯定，但不會給予過分的讚揚，因爲我們的重要責任是監督和批評。我對有關當局說，我們是一個壓力集團，壓得你們可能很不舒服，但是我們的社會責任要求我們這樣去做，儘管這樣做很危險，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安琪：這就是一個反對派的角色。反對派應該以促進社會的發展和良性迴圈爲出發點，而不只是意識形態化地爲了反對而反對。

徐文立：是的。例如對於當局釋放王丹，我們給以肯定的評價，但這是一個很有限度的評價。對於朱鎔基我們也是有限度地肯定，不去讚揚他，主要還是批評監督。

安琪：最近你會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趙紫陽的人權，並提名他獲諾貝爾獎，關注趙紫陽的人權是很有意義的，對於提名趙紫陽獲諾貝爾獎，外界有不同的看法。請問你這個提議的基本想法是什麼？

徐文立：提名趙紫陽獲諾貝爾獎的發起人是金堯如先生，金先生是一個資深的社會活動家，他的一些提法我是贊成的，所以願意作為他在國內簽名的聯絡人之一。金堯如提出更多地去團結中共內部的民主開放人士，這是正確而有意義的。另外，我們應該從新的角度去看趙紫陽先生的人品，他所堅持的理念，特別是他在八九年後的改變，而不應該固守於八九年以前的趙紫陽先生的形象。

不應指望中國象「鐵塔尼亞號」那樣沈沒

安琪：你曾經發出《告全國工人同胞書》，又有獨立工會章程，在這個方面希望有什麼進展？

徐文立：《告全國工人同胞書》是武漢的秦永敏先生起草的，他做了主要工作，我負責修改。為了取得廣泛的聯繫和影響，在海外設了兩個聯絡人，一個是美國的王希哲先生，一個是香港的盧四清先生，北京是我負責聯絡。這件事情突破了共產黨既想簽署有關的國際公約，又不想讓國內的人知道工人有權建立工會的事實，所以有巨大的影響和意義。它對中國未來成立真正的獨立工會，奠定了很好的理論和法律基礎。但在目前情況下，恐怕還難以在國內成為事實。原因之一是中國工人對組織的意識並不是非常強烈。更重要的是，中共對此非常警戒，懼怕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事會在中國發生。我曾經跟官方

笑談，我說你們不必要這樣恐懼，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出現像波蘭那樣經過漫長發展的獨立工會的基礎，也沒有象瓦文薩那樣經過長時間工會鬥爭的領袖人物。另外，波蘭畢竟是一個小國，一個或者幾個企業就可以決定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中國這個大國，即便武鋼、鞍鋼或者大慶這些龐大的企業成立了獨立工會，都還不可能左右整個國家的政治方向。

我們朋友間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象共產黨以往那樣操縱工人農民，發動工人造反，農民起義去奪取政權。那種想操縱一切，領導一切的結果，還是可能走向專制，跟共產黨沒有什麼兩樣。真正的獨立工會，如果不演變成一個政治組織的話，它主要是維護工人的權益。在目前，主要還是尋找法律上的依據和理論宣傳。據我所知，在工人朋友，特別是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比較集中的地方，這些工作還是有進展的。比如在廣州，已經有一些朋友向政府提出正式申請，但是受到了壓制。大同的李慶喜先生把《告全國工人同胞書》貼到了牆上，被勞教一年。由於外界的壓力，當局就把他放在家裏執行了。東北一些工業城市的朋友，也正在做這樣一些準備和努力，但目前條件還不成熟，需要一個過程。

安琪：你們的宣傳和努力是不是說明爭取以談判解決問題的機會已經到來？

徐文立：對。我們在《告全國工人同胞書》中明確地提出，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態勢之下，會出現大量失業和下崗問題。我們號召工人朋友盡可能地不訴諸街頭爭抗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學會用組織的力量，坐到談判桌上解決問題。要走到這一步，需要雙方的努力，

執政的共產黨能不能接受這一點是很關鍵的。當然，讓他們接受這一點也需要有一個過程。象美國允許獨立工會如勞聯的存在，也是經過了長時間的努力。我跟中共當局說：東北長春一帶出現了所謂「刨根黨」，就是用鈍器打擊他想打擊的物件的後腦根。與其讓這種暴力大量出現，還不如讓工人組織起來，推選代表，大家比較理智地跟資方進行談判。政府倒不如做好人，不偏袒勞方和資方任何一方，依據法律，來調整勞資之間的矛盾。

安琪：這是緩解社會危機的一種辦法。

徐文立：是的。否則社會危機的總爆發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動蕩，對於任何一方都不利。有些朋友可能指望國內產生大亂，由此可能提供機會，這個想法是很危險的。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各國政府恐怕都不會支援這種做法。中國一亂，就會造成不可預計的難民潮，這將是周邊國家和發達國家都無法接受的事實。如果真正對人民負責，就不願意中國象「鐵塔尼亞號」那樣徹底沉沒再去復蘇，還是要在不產生大動蕩的情況下，走比較穩步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道路。歷史告訴我們，亂世帶不來民主，亂世只會出專制和奸雄。

工人階級應從過去的幻境中解脫出來

安琪：盼亂的心態肯定是不得民心的，但是在說服下崗工人理解中共對國企的改革，防止出現「亂局」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工人自身的承受力？

徐文立：這一點有兩個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敦促政府拿出切實有力的措施，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證下崗失業工人的合法權益。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不斷呼籲和作出努力時，看到政府和中共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長時間以來，中國報刊和電視，都把解決下崗問題作爲一個中心內容來報導。當局知道，處理不好，就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的動蕩如果是以工人問題爲爆發點的話，那就會比「六四」問題嚴重得多，這一點他們已經意識到了。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政府從上到下意識到問題的症結，解決起來就比較有利。

另一方面，通過我們告訴工人朋友，不要再沈溺於過去那種當「領導階級」的錯誤幻境之中，而應當解脫出來。工人階級從來不是領導階級。中共也從來沒有把工人階級當過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應有的權利應該通過組織工會的方式去謀求。在計劃經濟轉軌至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出現下崗失業，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嚴峻現象，它也可能會激發在崗的和沒有上崗的一些人而努力學習，參加培訓，增加自己的才幹，這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原動力之一。如果人們都安於吃大鍋飯，社會永遠不可能進步。擇業者也必須有所變化，不要只迷戀於鐵飯碗的國營企業，應該把眼光放在自己做老闆，當個體戶上。通過個體職業的方法，來解決下崗和失業的問題。這是在觀念上的一個變化。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促進政府加速經濟私有化，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應當看到，新一屆中國政府在加強基礎建設方面，更多地創造就業機會方面，正在做出努力。

安琪：你怎樣看現在正在興起的「朱鎔基熱」的現象？

徐文立：我不希望中國再出現這個熱那個熱，我們號召工人朋友在建立獨立工會的過程中，也一再提醒不要搞一哄而起，應該根據當地工人的覺悟程度和要求程度去做事。中國不能再這個熱，那個熱。熱來熱去，到了冷下來的時候，就可能發現我們還是兩手空空。對朱鎔基先生也是這樣，對他爲人比較正直，爲官比較清廉這一點和對目前施政方面的一些新氣象給以肯定也就足夠了。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們，不宜要一些小計謀，想促成中共上層的矛盾，然後有機可乘。這種想法很危險，上層內鬥起來的結果，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蕩。我不指望朱鎔基先生跟江澤民先生之間產生內鬥，我倒希望他們能夠協調地一起工作，爲中國的經改和政改做出貢獻。朱鎔基先生畢竟也是近七十歲的人，雖然有過右派的經歷，但是要在政治上指望他非常開明、正直，引導中國走向民主社會，這種期望也過高了。從他在記者招待會上侃侃而談，卻對政治題目和個人的右派經歷回避，以及對「六四」問題跟鄧小平態度沒有什麼兩樣的情況看，我認爲對他的期望值不應過高。

中國民運並沒有產生真正的領袖

安琪：最近關於王炳章回國一事引起了很大的風波和爭論，包括他回國的方式，例如建立地下反對黨，對國內人的安全的影響等等，在海外都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也反映了海外民運回歸大陸的一種期盼。你個人怎樣看待這些問題？

徐文立：國內的朋友有一個很好的合作方式，就是任何重大問題發生了都能夠及時通過電話進行協商，達成一致的共識。在王炳章的事情上，我們基本上有三點意見。第一，首先應該指出，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黑名單的措施，使得海外的一些朋友不能夠自由地返回自己的祖國，這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精神的。所以王炳章先生的任何舉動，負有主要責任的是中國政府。不應該因為王先生在某些做法的不恰當而過分地去責備他。第二，從事民運活動的朋友，不享有任何特權，不管你是在祖國生活也罷，還是在其他國家生活也罷，應該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法規。第三，鑒於剛才說的第一點，王炳章先生闖關有他的特殊原因，所以我們希望美國政府對於王炳章先生在闖關當中如果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美國移民局的法規的話，能夠給以諒解。

王炳章先生和其他朋友從事的一些政治活動，比如象中國民主正義黨，或其他組織秘密黨的活動方式，有他們自己的理由和存在的道理。政治生態環境當中，不應該只有單一的方式。我們堅持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政治路線，卻不該輕易地去否定別人的做法，因為政治生態當中需要多種形式，才可能產生應有的效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王炳章和其他人的一些做法，我們這種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難以存在，或者難以體現出它應有的價值。

安琪：從王炳章事件上，又引申出了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的老問題。就是說，海外民運怎樣才能建立正常的批評機制？你覺得民運內部的原則性問題是不是可以展開批評、民

運領袖有沒有不被批評的豁免權？

徐文立：在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當中，現在很難說誰是領袖，這個提法本身就不太準確。領袖人物應該是真正地領導過幾次像樣子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之後才有可能產生。雖然中國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有過「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後來又經過幾次學潮，有過八九民運，但都不是非常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活動，所以很難說在中國民主人權的隊伍中有真正的領袖人物。

但是，即便成了領袖，也沒有不被批評的豁免權。我經常跟一些朋友們說，民主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是專治那些政治家 and 想成為政治家的人，主要是監督他們，它給予老百姓以最大自由，只要你不違反有關的法律法規，你什麼事都可以做。相反，想做一個政治家或者已經在做政治家的人，更要檢點自己，更需要接受別人的監督和批評，他不但沒有什麼「豁免權」，在某種意義上他反而更應該有被批評的所謂「特權」。

另外，不要把所有的批評和必要的鬥爭，都看作是面子之爭，或者是名利之爭，地位之爭。否則就會帶來兩個很大的後遺症，一是認為在民主人權事業當中，沒有原則問題。二是將來出現了原則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批評，不鬥爭？批評和鬥爭的過程當中，難免夾雜著一些面子問題，名利問題和權利問題，甚至在海外還存在著一些金錢問題。但這兩種問題不應混淆，應該看到都是客觀存在著的。

不要爲自己的心路歷程感到可恥

安琪：你是一九八一年以反革命罪被判重刑的，當你聽到中國憲法裏取消了反革命罪時，感想如何？

徐文立：中國共產黨過去制定了一個反革命罪，非常牽強附會，不符合人類社會的法理。當時對我的判決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對此，我無怨無悔。因爲說老實話，我並不主張革命，但是非要給我扣上一個反革命帽子，我也未必不能接受。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我不是反革命，而在於我主張中國應該走向民主的社會理想是正確的。政府對我的判決完全是一種人身迫害，直到現在我保留著在這個問題上對他們有起訴的權利。

安琪：有人說你當年主辦《四五論壇》的思路，沒有跳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是這樣嗎？你的信仰基礎是什麼？

徐文立：一九七八年我先是辦《四五報》，後來跟趙南先生合作辦《四五論壇》，由於我追求的是一種民主的理念，不希望是我們內部有不平等的地位，所以當時就沒有設總編，只採取了召集人的制度。三個召集人中有我、呂樸、劉青，我們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從我個人的行爲和思想可看出我是完全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化的馬克思主義的。

安琪：據說你父親是一位自由知識份子，他對你的影響是不是很重要？

徐文立：我的父親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他在學生時代曾因參加民主事業而遭被捕。被保釋出來後，他又去學醫，之後當了教員。一九三七年他領著學生逃難過程中，看到前方將士死傷很多，就毅然決然地帶著他的學生從軍了。由於他的外科醫道很好，所以很快就成為抗日戰爭後方醫院的院長。八年抗戰期間，他一直堅持在江西。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我父親對於國共的內戰和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非常反感，所以從思想感情上比較傾向於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初，他帶著一個部隊在福建的北部盤旋，沒有執行國民黨讓他從馬尾渡到臺灣去的命令，後來就把他的醫院交給了三野。在這個過程中，他曾經救護過共產黨的一些受傷高級幹部。在抗美援朝中，我父親成為福建省第一個因公犧牲的烈士。

父親的一些民主思想和作風，特別是他的社會責任感，給我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他不是簡單地去支援某個政黨，而是哪個黨為國家民族做好事，他就支援哪個黨，去為這個黨做事情。按說，他當時在國民黨作為一個軍醫，已經到了少將的地位，如果按照這個路子去攀升的話，應當可以當上國民黨的高官。但是他並沒有選擇這條路，當國民黨腐敗了，他就唾棄了國民黨。四九年以後，他很快受到共產黨的整治，但是他對共產黨初期禁除鴉片、妓女的政策是贊成的。受這樣一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份子家庭的熏陶，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我有時候可能很不識時務地做一些事情。我覺得，只要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好處，我都會毅然決然地去做。這有時可能有損我個人所謂的聲譽，但我都在

所不惜。

安琪：共產黨的傳統教育，對你的影響如何？

徐文立：共產黨的一些教育和思想，並沒有完全把我原來的根給取消。但我們這些人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要想完全擺脫這種影響，或者說自己身上沒有這種影響，那是欺世盜名。有些人想以通過中共體制內發揮作用的方式，來爭取民主和自由，這都無可非議。這樣的心路歷程，植因於歷史環境和個人經歷，沒有什麼可悲和可恥。有的朋友認為我當時沒有跳出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我想這是對我個人的歷史和我的思想根源不瞭解的緣故。以前我在文章中引到馬克思的一些說法，肯定它為一種科學理論。到現在我也不認為馬克思主義一無可取，它有自己的獨立系統。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科學都不可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體系。任何一個思想體系，頂多是一個C，而不能成為一個O。人類社會的各種思想體系，正因為它是一個C，所以才能形成一個鏈形傳播下去。人類社會永遠沒有終極目標，任何一代人都會面臨自己新的問題，只不過是聰明的一代人解決了自己這一代人可能遇到的問題罷了。

現代化也不需要全盤照搬

安琪：你九三年獲得假釋，到九七年五月二十六號這個階段，你有哪些主要的體驗和

思考？

徐文立：假釋期，也是剝權期，剝權期一直延續到九七年的五月二十四號，在這個期間，我當然不可能從法理上去接受他們對我的這些制約。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特別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我覺得還不足以讓我較為公開地從事政治活動。所以在這段時間裏，我主要是學習和調整身體，另外就是用各種機會瞭解自己的祖國。中國確實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各地的情況極為複雜和不平衡，北京的城區和一百里以外的郊區，甚至可以看做是兩個世界。更邊遠的地方，農業還處於一種自然經濟的形態。我到過皖南，感觸很大。我發現這種自然經濟的形態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如果沒有橫徵暴斂，或者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要輕易讓人餓肚子，不容易。但是你要讓它非常現代化，也不容易。我認為不需要全盤照搬一些國家的現代化，應該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從九三年到去年為止，我利用去給我的父母奉安，去探親和旅遊的各種機會，我把中國主要的地區都走到了。我和我夫人合作寫了三個遊記，反映出我對中國問題的觀察瞭解。

在這個過程中，我廣泛地接觸了朋友，為現在能夠接觸更多的朋友做了準備工作。九五年我曾經以我夫人的名義公開提出了我關於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總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四點意見，是我後來關於中國民主的四條綱領的雛形，反映了我繼續追求建立多黨民主和漸進民主的基本思想。

順便提一下，我很看重我夫人九五年出版的《徐文立獄中書》，它反映了我十幾年來在

獄中對各種問題的思考。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

安琪：這本書是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的嗎？

徐文立：是的。它融彙了我對整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等各方面的思考。我們全部的通信有一百多萬字，最後截取了四十萬字。這是我們九五年花整個一年完成的工作。你也知道，我完全處在一種被監視的情況下，我不希望中共當局知道我在做什麼，所以當時非常緊張，而且怕編輯過程被破壞，被抄家，所以每出一個篇章，軟碟就要做三個，列印好幾份。我當時的點陣式印表機質量比較差，響聲比較大，有時甚至要用被子捂着列印。所以這本《家書》是在一種非常緊張甚至恐怖的情況下完成的，外界可能不太能體會。

「心中無鬼事，晝夜能安眠」

安琪：在監獄的十二年，你個人和家庭一定歷盡滄桑，吃了不少苦頭？

徐文立：我們從事民主人權事業，自己決心這樣做，付出代價，是有思想準備的。當時從事政治活動主要是七八年到七九年，那時雖然壓力很大，還沒有逮捕我，所以一直堅持跨了三個年度。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出國的機會。我當時認為，既然做了這個事情，就應該敢於承擔。我不想離開自己的祖國，因為畢竟是在中國做事情，而我是個中國人，這是

最起碼的道理。當然我沒有任何批評其他朋友被迫離開自己祖國的意思，我只是作為對我自己的一種要求吧！所以八一年他們來抓我的時候，我是非常坦然的。這一點我夫人有很充分的思想準備。她是非常堅強的女性，在我被秘密逮捕、審判、關押的一年半當中，我的夫人和孩子不知道我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被關押在什麼地方，一點消息也沒有。我夫人四處去詢問，有關當局都非常傲慢無理地對待她，這一段時間對我妻女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當時沒有受到外界的關注和支援，基本上是靠我夫人帶著孩子苦熬過來的。審判完了之後，就能夠見面了。據我們後來知道，當時是彭真、胡喬木給鄧小平出的主意，說一定不能讓我的名字見報，所以那段時間外界不知道我的情況。

一直到八五年的時候，我在監獄秘密地寫了《獄中手記》，敘述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心路歷程，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當時王炳章先生寫了一個非常感人的序言。寫了這本書之後，處境就更困難了，他們把我從一個六平米的單人房間裏，轉移到一個三平米的反省號裏，兩平米是睡覺的地方，只有一平米可以活動。我個人的心情比較平靜，開始連放風都不准，我就以對角能走兩步的辦法走，我心想，這樣走十個來回，就是二十步，每天不停地走下去，我也可以走它個二萬五千里長征。再說當年的皇帝睡在皇宮裏，不過也就是睡一個床罷了，每個人躺下，也就那麼點地方。因為每天都要開著燈睡覺，我就寫了一首詩，前兩句是：心中無鬼事，晝夜能安眠。我側重做的兩件事情，一是鍛煉身體，這一點我要求得非常強烈，就是你必須讓我鍛煉身體，實在不行的時候，我就在原地跑

步。有條件的時候，我就打球，打羽毛球和乒乓球。另外就是看書，當然看書是分不同階段了，有時根本沒有書看，有的時候就有書看，甚至有時會有很多書看。但是報紙基本上一天也沒有拉過，包括在預審期間。後來我也能夠看電視，「六四」的整個過程我都看到了，甚至他們說天安門一槍沒發，但有一個鏡頭推到紀念碑上的一個槍眼，這樣的鏡頭我都看到了。我是單獨關押，採用犯人看犯人的方法。我跟着我的那些犯人，一般來說關係都處得非常好，我經常可以跟他們談一些他們的處境，他們瞭解的情況，所以我的語言能力並沒有喪失。

我夫人的支援，對我是個巨大的鼓舞，女兒也非常懂事。對她們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但同時也一種磨煉，這使得我們整個家庭更加團結，女兒更早期成熟。所以她出國去留學，我們非常放心，知道她的學習會比較傑出。

安琪：據說你女兒正在舉辦現代繪畫和雕塑展，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我想你一定很高興吧？

徐文立：是的。但是我又很難過。她九歲的時候就離開了我，基本上是她母親一手把她撫養大的。現在她取得了一點成績的時候，我又不能親自去祝賀她，實在很對不起她。

安琪：為什麼你沒有陪同你的夫人一塊來美國參加你女兒的展覽儀式？

徐文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出來了肯定不可能回去。當然這也不能試，如果一試真是這樣的話，那和我現在追求的目標就不太一樣了。我覺得中國的民主運動的主戰場還

是在國內，它的重心也在國內。大陸很多比較著名的朋友，因為各種原因不得被迫流亡海外，在這種情況下，總還是要有一些人在國內堅持。好在我已經堅持了這麼多年，也有一些朋友抱著一種不怕再進監獄，甚至寧可把牢底坐穿的決心。既然有了這樣一個決心，那還不如留在國內。如果由於某種出國機會的誘惑，出去了而不能回來，那恐怕就難以挽回損失了。

安琪：你現在主要從事的還是人權層面的活動，將來在民主政治有所發展的情況下，你有沒有可能從政呢？

徐文立：這一點是比較明確的。現在還是初級階段的民主人權事業，作為一個政黨，還是不完全具備條件，但是追求一種多黨政治和從政的想法，我想這是不可否認的。我肯定是想通過搞政黨政治的方式，改變選舉制度的方式，來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發揮自己的作用。

安琪：有人在談到你的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時候，特別是在你談到有關民運對策的時候，說你是在幫助共產黨，甚至說你的活動跟官方有某種程度的默契。你個人怎樣對待這種說法？

徐文立：事實已經非常說明問題了，如果非要說我是在幫助共產黨的話，我是在幫助共產黨不要那麼專制，幫助共產黨改變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幫助共產黨變成一個社會民主黨。如果我能夠起這樣的「幫助」作用，我也不回避這種「幫助」。但是我絕對不可能去

幫助共產黨鞏固它的一黨專制和反民主反人權的一些作爲。事實證明，我們在大陸進行民主人權事業的朋友們，所受到的壓力是巨大的，我們不斷受到有關方面的騷擾。我最近被抄家的事實，說明在中共的眼裏，我們還是眼中釘、肉中刺，怎麼可能會成爲民主運動中的投降派去幫助共產黨呢？這是不攻自破的。要說與共產黨在某些方面有某種合作的可能，那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這種互動是民主社會中一種很正常的現象。民主社會在野黨和執政黨雙方都會有一些良性互動和在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這一點，認爲什麼事情只能是絕對的白或者絕對的黑，正是對民主社會的一種無知，並沒有完全擺脫共產黨的窠臼。

安琪：在你的具體工作中，你感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徐文立：共產黨所採取的一些政策，使得我們隨時處在一種緊張的壓力之下，所以有時候做事情可能粗糙一些。有些事今天不做，明天就有可能被抄家，人就被帶走了，有時候我們作事難免會急躁一點。我們做得粗糙或者急切的工作，希望朋友們批評，但是也請體諒我們在國內的環境之艱苦。

還有一點，國內的人經濟上是比較艱難的，我們這些人不可能找到比較像樣的工作，只能各自採取一些謀生手段。我通過自由撰稿、爬格子，在國外發表一些東西，有一點小的收入，但是大部分還是要靠朋友，好在我的朋友比較多。我認爲經濟上還是要立足國內，當然也歡迎國外的朋友給予適當的支援和幫助。有的朋友認爲，有的時候做事情就要

側著身子站著，就象魯迅先生說的。實際上只要你做事情，你永遠是側著身子站著的，壓力總會來自於不同的方向，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要感到奇怪，也不必覺得悲哀。

附錄

爲中共政府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後的法律形勢

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全國工人同胞們：

鑒於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正面臨對國營企業板塊動大手術的關鍵時期，鑒於當前全國各地時有發生工人遊行、集會、示威的事件，鑒於中共政府業已簽署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我們作爲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人們，特向大家提出如下幾方面重要的意見和建議：

一、工人階級作爲我國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之一，雖然從來不是什麼「領導階級」，但也決不應該是任何政府、企業領導或私營企業家擺佈的生產工具，《國際歌》早已

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全靠我們工人自己！

二、我們希望大家認識到，對國營企業進行市場改革，是現階段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想讓國營企業倒退回計劃經濟的時代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市場經濟逐步走向成熟的今天，想讓它維持目前的狀況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一般的國營企業除了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改革之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大家應當相信，在度過了國營企業體制轉型的最艱難時期，中國的整個經濟進入市場化的良性迴圈階段後，從總體上說，大家的經濟問題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和社會發展同步提高。

三、我們還希望大家認識到，國營企業職工因經濟體制轉型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包括勞保福利喪失、下崗、失業等問題，雖然發生在江澤民時代，卻是毛澤東搞「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結果，是長期吃「大鍋飯」的重重弊端，經過幾十年的積累，才造成了目前這種積重難返的局面，從八十年代以來，貪污受賄之風暴漲，雖然對國營企業的全面崩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性作用，但畢竟只是次生問題，而肇始於「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則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因此，我們希望大家能理解當今中共政府的改革政策，理解國家現行經濟政策的總體合理性。以我們的理性行為，促使中共在改革的道路上繼續進步。

四、我們中的許多人本身就來自產業工人隊伍，非常明白，工人除了工資以外沒有任

何生存依賴的現實，由於工人下崗、失業後喪失勞保福利，拿不到工資，退休工人醫療費報銷無著等等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中共拿國民進行共產制試驗遭到徹底失敗造成的。因此，中共及其政府理當為大家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為此，我們強烈要求中共及其政府合理地解決退休、病殘、下崗、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事宜，並做好再培訓和再就業工作。

五、我們堅決認為，遊行、集會、示威乃至罷工（儘管當今中國憲法在公民權利中刪除了這一條款）是天賦的合法權利，是任何個人、組織和政府所不得剝奪的。但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目前的特殊局面，我們呼籲大家為國家的經濟轉型有一個平和、穩定的良好氣氛而暫時不要行使它們。我們將在下面第六點中為大家提出一個更為可行的方法，請大家在用下面方法仍不能表達意見，仍不能合理地解決問題時，再考慮進行遊行、集會、示威。

六、中共政府已經簽署的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規定：
本公約締約各國承擔保證：

（甲）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以促進和保護他的經濟和社會利益；這個權利只受有關工會的規章的限制，對這一權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規定及公民社會中為了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為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

（乙）工會有權建立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

(丙) 工會有權自由地進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規定及在民主社會中爲了國際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爲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

(丁) 有權罷工，但應按照各個國家的法律行使此項權利。

據此，我們建議全國工人同胞們，立即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工會，組織起來共同捍衛自己的一切權益，就工資、福利、下崗培訓、就業保障、失業補償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及因應相關的問題與政府、企業領導、私營企業家或其他相關機構進行交涉。從當前說，尤其是國營工廠職工，更應在官方工會之外籌組自己的工會，因爲工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工會，才能對企業領導進行有效的監督，防止他們貪污受賄乃至蛀空公有財產，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工會，才能與他們任意懲罰工人、任意裁剪工人以及其他完全不顧工人合法利益的作法進行抗爭。

當然，有必要指出，工人同胞從現在就可以積極籌組工會，若正式成立，則應到政府指定的專門機關進行登記註冊，如果政府不予依法辦理，在反復交涉無效後，可以考慮以法律容許的方式施加適當的壓力，直到它正式批准爲止，在此申請期間，如遇非法阻攔，可考慮遊行、集會、示威，亦可考慮依據上述國際公約，同時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社會進行投訴。

還要必要指出，組織工會並由工會提出大家的意見、願望和要求，通過工會與相關各方談判以達到目的，是我們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尊重政府、企業領導、私營企業

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法定權力、責任、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福祉。為此，我們要善於挑戰，也要善於妥協，我們要把勞資合作與社會和睦，置於和大家自身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因為離開了大家的敬業樂業，整個中國社會將失去立足的根基，而離開了中國社會的和衷共濟，我們工人的幸福安樂也就沒有依憑！

全國工人同胞們，我們自立、自主、自強的時代已經來臨，大家成立工會的權利已為中共政府承認並受到國際公法的保障。讓我們把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向工人階級發出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略加改動後贈給大家：

全國工人同胞們，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借此機會，我們向全國工人同胞們拜個早年！

中國部分民運人士的發言人：秦永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於武漢

北京聯繫人：徐文立

香港聯繫人：盧四清

美國聯繫人：王希哲

就申請建立《中國人權觀察》事宜

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

並致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公開信

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

並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無庸置疑，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根本改善，主要取決於中國公民自身的人權覺悟和人權要求。

當然，作為中國大陸當前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於人權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亦至關重要。令人高興的是，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一九九七年十月授權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今年三月十二日，錢其琛副總理又重申了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承諾。

古人云：一諾千金。

所以，中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紛紛希望中共中央說得漂亮，更要做得漂亮。那麼，這裏就有一個怎樣才能檢驗中國共產黨在人權問題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問題。

依照國際慣例和經驗，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較徹底的改善除了本國政府、議會和獨立行使司法權力的機構付出巨大努力之外，至少有來自三個方面的關注和監督：

一、國際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獨立的監督機制、各國政府之間的互相監督機制、以及世界性人權組織的獨特的監督機制的相互配合。

——中國政府應該擯棄別國政府、世界人權組織只要對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就指責別人干涉中國內政的偏狹作法。

——應該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發生人權侵犯就是對全人類的人權侵犯。

——中國不但應該誠懇地接受別國實事求是的有關人權問題上的批評，也應該實事求是的批評別國、包括歐美各國的人權狀況不盡人意的地方，共同地為全人類的人權改善而努力。在這一點上，國與國之間的權利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應享有特權。

二、官方指定的半官方的人權組織，如中國的「人權學會」，應依照世界人權的普遍原則和有關條款監督和保障公民的人權得到切實的保護，使得每個公民能夠「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地生活在幸福、安定的生活環境中。

——中國「人權學會」不應該成為配合官方進行人權欺騙的禦用工具。

三、必不可少的「民間人權組織」，獨立地行使監督權力，以保障全社會的人權狀況的改善。

——沒有真正的民間人權組織，「官侵人權」的情況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止和制止。常

識告訴人們，「官官相護」普遍存在，公民不相信官方指定的半官方人權組織能夠有效地保護公民的人權，和制止官府的人權侵犯。

——當然，在允許民間人權組織存在的前提下，民間人權組織完全需要與半官方人權組織友善合作，共同解決一些棘手的人權個案。因為半官方人權組織具有純民間人權組織不具備的某些優勢。

以上三條，可以概括為「人權保障三條件」。

以上三條，缺一不可。

如果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不反對以上「人權保障三條件」的話，請允許我和我的朋友出面團結全國各界民間具有代表性的人士依法組成「中國人權觀察」這樣一個純民間的人權組織，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國政府、以及世界各人權組織的幫助、監督下，對中國人權的徹底改善作出應有的貢獻。

眾所周知，臺灣已有這樣純民間的人權組織，中國大陸沒有道理在這一點上落後於臺灣。

希望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在這一試金石前，不要失信於中國人民，失信於天下。

希望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各國政府也應該據此觀察中國政府簽署有關人權國際公約，到底是取信於中國人民，取信於天下，還是欺世盜名？

我期待著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的答復。

中國公民 徐文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徐文立年表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出生在江西安福。

父親是國民黨陸軍醫院院長，家眷抗戰期間隨後方醫院轉移，小學不固定。戰後回老家安慶上學。

一九五三年父親徐裕文因公犧牲，被迫認為烈士。

初中在長春師大附中就讀。

高中在北京七中就讀，畢業後，自願不考大學，自學一年。

一九六四年入伍，在海軍航空部隊。

一九六九年退伍，分配北京鐵路分局，任電工。

一九七一年與賀信彤結婚。

一九七二年女兒徐瑾出生。

一九七六年積極參與「四五」運動。

一九七八年參與「西單民主牆」，手寫第一份《四五報》；後與趙南的《人民論壇》合併為《四五論壇》。一九八一年被迫停刊，共出《四五論壇》十七期，編輯部設在徐文立家。期間廣泛接觸了民運人士和參與了各民刊組織的活動。

參與組織一九七九年國慶日為《星星畫展》舉行的「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的遊行；組織、張貼、油印了《魏京生審判記錄》、在西單牆前組織民意調查，發表演講，以個人名義在民主牆寫了《不公正的判決》、為魏京生鳴不平，為營救劉青做工作。多次發表文章和專談。為恢復齊白石名譽在海外發表文章。

一九八一年四月被捕，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十五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在北京第一監獄服刑，始終是在單人牢房單獨監禁，直到一九九三年假釋。一九八五年於牢房秘密寫出《獄中手記——我的申辯》在海外《中國之春》發表。在監獄中因此從單獨監禁改為單身禁閉五年，並在此間停止了家屬（每兩個月一次）的探視，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恢復接見家屬。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當局迫於國際輿論和謀求二〇〇〇年奧運會主辦權，在與美國有關最惠國待遇的交涉中，將他假釋出獄。在監獄中度過十二年另四十七天。

假釋後仍有四年「剝權期」，此間他克服困難，利用給母親安葬等機會多次離京外出，廣泛接觸瞭解社會民情，足跡遍及十幾個省市。

一九九五年對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發展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在晝夜被監視情況下，整理出版了《徐文立獄中家書》四十余萬字。

一九九七年「剝權期」結束，和朋友開始一系列、全方位的爭民主活動。主張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漸進地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在大陸民主運動中他主要是起協調作用。一九九七年成功開創「空中民主牆」用現代通訊手段，繼續二十年前的西單民主牆。

一九九八年七月為浙江民主黨組黨申請案呼籲組成「七·一零事件法律後援會」以聲援蒙難者。國際重要人物訪華期間，多次被公安帶走，或受到警告。

一九九八年十月往山東東平聲援受迫害的謝萬軍。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宣告成立「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黨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再次被捕。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將他判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罪名為「顛覆國家政權罪」。主要「罪行」：接受外國記者採訪；與韓東方對談；與秦永敏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組建「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宣判後，他當庭表示抗議，指出這是政治迫害，決不上訴。在看守所戴手銬寫出《我不上訴》的聲明。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三日在延慶監獄入監服刑。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驗血體檢。告之，只有腰椎稍有骨質增生，其他一切正常。三月份出現浮腫，疑有心臟、腎臟等病。家屬要求看病、治療不果。

一九九九年八月六日體檢後，確診爲肝炎，卻未獲有效治療，又不允許保外就醫。現狀：仍在獄中。現在骨痛、手關節痛，牙齒也掉了大部份。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我以我血薦軒轅

黑色文庫 第一集

作者／徐文立

出版者／勞改基金會黑色文章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廖天琪

封面設計／藍飛

華盛頓2001年12月第一版

定價： $\frac{\text{U.S. } \$18.00}{\text{N.T. } \$450 \text{ 元}}$

©作者 徐文立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非經作者及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複製和轉載本書文字和圖片。

*本書由勞改基金會設計，編輯及出版。若獲盈利，僅用作《黑色文庫》的出版費用。

I Shed My Blood to Color My Country

By Xu Wenli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1

ISBN 1-931550-14-X

Printed in Taipei, Taiwan